历史不糊涂

从唐朝风云人物揭秘中国政治传统

李拯◎著







历史是一面镜子，更是一种追问

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 **李辉**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杨光斌**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 **雷颐**

倾情推荐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历史不糊涂

作者:李拯

ISBN:9787508663777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推荐序一



历史是镜子，更是追问

读李拯这部叙述唐代历史的书稿，让我想到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千古名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孟浩然出生襄阳，曾隐居于鹿门山，有“孟襄阳”之称。一般将他冠以“田园诗人”，可是，我更喜欢他的这首《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这首诗不是田园诗恬淡、悠远的意境，相反，是海阔天空一样的纵横捭阖。我想象，孟浩然站在岘山之巅，目光随汉水而去，俯瞰潮起潮落。他在看人事代谢、朝代更迭、历史兴衰。诸多感触沛然而至，这才酝酿而成高屋建瓴、气势恢宏的千古名句。

李拯与我是随州老乡，来报社不久就认识了。30多年前，我刚入大学时随州还叫“随县”，隶属襄阳地区。读他的书稿，想到孟浩然的诗，再合适不过。他的笔下，一个个唐代人物的故事与命运彼此串联、衔接蔓延，呈现了唐代由无到有、由盛至衰的全过程，多少历史感叹，尽在其中。

巧的是，报社里随州老乡竟有好几个，偶尔相聚，不亦乐乎。2014年秋天，李拯与我坐在一起闲聊。他说起自己一直在阅读《资治通鉴》，对唐代历史颇感兴趣，想写几篇唐代人物，以人写史。如他后来所说：“我曾经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阅读《资治通鉴》的精神长

征，每一次掩卷沉思，窗明几净之时，似乎总能感到历史从过去伸向未来的邀请，那些慷慨悲歌的人物所折射的时代问题，怎么与此时此地的语境如此相似？”写唐代人物，的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想法。李拯计划先写李密和李世民两个人。我建议他，不妨从一开始就考虑形成一个系列，先在杂志上开专栏发表，然后结集出版。没想到，仅仅一年多时间，他就完成了14篇历史随笔，一个完整的唐代兴衰史在他的笔下得以呈现。

唐代历史，我知之甚少。小时候无书可读，回父母家乡枣阳，去乡下大姨妈家，二表哥手抄一本《说唐》，被我带回随县，看了一遍又一遍。知道了瓦岗寨，知道了长安，知道了隋唐18条好汉。有段时间，每天讲他们的故事，还与小伙伴们比赛，看谁能完整背下18条好汉的排序。说起李元霸、宇文成都、雄阔海来头头是道。原来觉得秦琼武艺高强，结果只排名16，想想觉得有些委屈。可是，18人哪一个不是好汉？从此，儿时心里，开创唐代的那些人物，每一个都是传奇。

“文革”后参加高考，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班上一位女同学颜海平，研究唐代文化，创作了话剧《秦王李世民》，轰动一时，并荣获全国优秀剧本等奖。话剧上演时，大家都去观看，舞台上演绎的唐代兴盛尤其令我们百感交集。“文革”浩劫刚刚结束，谁不期待百废待兴的中国能够尽快走出历史阴影，拥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和一个全新的生活？

这些算是我与唐代历史最直接的接触了，了解之肤浅，可想而知。直到李拯开始写作，我才有机会隔三岔五地拜读新鲜出炉的作品。通过他叙述的人物故事，略知唐代兴衰一二，在我而言，仅此而已。

有意思的是，酷爱历史的李拯，大学本科并不是文科生，而是理科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学院。硕士考试时，他转换学科，进

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从此，现实观察与历史思索与之相伴，须臾不可分开。其实，一个人的兴趣永远决定了他最后的选择。读他书中如下这番话，可以体会到当他遥望历史时，心底油然而生的敬畏之情。他的这番感慨，来自凝望北京潭柘寺的一棵千年古树：

> 人们在这棵树下冥想、祈祷或礼拜，寄托的对象并不是这些有形且繁茂的枝叶，而是这棵古树历经沧海桑田而积累下来的时间，是它经历的无数个夕阳西下、清风朗月和人事轮回。这棵古树，不过是变动不居的时间所代表的一个具象符号，而人们向古树祈祷，实际上是在向时间表达敬畏。
>
> 一个人、一棵古树，这样一个意象再恰当不过地揭示出人类精神的秘密：时间拥有一种更为本质的力量，而人类在内心深处对这种力量存有敬畏。

正是这种敬畏，才使李拯开始了他的唐代历史之旅。在史料与故事的剪辑、呼应与映衬中，他思索人物命运，追寻或许无迹可寻的历史规律。14个政治人物或人物群体，搭建成一本相对完整的历史叙述架构。与其他擅长讲故事的作者的作品不同，《历史不糊涂》的要点不在于铺陈传奇，而是试图勾勒一个个唐代著名人物的命运，归纳某种性格走向。不同的性格又与中国深厚的文化基因传统密切相关，即便伟大如李世民、武则天这样的人物，最终也不得不消弭于无形之中。

李拯谈到为何选择如下人物来贯穿整个唐代兴衰：

> 本书中选取的这些政治面孔构成了一个前后相续的连续体，他们的故事共同构成了有唐一代的慷慨悲歌：李密、李世民、长孙无忌、徐世勣、武则天代表了唐朝从建立到兴起的上升阶段；李隆基、李林甫、安禄山则活跃在唐朝达到巅峰而由盛转衰的转型时期；李泌、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裴度则代表了一个衰败王

朝力挽狂澜的努力；而李德裕、牛僧孺、宦官群体、黄巢、朱温则共同见证了唐朝的最后覆灭。每个人的人生际遇都与唐朝的命运起伏息息相关，而他们的命运构成的轨迹，就像唐朝吐纳呼吸的躯体一样，反映着这个王朝内在的政治机理。

研究政治学的李拯，在对唐代人物的叙述时，自始至终贯穿着难得的冷静思考。他显然是在有意识地摆脱传奇的轨道，将更深层次的政治学思考融入历史研究之中。是否准确，是否完整，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必须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言之成理的归纳。在阅读本书之后，读者或许可以更深切地体会他发出的感慨："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有时让人不知所措，热爱它的秦砖汉瓦、唐诗宋词，迷恋它的激情澎湃、婉约清新，就不可避免地发出沉重的叩问：伟大而美好的文明，为何难以走出治乱兴替的自我循环？"

对历史的敬畏，常常就藏匿于历史忧患之中。

总爱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其实，历史更是一种追问。因忧患而叩问，因叩问而思考。

仰望历史天空，一个巨大的问号，醒目地悬挂着……

李辉

著名作家

2016年4月28日于北京

推荐序二



文明基因是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根本

本书作者李拯，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近30年所教过的政治学专业最有才华的研究生之一。他的政治学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和扎实性自不待说，文采、口才也堪称一流。他博闻强识，熟读《史记》《汉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能够背诵其中大段落的叙述，是难得的人才。

读《历史不糊涂》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能把读者很快带入到千年前的"现场"，和唐代的那些人物一道品味"此情此景"，共度"此时此刻"。读者不自觉地进入了历史，而历史中的人物也栩栩如生地回到了当下，千年的历史，竟然构成瞬间的穿越，形成酣畅的对话。历史不由得让人扼腕，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居然搞不定自己的嫡长子和嫡次子，无奈之下只有让他并不满意的嫡三子李治继承皇位；而懦弱的唐高宗李治又搞不定自己的后宫，由此才有了武则天的横空出世，李家江山险些易主。这就是制度变迁的非预期性，如果一切都按照顶层设计而来，都是一帮李氏子孙主持大局，历史也就单调而无趣了。

历史固然有其非预期性，但中国历史有着自己独特的轨迹。我们为什么如此理解、同情历史中的玩家，而他们又为何具有如此强烈的现实存在感？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的历史观：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无论是唐太宗这样的大人物，还是芸芸众生中的小角色，中

国人都如此在乎“身后事”，从而共同构筑起宗教式历史观。所以，千万别说中国没有宗教。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中国人的儒学为何被外国人尊称为“儒教”，儒家思想确实内化于两千年来各色人群的血液中，从而内化为不变的生活方式。“儒教”虽然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部分，但宗教式历史的核心脉络就是儒家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上去无所不能的武则天，最终未能把李家的皇权转移到娘家人那里，借用本书作者的话说，这叫“权力败给了文化”。这样的思想性提炼可谓真知灼见，我想这一观点并不会因为唐代制度史研究成果之丰富而失去光芒。

能够“化”人的文明的力量为何如此巨大？比较文明视野下的中国文明更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几大古文明中，且不说早就灭绝了的亚述文明和玛雅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因野蛮人入侵而中断了几个世纪之后才因“文艺复兴”而成为今天西方文明的古典资源而已；古印度文明在经历两个世纪的殖民入侵后，其官方语言都被替代了；古埃及文明也早已式微，巴比伦文明的发源地已经变成了伊拉克这个样子，只有中华文明虽历经磨难却能够几度中兴——当下中国是新一轮的文明型国家的复兴。这里面必然有现代社会科学难以回答的奥秘，痴迷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学者需要对中华文明抱有敬畏之心，否则就错把中国当成西方了，最终必然要以西方的“药方”来“问诊”中国的“病症”，即用西方的知识来回答中国的问题，结果必然也是南辕北辙。能够保持4 000年的连续性存在，我认为是“中华文明基体论”（由文明基因组成的共同体）在起作用，这些基因包括但不限于：融合能力超强的华夏民族，最能体现民族性而4 000年不变的语言和文字，大一统的国家观，治国的民本主义，科举制，协商政治，社会生活的家庭伦理本位和郡县制下的皇权不下县的社会自治。正是这些文明基因，才使得中华民族虽然几度衰败而最终能够屹立不倒并再度复兴。

那么，唐代为中华文明贡献了什么呢？我们一般都说汉承秦制、清承明制，其实还应该加上“唐承隋制”，因为隋唐的最大贡献之一就

是夯实了大一统传统。秦汉的遗产是统一，但随之而来的便是300多年的分裂历史，这个时间长度几乎赶上统一的汉代。也就是说，大一统的中国在汉代之后并不是必然的，很可能变成今天的欧洲那般国家林立，但是隋唐夯实了大一统。隋唐之后，又经历了只有50年左右的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很快便是宋朝的一统，之后的1 000年便基本上没有了四分五裂的中国史——直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唐朝不仅夯实了大一统，也将科举制发扬光大。这些都是可以说得上来的“硬贡献”，而看不见的“软贡献”就是“贞观之治”文化遗产，这份遗产不但是今天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资源，更是宗教式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唐代之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就由西部移至东部，而这个大转移既是自然演化而来的，也是非预期的。755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地方力量开始坐大，颇有点儿今人所说的“事实性联邦主义”的味道。在这种局面下，唐朝的集权制式的财税体制也发生了改变，导致收不上税，而这一结果则促使地方商业中心的兴起——远离长安的开封（汴京）就是由此而来，后来成为赵匡胤首先得到的京畿之地。宋朝开封的人口已经多达百万，真是匪夷所思，集市发达，商业繁荣，文化昌盛，乡规民约让百姓安居乐业，难怪日本人说宋朝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了。谈及此，不得不感慨历史中更多的非预期性事件。试想，如果隋炀帝早年不在江南生活而看不到江南鱼米之乡的富足，会有大运河吗？如果不是隋炀帝在江南看到那么多富有才华的读书人闲散民间，会有科举制吗？这些改写中国命运的大手笔，或者说建制的产生，竟然那么偶然，那么富有个人色彩。

当然，代表“政治正确性”的历代史官不会这样书写历史，我们的历史观深受史官叙事的影响，而史官的叙事必然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这样，在“唐书”（《旧唐书》《新唐书》）那里，曾为建立唐朝做出卓越功绩的徐世勣，因晚年支持武则天当皇后就属大逆不道了，因为在儒家“夫为妻纲”的世界里，武则天本身就是异数。但是，如果没有了武则天，唐史不是缺少了许多色彩？何况武则天治下的唐代并

不像传统史书论述的那样不堪。这是从“回到历史”的角度看待武则天和徐世勣。而如果以今天的“政治正确”的标准评价武则天，比如以女权主义的标准，武则天与慈禧太后都是重要人物，需要重新认识。这不是笑谈。曾经，美国的杰克逊总统为推广白人民主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在美国有“杰克逊式民主”即大众民主之称，但因其对印第安人搞今天意义上的“种族清洗”，他的图像被从20美元钞票上拿下。历史可真是一部“观念的矛盾体”，因此评价历史人物需要超越“二十四史”。

是为序。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2016年4月30日

前言



时间的力量

我曾在北京郊区的潭柘寺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千年古树前面排起了顶礼膜拜的长队，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对着古树闭目祈福，神情专注，良久方罢。我被这个场景深深震撼。

那只不过是一棵树木而已，为什么能够激发人们最为深沉的敬畏之心？又是什么力量赋予了这棵树木超越自身的精神特性？显然，古树粗壮的树干、茂密的枝叶只是从审美的角度增添了情趣，并不能自在自为地产生精神的飞跃。我思来想去不得其解，后来突然意识到，或许正是这棵古树里面凝聚的时间，才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更高的价值和存在。

人们在这棵树下冥想、祈祷或礼拜，寄托的对象并不是这些有形且繁茂的枝叶，而是这棵古树历经沧海桑田而积累下来的时间，是它经历的无数个夕阳西下、清风朗月和人事轮回。这棵古树，不过是变动不居的时间所代表的一个具象符号，而人们向古树祈祷，实际上是在向时间表达敬畏。

一个人、一棵古树，这样一个意象再恰当不过地揭示出人类精神的秘密：时间拥有一种更为本质的力量，而人类在内心深处对这种力量存有敬畏。

而环顾世界，再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对时间和历史更加敏感、更为重视的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断代、在几千年里保持了连续性的文明体系，而且中国古人注重书写历史、延续历史。黑格尔也承认，“历史必须从中国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中国人生活在历史之中，精英阶层也以青史留名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历史所代表的时间之轴是中国人的精神寄托。

直到今天，年轻人仍然能够从司马迁的《史记》中获得启迪，从李白、杜甫的诗歌中寻找美感。正如杜维明所言，传统思想将永远存在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正因此，时间的延续、历史的视角是思考中国的基座。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早就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基于中国自己的条件，而不是其他国家的经验。因此，与走向未来一样重要的是回归传统。

而回归传统，首先应该理性地认识历史和传统。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面说过这样一句话，“橘黄色的落日余晖下，一切都被蒙上一种怀旧的色彩，哪怕是断头台”。这句充满了诗情画意的话，其实饱含着深刻的方法论智慧。就像落日的余晖一样，时间的累积本身就会因为厚重而产生一种温情，而这种温情有时候会让人不自觉地忽视历史锦袍上的虱子，只是关注锦袍自身的美好。或者说，越是古老的事物，越是能够勾起人们内心的美好想象，而这有可能导致人们不假思索地将传统浪漫化或者完美化。历史之中，既有丰富的智慧，也有深刻的教训。

因此，回归传统的前提是客观地、理性地认识传统，而在传统之中孕育未来，既包含对传统的自然延伸，也包括从传统中得到的反思和教训。本书中选取的14个唐朝人物（人物群体），其中很多人是时代思想的精华，是传统文化里面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理想代表，也有一些人穷凶极恶，书写他们故事的著作不胜枚举，道尽了他们人生

的各个层面。但本书只是采撷他们人生中最闪光的一个点或者穷极一生的困惑，并以此观察他们的思考与挣扎，最后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理性的反思，形成一幅揭示中国政治传统的认知图景。

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具有本体意义的问题或许是：伟大且美好的文明，为何难以走出治乱兴替的自我循环？就像唐朝命运所展示的一样，唐朝曾经创造出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最后仍然陷入了自我瓦解，而它之后的历朝历代仍在延续着“自我重建、自我毁灭”的剧情。历史不仅仅是忠实的记录者，更像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审判者。历史从不糊涂，也不会打盹小憩。古代的那些帝王将相稍有懈怠，它都会了然于心，并启动治乱兴替的机制，创造新一轮的改朝换代。历史不糊涂，任何人都别想蒙混过关。

本书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因此不追求宏大而严密的逻辑体系，它只是想通过一个个人物的挣扎或困惑，去触及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许本书的结论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赞同，甚至还会遭到尖锐的批评。但是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给大家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展现出的历史景深和某些字句给人带来的灵光一闪的启示。浅阅读能从本书中体会治理艺术，处世之道与命运无常；深阅读能从中领悟政治与人性中的深层奥秘，而文字本身还能给人带来一种穿越历史的美好体验。看见什么或许言人人殊，但观察的视角却应该尽量多元化，这本书就力图展示出不一样的视角。

博尔赫斯曾引用这样一句话，“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对新事物的认识无非是一种回忆”。其实，无所谓过去、现在与未来，因为现在就包含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因此，历史不是关于过去，而是关于现在和未来。或许，这本书呈现的14个唐朝人物（人物群体）的命运轨迹，能够让人们透过时间去凝视永恒之物，既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延伸的未来之中。

第一章



李密：“预言自我实现”的魔咒

李密的一生就像流星划过夜空，骤然照亮了无边的黑暗，但正当这些许光亮给人带来希望时，却在顷刻间归于沉寂。在隋末唐初起义的诸侯中，李密首倡大义、引领风气。然而，李密似乎也只是历史的报幕员，就像陈胜、吴广只是为刘邦、项羽鸣锣开道一样，为后来者搭建起“逐鹿中原”的舞台。

在“诸神之战”的黄昏，李密曾被寄予拨乱反正的厚望，他征服的领地曾东至大海，南至江淮，在诸侯中独占鳌头；而从“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角度，他的麾下更是济济多士、群英荟萃，例如秦叔宝、单雄信、程咬金、王伯当、徐世勣等人都是勇冠三军、天下驰名的英雄好汉，尤其从秦叔宝、程咬金、徐世勣后来辅佐李世民荡平天下的事迹就足以说明李密麾下人才之盛。但是，占据地利人和的李密，为何不能完成削平群雄、定于一尊的事业？

老子把“不敢为天下先”当作“三宝”之一，李密的失败似乎应验了这条权谋学的经典语录。然而，如果仔细审视李密旋起旋灭的曲折人生，他的成功、得意、失败，又远非权谋或厚黑所能解释。当他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之时，他所利用的政治资源来自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隐秘传统，即上至天子、下讫庶民都深信不疑的“图谶”之学；当他损兵折将、进退失据之际，促使他投靠李唐并因此坠入失败深渊的原

因，则揭示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心照不宣却从未捅破的秘密，即君臣之间并非如同股肱手足，而是往往处于利益的对立面。用现代的话说，员工与老板的利益并不一致。

“预言能够自我实现”。童谣或图谶所蕴含的神奇力量，其根源都在这句话之中。李密本是名门之后，曾祖父是北周的太师——魏国公李弼，父亲是隋朝的上柱国——蒲山郡公李宽。家庭出身高贵并不是李密笼络人心的最大优势。在群雄间能够一呼百应的根本原因则是李密故意将自己解释为“应在图谶”的真龙天子。隋朝末年，天下群盗蜂起，江山风雨飘摇，而在易代之际，人们总是相信图谶能够揭示出未来的重大变革。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图谶都说，李氏将取代杨氏坐拥天下。李密正是在这一点大做文章，在思想舆论上争取人心，让人们相信他就是图谶所预言的救世主。预言的魔力，把李密送上了人生的巅峰。

然而，虚无缥缈的图谶之学，毕竟敌不过坚硬的权力法则。在被王世充逼退洛阳之后，李密跌入了人生的低谷，但他并未输得血本无归。部将徐世勣仍然统领着黎阳，王伯当还占据着河阳，即便是兵败之后，他还有两万多人的散兵游勇。人生足可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不至于一战成擒。就在这时，李密遇到了中国历史上很多英雄人物都曾面临的问题：他作为“主公”想要卷土重来，而部属却想投靠李唐。利益诉求的对立，在这时以命悬一线的方式呈现出来。

然而，李密在应该坚强的时候软弱了，在应该决断的时候犹豫了，以至于他最终被部属的私利捆绑，走上了投靠李唐的不归路。李密或许会死不瞑目：为什么投降不符合他的利益，却符合部属的或者说“官僚集团”的利益？

初次革命的失败

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少年时期，李密也在少年时就初露峥嵘、与众不同。由于蒙承祖荫，李密被选拔到皇宫里面做侍卫，年纪轻轻就混到了皇帝身边，前途可谓一片光明。但隋炀帝杨广只见了他一次，私下就对宇文述说："个小儿视瞻异常，勿令宿卫！"杨广初睹其面便产生了某种不祥之兆，这个细节更像日后李密举兵反隋的隐喻。

宇文述只好煞费苦心地对李密说了一番劝退的客气话。换作别人，或许会为失去工作而哭哭啼啼，但李密却表现得识度不凡，"大喜，因谢病，专以读书为事"。因此才有了"牛角挂书"的千古佳话。有一次，李密骑着一头黄牛，将《汉书》一帙挂于牛角上，一手捉牛虱子，一手翻书阅读。茫茫天地间，一个少年不为路边的樱红柳绿所扰，亦不为踢踢踏踏的牛蹄声所动，悠然自得地沉浸于阅读的精神世界里，这幅画面对读书人具有不可思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被打动的人中间就包括在路上偶遇李密的隋朝尚书令杨素。于是杨素按辔追上李密，好奇地问道："何处书生，耽学若此？"李密自然认识名重天下的杨素，于是下牛再拜，自言姓名，杨素与语大悦，愈益奇之。吊诡的是，李密读的恰是《项羽传》，这似乎也暗示着他会像项羽一样骤起骤落。

杨素是历事两朝的勋臣宿将，不仅战功卓著，而且是经营政治的高手，当时在位的皇帝杨广，就是在他的力挺和密谋下，挫败原来的太子杨勇而登上皇位。通过扶持器重自己的皇帝，来保证自己的权势能够代际传承，杨素对子女的安排真可谓"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杨素看重李密，一方面说明李密确实是人中龙凤，另一方面也有杨素自己的私心作祟，那就是为子孙后代笼络李密。杨素对儿子杨玄感等人说："吾观李密识度，汝等不及。"于是，杨玄感倾心结纳，与李密情好日笃。

按照杨素的设计，杨玄感继承父爵，而李密正可作为杨玄感的幕后智囊，以此确保杨家富贵长久。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与期望背道而驰，杨素已经位极人臣，他儿子杨玄感站在这样的起点，如果还想有什么人生抱负的话，再往上走就只能当皇帝了。而杨玄感恰恰就有此狼子野心，他的志向不是守住父业，而是在此基础上夺取皇位、窃取天下。杨玄感与李密，两位职业革命家就这样走在了一起。从此，天下再无宁日。

公元613年，也就是大业九年，隋炀帝第二次东征高丽，杨玄感受命“于黎阳监运”。当此之时，天下骚动，按捺不住的杨玄感终于决定起兵，并立刻派人把李密接了过来。李密为杨玄感献出了三条计策，上策是直接占领蓟县，截断隋炀帝的退路，使隋炀帝进无所攻、退无所守；中策是西入长安，占据隋炀帝的巢穴，以此号令天下；下策是攻打洛阳，“顿坚城之下，胜负殊未可知”。这三条计策，既展现出掌控全局的战略能力，也表现出不择手段的心狠手辣，尤其是心狠手辣这一点，既成就了李密的辉煌，也将摧毁所有的繁花。没想到，杨玄感对前两条计策嗤之以鼻，说：“公之下计，乃上策也。”但一切正如李密所料，洛阳鏖战，进有坚城阻隔，退有官军夹击，杨玄感旋即以失败而告终。革命失败，元恶既诛，胁从被罪，李密难以独善其身，也被官军抓捕了。

但职业革命家向来都有金蝉脱壳的办法，他用金子贿赂执行任务的官差，因此成功出逃。跨出这一步，就意味着他与朝廷彻底一刀两断，从庙堂之高走向江湖之远，走向广阔的天地、苍茫的云野和陌生的人群。革命进入低潮，革命家的人生也陷入低谷。李密开始进入漫无目的的流亡岁月，他先是投靠平原的黑社会，在遇冷后又前往淮阳，隐姓埋名、聚徒教授。而在这段郁郁不得志的时间里，李密常常诗书遣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时来运转之际，市井徒、刀笔吏、屠狗辈都

能千古留名，何况于我？李密满身都在蓄积能量，就像千年火山在伺机喷发。

很快，机会就会来敲门了。翟让、王伯当、徐世勣、秦叔宝、程咬金等绿林好汉正啸聚山林，这群乌合之众，缺少一位能将众人力量组织起来的领袖，一种将黑帮团伙转变为军事集团的革命理论，更需要一张能激发信念、为所有人指明奋斗方向的未来蓝图。这一切，似乎都等待着李密的粉墨登场，等待着李密画龙点睛的关键一笔。

从隐姓埋名到峰回路转

乌合之众与政治集团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只是亡命之徒的松散结合，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缺少严密的组织体系；而后者不仅具有鲜明的政治蓝图和奋斗目标，而且有制度化的组织架构和决策体系。尽管如此，二者却完全可以表现为相同的“肉身”。同样是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翟让为首，就是乌合之众；李密为首，则为政治集团。

这就像马克斯·韦伯笔下的“超凡魅力型领袖”，李密恰好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一个政治领袖最需要具备的素质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许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是有一点共识，那就是政治领袖应该描绘未来蓝图，并将这种蓝图灌输给普通人，成为其理想信念，使他们自觉为之不懈奋斗。而李密恰恰就是规划未来蓝图的高手，他既有预言家的高瞻远瞩，也有演讲家的煽动能力，不仅善于用美好的蓝图打动人心，而且能以激情洋溢的话语取信于人。

显然，翟让等人啸聚山林，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政治集团应有的“肉身”，但是他们只知道打家劫舍、锄强扶弱，并没有远大的目标，因此，也可以说是没有灵魂、没有方向；而李密虽然独自一人，但是脑袋里面却装着纵横四海、经略天下的理论和蓝图，他只是缺少一个实

现战略构想的现实载体。可以说，翟让等绿林好汉需要一个战略蓝图，而李密则需要一支现成的军队，如果双方真能完成“肉身”与“灵魂”的结合，那岂不是要摇身一变成为极具实力的政治集团？而事情的发展，正朝着这个方向不断靠近。

李密在淮阳又遭到举报，于是再次逃到东郡，听说当地的贼帅翟让“聚党万余人”，于是前往投靠。翟让这边有人知道李密是杨玄感的亡将，于是劝翟让秘密将其杀害，翟让遂将李密囚禁起来。然而，最冰冷的绝望，往往能激发最热烈的激情，李密在临近鬼门关时，将其煽动能力发挥到极致，他通过贼将王伯当向翟让献计，“当今主昏于上，人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京都，此亦刘、项奋起之会”。意思是说，现在皇帝昏庸、民怨沸腾，从外部形势看，东征高丽拖垮了精锐部队，也断绝了与突厥的和亲，隋朝已经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从内部形势看，隋炀帝竟在这时巡游扬州，这正是起义的好机会！于是，一幅逐鹿中原的蓝图就印在翟让心中，让这个只知打家劫舍的莽汉怦然心动。接下来，李密顺水推舟说道，“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士马精勇，席卷二京，诛灭暴虐，则隋氏之不足亡也”。这是以“席卷二京”的未来预期来引诱翟让心中躁动的野心与渴望。果然，一言之下，翟让不仅不再把李密当作朝廷的通缉罪犯看待，而且“深加敬慕，遽释之”。

接下来，李密就开始用系统的革命理论和战略部署来改造这群乌合之众。他深知现在聚众为盗、自给自足固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想要成大事、谋大业，就必须要获得自己的土地、财政与源源不断的人才。于是，李密为翟让规划出第一步战略部署：“未若直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勇马肥，然后与人争利”。也就是说先占据荥阳，获得一个革命根据地，然后再深根固本、以图天下。有目标、有蓝图、有部署，起于草莽之间的翟让等人哪里想过在打家劫舍之外，还有这么宏伟壮丽的事业，在落草为寇之外，还有跻身王侯将相的美好未来？

而李密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书生，他在规划蓝图之后，更能亲自领军上阵杀敌，将蓝图变为现实。荥阳通守张须陀骁勇善战，曾经大败翟让，这让翟让一直心有余悸。于是，攻打荥阳时，听说张须陀率兵来战，翟让竟“大惧，将远避之”。李密这时便向这些绿林好汉展示出智慧谋略比单纯的暴力更能克敌制胜。他对翟让说：“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擒之。”于是自己分兵设伏于树林间，让翟让假装战败撤退，等张须陀趁势追来，李密则绕到敌军身后，翟让亦当其前，前后夹击，“大破之，遂斩须陀于阵”。夺取荥阳，既证明了李密战略部署的正确性，也向众人展示了其有勇有谋的人格魅力。而李密“躬服俭素，所得金宝皆颁赐麾下”，大得人心，这些都为李密取代翟让埋下伏笔。

在攻下荥阳之后，李密又开始规划远景目标，他继续对翟让说：“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换言之，这次的战略目标是：攻打洛阳、直接去袭击兴洛仓，彻底摆脱江湖草寇的身份，并开仓发粟、赈济贫弱，以吸收有生力量、壮大军队。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打下兴洛仓，直逼朝廷的东都洛阳，就像一把尖刀直插朝廷的心脏，也就直接走上了与朝廷对抗的擂台，从此就要真正开始逐鹿中原的事业。至此，翟让不仅完全被说服了，而且也认识到一旦走上逐鹿中原的道路，自己便没有能力担任领袖职务，连说：“仆起陇亩之间，望不至此。必如所图，请君先发，仆领诸军，便为后殿。得仓之日，当别议之。”所谓“得仓之日，当别议之”，实际上是在含蓄表明，一朝攻下兴洛仓，便以主公之位相让。

果然，破仓之日，翟让即率领众人推李密为主，号为魏公。李密刚获得一块可进可退的根据地，就立即命人写下讨伐隋朝的战斗檄文，尽数隋室之罪，这实际上是为自己造反制造正当理由。“未有暴虐临人，克终天位者也”，而自己则是要结束隋朝暴虐统治的救世主。李

密终于走出人生的低谷，展开排云而上的翅膀，开始了一飞冲天的奋斗。

可以说，正是李密的鼓动，为这群乌合之众指明了奋斗方向，使之正式成为逐鹿中原的政治集团。李密一介书生，却掌握了“思想”这个最锋利的武器，能够在无形之间斩断所有刀枪剑戟，为这支队伍赋予了崭新的“灵魂”，让这群绿林好汉如凤凰涅槃般获得重生。

而在这个过程中，李密不仅使用了理性的力量，还发挥了有勇有谋的人格魅力。

用“预言自我实现”笼络人心

李密懂得应该积极开展“政治营销”，揭开中国古代政治最为隐秘的传统，并从中获得超乎寻常的力量，为自己在诸侯之间赢得了无人企及的威望。

李密这次使用的武器，就是预言的力量，也就是启动“预言自我实现”的功能，为自己问鼎中原制造神秘的信念，以此取信天下、笼络人心。“预言”在中国古代政治有两种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一种是童谣，另一种是图谶。在治乱交替的中国历史中，一旦天下大乱，往往就会出现包含预言未来的童谣或者图谶，而它们具有宗教先知般的巨大魔力。

图谶是把预言与巫术结合起来，让人们相信某种政治预言并自觉为之奋斗。说白了，图谶是一种融合了超自然力量的预期管理。这就像股票的涨跌仰赖于预期一样，当所有人都相信一只股票会涨价，即便它事实上不会涨，人们的预期也会促使需求增加、股票涨价。这正是“预言自我实现”的奥秘，而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将之运用于政治生

活中。陈胜、吴广起义，把“大楚兴，陈胜王”的字条放在鱼腹中，让士兵觉得这是天意；曹丕代汉自立，就在“代汉者，当涂高也”的图谶上大做文章，宣扬“当涂高”即是“魏阙”。

在隋末唐初的乱世岁月中，童谣与图谶同样应运而生，而且都神秘地指向“李氏将兴”的目标。当时，天下流传“李氏当为天子”的图谶，加上隋炀帝本来对门族强盛的郕公李浑心存嫉妒，于是找理由杀了李浑宗族32人。杨广对李姓大臣大开杀戒，不仅促使后来成为唐高祖的李渊最终起兵造反，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李氏当为天子”的预言更加具有可信度。道理很简单，如果“李氏当为天子”的预言是假的，皇帝为什么如此重视？皇帝为此大动干戈，本身就说明这一预言具有极高的可信度。而李密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把自己对应为图谶里面所说的那个“李氏”，而且方此兵荒马乱之际，他是地盘最大、兵力最强的诸侯，这更加坚定了他就是“应在图谶”的真龙天子。

与此同时，童谣也开始爆发相应的力量。当时有个叫李玄英的人从东都洛阳逃来，经历诸贼，求访李密，并说：“斯人当代隋家。”别人问为什么，李玄英开始“道破天机”：最近民间有一首叫作《桃李章》的童谣，“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这看上去像是前言不搭后语的天书，解读之后则暗藏玄机：“桃李子”，说的是逃亡的李氏之子；“皇与后”，都是皇帝的称呼，意指隋炀帝；“宛转花园里”，是说隋炀帝巡游扬州；“勿浪语，准道许”，是说那个真命天子的名字是“密”！到这里，一幅清晰的政治预言图景呈现出来：隋炀帝将死于扬州，李密取而代之。李密能够将他的政治构想灌输给那些绿林好汉，一个重要的媒介就是童谣与图谶的魅力。在听说这个“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预言后，群盗皆以为然，“由是渐敬密”，李密的思想由此而进入人心。

李密不仅善于运用正面的预言来经营自己的形象，也善于用负面的预言来诋毁对手。他在讨伐隋朝的檄文中，就将中国古代的图谶、

星象等超自然学问发挥到极致。在数落隋炀帝的10项罪名之后，李密接着指出："故谶箓云：'隋氏三十六年而灭。'此则厌德之象已彰，代终之兆先见。"意思是说，隋朝暴虐，不仅引起人怒，更招致天怨，图谶里面早就说隋朝只有36年运数，而且"厌德之象已彰"，李密接着举出最近出现的异常天文地理现象，例如"岁星入井""正阳日蚀""川竭山崩"，说白了都是预示着隋朝将要"宗庙为墟"的怪象。借助天人感应的神秘信念，李密不断论证隋朝将亡，而自己将取而代之，以此不断制造舆论、争取人心。

总之，那些对李密有利的图谶与童谣，若放在现代，可能被视为是一番鬼话，但在当时却抓住了人们认知系统的盲点。其实，任何逻辑建构、话语体系都无所谓正确或荒谬，关键是要有人相信。信则有，不信则无。李密可以说是深谙此道，通过诡秘莫测的图谶、童谣和天人感应学说，不仅赢得了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而且赢得了天下威望。

一次失败而坠入悬崖

雄兵甲于诸侯，威望著于天下。李密的人生似乎树立起一架拔地而起的天梯，只需要拾级而上，就可以实现"并海内，兼诸侯"的千秋功业。然而，"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在表面的繁华之下，问题的毒瘤正在悄然萌芽。

首先，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翟让主动让贤之后，李密与翟让的关系就比较敏感了。对李密而言，翟让虽有禅让之德，但正因此，也是他稳固权力的最大隐患，尤其是随着李密的事业越做越大，利益的蛋糕也越来越大，更让二人的关系处于微妙的紧张状态。翟让的哥哥完全不懂这中间的道理，竟对翟让说："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这话传到李密那里，无论翟让本人是否有意夺回权力，懂得零和

游戏规则的李密定会先下手为强。于是，李密摆下鸿门宴，杀死了翟让，还把翟让的部将徐世勣给砍伤了。注意这个细节，它将会在关键时刻决定李密的命运。

翟让一死，李密看似稳固了地位，但实际上得不偿失。其一，手刃恩人，留下了抹不去的道德污点；其二，翟让的老部下即便不会反抗，也会在心里留下疤痕，播下猜忌的种子。李密以一个外来人的身份突然成为整个集团的领袖，凭借的是他胸中的战略蓝图以及图谶赋予的神秘光环，而他与各位部将的关系却不会因此而立刻稳固，需要假以时日慢慢巩固。李密还没有坐稳位置，就杀害了对自己有禅让之恩的翟让，也必然会让将士寒心。从此，这支令行禁止的军队就因为旧主翟让之死而出现了深深的裂痕，这为后来关键时刻时李密众叛亲离做足了前戏。

而这时，天下扰攘，群雄逐鹿，李密与王世充鏖战洛阳，互有胜负。李渊与李世民起兵于晋阳，正要驱兵入关，占长安以号令天下。在此形势下，李密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他的谋士柴孝和劝谏说，现在不应该鏖战洛阳，而应该“亲简精锐，西袭长安”。历史何其相似！这曾经是李密向杨玄感献出的计策，这时又有人对李密献出同样的计策，而且杨玄感不听从李密的劝谏，与此时李密不听柴孝和的劝谏，也如出一辙。李密劝谏别人的事，自己却做不到，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诚不我欺！

而老谋深算的李渊恰好看到了这一点，为了让李密与王世充继续交战，而给自己攻破长安留下空间，他给李密写了一封卑躬屈膝的信：“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余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惟冀早应图**箓，**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意思是说，现在天下大乱，而能荡平天下的，非李密而谁？李渊也懂得利用“图谶”的预言来抬高李密，劝李密“惟冀早应图**箓，**以宁兆庶”，而自己则“年余知命，愿不及

此”，这是在有意自我贬抑。显然，李渊在表面的卑微恭顺之下，真实目的就是要捧得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忽略自己这个潜在敌人。李渊的目的达到了，李密不仅把信公之于众，而且洋洋得意地宣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也！”

他哪里知道，“鸷鸟之击也，必匿其形”，李渊就是要稳住他，使之继续对抗王世充，为自己占领长安争取时间。

李密缺少李渊的能屈能伸与忍辱负重，却比李渊更加爱慕虚荣，心狠手辣，而老谋深算却不足。他具有卓尔不凡的煽动能力，却缺少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条分缕析的能力，常能以理动人、以情感人，却难切近事机、随机应变。前者让他能够在政治宣传中笼络人心，后者则让他在具体实践中走向失败。

不久后，李渊果然从太原一路向西攻下长安，占据了正统的地位，而李密则在与王世充的鏖战中失利，与部下弃甲曳兵、落荒而逃。失落、沮丧、气馁等负面情绪笼罩着整支军队。虽然是一次惨败，但是李密当时的地盘足够广大，还不至于山穷水尽，完全有资本东山再起。当时，徐世勣统领黎阳，兵多粮广；王伯当占据河阳，地狭势蹙。李密如果前往黎阳，或许历史就会改写，但是他因杀翟让时伤害过徐世勣而耿耿于怀，关键时刻又没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胸怀。而逃往河阳的结果，则是带上王伯当一起亡命天涯。未来何去何从？是继续举旗争霸，还是投降他人？李密遇到了历史上不少英雄人物都曾面临的抉择。

李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进取”，也就是他想继续举旗争霸，但是部属都说，现在众心危惧，人情不愿，肯定难以成功。潜台词是，咱们还是找个人降了得了！接着就有人出主意说您与唐公李渊同姓，虽然没有一起举兵，但是鏖战东都，使唐公不战而据京师，您也是大功一件。潜台词是，降了唐公李渊是个不错的选择。

古人云，“成大事者，不谋于众”。李密的性格弱点这时暴露无遗，他没有信大义于天下的胸襟，猜忌徐世勣从而断了后路，也缺少统合众人意志的决断力，曲意逢迎部属进而毁了前路。投降李唐的结果是部属官复原职，而李密身首异处。

部分利益绑架整体利益的深思

听闻李密这个潜在劲敌前来投靠，李渊当然喜形于色，特地遣使迎劳，相望于道，李密也望之大喜，满心期盼“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然而，李密自废武功，束身就擒，当所有功业都已是明日黄花，他凭什么来换取礼遇?

投降没多久，李密就感到命运对自己的无情嘲弄。一方面，在李唐“礼数益薄，执政者又来求贿”，让他心郁郁、意快快；另一方面，战败的部将并不归附王世充，他如果当初不投降李唐，足可与李渊、王世充、窦建德等诸侯鼎足而立、以争天下，如今却寄人篱下，这让他扼腕叹息、追悔莫及。在痛苦的折磨下，他决定谋求出关，招揽旧部，卷土重来。于是，他向李渊汇报，愿前往山东说服旧部归顺，实际上是想金蝉脱壳。李渊一开始被表面的利益迷惑，竟答应了他的请求，后来大臣劝谏不能放虎归山，李渊才恍然大悟，立即追召回京，而李密这时正急速亡命，只好公开叛变。然而，天地之大，李密竟无处可逃。

李密英雄一世，最终惨死在一个叫作桃林的小县城，悄无声息地像尘埃一样从历史的缝隙中落下。他本该在历史长河中投下巨石、掀起巨浪，最后却淹没在历史的浪花之中，只留下波澜不惊的水面。

当代金融大鳄索罗斯曾说，参与者的看法影响事件的发展。因为现实选择是“未来投到当下的影子”，可见预期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

响。李密的失败，证明了那些童谣或图谶的虚幻，也说明预言并不总是能够自我实现。王夫之在评价童谣的预言功能时，这样表达质疑："岂果祸福之机，鬼神早泄其秘于童稚之口哉？"确实，童谣的产生并不是因为鬼神，而是来自于人的创造。马克思说，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其实并不存在所谓超自然的预言能力，政治精英不过是利用巫术传统影响舆论、争夺人心。

当年北周与北齐两雄争霸，北周有韦孝宽，善用间谍；北齐有斛律光，善于用兵。斛律光不仅兵权在握，而且是北齐后主高纬的老岳父，权势熏天。韦孝宽抓住机会，制造童谣云："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举"，以此"预言"高氏将崩、斛律将兴，结果北齐皇帝高纬对"童谣"深信不疑，果然处死了大将斛律光，为北齐覆灭埋下了伏笔。高纬哪里知道"童谣"并不是得之于天，而恰恰来自竞争对手的编造。

这说明，童谣或图谶所产生的预言会影响人们的预期。但有时候预言与谣言仅有一步之遥，如果把谣言当作预言，则会在扭曲的预期中将现实推入万丈深渊。因此，可以利用预言管理预期、争取人心，但无法将成功完全寄托于预言的"自我实现"。罗素在《权力论》中说："舆论是万能的，其他一切权力形态皆导源于舆论。"但他也承认这需要一个"交互的过程"，或者说，在"预言"与"自我实现"之间，还需要跨越重重现实阻隔，而李密就在部属的私利面前折戟沉沙，遭遇了失败的滑铁卢。

李密熟读史书，难道没有读过鲁肃劝孙权抗曹的章节？曹操80万大军压境，是战是降，在孙权的江东集团引发了激烈争论。孙权面临的问题与李密此时的处境可谓如出一辙。

鲁肃在关键时刻说出的一段话，虽是异时异地，却充满对官僚政治的深邃洞察，足以彪炳古今。鲁肃对孙权说，江东谁都可以迎曹，唯将军不可迎曹！为什么？因为官僚迎曹，无非是换个主子打工，犹

不失“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而将军迎曹，只有被软禁甚至谋杀这两个结果！官僚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对立，在这时表现得如此赤裸裸而又血淋淋。这才有孙权“此天以卿赐我也”的感慨，才有以弱抗强、以小博大的勇气。

可惜，李密的身边却没有一个像鲁肃这样的人。同样的道理，所有人都可以降唐，唯有李密不可，因为部属无非易君而事，官品不丢，俸禄不减，甚至还会获得更大的晋升空间。只有李密才代表李密集团的整体利益，这个集团的任何一个零件，都只会考虑它自身的穷通荣辱，而不会把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这就像在一个企业里面，企业家才代表企业的整体利益，承担了全部的风险，企业倒闭了，企业家将一无所有，而领取固定工资的员工，只需要换一个地方打工。李密的困境就在于此，他失败了，但是部属还可以换个老板打工。

事实上，这正是部分利益对整体利益的异化。如果说这时二者的冲突以极端方式呈现出来，那么在制度的日常运转中，这正是朝廷意志难以贯彻到底的根源。害怕农民起义、担忧江山易主，这是皇帝从整体利益出发感到的压力与责任，这种压力也是皇帝不断整顿吏治、惩治腐败的根本动力。然而，这种压力与责任在沿着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向下传递的过程中，也必然会遭遇层层递减的困境，因为官僚不会像皇帝那样从大局和整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只会考虑自己耳目所及的小局和部分利益。韩非子以极其强烈的对比，将君臣之间的利益冲突直白地道出：“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

这与李密在危急时刻面临的困境何其相似。一家一姓的王朝可以更替，但是无论谁执政，都需要笼络精英治理天下，于是，官僚的利益从根本上就与皇帝的利益出现分歧。这就是为什么，皇帝必须不断地强调“忠君体国”的重要性，宣扬“修齐治平”的价值，为的都是从道

德层面让官僚更多地从朝廷存亡和整体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只可惜，皇帝与官僚“委托—代理”的链条越长、层级越多，道德约束作用越层层递减，整体利益最容易在基层被部分利益异化。

李密曾借助预言的魅力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却终究屈从于坚硬的现实法则。如果他“牛角挂书”读的不是《项羽传》，而是《鲁肃传》，他的人生是否会改写?

李密之后，李渊在他的儿子李世民的辅佐下，最终建立了唐朝的百年基业。而李世民继承皇位之后，选贤任能、励精图治，也一度克服李密曾经面临的难题，使得官僚集团共襄贞观盛世。然而，李密没有成功，所以不必考虑权力继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却会噬咬李世民的心灵。

第二章



李世民：寻找合法性的失败

公元643年，李世民登基做皇帝已经17年了。他脚下的土地，东西南北都延伸到人力所及的极限；他治下的社会，据说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境界。这是贞观之治的鼎盛时期，天下一统，四海升平，蛮夷外服，百姓安居，而已届不惑之年的李世民，正值政治生命成熟之时，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可胜败兴亡，从来只是转瞬之间。外患既除，内忧将兴。忧从何来？贞观十七年正是盛世景象下的一个转折点。欧阳修曾评价这位盛唐皇帝，“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他有着睥睨群雄的文治武功，但也在这一年面临着重大考验——选择接班人，确保权力平稳传递。这曾经难倒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们，而李世民也只欠缺这最后一块政治拼图了。

只可惜，正是这个千古难题对他的身心造成了严重打击。一场太平盛世下的宫廷风波，终于在贞观十七年归于平静。帝国的权力继承，就像疾驰而过的列车在他心头碾过，那疼痛只有他自己懂得。太子李承乾由于谋反被废为庶人；魏王李泰则被贬往京外；晋王李治，一个暗弱、无能、多愁善感的男人成为最后的赢家。一母所生的亲兄弟，竟视彼此为仇人、如路人。

李世民的选择出于他人所不知的隐衷，也有着难以言喻的痛苦。皇权的绝对性决定了他只能选择一个儿子，同时必须舍弃其他儿子；也决定了诸子夺嫡是一场零和游戏，骨肉相残的结局不是鱼死网破，就是你死我活。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性之光也会在某个时刻从政治铁幕的罅隙中散发清辉，李承乾死的时候，他为之罢朝；李泰死的时候，他忧形于色。政治就是把亲情埋进土里，但还是会有疼痛的感觉，李世民千古一帝，无数的政治风波练就了他的铁石心肠，却仍然不免为亲情留下一份柔软。

难道权力继承与脉脉亲情真的无法统一，注定只能在剧烈冲突中撕碎皇帝的心？这涉及皇权继承的根本问题。李世民本想通过自己的挣扎，为千秋万代确立一个稳定的规则，能够让政治与亲情两全其美，让权力继承不再以血流成河和骨肉相残作为代价，也让后世帝王不再忍受他曾经的煎熬。只可惜，他征服了广袤的土地，却无法打败文化的基因。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上，千古一帝李世民从哲学层面而不是技术层面触及过这个问题。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互争雄长，后来李承乾蓄意谋反，提前出局。按说，礼贤下士、素得人心的李泰成功夺嫡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李世民在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堪称惊天逆转的决定。而这背后，正隐藏着他对这一问题从哲学层面的深刻思考。

那么，李世民的思考究竟是什么？

太子失德

李世民的思考与挣扎，是从诸子夺嫡开始的。

在太宗诸子之中，长孙皇后的三个儿子是皇位最有实力的竞争对手。太子李承乾在李世民登基时就立为皇储，魏王李泰礼贤下士、声震朝野，晋王李治则比较低调，看似是最不可能被选中的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有力竞争者，就是才兼文武的吴王李恪，他的母亲是隋炀帝之女，出身高贵，李世民又常“称其类己”，为李恪赢得了“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的声名。

李承乾小时候本来“性聪敏，太宗甚爱之”，《贞观政要》曾记录李世民善于从生活小事教育太子的温馨故事。看到太子将要吃饭，就教育说：“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看到太子乘马，就劝诫说：“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看到太子荡舟湖上，就启发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看到太子休息于树下，就教导说：“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从日常生活中发掘治国智慧与政治哲理，寓大于小，春风化雨，李世民教育太子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然而，李承乾长大之后，却性情大变。他沉溺声色、漫游无度，把李世民呕心沥血的教导抛诸脑后，尽情与群小亲狎款昵。李承乾也非常狡猾，自己纵情无度，但也惧怕其父知晓，于是索性跟李世民玩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人”：朝堂之上，“必言忠孝之道”，退朝之后，“便与群小亵狎”。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李承乾对此也早有防备。等到劣迹暴露，东宫的大臣如果要进谏，李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敛容，引咎自责”。知道别人要劝谏，自己先三省吾身，深自谴责一番，好让别人无可置喙，其狡黠如此。李承乾口才极佳，在他舌灿莲花之际，“群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为明而莫之察也”。

李承乾有一位宠爱的伶人方才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而李承乾对他也特加宠幸，称呼他为“称心”，这触及了李世民忍耐的极

限。果然，“太宗知而大怒，收称心杀之，坐称心死者又数人”。李世民的本意是通过诛杀“称心”而让李承乾痛改前非，但这反而加剧了李承乾的抵触和反叛。他认为这是魏王李泰出于争宠的目的，故意向李世民通风报信、告讦其事，于是“怨心逾甚”。李承乾痛悼“称心”不已，不仅“于宫中构室，立其形像”，还“数至其处，徘徊流涕”“赠官树碑，以申哀悼”。李承乾对这位伶人的宠爱可谓有情有义、有始有终，但在李世民看来，这是在非薄名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于是，李世民派出于志宁、孔颖达、张玄素等当世大儒前往匡正。这些人为了教育太子也是拼尽全力，光于志宁就写了长达20卷的《谏苑》，李世民为了嘉奖于志宁和孔颖达，“二人各赐帛百匹、黄金十斤”。然而，李承乾再次辜负了其父的一片教子之心，不仅不为所动，反而暗中派刺客暗杀他们。就这样，李承乾“侈纵日甚”，而离经叛道的荒唐事也越来越多，“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翦彩为舞衣”，他还经常带领部下模仿突厥人设穹庐、烹羊肉、演胡乐，扮演突厥部落、彩排突厥葬礼。

李承乾的生活，混杂着王孙公子的富贵气息、打破常规的想象力以及某种后现代的率性而为。这些放到现代社会，没准会收获大批忠诚的拥趸，但在当时却犯了大忌，也意味着李世民所有挽救措施的失败。

太子失德，对于皇位传递意味着风险的倍增。一般而言，太子在位，皇子们还要开展夺嫡竞争；如果太子被废，东宫虚位以待就更助长了各个潜在皇位继承人的野心。他们会像一群饿狼一样，扑向“储君”这块会在将来富有四海的“肥肉”。

魏王争宠

李承乾既已无药可救，各位皇子自然会对东宫之位跃跃欲试，而魏王李泰这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夺目光彩足以掩盖其他皇子的光芒。夺嫡游戏看上去不会经历复杂的混战，只会在李承乾与李泰的“一废一立”中轻松结束。

李泰雅好文学、敬贤礼士，这两点就表明他具有成为储君的潜质，由此也博得了李世民的欢心。于是，在李承乾逐渐失去圣眷时，李泰却在一步步取代李承乾在皇帝心中的位置。李世民特批李泰可以自行设立文学馆，以延揽人才，而且由于他“腰腹洪大、趋拜稍难”，给予他“乘小舆至于朝所”的特权，其见宠如此。

而李泰也不是那种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他知道李世民“马上得天下”饱经战乱之苦，于是倾心于偃武修文、大行教化。他带领当时的文学才俊修撰了一部《括地志》，“乃分道计州，编辑疏录，凡五百五十篇，历四期成”，不仅保存了六朝地理书中的珍贵资料，而且创立了一种新的地理书体裁。此书献上御览，李世民自然会为李泰喜不自胜，皇帝的喜悦转化为丰厚的赏赐——“诏藏秘阁，所赐万段”。皇帝的赏赐之重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风向标，尤其是在太子李承乾失宠之际，更会引起易储的猜想。

李世民本就宠爱李泰，此时更加寄望甚重，尤其是与自甘堕落的李承乾相比，李泰更是显得出类拔萃。深沉蕴藉的李世民也开始公开表现出他的偏爱和私心了。每月赐给李泰的财物“过皇太子远甚”；同时还命李泰入住武德殿，与皇太子比邻而居。当时，李承乾还未被废黜，而对李泰的偏爱已远出于皇太子之上，这超越了长幼有序的宗法规范。褚遂良疾言劝谏：“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注]这更说明在李世民心里，李承乾与李泰的分量已经悄然改变。

方此之时，李世民对李承乾日益疏远，对李泰日见倚重，双方实力的对比越来越对李承乾不利，而就在关键时刻，李承乾又犯了足疾，“托疾不朝参者辄逾数月”，更引起了皇帝的嫌恶。这时，李泰认为韬光养晦应该告一段落，是主动发起进攻的时候了。于是，李泰外组朋党，内结权臣，引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20多人寄以腹心、结为联盟，对李承乾形成了内外夹击的态势。而李承乾自幼占据东宫，绝不会束手就擒，也开始酝酿用武力的方式最后一搏，于是，“寻与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等谋反，将纵兵入西宫。”李承乾的思路非常简单：领兵造反，弑父自立。李承乾与李泰已经处于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一场骨肉相残的宫廷斗争即将爆发。

然而，就像经济学名言说的那样，应该发生的事情从未发生，宫廷斗争也向来都不会一条主线走到底。李泰咄咄逼人，李承乾绝地反击，在双方就要刀光剑影、短兵相接的决战之际，斜刺里杀出了齐王李祐这个偶然变量，让李承乾还未来得及大动干戈就束手就擒，也让李泰在几乎要成功时却功败垂成。而晋王李治，一个从未在夺嫡游戏中崭露头角的人，却出人意表地赢得了一场自己从未参与的斗争。

旁逸斜出的宫廷剧情

谁都没想到，太子与魏王的明争暗斗，竟会因为齐王李祐的一场略显滑稽的兵变而画上句号。这真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齐王李祐，具有纨绔子弟的一切特性，先封楚王，后徙燕王，终授齐王，并赴齐州任都督。李祐发动的兵变，完全是一场慌不择路的政治闹剧，事情起因于他与朝廷钦差权万纪的冲突。权万纪本为吴王

李恪的长史，“有正直节”，而李祐在齐州吃喝玩乐无所不为，李世民就让权万纪来匡扶他。

权万纪为人刚直不阿，但是十分褊隘，对齐王李祐不仅停留在犯颜直谏的话语层面，而且还落实到“专以严急维持之”的行动层面，试图让李祐从花天酒地一跃而进入圣徒般的禁欲生活。关闭城门，解散鹰犬，最“过分”的是，还放逐了李祐特加宠信的群小昝君谟、梁猛彪等人。李祐狎昵群小，曾经朝夕相处，无日无之，如今却劳燕分飞，各奔东西，自然情谊难舍。于是，在情感的驱使下，李祐与昝君谟等人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策划暗杀朝廷派来的钦差权万纪，殄除元凶，恢复旧好。

然而，事未发而谋先泄，权万纪先下手为强，追捕凶手于前，上奏朝廷于后。事态迅速升级，朝廷派来了刑部尚书，并召权万纪入朝调查。李祐陷入了恐惧中，权万纪一旦回京，李世民作为一位严父，肯定会追查到底、严加惩罚，自己虽以人子之亲，恐怕也不能得到李世民的原谅。于是，李祐在手足无措的情况下，派人将权万纪杀死，这虽然阻止了权万纪进京，但给自己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造反是死，不反也是死，昝君谟等人遂劝李祐起兵造反。这样一场事起仓促的兵变，其结果可想而知。虽然李祐的部属对官军夸下“右手持酒啖，左手刀拂之”的豪言，但是朝廷军队一到，李祐甚至没有抵抗就被生擒了。

这场兵变，是挣扎求生的无奈之举，也是困兽犹斗的自全之计，本来是毫无意义的一场滑稽剧，却在无意间进入了宫廷诸子夺嫡的剧情中，从而一举改变了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的命运。在齐王李祐举兵之前，李承乾就已经决定要发动政变了。李承乾做梦都不会想到，政变这事儿竟然还有人抢跑。不但如此，李承乾所倚重的勇士纥干承基，竟然还先去参加了齐王李祐的造反，这让李承乾很是愤恨，他责怪纥干承基说：“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耳，此间大亲近，

岂可并齐王乎？”意思是说，我离皇帝只有20步，这么亲近的距离，简直就是为造反而天造地设，齐王住得那么远还造哪门子的反？没想到，齐王败北，纥干承基入狱，这段话也自然传到了皇帝耳朵里。就算李世民再有为父的胸怀和“虎毒不食子”的仁慈，听到儿子不惜弑父自立的话，如何不感到彻底的绝望？

于是，李承乾顺理成章地被废了。而李泰认为时机成熟，于是每天都殷勤地侍奉皇帝，李世民也当面答应立他为太子，并向身边的大臣描绘那幅充满父子深情的画面：“泰昨入见自投我怀中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儿子投入父亲怀中，诉说着心有灵犀的温情，也憧憬着父子交接的愿景，这将是一幅怎样融化人心的温暖场景？

但这边厢密送款曲，那边厢却暗藏危机，李承乾在坠入万丈深渊之前还不忘在政治生命的最后时刻捅魏王李泰一刀。他在最后的陈词中对李世民说了这样一段话：“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这几句话说得既狠且准、字字见血。意思是说，我堕落至此，并不是自己有所企图，而是被魏王李泰所逼，如果立李泰为太子，那就正中其下怀，使其奸计得逞了。李承乾这是要与李泰玉石俱焚、同归于尽：既然我东宫不保，你也别想火中取栗。从心理角度分析，这段话说得着实高明。把自己的堕落归结为李泰的步步紧逼，实际是让李泰也分担一部分罪责，而李世民千古一帝，怎么会甘愿落入李泰的算计中？

李承乾在政治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从希望的尾巴上薅下来几根毫毛，足以在他含恨而终时给自己些许安慰。但他永远不会知道，李世民废黜魏王李泰，不是因为他的激将，而是出于对权力继承的深刻思考。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齐王造反，太子蓄谋，魏王窥伺，骨肉之间的猜忌、争夺甚至互相残杀让李世民心力交瘁。而朝廷大臣也为储君的选择分裂为两大阵营：岑文本、刘洎请遂立李泰为太子，而长孙无忌、褚遂良执意请立李治。满朝文武的分裂，朝廷政治前景的不确定，都在啃噬着李世民的心灵。

经过撕心裂肺的挣扎、伤心欲绝的悲痛之后，李世民终于在涕泪纵横间下定决心，做出抉择。他把文武百官都支开，只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徐世勣）等勋臣宿将，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在心灰意懒之际，他甚至"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胸中苦痛，竟到了引刀成一快的程度。长孙无忌等人马上"争前扶抱"，趁机问皇帝究竟想立谁为嗣，李世民说："我欲立晋王。"长孙无忌，这位皇后的兄长，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的舅舅，立刻回应道："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于是，李世民用一种近乎戏谑而假装轻松的方式对李治说："汝舅许汝，宜拜谢。"就这样，权力继承的政治风波以戏剧性的方式尘埃落定，李治赢得了一场他从未参与的斗争。

然而，还有诸多疑点尚未澄清，一场李承乾与李泰为主角的争夺，为何让暗弱无能的李治渔翁得利？李世民是真的倾心于李治，还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从史料分析，李世民对李治并不满意。在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角力之时，提起晋王李治，李世民唯一的印象只有李治出生时，太原出现了"治万吉"的碑文，可见对李治并无特殊印象。而立李治不久后，李世民又心存废立之意，想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虽然后来在长孙无忌等人的争取下"其事遂辍"，但从李世民的反复和犹豫来看，他选择李治，实属无奈之举。

那么，既然对李治并不满意，李世民为什么不立李泰？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争是不争，不争是争”的权谋辩证法使然。李泰太过积极进取，必欲取之而后快，反而引起了李世民的反感；而李治则仁孝为怀，看上去无欲无求，恰恰赢得了李世民的欢心。这确实有案可稽。在李承乾刚刚被废时，李世民曾当面许诺立李泰为太子，褚遂良等人建议：如果一定要立李泰，就请安置晋王，“始得全矣”，否则魏王一立则晋王必然遭遇不测。没想到李世民老泪纵横直说，“我不能”。这就可见，晋王的暗弱成功博取了皇帝的同情，也悄然占据了心理上的优势。

李泰的咄咄逼人更加剧了李世民对李治的怜悯与垂青。李泰担心李世民会立李治，于是恐吓李治说，你和汉王李元昌关系好，现在李元昌参与太子谋反东窗事发，你难道不担心受到牵连吗？李治因此忧形于色，李世民感到奇怪，屡问其故，李治才把李泰这番话和盘托出。结果，“上怃然，始悔立泰之言矣”。这在后来的对话中也得到印证，李世民从容对侍臣说，“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李世民虽是杰出的皇帝，但更是仁慈的父亲，他仍然饱含着深沉的舐犊之情，在权力斗争之外尽力保证皇子们的生命安全。

“争是不争”的逻辑确实存在。比如说康熙不喜欢太过追求权力的八王胤禩，而选择了一味隐忍的雍正；魏明帝曹叡能够博得曹丕的欢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打猎时，看到曹丕射杀母鹿时说：“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名著《领袖们》中，引用戴高乐的一段话来表明追求权力的辩证法：寻求高位一定要如同向女人求爱那样，“你追她就逃，你退她就跟”。有时，得到权力的最好的办法似乎是不要去求它。就像一个伟大的演员知道自己何时应该退场一样，政治人物更应知道进退有度。

李泰对权力追求确实过于进取，逼迫李承乾造反、给李世民施压、暗中笼络朝中大臣……李泰从来都是以积极的方式主动追求，却不知道回环曲折的力量，不懂得“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的道理。而李治一直是不在场的潜在竞争者，从来未曾抛头露面，也没有表现出“必欲取之”的决心，但最后却实现以退为进、无为而无不为的成功逆袭。可以说，“争是不争”的逻辑，确实是促成李世民选择李治的原因之一。

故事本应到此圆满结束，唐朝皇室的诸子夺嫡无非是为道家“争是不争”的权谋学写下生动注脚，这个故事也只是中国历史上诸多宫廷游戏之一，除了演员和场景不同之外也并无新鲜之处。但是根据史书后面的记载，这并不是根本原因和最终考虑。李世民原来在“争是不争”的权力法则之外，还看到了更加本质的东西，使得这个故事突然具有了超越权谋的哲学启示。

李世民思考的深度、看见的远方已经超越了“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权谋学。他在后来才揭示出废魏王、立晋王的深意：“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这才是李世民结束这场权力斗争的根本原因，他要为立储制订一条万代不易的规则，那就是封死“可经营而得”的通道。魏王李泰积极经营，虽然才兼文武，一样要被舍弃。只有树立这样的导向，千秋万代之下才不再有人去积极谋求储君之位，也才能杜绝权力继承的血腥竞争，让政治与亲情能够两全其美。

即便没有那些文治武功，仅仅这一句话就足以让李世民闪耀在中国的历史星空。

权力合法性需要超越现实的道德基础

李世民的思考透过了权力斗争的表象而触及了本体意义上的问题：权力继承为何总会引发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

在他看来，原因就在于“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正因为皇权可以经营而得，所以窥伺之心不绝，争竞之路不断，“成王败寇”成为唯一的逻辑，权力争夺也将永无宁日。因此，他开出的药方就是要斩断皇权与经营之间的桥梁，为皇权奠定一个超越于世俗之上的合法性基础，既不能为斗争所猎取，也不能为暴力所取代，这样才能彻底斩断宫闱之间的权力斗争，让权力的继承不再以碾压亲情为代价，彻底消灭中国政治“成王败寇”的逻辑。

也就是说，在李世民辗转难眠的煎熬之夜，他已经隐约从哲学层面触及中国古代政治的核心问题：怎样建构皇权的基石才能避免“成王败寇”的逻辑？他还没有足够的思想资源能够回答这一问题。因此，他只能用朴实的做法来践行他的想法，那就是斩断皇权与“经营而得”之间的桥梁。他想用失败的结果导向，来回答他隐约触碰到的那个问题。

其实，这就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或者说是权力的道德基石问题。儒家对此有一整套明确的价值系统：皇权的基础是“德”，有德就要调和阴阳、惠及民生，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儒家思想是根据执政绩效和百姓忧乐来判断君主的合法性。它的优势在于注重实际与功利导向，它的劣势却在于太过强调实际，因为实际的执政绩效是时好时坏的，如果执政绩效暂时处于低谷，那就可以置“君臣”于不顾，光明正大地通过竞争来争取最高权力。这正是李世民所面临的问题，因为最高权力“可经营而得”，因此，无论是皇子之间的争夺，还是君臣之间的猜忌，都将永无宁日。

显然，儒家先贤认为，如果君主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那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就应该让更能代表天命的人来取而代之。所以“汤武革命”的旗号是“吊民伐罪”，得到的评价是“顺天应人”。孟子在听到有

人置疑武王伐纣属于“臣弑其君”时，只说这是“诛一夫纣矣”。正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在儒家的理想国里面，君主没有永恒的谱系，也不可能永远获得命运的眷顾，如果失德，就会被取而代之。因此，为了反对无德的君主，以下犯上就被赋予了正义性，这也是社会推陈出新的一种机制。因此，中国的古代历史没有万世一系的叙事，只有改朝换代的循环。

这种“民本主义”合法性的来源虽然体现了“民为贵”的导向，但是也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君主可以被取而代之，那么所谓“忠孝仁义”等价值就不具有绝对的尺度，而只是基于现实的一种权宜之计。君主可以被取代的可能性一旦打开，那么“可经营而得”就会像梦魇一样笼罩着统治者，使之始终成为众矢之的，陷入永无休止的不安之中，这也正是李世民痛苦与纠结的根源。

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君主的合法性如果建立在执政绩效这个不稳定的基础上，那么任何一个权力的挑战者都可以声称在位者失德。哪怕君主实际上干得很好，但是为了师出有名、为自己制造合法性，夺权者完全可以主观上声称君主失德。曹丕篡汉，司马懿篡魏，刘裕篡晋……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次篡位事件，哪一个篡位者不是把自己比作“汤武革命”？哪一个篡位者不是一边手握雄兵、用尽阴谋，一边堂而皇之地宣称曾经效忠的君主已经德不配位？

这并不是说儒家伦理秩序不好，而只是从客观上来说，它并未给君主或者说皇权制造一个绝对的合法性基础和道德基础。结果，“立嫡以长”虽然是继承的原则，但是就像李泰那样，他可以通过声称太子失德而破坏这一规则；“忠君体国”也是最基本的伦理，但是大臣可以通过声称皇帝失德而行篡逆之事。由于道德变成骑墙的权宜之计和投机选择，因此道德也就失去了评价功能，并不是因为“有德”而获得胜利，而是因为胜利才宣称自己“有德”。有德无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胜利还是失败。顺天应人也好，德配于天也罢，都只是胜利者在胜利

之后寻找的说辞，并不是胜利的依据。而获得胜利的过程可以无视仁义道德，无所不用其极。于是，正义和道德成为胜利的点缀，就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关于正义辩论的观点，“正义不过是较强者的利益”“只有强者的利益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正义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权力斗争根本就难以平息。

可以说，在为立储之事辗转难眠时，李世民已经触碰到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问题。他凭借个人直觉做出选择，想要在执政绩效之外，为权力制造一种超越于功利性的绝对基础，用司马光的话说就是“以杜祸乱之原”。然而，李世民缺少构建一整套权力合法性学说的思想资源。

比如说，日本皇室万世一系的合法性基础正是来自于天照大神的神性，日本天皇一直扮演着半人半神的存在，而不是一个世俗的个体，因此幕府可以攫取世俗权力，但是绝不可能僭号称帝。再比如说，西欧的封建王朝相对稳定是因为在君权神授与贵族血统的双重庇护下能避免其他人对君主之位的窥伺，从而使整个社会产生一种各安其位的稳定。英国克伦威尔虽然革命成功，却只能自称“护国主”，无法僭位称王。因为君主之位的基石，不仅在于权力斗争的胜利，更在于绝对性的道德基础。

这并不是说日本或西欧的传统比儒家伦理更加优越，它们虽然为最高权力制造出普通人难以僭越的道德基础，但是牺牲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它们的传统下，不可能出现凡夫俗子的逆袭故事。儒家思想为君主的可替代性打开了大门，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就连石头缝里蹦出的孙悟空也能喊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豪言壮语，但是牺牲了皇权的稳定性，使得权力斗争永无止息。

由于权力缺少超越世俗的合法性支持，通往权力的道路就必然会由阴谋、争夺、杀戮来铺就，而“成王败寇”则是唯一的路标。李世民死后不久，李治就处死了曾经把他送上皇位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而

这只是武则天夺取权力的前奏。只要“成王败寇”的逻辑还在，残酷的权力斗争就只会以更加残酷的方式上演。

晚年的李世民独自站在凌烟阁，追忆起往昔的峥嵘岁月，再多的繁华也将随风而去，再大的功勋也将化为尘埃。他废黜李泰的选择无法解决中国政治传统的根本问题。历史，仍将在既定轨道上前行。

“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李世民的宠妃徐惠在8岁时写下的诗，似乎冥冥中预言了李世民的孤独。

而比李世民更加孤独的则是他的左膀右臂——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力排众议将晋王李治送上皇位，居国公之尊，享国舅之亲。本来应该在成功的巅峰尽览美好风光，却不知道正是无人企及的成功为自己最终掘墓。残酷的权力斗争仍将上演，而长孙无忌的人生际遇将揭示出皇权的另一个本质特征。

---

1. 引言摘自《新唐书》，其中“嫡”指东宫太子，“庶”指其他皇子。——编者注

第三章



长孙无忌：权力与安全感的悖论

长孙无忌就像一个奋不顾身的攀登者，用一生的时间在权力的山峰上奋力攀爬，但是在他终于到达巅峰时，却发现前面不是“一览众山小”的旖旎风光，而是万丈深渊。多么具有反讽意味，一辈子的攀爬只是为了给自己堆积一座悬崖。

是的，在权力的游戏中，还没有谁像长孙无忌的人生这样充满了枪口反转的戏剧性。他从追随李世民开始，就一直在唐朝的权力结构中占据高位，但是谁能想到，他竟然死在了自己一手扶上皇位的唐高宗李治手里。他曾经利用诬陷、牵连、告密等手段排除异己，在对手一一倒下之后，他竟然倒在了自己熟稔于心的政治手腕之下。砰！权力之枪再度响起，只不过这一次，枪口对准的是自己。

唐高宗显庆四年，也就是公元659年，长孙无忌被中书令许敬宗、吏部尚书李义府诬陷谋反，被流放黔州，必欲除之而后快的许、李二人旋即派人逼他“自缢而死”。那一刻，在阴冷潮湿的蛮荒之地，曾经权倾朝野、如今引颈受戮的长孙无忌会想到什么？他一定会感到莫大的冤屈，他一定会感叹天意弄人，他一定会感慨人间竟无公道。

然而，长孙无忌冤死，有人会在九泉之下仰天大笑，感谢老天开眼、社稷有灵，这其中就包括曾经屡建奇功的江夏王李道宗，还有曾

是皇位有力竞争者的吴王李恪。他们本来是皇室子孙的佼佼者，却无端被长孙无忌诬告谋反。从他们的视角来看，长孙无忌的下场是罪有应得，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是因果报应的证明，长孙无忌有什么资格谈冤枉?

冤枉别人以至于被人冤枉，每个人都只是权力游戏的牺牲品，这无关正义和道德，只有成败之分、胜负之别。权力斗争是如此残酷，每一个手握权力的人都缺少安全感，都在寻求安全。权力越大，就越有能力实现安全，但是也意味着斗争愈加残酷，因此更加剧了恐惧心理，反而降低安全感。于是，越追求权力，就越缺少安全感;越缺少安全感，就越追求权力。这种以获取权力的方式追求安全，结果却适得其反，这正是权力游戏中的“安全悖论”。显然，皇帝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有着无人能及的不安。

长孙无忌、许敬宗、李义府等人都看到了皇权拥有者的深度不安，于是他们都知道打败对手最便捷的途径，就是——“诬告谋反”，哪怕只是诬陷、造谣、诽谤，也会引起皇帝的深深顾虑。在这方面，长孙无忌可以说是顶尖高手，他通过“诬告谋反”将强劲对手接连扳倒，也充当了许敬宗的“老师”，而许敬宗可以说青出于蓝胜于蓝，通过一番莫须有的“造反”说辞，便让唐高宗李治决定对长孙无忌实施“不待时而斩之”的处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经过审判而立即处决。

那么，许敬宗究竟跟李治说了什么让李治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恐惧?长孙无忌英雄一世，曾经将“诬告谋反”运用得游刃有余，为什么到头来自己却倒在了“诬告谋反”的枪口之下?“诬告谋反”能够立刻奏效的背后，潜藏着哪些值得深思的东西?

家庭出身与后天努力的完美结合

长孙无忌集先天优势和后天优势于一身，他比别人出身更好、天赋更高，又比别人更努力、刻苦，这样的人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会跻身社会的精英阶层，踩着失败者的累累白骨爬上社会金字塔的顶端。

长孙无忌的祖先属于北魏的拓跋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袭大人之号”，由于是宗室之长，因此改姓为长孙氏。后来魏室西迁，他的高祖、曾祖随之来到长安，依然身居高位，是隋唐时期“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数代人的代际积累，让长孙无忌一出生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让他能够与李世民相逢于微时，结下深厚情谊。他在年少时就与李世民交好，这份“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的淳朴情感，成为二人无论经历多大政治风波都能保持信任的坚固基石；而他的姐姐年轻时就嫁给李世民为妻，即名垂青史的文德皇后，亲戚关系让他与李世民的关系日益稳固。

出身高贵而又天资颖悟，志怀远大而又人脉广泛，长孙无忌从踏入仕途开始，就没有经历“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底层逆袭路线，而是直接进入核心决策层，尤其是在策划“玄武门之变”中，长孙无忌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也由此奠定了在太宗一朝的稳固地位。当时，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矛盾日益公开化，已经到了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程度。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长孙无忌“奉旨密召房玄龄、杜如晦等共为筹略”，也就是说长孙无忌相当于李世民集团的召集人，是比房玄龄、杜如晦更能博得李世民信任的人。后来，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诛兄戮弟、逼父退位，成为新任皇帝，长孙无忌由于居功最高，成为实至名归的“二号首长”。

唐朝初年，群星璀璨、人才辈出：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温彦博“敷奏详明、出纳惟允”；戴胄“处繁治剧、众务毕举”；魏徵“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王珪“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而在这璀璨群星中，李世民眼中最亮的

那颗星自然非长孙无忌莫属。无论是下诏褒奖还是列地分封，无论是朝廷仪式还是图形凌烟阁，长孙无忌永远都名列首位、拔得头筹。李世民曾这样公开表达对他的信任，“朕今有子皆幼，无忌于朕，实有大功，今者委之，犹如子也”。名则君臣，亲则父子，李世民对他可谓恩宠莫比、亲信无二。

当然，长孙无忌永远不会吃关系的老本，他懂得如何运用与李世民的深厚渊源巩固权位，但也明白关系只是静止的存在，并不能一劳永逸地保证荣华富贵。长孙无忌具有极高的“政治智商”，他不会恃宠而骄，只会默默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版图。他深谙“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的道理。在李世民不断赐予官爵之时，他深以盈满为诫，上书辞让。他虽然懂得苟合取容、谄媚皇帝的艺术，李世民在历史上也以从谏如流而闻名，但是即便如此，长孙无忌也不会像魏徵那样为了致君尧舜而彰君之恶。他太懂皇帝了，没有哪个手握至高权力的人喜欢拂逆己意，也没有哪个君临天下的人能经得起美语甘言。在他看来，进直言只能得虚名，拍马屁才能得实惠。李世民曾公开要求大臣“言朕愆失”，长孙无忌带头表态：“陛下圣化致太平，臣等不见其失。”

长孙无忌总是能抓住皇帝最深层的心理诉求：中国古代的皇帝除了希望万邦来朝、青史垂名之外，就只对泰山封禅最为向往了。泰山之巅是天子与上天的交流之所，正因此，泰山封禅就具有超出世俗政治的宗教意义，是历代皇帝为了表明自己治理业绩的最重要的仪式。李世民千古一帝，大治天下，虽然自己出于谦虚不愿意主动提出泰山封禅，但心里岂不心向往之？长孙无忌曾数次带领群臣要求李世民封禅，在李世民假装谦让之后，他早就探知上意，于是带领群臣向皇帝“示威”，“逼”皇帝封禅，李世民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了。这样既满足了皇帝的虚荣心，又显得不是皇帝刻意追求，而是众望所归、民意难违，把人臣之分发挥到如此极致，哪个皇帝能不喜欢？

于是，在太宗一朝，长孙无忌所向披靡，就连皇位的继承人，也是在他的圈定之下才最终确立下来。此时的长孙无忌离皇权只有一步之遥，但正是这一步之遥却是皇帝最为忌讳的戒备之所。长孙无忌倒在了这一步的距离上，他力排众议精心选出的接班人，竟是为自己选定的掘墓人，当然，这是后话。在引起皇帝的戒备之前，长孙无忌一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通过击倒政敌寻求安全。

以“诬告谋反”击倒政敌

随着李世民春秋渐高，长孙无忌也开始对未来积极部署。文德皇后三子，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晋王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太子李承乾失德，废在朝夕，魏王李泰礼贤下士、声震朝野，李世民在废掉太子之后也曾许诺将其立为太子，但是长孙无忌却坚决反对，他向皇帝推荐的人选是晋王李治，最终将李治扶上了皇帝的宝座。

都是亲外甥，长孙无忌为何无意李泰，而倾心李治？长孙无忌在轻重权衡之间，自有一番长远考虑：李泰才华横溢，如果立为太子，将来必为一代雄主，将他扶上皇位，不仅难以挟制，自己作为前朝元老，反而会陷入尴尬处境；而李治暗弱无能、没有主见，容易受人影响、被人操控，如果把皇冠戴在李治的头上，就能产生“弱君强臣”的格局，自己就能更好地控制皇帝。显然，长孙无忌的如意算盘是弃李泰、立李治，最终也如愿以偿，成功把李治送上皇位。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长孙无忌哪里会想到，李治固然容易被人操控，但既可以被他操控，也可以被别人操控，如果是后者，那就会带来枪口反转的悲剧。命运就是这样，从来不会按常理出牌，也从来都是出乎意料。

当然，在此之前，长孙无忌还有足够的时间来经营自己的权力帝国。长孙无忌通过“诬告谋反”的利器，同时除掉了江夏王李道宗和吴

王李恪这两个对手。江夏王李道宗是李世民这一辈的宗室兄弟，17岁就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在讨伐北方军阀刘武周、击破突厥颉利可汗的重大战役中颇建战功。在诸多宗室弟子中，时人以江夏王李道宗和河间王李孝恭为最贤。长孙无忌为什么与李道宗积怨已深，史书里面并没有明确写明原因，只说“长孙无忌、褚遂良素与道宗不协”，但可以推测李道宗的卓越军功引起了长孙无忌的妒忌。

与之相比，长孙无忌视吴王李恪为眼中钉、肉中刺则是出于保护既得利益的本能。李恪才兼文武，沉毅英勇，自身条件出类拔萃，加上母亲又出身高贵，是隋炀帝的女儿，李世民生前就经常夸李恪“类己”，时常流露出立李恪为太子的意思，这使得李恪成为皇位的有力竞争者。而真正促使长孙无忌动了杀机的是在他极力维护李治当上太子之后，李世民还暗中想要改立李恪为太子。如果李恪成功，长孙无忌就会因为站错队而被打入另册，一念及此，长孙无忌肯定会脊背发凉。正因此，为了巩固李治的地位，更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他必须除掉李恪这个潜在的威胁。

江夏王战功卓著，吴王物情所向，他们都是难以撼动的实力派，而且搞不好还会留下屠戮宗室的骂名。但唯其艰难，更显得“诬告谋反”是多么管用。就像壁立一旁的猎人等待猎物的出现，暗藏杀机而又不露声色，长孙无忌也是这样敏锐地窥视着政局的微妙变化，时刻准备向敌人扔出手中的投枪匕首。他没有刻意安排，只是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侧面突围、曲线救国，等待合适的机会只需轻轻顺水推舟，即刻一剑封喉。

机会终于出现了，而故事得旁逸斜出从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说起。一代名相房玄龄在太宗一朝名重当时，自己一世英名，善始善终，却没有解决好子女的问题。房玄龄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房遗直继承爵位，这本符合宗法秩序下的继承规则，但二儿子房遗爱偏偏娶了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一个是房家嫡长，一个是皇家驸马，这下兄

弟二人顿成分庭抗礼之势。而高阳公主生性桀骜不驯，又不愿意屈居老大之下：凭什么房遗直继承房玄龄的政治地位?

高阳公主生性放荡，在李世民在世时，她就与《大唐西域记》执笔人高僧辩机擦出火花，让李世民颇为难堪。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放荡不羁的性格，高阳公主做事时也缺少有条不紊的思路，她开始密谋“黜遗直而夺其封爵”，但行事方式却荒诞不经，她与房遗爱策划谋反，拥立荆王李元景为帝。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谋反这事不能高调啊！高阳公主还主动到唐高宗面前告发房遗直，这简直是手段背叛目的、行为反对目标，而朝廷的调查结果是，房遗直终获清白，而自己的阴谋却暴露了。

这本是几个小丑导演的一场闹剧，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长孙无忌却从中看到了宝贵的机会。这时，长孙无忌的“政治智商”再次表现出来，他懂得因小图大、见缝插针，让一个小小的骚动成为政治杠杆，以此借力来扳倒强大的对手。房遗爱甫一伏诛，长孙无忌就告发说李道宗和李恪都参与其事，于是皇帝立刻下令处死二人，都没有给二人任何申诉的机会。房遗爱是功臣之后又是皇家驸马，有实力也有影响力，而李道宗曾经掌兵，李恪向来深孚众望，这些人如果联合起来，唐高宗肯定会感到地位受到挑战。于是，唐高宗在恐惧的驱使下，不分是非曲直就对李道宗和李恪做出了判决。就这样，没有处心积虑的布局，也没有深文周纳的陷害，没有片刻的迁延，也没有公正的审判，只需带上寥寥数笔，长孙无忌就像擦掉灰尘一样抹去了那两条与他同样高贵的生命。然而，日后长孙无忌将会感慨“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李恪临刑时大声疾呼：“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他只能把沉冤昭雪的希望寄托于“社稷有灵”。历史发展满足了李恪的愿望，但是靠的不是“社稷有灵”的超自然力量，而同样是“诬告谋反”的不二法则。

命运的指针开始逆转

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足够丰富性，从不同的角度可以领略到截然不同的风光；命运的诡谲之处则在于它的充分多变性，每当人们希望满怀的时候，也一定是遭到命运玩弄并彻底失望的时候。

长孙无忌的如意算盘打得啪啪响，人生应该自此步入“无处惹尘埃”的极乐境界：皇帝言听计从，强敌凋零殆尽，接下来的时光应该在权力巅峰上阅尽世间风光，独享成功尊荣。然而，命运的指针有时会在最高点开始逆转，长孙无忌还沉浸在美好的憧憬中，全然不知命运的辩证法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长孙无忌以为李治暗弱无能，容易控制，因此就能避免他们之间的潜在冲突。然而，权力的规律并不会因此而失效。《史记》有言，“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其实揭示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权臣与皇帝之间，由于安全感的缺失，双方无论如何都会存在难以消除的不安与猜忌。长孙无忌以为他是皇帝的亲舅舅，又一手将其送上皇位，应该能避免这种不安与猜忌，但是温情脉脉的亲情却难以抵挡权力法则射出的寒光。

长孙无忌与李治之间开始出现分歧，并不是李治直接主张自己的权力，而是因为斜刺里杀出了一个武则天，突然改写了既定的剧情，倒逼李治公开与长孙无忌决裂。当时，作为先朝嫔妃已落发为尼的武则天与前往寺庙吊唁亡父的李治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而武则天作为先朝嫔妃被选入后宫已经引起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的不满。接下来，长孙无忌苦心经营的一切似乎都在为武则天作嫁衣。长孙无忌选择李治不是因为他暗弱无能、易于操控吗？此时此刻，武则天以女人的妩媚和爱情的魔力牢牢控制住了李治的心智，长孙无忌的如意算盘这时竟适得其反。

长袖善舞的武则天先是用计谋陷害王皇后，然后开始谋划成为皇后。于是，宫闱床第之间的争夺终于演变为选边站队的政治斗争：李治执意要立武则天为皇后，满朝文武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

长孙无忌与褚遂良选择坚决反对。从道义上来说，长孙无忌在这时确实展现出一位大臣应有的操守与气节。他虽然为了追求权力而无所不用其极，但并不是心中只有权力、把玩弄权力当作终极追求的政客，而是在权力之上还有不能被权力污染的大道大义。武则天作为先朝妃嫔如果被立为本朝皇后，这样的乱伦就是对儒家伦理秩序的公开亵渎。长孙无忌受顾命之重、握一国之权，岂能坐视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发生？关键时刻，长孙无忌展示出他的道德修养与气节操守，也表现出他作为贵族应有的高贵精神。

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如果从另一面来考虑，长孙无忌坚决反对武则天成为皇后或许也有着深刻的利弊权衡。有人说，所有的政治斗争，归根结底就是“新贵族”向“旧贵族”发起的挑战。方此之时，李治只能算是身在局中的局外人，而武则天的横空出世则多少让长孙无忌感受到朝廷新贵蠢蠢欲动的挑战，也由此感受到武则天对其地位的威胁。

一开始，武则天也不想与“旧贵族”公开抗衡，也想在“新贵族”与“旧贵族”的妥协中实现平稳过渡。为了立武则天为皇后，皇帝也不惜放下身段，向长孙无忌求情，“帝乃密遣使赐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以悦其意”，皇帝虽然主动献上殷勤，但长孙无忌依然不为所动。后来，武则天的母亲亲自拜访长孙无忌，“屡加祈请”，最终也铩羽而归。之后，礼部尚书许敬宗又屡申劝请，却换来“无忌尝厉色折之”的结果。皇帝与武则天的姿态已经放得够低了，也给足了长孙无忌台阶和面子，而长孙无忌的坚决否定无异于公开扇了皇帝一耳光。从此，对立与冲突将在所难免。

最后，皇帝李治终于第一回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觉，那就是行使皇帝本就享有的乾纲独断的权力，“竟不从无忌等言而立昭仪为皇后”。接下来，武则天就要替皇帝撕开他与权臣之间的温情面纱，将权力斗争最为残忍的一面暴露出来。

因“诬告谋反”身死族灭

定罪需要还原真相、依法裁决，但是“诬告谋反”却能促使皇帝不审而判、不教而诛。长孙无忌曾以此击倒强敌，而武则天一党的马前卒许敬宗给长孙无忌来了个“请君入瓮”，这其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辩证法让长孙无忌的命运带着莫可名状的无奈与悲哀。

长孙无忌大权在握，怎样才能扳倒他呢？武则天一党还是选择了“诬告谋反”这条捷径，这时许敬宗就粉墨登场了。许敬宗作为当时的著名史家，主动充当武则天的枪手，也是为了攀附新贵，在权力重组过程中分一杯羹。而许敬宗将长孙无忌最为擅长的方式运用到长孙无忌身上，直接促使李治下令对长孙无忌实施“不待时而斩之”的裁决。许敬宗也不会像长孙无忌那样回环曲折，而是主动出击、直奔主题，他在派人劝唐高宗封禅时，直接“称监察御史李巢与无忌交通谋反”，皇帝就命许敬宗等人进行调查，而许敬宗恰好可以通过一番早已构思好的说辞，让皇帝在绝望与恐惧中做出非理性的决策。

皇帝见到许敬宗的第一句话就开始抱怨：“我家不幸，亲戚中频有恶事。高阳公主与朕同气，往年遂与房遗爱谋反，今阿舅复作恶心。近亲如此，使我惭见万姓。”显然，皇帝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已经对长孙无忌做了“有罪推定”，所谓“今阿舅复作恶心”，是在调查之前就认定长孙无忌犯下罪孽。

许敬宗抓住皇帝的疑心，首先向皇帝分析长孙无忌谋反比房遗爱谋反更加严重。他说，房遗爱只是乳臭小儿，怎么能成事？但是长孙无忌与先帝李世民一起谋取天下，还做了30年宰相，众人服其智，百姓畏其威，可以说是“威能服物，智能动众”。许敬宗这是要向皇帝表明长孙无忌拥有足以倾覆皇室的资源和能力，这就能在事实还原之前就激起皇帝的恐惧，也能为立即处置奠定逻辑前提。于是，他接着说，担心长孙无忌一旦知道事情败露，攘袂一呼，啸聚羽翼，“必为宗庙深忧”。所以说，对皇帝来说最保险的做法，就是“不日即收捕，准法破家”。

许敬宗非常聪明，他巧妙地运用了中国古代政治中“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的法则。长孙无忌炙手可热的权势、贵为国舅的地位曾经是光耀门楣的资本，现在被许敬宗这么一解读，却成为皇权的巨大威胁，也成为导致长孙无忌速死的触媒。而暗弱无能的李治，显然陷入了恐惧之中。

许敬宗已经动摇了帝心，因为李治接下来说，他不忍心处分长孙无忌，怕后代史官说他不能和谐亲戚。可见，皇帝从内心深处已然同意许敬宗的处理方案，唯一的顾虑是担心史书“留名”。许敬宗“不愧”为《晋书》《姓氏录》等诸多史书的主要撰稿人，他再次引经据典，说汉文帝是公认的明君，但舅舅犯法，一样诛戮，史官“不以为失”，长孙无忌犯下的罪行比汉文帝的舅舅严重多了，有什么不可以杀？在解除皇帝的最后的顾虑之后，许敬宗再次发出警告，“大机之事，间不容发，若少迟延，恐即生变，惟请早决！”就是说，现在不立即行动，恐怕就会被长孙无忌反扑。许敬宗把一件莫须有的事情说得惊心动魄、千钧一发，仿佛李治马上就要皇位不保。结果，李治“竟不亲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立刻发出长孙无忌去官爵、流黔州的诏令。

没有真相，没有取证，没有审判，长孙无忌就这样陨落了。他与皇帝的亲情一笔勾销，与皇帝恩断义绝。长孙无忌在不知不觉间倒在了自己曾经屡试不爽的利器之下。

纵览许敬宗的话语文本，自始至终都没有在事实层面留下半点口舌，对长孙无忌是否存在谋反的证据避而不谈，而是紧紧围绕长孙无忌如果谋反就会带来的危害夸大其词、步步紧逼，直到说得皇帝脊背发凉、手心冒汗。许敬宗的意图非常明确，他不是在朝廷上做还原事实的辩论，而是在密室里面直戳皇帝内心的深层恐惧。其实，长孙无忌曾经打倒江夏王李道宗和吴王李恪不也是同样利用了这个心理武器吗？这再次说明，缺少理性公正的司法审判，没有对事实与真相的还原，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长孙无忌可以因此而害人，同样可以因此而被害。

“权力安全悖论”源于恐惧

命运，就是对它宠爱的人也不会慷慨无度。长孙无忌居于九天之高，却在辉煌的顶点跌入万丈深渊，他的命运令人唏嘘，他的身上充满了各种悖论。“诬告谋反”，同样的政治法则，他曾屡试不爽，却也在他如日中天时成为自己的夺命神器。一旦告人谋反，就能光明正大地绕开必要的司法程序，直接进入真相缺席的不审而判。这一点触及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它揭示出皇权的深层不安，显露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敏感性和警惕性。

关于这一点，许敬宗显然是读透了，看明白了，而且用得稳、准、狠，恰到好处。“诬告谋反”哪怕只是造谣，也会在皇帝心里投下巨大的阴影，为了保持江山永固，也为了保险起见，一般的皇帝都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于是，“诬告谋反”也成为权力斗争中一本万利的利器。

当然，“诬告谋反”能够在长孙无忌身上立竿见影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他已经身处“勇略震主”“功盖天下”的危险位置。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皇帝与权臣的关系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难题，他们的和谐相处最需要彼此信任、襟怀坦荡，但是他们总会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缺少安全感，猜忌的种子一旦播下，一个莫须有的谣言就能引发残酷的零和博弈。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易代之际，皇帝与权臣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继任皇帝与托孤大臣之间的矛盾。汉代的霍光废除了在位仅27天的昌邑王，而后亲自选择了流落民间的刘病已作为皇帝。但是刘病已对霍光的感情十分复杂，一方面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心存忌惮，与之交往时“若有芒刺在背”。霍光死后，他的子女就因谋反而家破人亡。隋朝的杨素历事三朝，功劳最高，也是出于富贵常保的考虑，帮助晋王杨广挫败了位居东宫的杨勇，将杨广一手扶上皇帝的宝座。结果杨广一继承皇位，杨素就遭到嫉妒，直到他的儿子杨玄感起兵造反而身死族灭。在顾命大臣与新任天子之间，在既得利益者与新生贵族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一对世界上最难处理的关系之一。

在承平时期，皇帝与权臣的关系常常表现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权力平衡，也就是通常所谓“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宰相是朝廷实际上的“执政者”，职能是总统庶政、调和阴阳，在有唐一代更是礼绝百僚，哪怕皇帝见了也要躬身行礼。正因为宰相所处的崇隆地位，使得“君权”与“相权”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博弈之中。长孙无忌让皇帝感到莫大的恐惧，正因他为相30年，无论是声名威望还是实际能力，足以“攘袂一呼，啸聚羽翼”。

而“诬告谋反”能够奏效也是因为“谋反”在很多时候确实成功了，皇权在不知不觉间拱手让人。南北朝时期，“江南多好臣，一年一易主”，南朝宋、齐、梁、陈，一共4次政权更迭都是权臣尾大不掉最终取代皇帝的剧情。而当僭主对原来的皇室赶尽杀绝时，每一个末代皇

帝几乎都会在饮下毒酒时悲呼：“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谋反的成功先例更加剧了皇帝的不安和对大臣的戒备。

皇帝与权臣之间的紧张关系其根源就在于皇权的绝对性与完整性，因为一旦失去皇权，就意味着失去一切。对于皇帝和他身后的皇位而言，要么是完完全全的得到，要么是彻头彻尾的失去，这中间没有分权的缓冲地带和妥协空间。正因为皇权不可分割的绝对性，皇帝比权力阶梯上的任何人都更需要安全感，也更容易产生恐惧和猜忌。因此，一旦听到“谋反”的消息，皇帝基本上在来不及进行司法调查的情况下，就被恐惧驱使着进行间不容发的处理。在这里，权力才是决定一切的自变量，事实并不重要，皇帝如果行动迟缓，被对手占据先机，那么送上审判席的就会是自己。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公正独立的司法程序无从产生，而皇帝也只有从不断的斗争和胜利中获得安全感。结果，在这场权力游戏中，没有人会获得最终的安全感。

罗素在《权力论》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一切服从的现象，根源都在于恐惧，不论我们所服从的领袖是人还是神”。这说明“恐惧”在塑造权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人们因为恐惧而服从，而皇帝也会出于恐惧而寻求安全感，结果就是对任何潜在挑战的风声鹤唳。

这不是基于“权谋”的技术性分析，而是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由于皇权的深层不安，皇帝视大臣为潜在对手，导致整个制度设计无法追求更高的目标，而在如何保住皇权、防止谋反、强君弱民上花费了太多精力。韩非子就明确表示，“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并赤裸裸地宣称，君主的最大敌人不是敌国，而恰恰是本朝的大臣。

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有一条脉络非常清晰，就是随着历史发展，制度设计越来越把“防止谋反”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主要表现就是削弱宰相权力、地方发展和社会活力。比如，根据宋代的军事制度，带兵打仗的统帅只能临时选择，不是为了提高战斗效率，而

是为了防止串通谋反；元代奠定的中国行省制度中区域划分不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地方发展，而是把膏腴之地分割，将山川形胜打散，使得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与朝廷对抗。以“防止谋反”为出发点的制度设计背后是皇帝与大臣、中央与地方隐然对立的潜意识，这当然能保住皇权，但是牺牲了社会发展的效率、多元与活力，也无法为公正独立的司法审判提供生存空间。

在听到李恪大声疾呼“社稷有灵”的时候，长孙无忌或许只是捻须一笑。然而，如果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斗争，那么谁也不会是安全的。九泉之下，长孙无忌当有切身体会，也应有深刻反思。

而在武则天立为皇后的政治风波中，有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从高位坠落，也有勋臣宿将随波逐流、明哲保身，这其中就包括向来以正人君子、忠君爱国自居的一代名将徐世勣。徐世勣一向以忠义之名著称于世，但是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事情上，他却没有像长孙无忌那样表现出大臣应有的操守与气节。真诚已经坠落，虚伪得以保存，而徐世勣终于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撕开了伪善的面具，也让人窥见这位伪君子持续一生的华丽的道德表演。

第四章



徐世勣：“道德理想国”的虚伪表演

徐世勣，后来以“李勣”之名声震史册，前半生是绿林里的英雄好汉，后半生是庙堂上的忠臣义士。“功定华夷，志怀忠义”，《旧唐书》已迫不及待地将他塑造为完美的道德楷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道德楷模”，实际上进行了一辈子的伪装表演。那一片夺目的道德之光，不过是用伪装堆砌的海市蜃楼。

当然，徐世勣并不是“大奸似忠”那类脸谱化人物，他只是一个善于将“私利”穿上道德外衣的高手。他以黑社会的身份起家，有出人头地的渴望和建功立业的野心，但是他的出生入死，从来都不是出于表面标榜的忠君爱国，而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宠禄及身与富贵长保，在慷慨激昂的道德面具下进行着个人利益的精打细算。他不像李林甫在道德的外表下包藏祸心、口蜜腹剑，他不是卫道士，但也不会穷凶极恶，他只是一个小心翼翼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不可否认，徐世勣卓著的战功为他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他追随李世民打败了王世充，平定了刘黑闼，战胜了辅公祐，与李靖一起赶走了突厥，与李孝恭一起收复了江南。直到唐高宗时，已届耄耋之年的他还率领各路大军征服了高丽，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的未竟事业，以此达到了人生辉煌的顶点。徐世勣的军事才华无与伦比，

但是从他的政治生涯来看，战功卓著仅仅只是奠定了基础，道德伪装才推动了他的政治飞跃。

在瓦岗寨啸聚山林时，他就以江湖义气而闻名。后来追随李密逐鹿中原，他又以讲信义、重然诺而身居要职。在追随李密投降李唐之后，他仍然不顾李密曾经对自己的伤害，对已经失败的李密念念不忘，这份不忘旧恩的“忠诚”深深打动了唐朝的李氏父子。徐世勣刚刚进入李唐集团，就得到了李渊“实纯臣也”的评价；他曾在皇宫举杯豪饮，醉倒后受到李世民御袍加身的礼遇。如果徐世勣的生命到此结束，那么他的伪装也将天衣无缝，他的美名也将永世长存，只可惜，命运却非要在他毕生表演行将结束时，把道德外衣倏然撕碎。

在徐世勣行将就木的晚年，是否立武则天为皇后考验着每一位朝廷大臣的操守与坚持。而徐世勣在这一问题上的趋炎附势，成为武则天登上皇后位置的最大推动力，这险些断送了唐朝的大好河山，也终于掀开了徐世勣的道德伪装。“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只可惜，他没有通过终极考验，人们也由这一个污点窥见了他在道德外衣下的虚伪本质。

徐世勣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加厚的保护网，他懂得权力斗争的法则，却从来不露出丝毫狡猾；他深谙伪君子的表演艺术，达到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至高境界。他言必称忠孝、行必重仁义，永远站在道德制高点凭临众生，但在他的内心，却始终计算着一己私利的复杂方程式。

自始至终，他的飞黄腾达都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在追求道德完美的儒家政治体系中，一个善于伪装的人为什么能平步青云？如果仁义道德可以通过伪装而达到以假乱真，那么追求道德纯洁性、构建道德理想国又会带来哪些问题？

诡诈与仁义的两面性

徐世勣一生战功卓著，几乎参与了初唐时期所有的重大战役，是有唐一代最耀眼的明星将领，没有之一。秦叔宝、尉迟敬德、程咬金、李靖等人都是后人津津乐道的名将，而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出尽风头，李靖在削平四夷的事业中尽领风骚，但这些人当中，唯有徐世勣经历了唐朝肇建的所有重大战役。

唐太宗李世民评价说："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比于长城之固，可见倚重之深。因此，认识徐世勣的内心世界也应该从理解战争出发。

《孙子兵法》有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也就是说，军事将领如果要战胜对手，必须要兵不厌诈、善于伪装，这从根本上就与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价值背道而驰。与此同时，《孙子兵法》又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军事将领还必须懂得爱抚士卒、团结队伍，使之愿意与自己荣辱与共、赴汤蹈火，这就需要军事将领重承诺、讲义气，增强队伍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因此，诡诈以应敌，仁义以抚下，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应该兼具诡诈与仁义的两面性，应该做到对内仁义、对外诡诈。

徐世勣作为杰出将领，就将诡诈与仁义结合得天衣无缝，演绎得炉火纯青。在与李靖一起攻打突厥时，当时唐军得利，突厥后撤，而朝廷的持节使者恰好刚刚抵达颉利可汗的部落。从道德立场出发，朝廷使者到来表明朝廷愿意与突厥对话协商，至少突厥人盛情迎接唐朝使者是从心里接受使者带来的和平信号，自然会放松警惕、疏于战备，那么唐朝军队讲信义的做法应该是勒兵以待，这时发动进攻不单是背信弃义，也是置朝廷的信誉于不顾。然而，徐世勣绝不会同意这样的书生之见，他从中看到了稍纵即逝的战机，"今诏使唐俭至彼，其

必弛备，我等随后袭之，此不战而平贼矣”。结果当然是诡诈获胜，徐世勣赢得了平定突厥的不世功勋。

与此同时，徐世勣对待部属，却可以说是极尽仁义，不仅懂得“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道理，“前后战胜所得金帛，皆散之于将士”，而且善于运用“推人之功，纳己之过”的统治艺术，“事捷之日，多推功于下，以是人皆为用，所向多克捷”。在追随李密的时候，徐世勣攻下了黎阳仓，“就仓者数十万人”，这些人中间就有日后飞黄腾达的魏徵、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等文人学士。徐世勣“一见于众人中，即加礼敬”，把这些士大夫“引之卧内，谈谑忘倦”，这不仅赢得了“有知人之鉴”的美名，而且救人于危难之际、拔人于未显之时，也足以彰显徐世勣的信义为怀。

徐世勣起于草莽，他所标榜的义气也带着极其浓烈的江湖气息。他在追随李密东征西讨时，与单雄信结下了深厚的同袍情谊，本该是一个战壕作战的手足兄弟，却因为命运的跌宕而劳燕分飞。李密在败给王世充之后降了李唐，徐世勣随后也加入了李唐集团，而单雄信则投靠了王世充。后来，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单雄信遭到生擒，按照惯例应该以死论处，徐世勣这时表现出足够的兄弟义气，“勣表称其武艺绝伦，若收之于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为国家尽命”，而且愿意以自己的官爵赎单雄信一命。无奈唐高祖李渊不许，在单雄信临将就戮之时，徐世勣“对之号恸，割股肉以啖之”，而且正气凛然地为其送终，“生死永诀，此肉同归于土矣”。此情此景，此言此行，将义气二字演绎得感人肺腑，真可谓见者惊心，闻者落泪，无不为之心有戚戚焉。单雄信死后，徐世勣收养了他的儿子，将这份手足之情坚持到底，善始善终。

不能不说，徐世勣不仅有军事将领独有的血性与尚武精神，而且有与尚武精神相伴而生的江湖义气，他以一把仁之剑、一把义之剑，取人心于无形之间，为他自己树立起崇高的道德感召力，甚至在他死

后，“闻者莫不凄怆”。然而，一旦将这份义气用于粉饰自己的道德形象，并以此作为博取君王信任的资本，那么道德也就失去了作为价值标准的纯粹性而被异化为克敌制胜、俘获人心的工具，难免会造成一种真假难辨的道德伪善。

在两军对阵的沙场，诡诈以应敌，仁义以抚下，二者可以各司其职、泾渭分明。但是，当战场从有形的军事转向无形的政治，敌我之分瞬息万变，诡诈与仁义也就相互交织、彼此渗透，直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诡诈更是包裹在仁义的外表之下，杀人无形而又不知所踪。而这正是理解徐世勣的关键。

精致的道德表演

徐世勣动合时宜、进退有度，既能敏锐地捕捉皇帝的需求，也能精确计算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优路径，更懂得如何把个人私利包装在慷慨激昂的道德面具之下。他的伪装艺术如此之高，如果不进行抽茧剥丝的思辨，很容易“乱花渐欲迷人眼”，被“崇高”的表象所迷惑。从表演艺术来说，徐世勣是真正的大师。

徐世勣初入江湖就与翟让等人在老家聚众为盗，他当时年仅17，就对翟让说：“今此土地是公及勣乡壤，人多相识，不宜自相侵掠。且宋、郑两郡，地管御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就彼邀截，足以自相资助。”意思是说，在老家都是父老乡亲，下不去手，不如换个地方做强盗。从强盗的素养来说，徐世勣能放过乡土的熟人也算是良心未泯、盗亦有道，但是熟人与陌生人都是人，杀熟人有所不忍，杀陌生人就能心安理得吗？可见，这份对熟人的选择性怜悯并不是真正的天地良心。

后来，徐世勣投靠李唐集团，入伙的第一次发声就刻意带着高亢的道德音色。当时，李密兵败降唐，徐世勣作为李密的部将还统领着黎阳，不久就占据了李密原有的土地与兵马，但此人此土未有所属，徐世勣也缺少自立门户、举旗争霸的意志，于是也决定随之归顺李唐。按照一般人的思路，直接向李渊俯首称臣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徐世勣却抓住这次机会，在李渊面前进行了一次华丽的道德表演。他并没有直接向李渊上表，而是“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也就是献给李密，让李密转献给李渊。

为什么要拐这么一道弯？徐世勣对此有一番深思熟虑，他认为，如果直接把土地和人口献给李渊，那对于曾经的老板李密来说，就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也就是卖主求荣。所以说，讲义气的做法应该是把土地和人口交给李密去敬献，那样旧主恩情不忘、新主邀宠未减，可谓两得其宜。果然，李渊在听说徐世勣这番苦心后，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这显然是为徐世勣的“忠义”所感动，“纯臣”的评价也不可谓不高。徐世勣在李渊心中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打上了“忠义”的烙印。

表面上看，徐世勣如此不忘旧恩不正是对“忠”的最好解释吗？其实，这是徐世勣处心积虑的一场“道德秀”。如果真心不要“利主之败”，那就根本不用归顺李唐；换句话说，只要归顺李唐，无论以什么方式投降，都是在“利主之败”。于是，对徐世勣而言，投降成为一个两难的选择，如何既能从表面上逃避“利主之败”的道德指摘，又能向新主证明自己的忠诚？

这时，徐世勣对权力法则的深刻洞察就派上了用场。在中国古代，君主考察一个人是否忠诚的重要检验方法之一，就是看这个人如何对待曾经的首领。如果是人走茶凉，那么自己也可能是同样的下场；如果是慎始善终，那就说明这个人气节不改、忠贞不移。一代名臣魏徵曾经是隐太子李建成的幕僚，看到秦王李世民立下不世功

勋，“阴劝太子早为计”，后来李世民率先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李建成，李世民于是责备魏徵离间皇室兄弟，魏徵则直言不讳地说：“太子蚤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按道理，这句话应该会触怒李世民，但李世民“器其直，无恨意”，就是因为魏徵对旧主忠贞不移让李世民认识到魏徵并不是见风使舵的小人。显然，徐世勣深谙此道并由此找到了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把土地与人口交由李密敬献，既显得仍然忠于旧主，也能让新主看到自己对旧主的态度。可以说，经由李密转交，不是在表达政治忠诚，而是在玩弄权谋技巧。

对旧主“感德推功”并非真正对旧主心怀感恩，而都是表演给新主看的。对于这场“道德秀”，徐世勣也时时不忘做到有始有终、滴水不漏。

后来，李密反叛伏诛，徐世勣表请收葬并且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祭奠仪式，“勣服衰绖，与旧僚吏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释服而散”。徐世勣的做法再次赢得了上至天子、下及群臣的赞扬，获得了“朝野义之”的美名。但是认真推敲，如果真正忠诚于李密，李密逃亡的时候，徐世勣就应该举兵相随；李密被杀的时候，徐世勣更应该起兵护主。而在这些关键时刻，徐世勣又在哪里？斯人已逝，尸骨已寒，而后在死者的坟茔上大做文章，对死者，如许“忠诚”来得太迟，对生者，这样表演却恰逢其时。

这样的伪装可谓“天衣无缝”，真实的目的被包裹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人们还没来得及去拷问本质，就已然为表面的道德热忱感动不已。“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在理性思考萌芽之前，道德感动就将人心攫住，并让思考流失于热泪纵横之间。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徐世勣不断用伪装铺就进身之阶。

道德外衣下的苟合取容

人性是最厉害的武器，人总是倾向于相信表面的美好，徐世勣显然抓住了人性的这个弱点。因此，他的表演总是大获成功。

徐世勣以大气凛然的“忠义”，在皇帝的内心激起巨大回响，不断稳固着皇帝的宠爱与信任。有一次徐世勣骤得暴疾，据说要用胡须烧成灰才能治好，李世民立刻剪掉自己的胡须，为其和药。徐世勣自然“顿首见血，泣以恳谢”，而李世民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其见宠如此。

李世民直到弥留之时，对徐世勣寄以托孤之重，并做出了“思之无越卿者”的评价，而理由恰恰是“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还是那一套逻辑，对旧主一以贯之，对新主岂会始乱终弃？徐世勣也认准了这一逻辑，通过李密这个政治失败者，尽情演绎着他的“忠诚”，并让皇帝看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坚定性，这真是戳准了皇帝心中最柔软的那个部分。

但实际上，即便排除这份“忠诚”的表演成分，剩下的也不过是无原则的苟合取容、阿谀奉承。唐太宗李世民曾要求群臣指出自己的过错，徐世勣的回答是“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见其过”。李世民文治武功、千古独步，说“不见其过”还能勉强搪塞，但是暗弱无能的唐高宗李治总不能也没有什么过失吧？李治有一次说，隋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但是现在无人进谏，这是为什么？徐世勣回答说：“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把“无人进谏”说成是“无得而谏”，这是非常高明的概念偷换，“无人进谏”暗含的意思是皇帝不能虚心纳谏以至于言路壅蔽，而“无得而谏”的意思是皇帝的所作所为堪称尽善尽美以至于群臣百官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寥寥数字悄无声息地把皇帝纳谏的问题变成了对皇帝的歌功颂德，皇帝能不心花怒放？

有意思的是，武则天在临朝称制后曾问群臣，何为“忠”？有一个人的回答最令人满意：“外扬君之美，内正君之恶”。也就是说，忠于君主，除了对外宣扬君主的美德令誉之外，关起门来还要匡正君主的

过失。忠，并不是无原则地逢迎拍马，而必然包括坚持原则、谨守底线，甚至在皇帝犯错的时候，敢于犯颜直谏、以正君恶，这才是对皇帝和朝廷负责任的“忠”。正所谓“嘴不饶人心必善，心不饶人嘴必甜；心善之人敢直言，嘴甜之人藏谜奸”。而徐世勣的忠，以苟合取容为能事，以迎合上意为光荣，即便认识到君主的过错，也必然文过饰非，这恰恰是一种“伪忠”。这一点将在决定唐朝命运的关键时刻助纣为虐。

当然徐世勣心里也清楚，道德外衣再华丽也不过是博人眼球的外衣。政治，最重要的还是实际的权力法则。李世民毕竟是千古一帝，临死时既用“思之无越卿者”的高度评价来正面激发徐世勣的忠诚，也从反面对徐世勣做出了一番深思熟虑的安排：李世民认为继任皇帝李治对徐世勣无恩，于是先将徐世勣贬官出京，李治登基后再提拔为宰相，以博取他的感恩戴德；相反，他要是徘徊顾望，就立刻处死。李世民的矛盾态度说明他至少对徐世勣表现出来的忠诚有所怀疑，而徐世勣对此也早有防备，因此也能再度以伪装而棋高一着。诏令一出，徐世勣连家都不回，立刻赴任。徐世勣何苦“不至家而去”？

徐世勣太清楚这一道诏令的用意了：一方面，李世民即将撒手人寰，徐世勣有尾大不掉的可能，调任地方则可以剪除潜在威胁；另一方面，先皇今抑，嗣帝后扬，是为了给李治腾地方。因此，徐世勣的任何迟疑都可能被视为政治上的别有用心。而他“不至家而去”，迅速果断地执行皇帝诏令，尤其在权力交接、人心浮动的敏感时期更能显出对皇室的绝对服从，也足以让李氏父子放心了。

这一番“不至家而去”的道德表演将暗流汹涌的政治博弈隐藏在幕后、化解于无形，再次显示出徐世勣高超的伪装艺术。

人生最后时刻的暴露

徐世勣的伪装成就了他自己，却差点断送了大唐的锦绣山河。但也是在这一次，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辅政大臣或诛或贬，而徐世勣依然稳坐官位，安然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次政治风波。

唐高宗登基后，立即召回徐世勣，而他也知趣地立刻回朝，配合得天衣无缝。随后，一场政治风波暗流涌动，在大唐政治版图下不断奔突，最后终于涌到台前。李治决意要废掉原配，改立武则天为皇后。这表面上看只是皇后的废立，但实际上是一场波谲云诡的政治博弈，朝廷大臣由于对武则天的不同态度裂变为两大阵营。武则天能否当上皇后关系到朝廷政治版图的一次重新洗牌。

支持武则天还是反对武则天，这一选择决定了每个人的政治命运。在这关键时刻，徐世勣无法通过伪装而蒙混过关，只有做出明确的选择。按照惯例，李治邀请长孙无忌、褚遂良、徐世勣等大臣入宫，讨论皇后废立的大事。显然，这时李治发出了有意废后的信号，但是他的决心有多大，尚未可知，因为如果他决心已定，就会以废立皇后是朕家事等理由拒绝群臣进谏，也不必再请大臣商议了。皇帝的态度与决心模棱两可，这时进宫亮明自己的态度，不管支持还是反对，都有可能与皇帝的想法相悖，都有可能是错的，也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隔着这层“无知之幕”，徐世勣聪明地选择了“称疾不入”。

他想要“谋定而后动”，看看别人怎么说，皇帝怎么回应，等这些都摸清楚了之后，再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自己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这或许可以称之为明哲保身的“政治智慧”，但是对于国家而言，这就是对朝廷纲纪的不负责任，对道德败坏的放任自流。

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从道义上来讲，李治不应该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是李世民宠幸过的嫔妃，先朝嫔妃如果成为当朝母仪天下的皇后，就有乱伦的嫌疑，这显然有悖大唐立国的道德基础与伦理价值。再者说，皇帝的原配皇后并无过失，作为母仪天下的象征性

符号，如果无罪被废，就难免引发非议、扰乱朝纲。更何况武则天玩弄权术，“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更是朝野上下人尽皆知的事实。如果徐世勣真正践行他所标榜的“忠义”，这时就应该挺身而出、舍生取义、维护道统，而不是身为国家大臣而匍匐于权势，更不能当缩头乌龟，不敢担当。重大关头往往是终极考验，可惜徐世勣装了一辈子，却在这次考验中穿帮露馅了。

徐世勣的观望确实为他争取了战略空间，也等到了一个确定的答案。褚遂良作为托孤大臣，对皇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甚至还动情地引用李世民临死前的话劝谏说：“先帝不豫，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儿好妇，今将付卿。’”如此苦口婆心，却给自己带来了一贬再贬的下场。长孙无忌由于坚决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竟被诬告谋反而遭到流放，最后惨死在南蛮荒野。长孙无忌一手把李治推上皇位，又是李治的亲舅舅，恩则君臣，亲同父子，竟能遭此下场，皇帝的决心不是显而易见吗？于是，徐世勣也有了自己的答案。不久后，李治问起徐世勣的意见，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是皇帝的家事，“不合问外人”。简单几个字，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也坚定了李治的决心。

册立武则天为皇后的仪式，由徐世勣亲自主持。徐世勣担任这一角色简直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他是三朝元老，由他出面为武则天站台，足以为名不正、言不顺的武则天提供道义支持。这是他人生最后一个闪耀时刻，他或许看不到武则天诛杀李唐宗室的那一天，也无法预见武则天掀起“酷吏革命”的那一幕，但他为了保全自己，不惜给一个王朝留下巨大隐患，这样的代价也太过高昂。而这个王朝，曾是他发誓要以死效忠的，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如果徐世勣在此之前就去世，那么他的形象或将完美无缺，但是在册立武则天过程中的趋炎附势暴露了他包裹在道德外衣下的诡诈，也终于撕开了他精心制作的道德外衣，让人能够触摸到伪善的本质。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徐世勣始终一狡贼而已矣。"

道德纯洁性带来普遍伪善

徐世勣最后在荣华富贵中安然离去。据史书记载，他在死前就像得到某种神秘的启示，突然跟家人说病情好转，可以置酒宴乐。于是歌舞起于堂上，子孙列于檐下，这时徐世勣对家人做了一番嘱托，说房玄龄、高季辅等一代名臣辛苦做得门户，却遭到后世痴儿破家荡尽，子孙后代应以此为戒。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徐世勣这番话说得朴实而又坦诚。但直到离世前，他最为挂怀的还是一家一姓的沉浮安危，这与他忠君爱国的形象形成强烈对比。

他走了，但是他提出的问题还萦绕着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

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古代政治就走上了政治与伦理、权力与道德混合的道路，这其中把父子关系扩展为君臣关系，"移孝作忠"是儒家伦理实现政治化的核心步骤。"孝"是对父母的忠，"忠"则是对君主的孝。皇帝用人，最看重的是"忠"，而"忠"也是评价个人德行最核心的标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一部治乱交替、盛衰循环的中国历史中，王侯将相何其多也，太平盛世何其壮也，而其中平天下、治盛世的所有经验归根结底就是用人问题，正如《贞观政要》的概括，"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而用人的所有经验，说到底就是用君子、退小人，正如诸葛亮的总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进贤退佞，是历朝历代都推崇备至的用人宝典，却隐藏着人性层面的根本漏洞。这个漏洞，被徐世勣无情地挑开了。

“亲贤臣，远小人”的前提是需要分辨谁是贤臣，谁是小人，而辨别贤佞的关键不在才能高低，而在德行善恶；不在能与不能，而在忠与不忠。如果说能力的考察更容易标准化，更具有操作性，那么德行的判断则容易扑朔迷离。尤其是，当“忠”可以伪装，当“德”可以表演，安能辨我是忠奸？如果君子与小人难以区分，甚至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那么亲贤臣也就变成了亲小人，远小人也就变成了远贤臣，朝廷就会失去辨别贤臣与小人的能力，那么“亲贤臣，远小人”又如何真正付诸实践呢？就像徐世勣带来的反讽那样，李世民临死之际授予托孤之重，是寄望于他的“忠义”，希望他能够辅佐继任皇帝保住社稷、造福天下，但徐世勣的“忠义”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在关键时刻露馅儿，差点儿让大唐江山断送于武则天之手。

其实，关于忠孝在行为层面的伪装问题孔子早有洞察。孔子曾批评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在孔子看来，“孝”不仅是赡养，更应该包括心中的敬畏。如果只是赡养，那么连犬马都能做到这一点。推而广之，“孝”与“忠”的关键是“敬”，是存乎一心的真诚与敬畏。《礼记·中庸》有言：“故君子慎其独也。”宋朝的朱熹这样注解道：“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事实上，孔子所谓的“敬”，也属于“己所独知、人所不知”的自律领地。心中有“敬”则富贵不能动其心，爵禄不能改其志，生死不能阻其行。但是问题在于心中无“敬”，行为上也可以伪装，表面上表现得正气凛然、忠贞不贰。内心的真假，无法通过行为来判断，只有在极端考验下才能辨别善恶真伪，孔子对此也早有先见之明，他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这正是道德政治在人性层面的根本悖论。不可否认，将道德修养作为评价标准寄托了中国古人对官员人格的美好期待，对美化风俗的崇高追求，但是道德可以作为内心约束，它属于因信称义、心诚则灵的隐秘世界，一旦把道德化为一个普遍标准，并以此作为陟罚臧否、选贤任能的准绳，就必然带来普遍的伪善。事实上，这一点在东西方

历史上都具有共性。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内部由僧侣集团掌握着信仰的特权，也试图控制着每个信徒的内心世界，结果带来的是教会的藏污纳垢、言行不一与普遍虚伪。宗教改革引入了“因信称义”的原则，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从而将僧侣集团从人心中放逐出去，让信仰与道德回归个人的心灵。说白了，好的制度不是要舍弃道德标准，而是要让道德回归内心，让行为受到约束，让真小人无法作恶，让伪君子难以高升。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拥有与生俱来的道德判断能力，这正是人称之为人的高贵所在。因此，追求崇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人类所有文明的共同志向。然而，对道德的追求容易陷入“泛道德化”的陷阱，即把内心的道德扩张为外在的一般标准，尤其是与政治和权力结合起来，就更容易走向反面，适得其反，带来以假乱真的表演和言行不一的虚伪。

徐世勣并不是空前绝后的人物，在他之前和之后，历史上都有大量以道德名义攫取权力财富的人。那些长袖善舞的伪君子会比真君子表现得更道德，更高尚。历史反复在证明这一点：在道德政治中脱颖而出的不是敢于面折廷争的忠臣义士，而是善于阿谀奉承的假道学、伪君子。可以说，追求道德纯洁性的结果正是普遍的道德伪善，而建造“道德理想国”的结果则是真君子无用武之地，伪君子有进身之阶。

徐世勣晚年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慊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陈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当盗贼是“逢人则杀”，而成为官军之后，杀人是为了救人。在他看来，黑社会是“流寇”，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杀人；而政府则是“坐寇”，因此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总之都是杀人，黑社会与政府的区别仅仅在于目的的不同。一个对政治的理解如此冷血的人，他只会像狐狸般狡猾与像狮子般残忍。只可惜，他在张开利爪时戴上了绵羊的面具。

徐世勣在人生最后时刻的败露，让怀着狼子野心的武则天登上了皇后的宝座。而徐世勣撒手人寰之后，武则天先是垂帘听政，与李治二圣并立，接着临朝称制，将继位的皇帝架空，对皇室子孙赶尽杀绝，更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令人胆战心惊的“酷吏革命”，在历史典籍上留下了斑斑血迹。环顾宇内，天下之大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武则天了。就在关键时刻，曾为徐世勣当作表演道具的伦理道德，在这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不知不觉间攫住了武则天坚若铁石的心灵。

第五章



武则天：时间进程的"一个断点"

武则天就像历史的一个断点，傲然游离于时间的进程之外。如果把中国历史比作一幅水墨画，武则天就是那座遗世独立的孤傲山峰。她创造了空前绝后的奇迹，也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孤独。

中国古代英雄辈出，但还是很少有人像武则天那样复杂，即便是千载之后，也很难盖棺论定。刚刚为她的心狠手辣义愤填膺，偏偏又被她作为女性的可爱一面所吸引；正要赞赏她选贤任能的开明与气度，却又为她掀起的"酷吏革命"不寒而栗。无论走向哪一个单向的维度，都会陷入剑走偏锋的困局。她就是这样令人捉摸不定，也因此自有一种不可抵挡的魅力。

她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在她的身上，融合了太多极端对立的元素——政客的阴险与女人的柔情，造反的狡诈与明君的胸襟，放肆的情欲与敏锐的洞察，爱美的心境与杀人的阴冷……或许正是这些内铄于心的多重性格，才让她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履险如夷，在不同的人群间游刃有余。她不是一个单向维度的人，永远不会一条路走到黑，因此她能左右逢源、无往不胜。

政治是关于可能性的艺术，而武则天证明了中国历史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女人也能当皇帝。她不同于之前临朝称制的汉高后，也不

同于之后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她们的权力虽然拟于人君，但还是借着与男人的关系“狐假虎威”，她们权力的合法性仍然依靠与男人的关系来支撑。与她们相比，武则天后来“周革唐命”、改变正朔则是直接把男人这棵大树砍倒，让女人成为权力的来源和主体，因此更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更有挑战一切的魄力。无论如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一份想象力与胆魄就具有十足的现代性。

然而，悲剧就在于，当武则天站上权力的巅峰，她已经把整个时代踩在自己的脚下，却发现这就是她人生的终点。真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发现自己站立在一个游离于时间之外的断点，进一步是万丈深渊，退一步也是万丈深渊，由此她感到了彻头彻尾的挫败感。武则天费尽心机夺走了最高权力，却发现她的权力根本无法传承下去，她成为儒家政治秩序的一个弃儿。在经历痛苦的挣扎后，她决定把权力还给大唐子孙，既革大唐之命，还复大唐之权，这相当于宣告自己一生的努力归于失败。究竟是什么打败了这个曾经战胜一切的女人？

武则天创造了历史，但是她无法赢得未来。她在成功的时候，证明了“政治是关于可能性的艺术”；而她在失败的时候，则揭示出中国政治超稳定结构的哲学基石。她战胜了所有人，也践踏了有形的政治制度，却不能打败无形的政治哲学。那么，作为女人，武则天怎样一步一步爬上权力的巅峰？最后，她又怎样在晚年时光败给了那个虽然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政治哲学？

不惜杀死女儿以搏出位

武则天在14岁时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思维与胆识。那时，她正值及笄之年，天生丽质难自弃，养在深闺之时，芳名就已惊动当朝皇帝李世民。于是一道诏书，招她入宫。女儿一朝选在君王侧，自然是好

事一桩，但毕竟宫廷凶险，年少入宫前途未卜，于是武则天的母亲“恸泣与诀”，但她却谈笑自如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宫闱之间，往往危机四伏，一位芳龄14的女孩竟无所畏惧地乐观前往。武则天的人生，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武则天的人生轨迹属于典型的“否极泰来”的辩证风格。在李世民驾崩之后，她作为先朝嫔妃出居宫外，入寺为尼，人生可以说是陷入了难以挽回的低谷。李世民生前，武则天在后宫佳丽中未曾显达；李世民死后，她在名义上又是先皇的女人，哪个男人敢娶为妻室？武则天似乎只有落发为尼、遗世独立这一条逼仄的道路了，却在渺然不知所归的人生低谷迎来了惊天逆转，继任皇帝李治经常到感业寺吊唁先皇，竟与武则天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而武则天心里明白，李治是她的唯一希望，因为只有皇帝能够拯救皇帝的遗孀。

武则天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她看准了李治多愁善感的性格，决定以自己的似水柔情与悲惨境遇来抓住李治的心。有一次，李治在感业寺路过佛舍，而武则天远远看到皇帝过来，悲从中来，且见且泣，泪光盈盈，楚楚可怜，李治的心果然为之融化，“帝感动”。可以说，此时此刻，李治已经暗下决心，哪怕将先朝嫔妃纳入后宫要遭到非议，他也要把武则天从深渊中解救出来。而这时，后宫王皇后与萧淑妃争宠也恰恰为武则天提供了机会。王皇后久无子嗣，萧淑妃方见宠爱，王皇后为了挟制萧淑妃需要引入外援，而恰在此时听说了李治与武则天暗送秋波的事情，于是决定将武则天“引内后宫，以挠妃宠”。于是，在李治的怜爱与王皇后的算计共同推动下，武则天越出了礼教大防的底线，再次进入后宫。王皇后还不知道，她引入的不是队友，而是自己的掘墓人。

在后宫斗争中初露峥嵘，武则天已经将毒辣、冷酷与狡猾展现得淋漓尽致。她先是与王皇后联合打倒了红极一时的萧淑妃，而后开始用反间计来对付曾经的恩人王皇后。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但是武则

天为了获得权力，却不惜赌上亲生女儿的性命。当时，王皇后与武则天共同打倒萧淑妃，结下了共同战斗的同袍情谊，王皇后对武则天尚未产生戒心。在武则天生下女儿后，王皇后欣然前往并毫无防备地抱着婴儿玩耍，皇后哪里知道，在抱起婴儿的一刹那，自己已经大祸临头。武则天等皇后走后，竟亲手用被子将女儿闷死。

故事发展至此，足见武则天泯灭人性的阴毒，而之后对整个阴谋的设计则体现出她洞悉人性的狡猾。她杀死女儿之后并不是哭哭啼啼向皇帝诬告皇后，而是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等皇帝来看小公主，她欢笑如常，假装打开被子，竟“发现”女儿已死。武则天伪装得十分惊讶，“责问”太监宫女出了什么状况，而左右都回答说：“后适来。”听闻之下，武则天什么都不用说，只需要呼天抢地、捶胸顿足，做无可奈何的悲痛状，皇帝自己就找到了她预设的答案——“后杀吾女”，并通过想象还原“真相”：王皇后自己没有子嗣，对武则天心生嫉妒，竟不惜亲手杀死她的女儿……

武则天成功做到了“看不见的说服”，能把诬陷做到如此极致，狠毒与狡猾缺一不可。如果她到皇帝面前诬告皇后，在后宫斗争如此激烈的背景下，皇帝也不可能只相信她的一面之词。然而，武则天还有更大的计划，亲手杀死女儿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是引皇帝上钩。于是才有了后面的剧情，她自己假装不知情，而在皇帝发现女儿已死的瞬间安排太监宫女以第三方的身份弱弱地说一句“皇后刚刚来过”，皇帝就能自然发挥想象力还原“真相”。她什么都不用说，但是什么都说了。

结果，皇帝对皇后益愈疏远，而对武则天日见信爱，直到皇帝决定废旧立新。就像她14岁就冥冥中感受到的神秘启示——见天子庸知非福，她已经实现了人生的逆袭。只是，手段太过残忍。

残忍并未因为胜负已分而停止，在她获得成功之后，命人砍掉了皇后与萧淑妃的手足，并将她们放在酿酒的瓮里，就这样一直到死。

而萧淑妃的两个女儿义阳公主、高安公主也遭到幽禁，年近40而不嫁。武则天的残忍狠毒令人毛骨悚然，但即便铁石心肠如她，也会留下心理阴影。在以后的岁月里，她总是产生幻觉，常常看到皇后与萧淑妃“被发沥血”，无论怎样“巫祝解谢”，总也挥之不去。然而，史书没有记载，她在君临天下之时，有没有想到过那个刚刚出生、满身还散发着婴儿香的女儿。如果她想到了哪怕一秒钟，相信那一定也是撕心裂肺的疼痛。

这时的她，或许当得起这样8个字的评价：面若桃花，心如蛇蝎。

用“酷吏革命”掀起白色恐怖

流血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停止。武则天夺取权力的过程充满了血腥，而巩固权力的过程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与皇帝双峰并峙、携手临朝，称为“二圣”。她能够准确地把握唐高宗李治的心理弱点：对付这个暗弱无能的皇帝，只需要永远保持进攻态势，就能让他不断妥协。李治也曾对武则天日益上升的权势感到恐惧，于是命西台侍郎上官仪“草诏废之”，左右侍从竟驰告武则天。她突然出现在皇帝面前，一番倾诉之后，皇帝不仅回心转意，而且感到“羞缩”，更为自己辩解说：“是皆上官仪教我！”经过这番心理挫折之后，李治对武则天更加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甚至一度“将下诏逊位于后”，被宰相郝处俊固谏乃止。

李治一朝撒手人寰，苦心经营多年的武则天就迫不及待地废掉了继任皇帝，开始了君临天下的岁月。如果说皇帝曾经是她登上权力巅峰的梯子，那么她现在已经不需要这把梯子了。而激荡在武则天脑海里面的未来想象已经不是重演历史上皇太后临朝称制的陈旧故事，她将要在一个父系社会创造女人的神话，那就是潜图革命、自称皇帝！

皇太后临朝称制，是以前朝皇帝之妻、当朝皇帝之母这样的身份行使权力，是以与男人的关系来定义自己的存在。武则天要做的事是摆脱这种限制，她要确立女人独立的主体性存在。

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在一个男权社会又是何其艰难！潜图革命、以周代唐甚至自称皇帝，这样的勃勃野心必然会激起不断的反抗。于是，在当权岁月，武则天如坐针毡，始终把满朝文武当作假想敌，担心有人会谋反。在恐惧心理的驱使下，她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恐怖黑暗的“酷吏革命”，始终以猜忌而不是信任来治理天下。从此，“告密”正式成为一种统治术。

武则天昭告天下，公开鼓励所有人举报谋反，通过大臣之间陷入内讧而获得皇位稳定。史书记载，“时四方上变事者，皆给公乘，所在护送，至京师，禀于客馆，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赉赐，以劝天下”。也就是说只要是告密的人，地方官要护送，到了京城还要住在朝廷客馆，说得好的还能加官封爵，差点儿的也能获得金银赏赐。不但如此，“凡言变，吏不得何诘，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只要是告密，官吏都不能阻挡，即便是村野耕夫，武则天也要亲自接见。武则天就这样用国家力量鼓励天下告密。于是，“故上变者遍天下，人人屏息，无敢议”。在重赏之下，周兴、来俊臣、索元礼、丘神绩等酷吏应运而生，使得社会陷入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内战状态，极大地破坏中国传统的社会信任和政治生态。

来俊臣等人本来大字不识，但都通过告密而平步青云。他们深知武则天鼓励告密是为了挟制大臣，而不是真正存在多少造反的阴谋，于是这些人纷纷“以夷诛大臣为功”。时间一久，他们发明了无中生有的告密模式，即“告密—诬陷—升迁”的路径，开始肆无忌惮地滥用“告密”的特权。他们的程序往往是：首先选择告密对象，其次动用极刑，最后在屈打成招后入大狱、诛九族。告密的理由必然是“意欲谋反”，而告密对象的选择往往与谋反没有任何关系，或是消灭异己，或是出

于报仇，或仅仅是因为看上了别人的老婆，所以不惜通过告密将其迫害致死，其荒谬如此！

用刑之手段更是惨绝人寰。索元礼喜欢用铁笼戴在“囚犯”头上，“以楔，至脑裂死”，还喜欢把“囚犯”挂在梁上，缒石于头，而极刑一开，“相牵联至数百未能讫”。如此残忍无度却得到武则天的嘉奖，“后数引见赏赐，以张其威”。来俊臣审判时，不问轻重先把醋灌进鼻子，然后掘地为牢，绝其粮食，囚犯“啮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终不得出”。来俊臣还制作了10种大枷，后来制成铁制头盔，人戴上后“宛转地上，少迁而绝”。后来，来俊臣都不需要动用极刑，只需要展示这些刑具就足以让人“莫不震惧，皆自诬服”。关于告密的程序、用刑的步骤、刑具的使用，来俊臣将其分门别类，写出集大成者的《罗织经》成为告密与极刑文化的滥觞。

告密成风、大狱屡兴，骨鲠之臣朝不保夕，狄仁杰、魏元忠、宋璟、张说、姚元崇等名臣都曾在鬼门关走上一遭，而被酷吏诬陷谋反而招致家破人亡者，更不知凡几。其中受到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唐朝宗室子孙。在镇压了韩王李元嘉的起义之后，武则天把宗室视为更大的潜在威胁，10多个亲王及家族遭到阴诛显戮，“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

“酷吏革命”达到了道路以目、人人自危的境地，武则天的统治看上去日益巩固。然而，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言，权力是一种流动的关系，“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武则天为了挟制群臣、剪除宗室而推动“酷吏革命”，只是赢得了表面的服从，却造成了内心的反叛，人心思唐已成定局。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然而，如果只有镇压这一种方式，武则天就不是武则天了。她懂得“胡萝卜加大棒”的法则，在“忤逆者诛戮”的同时实行“附顺者拔擢”，在残酷之外还给了天下士子一个若有若无的希望。这是她复杂的地方，也是她厉害的地方。

用政治吸纳安抚精英阶层

如果只有“酷吏革命”带来的绝望，那么在“反也是死，不反也会被诬陷致死”的逻辑之下，天下士林一定会选择鱼死网破、玉石俱焚，那样武则天掀起的白色恐怖就会适得其反。然而，武则天才不会一条道走到黑，她在绝望的肃杀中还夹杂着丝丝暖风，融化着人们内心的戾气。

如果仅从治国理政的能力出发，武则天与那些男性皇帝相比也是不遑多让，甚至可以说远出于大多数君主之上。她虽然阴险狠毒，为了权力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她清楚地知道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并做出了一副维护礼法秩序、尊重知识分子的样子。

有这样一个故事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僧人薛怀义本来是洛阳街头的无赖，受人推荐得到武则天的宠幸。武则天为了掩人耳目，让他假装剃度出家，以僧人身份出入宫禁。从此，这个昔日的无赖就开始飞黄腾达。他不仅成为皇室修建宫殿的总监，还统领了数十万大军北讨突厥，宠荣冠于当世。“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薛怀义一旦小人得志，便有恃无恐、目无法纪，什么王孙贵胄、文武百官都不放在眼里，甚至公开凌辱士大夫。

当时，有一位名叫苏良嗣的宰相，向来以刚直不阿而闻名。有一次薛怀义在宫中遇到苏良嗣，神情傲慢，举止无礼。殊不知，唐朝宰相当国，地位崇隆，史书上称为“礼绝百僚”，即便是皇帝，见了宰相也应行礼。薛怀义一向傲慢惯了，后面又有武则天撑腰，偏偏要耍一耍宰相。没想到，苏良嗣见此大怒，命侍从打了薛怀义一巴掌。薛怀义自然会到武则天那里打小报告，按照武则天的阴险狠毒来推断，故事的结局极有可能是苏良嗣大祸临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武则天竟批评薛怀义说：你应该从北门出入，南衙属于宰相，“毋犯之！”这说明，武则天为了得到权力可以践踏底线，但是在使用权力上仍能做到谨守边界，她会因为害怕谋反而滥杀无辜，但绝不会纵容私欲而破坏朝廷典章。她有冷酷到令人颤抖的一面，同时也有开明君主所应有的节制与气度。

这一点，在她用人方面体现得更明显。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政治体系保持稳定的关键是最大限度地将政治精英吸纳进政治体制内部。正因为此，唐太宗李世民感慨“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而知士庶安心、天下大治。武则天也深谙此道，而且比李世民走得更远。为了吸纳精英、安定人心，给人向上流动的希望，武则天使出的撒手锏就是滥赏官爵，滥封官位，滥发官禄。

史书记载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桀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凡是引见科考的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不管水平高低，都委以重任，运气好的可以“试凤阁舍人、给事中”，等而下之也能“试员外郎、侍御史”。中国历史上的“试官”就滥觞于此，所谓“试”，类似于今天的“见习”，实际上是闲官冗员、人浮于事，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当时有人嘲笑说：“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脱校书郎”，就可见冗员泛滥到了何种程度。后来，有个举人在这首打油诗后面续了一句讥刺当局的话，御史认为是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没想到武则天哈哈大笑，说：“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

武则天果然洞悉居上御下、驾驭人心的奥秘，只要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精英阶层被吸纳进体制内，不管是实职也好，闲差也罢，只要他们接受这个名位并且怀着在权力阶梯向上攀爬的心思，那么他们就不会到体制外举兵造反，政权就能获得稳定。这是大逻辑、大政治，几句略带嘲讽的打油诗又有什么要紧？

而武则天的知人善任，恐怕也是大臣名士乐于归心的理由。一代名臣狄仁杰、宋璟、姚崇等人，都是武则天一手提拔重用，与武则天也都有一段不能不说的佳话，尤其是宋璟，向来以刚直不阿闻名。在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最为得势的时候，连武三思、武承嗣这样的皇亲国戚都争着鞍前马后地伺候，宋璟就敢视若无物。当时，举朝上下称呼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唯独宋璟特立独行，他训斥大臣们说，你们并不是人家的家奴，为何要称之为“郎”呢？从此与二张有隙，两位内宠不仅伺机中伤，还派人刺杀，但都因为武则天的庇护，宋璟才能幸免于难。显然，武则天对骨鲠之臣的容忍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收买人心的作用，即便只是做做样子，她也表演得非常成功。至少，如果没有她留下的宋璟、姚崇等政治遗产，唐玄宗很难开创历史上的“开元之治”。

武则天透析了政治统治的本质，她非常清楚所谓“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说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用人，更重要的是完成对精英阶层的“政治吸纳”。她抓住了这一统治奥秘，将体制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于是那些梦想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大夫们，突然就忘记了她的残忍，抱着一丝宏图大举的侥幸心理心甘情愿地落入彀中，半推半就地维持着她的血腥篡权和残忍统治。

武则天的一柔一刚、一阴一阳准确地掌握着天下士子脆弱的心灵。他们因恐惧而屈从，又因希望而顺从，被动与主动相辅相成，武则天调和得恰到好处。

在时间的荒原铩羽而归

一手拿着足以让任何有志之士都为之胆寒的利剑，一手又握着天下士林都趋之若鹜的官帽，武则天获得了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功。然

而，当她的双脚踏上权力的巅峰，她的身体却在时间的冲刷下迅速老去。

晚年的武则天仍然爱美，这曾是她打动李世民的奥秘，也是她征服李治的武器。虽然年届古稀，已是“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但她仍然怀着少女般的爱美之心，“虽春秋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悟其衰”。有一段时间，她竟然重新长出了两颗牙齿，高兴得马上下诏改元为“长寿”。只可惜，驻颜之术不能抵挡时间的侵蚀，“长寿”虽是美好的期望，终究难以掩盖现实的窘迫。武则天该认真考虑权力的传递问题了。

权力与时间的关系本来就充满了紧张。乔治·奥威尔在小说《1984》里面这样形容它们之间的张力，“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而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也就是说，定义历史可以影响未来，而掌握权力则等于掌握了历史的定义权。武则天政权在手，当然也试图改写历史，改变时间的轨迹。她把先秦时期的周文王、周武王作为新王朝的始祖，并把自己的列祖列宗都追奉为皇帝，建庙供奉、配享天地。追认周文王，是为了给新王朝制造正当性的历史基石；追封老祖宗，则是为了给新王朝的权力传递书写连续的谱系。

定义历史，是为了改变未来。武则天如此煞费苦心地改变历史叙事目的都是为了周朝万世一系的延续。然而，武则天一生纵横天下、无往不胜，这次却要遭遇失败的“滑铁卢”。由于儒家伦理秩序自身的免疫力，她未能如愿以偿地实现“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的目的。

武则天是周朝的缔造者，而周朝延续的前提就应该是姓武的人当皇帝。武则天不是没有考虑过废掉李唐的皇嗣，而改立武氏子孙。她刚刚临朝称制，就把唐中宗废为庐陵王，立了睿宗当太子，却始终严加防范，朝中大臣胆敢与之往来，必然身首异处，史书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尚方监裴匪躬坐潜谒皇嗣，腰斩于都市”。然而，如果说

她对李唐宗室如同冬天般寒冷，那么对待武氏子孙则如春天般温暖。她不仅追封祖宗，而且“尽王诸武”，对武家亲戚全部封官许愿。在祭祀天地这样的重大活动中，她把武承嗣排在第二，武三思排在第三。这样的仪式性安排，折射出她内心废李立武的想法。

在当上皇帝的前后两个时期，她都向宰相提出立武氏子孙为太子的想法，却以同样的理由两次被不同的宰相制止。第一次，她想立武承嗣为太子，宰相李昭德说了这样一个理由，“自古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就是说，等武承嗣当了天子，他能给你这个姑姑立庙吗？一言之下，效果立竿见影，“后乃止”。第二次，她想立武三思为太子，宰相狄仁杰说了同样的理由，“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三思立，庙不祔姑”。意思也很明确，立自己的儿子庐陵王为太子，千秋万代之后自己还能常享宗庙，如果传位给武三思，他以后祭祀祖先会带上你这个姑姑吗？这次武则天不仅仅是彻底打消了立武废李的想法，而且立刻派人把庐陵王迎接回朝。

武则天战胜了一切有形的敌人，却在儒家伦理秩序面前铩羽而归，并且感受到无可奈何的无助感。姑侄关系，在儒家伦理秩序决定的权力传递中注定没有立足之地。武则天为了夺取权力，曾经掀起腥风血雨的斗争，曾让多少无辜的人鲜血流尽才铺就了一条通往权力的道路，但是她失去权力的过程却没有硝烟四起，也没有曲折反复，只是几个儒家士大夫的一面之词就打倒了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

李昭德与狄仁杰不愧是当世大儒，他们看准了改变历史轨迹的那个按钮，只需轻轻一按，则千古江山为之一变。

儒家伦理秩序的超稳定性

波谲云诡的政治剧情在武则天带着女性灵动色彩的安排下，轻松幽默地落幕了。

庐陵王已经回朝，武则天却把他藏了起来，故意跟狄仁杰他们玩了一个恶作剧。她把狄仁杰召来，故意问庐陵王的事，狄仁杰“敷请切至，涕下不能止”，他哪里知道庐陵王已经回朝，这是武则天故意逗他玩呢！直到此时，武则天才把庐陵王亮出来，并不无戏谑地说，“还尔太子！”看着狄仁杰一把鼻涕一把泪，武则天肯定在心里偷笑，这似乎是在说，你不让我把皇位传给武家后代，那我就做个恶作剧来逗逗你！武则天女人的一面又回来了，复杂如她，时时也有这样直抵人心的可爱瞬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武则天是在使尽浑身解数的挣扎之后才意识到在儒家伦理秩序面前，她是多么的孤独无助、势单力薄。迎回李唐太子，政治格局已定，但朝野上下仍然嫌还政于唐的进程太慢，70多岁的老宰相张柬之按捺不住，率领羽林军称兵向阙，发动兵变，刀锋下的武则天显得那样虚弱无力。

她对一起发动兵变的崔玄暐说，别人都是因人而进那就罢了，你是我一手提拔的，为什么还要反我？崔玄暐的回答堪称机智，也可谓经典，他说：“此正所以报陛下也。”武则天听闻之下，应该能感到那种彻骨的冰凉。这不是“忘恩负义”的世态凉薄，而是来自历史深处的一股寒气。崔玄暐没有错，按照儒家伦理，他是在做正确的事情，是在让武则天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回归儒家伦理的正常轨道。崔玄暐是把匡正过失作为报恩的方式。人心如此，武则天夫复何言？唯有以沉默来应对接下来的失败。

武则天被历史抛弃了，她在晚年那段幽居冷宫的岁月，一定能感觉到游离于历史之外的无助感与孤独感。她的失败并不是当代人的成功，而恰恰是儒家伦理秩序的荣耀。她并没有败给与她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而只是败给了人类轴心时代那个名叫孔子的哲学家而已。孔

子为中国的政治运转设计了周密的“操作系统”，而武则天的挣扎注定只是一个不能在其中繁衍生息的失败“软件”。

“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确立的是以男性和父权为基石的权力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是把父子关系扩展为君臣关系，并以此作为整个社会运转的伦理基石。在此基础之上，谁要是挑战“父死子继”的权力传递法则，谁就是在挑战整个国家和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也必然意味着自己被历史所抛弃。武则天曾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挑战者，却意外地发现遵守儒家伦理秩序还可以在儿子的供奉中获得一席之地；无视儒家伦理秩序，必然会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连一席之地都会是难以企及的奢望。儒家伦理秩序只留给她两个次优的选择，要么成为大唐权力谱系的横生枝节，要么成为大周权力谱系的幽暗角落。两者都意味着失去，只是，后者意味着一无所有。

武则天的失败，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写下了一个哲学的注脚。儒家伦理秩序的基础，不是把人当作遗世独立的个体，而是当作伦理关系中的一个结点。一个人首先扮演着某种伦理角色，然后才是他自己，因此，一个人也应该在这种伦理角色的扮演中，去寻找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这张伦理之网，是如此无远弗届而又无孔不入，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放在时间流转的坐标里，“父死子继”的原则保持了伦理秩序的延续与再生产。

显然，武则天一开始是这套秩序的受益者，她能够从名不见经传的大家闺秀，一跃而履至尊、制六合、威震四海正是因为她扮演着皇后这个伦理角色。而她最终的失败也是因为这套伦理秩序，以皇后的名义夺国神器，已经不见容于儒家哲学对正义的定义，如果再要传之后世，对儒家伦理秩序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这套秩序就像具有某种免疫力，这种挑战一经出现，所有的人都会与之为敌，挑战者将会陷入与时代作战的绝境之中。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武则天自己，不仅身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精神世界同样被这张伦理之网所定义。如果不是把儒家伦理秩序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念，武则天在已经取得巨大的世俗成功之后，何苦戚戚于千秋万代的历史评价？何必汲汲于自己死后能在香案上占据什么位置？儒家政治哲学不仅把印记烙在人的身上，更是烙在人的心上，因此具有某种“超稳定”的特性。它的优势是“稳定”，它的问题是过度“稳定”，由于过度追求稳定，而牺牲了其他的可能性。这套秩序在自我强化中不断延续，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始终难以衍生出其他可能性。

无论如何，武则天富于想象力，饱含激情，敢于打破常规，善于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抛开那些权谋与血腥的一面，她的激情使她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为这个习惯于萧规曹随、慎终追远的民族注入了一种敢于开拓的精神。她所在的时代也是女人最为扬眉吐气的时代，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女中豪杰相继涌现，为几千年充满腐朽的男人气息的历史注入了女人的风采与神韵。她的横空出世，为对手带来灾难，却给历史带来了别样精彩。

然而，武则天是孤独的，就像她的名字“曌”所隐喻的那样。这个字是她自己的创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也像这个字的孤独处境那样，武则天只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断点”，不管耸起多高，她都注定是一座孤峰。

在武则天之后，她的两个儿子李显和李旦先后成为唐朝的皇帝，但是武则天带来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尤其是她为女人带来的想象空间，注定要在更多女人的心里埋下希望的种子。只可惜，当历史第二次出现时，必然是一种悲剧，唐中宗李显的皇后韦氏权倾朝野，也试图再现武则天开创的女人时代，而此时少年英武的临淄王李隆基率军入宫，一举结束了唐朝自武则天以来的动荡，而把唐朝推向了另一

个盛世的高潮。李隆基不会像武则天那样，但是他会面临另一个困境，那就是至高无上的皇权最终腐蚀了他的人性。

第六章



李隆基：绝对权力让皇帝陷入“认知困境”

唐玄宗李隆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悲惨的帝王，没有哪个皇帝像他那样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的人生，曾一手缔造名垂千古的开元盛世，却又亲自吹散了所有的繁花。如果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李隆基的悲剧更是将他的人生彻底毁灭，因为他的成功曾经如此辉煌，而他的失败又是那样凄凉。那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憾恨，令人扼腕长叹。

公元755年，当了约43年皇帝的李隆基正处于快意人生的境界，天下承平日久，财货积于府库，雄兵威于四夷，百姓安于农桑。这样的文治武功，已经足以让他跻身明君行列，接受千秋万代的顶礼膜拜。而李隆基却对世俗成功感到厌倦，宁愿奋不顾身地经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李隆基与杨贵妃注定是一对苦命鸳鸯，只能在浪漫的文学想象里慰藉彼此。

就是这一年，李隆基的宠臣安禄山举兵造反，“渔阳鼙鼓动地来”，在李隆基猝不及防的瞬间，震碎了他苦心经营的事业与爱情。公元756年，李隆基带领群臣仓皇西逃，昔日的荣华富贵、锦衣玉食更加凸显了落荒而逃的狼狈不堪。沿途官员逃散，一路忍饥挨饿，到了马嵬驿，将士饥疲，群情汹汹，先是屠割肢解了宰相杨国忠，然后逼迫

皇帝处死杨贵妃。已届古稀之年的李隆基颤巍巍地拄着拐杖独自面对叫嚣的士兵，倚杖倾首而立，良久，才默许了士兵的请求。既失天下，复失所爱，那一刻李隆基心里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与煎熬?

然而，如果时间倒流，没有人会想到李隆基会沦落至此。他在年轻时“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27岁时联合太平公主提兵入宫、发动政变，杀死临朝称制的韦皇后，避免唐朝再次陷入外戚篡位的悲剧。接下来，他成为大唐储君，在履位至尊之后，再次先发制人，剪除了太平公主的庞大势力，从而一举将唐朝政治拨回正轨。可以说，从武则天窃国篡位以来，李隆基真正结束了唐朝政治的混乱，拨乱反正，其功最高。

而后，李隆基励精图治，先后任用姚崇、宋璟等人为相，不数年而刑清政简、天下大治。唐朝宰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之能比，可见李隆基识人之明、用人之智、容人之度。如果把时间定格在此时此刻，真可谓君明于上、臣贤于下，济济多士、风云际会，太平盛世可期，海晏河清可望。没有人会对李隆基抱有任何怀疑，也没有人会对未来存有一丝悲观。

但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天纵英才的皇帝，在执政前后期竟判若两人。他曾经任人唯贤，后来却宠信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等奸诈小人；他曾经厉行节俭，后来却赏赐无度、骄奢淫逸、声色犬马；他曾经从谏如流，后来却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专以打击不同声音为能事……李隆基判若两人的转变，对比之强烈，反差之悬殊，足以说明这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具有某种意义，有其内在逻辑与必然因素，就是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可以说，李隆基的人生轨迹揭示出人性与权力的深层关系：权力腐蚀人性，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性。李隆基的故事展示出人性中固有的美德，诸如自律、节制、反省等是如何在皇权的腐蚀中节节败退，导致最终走向负面。

少年英武拨乱反正

马克思曾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这句话用来形容武则天和韦皇后的命运可谓允当。武则天的悲剧成就了韦皇后，而韦皇后的闹剧成就了李隆基。

当时，武则天被迫退位，唐中宗李显即位，李氏子孙终于夺回睽违已久的皇权，大唐政治看似就要回归正轨，却依然潜藏着巨大危机。李显的权力之路充满回环曲折，一度被废为庶人，又遭到武氏子孙窥伺，而在与杀身之祸相伴的人生低谷，韦皇后始终不离不弃。于是，二人约定，"一朝见天日，不相制"。李显成为皇帝之后，韦皇后遂势倾天下。李显有感于患难真情，对她听之任之，甚至看到韦皇后与武三思公然在床戏耍也一味姑息纵容。

韦皇后的权力欲望日益膨胀，于是在上官婉儿等人的引导下开始酝酿巨大的阴谋——效法武则天，临朝称制、潜谋革命。不久，李显暴毙，韦皇后临朝称制。大唐江山历经曲折才失而复得，如今再次陷入风雨飘摇。

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此时此刻，千钧一发，皇室子孙如果没有人挺身而出，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稍有迁延，韦氏气候一成，则无复宗庙社稷矣！就在历史需要救世主出现的时候，临淄王李隆基正式登场，成就了"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千古传奇。

韦皇后离经叛道非只一日，而李隆基密谋诛逆也是由来已久。李隆基善于审时度势、分清敌我，并依据形势变化寻找同盟合纵连横。武则天有两子一女，唐中宗李显暴亡，后来的唐睿宗李旦当时位居藩王，太平公主广有宾客。如果说"政治就是把拥护支持自己的人搞得多

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那么李隆基十分清楚，政治斗争无非就是团结暂时的朋友对付共同的敌人。面对韦后作乱，他选择与太平公主结为同盟，就像他日后铲除太平公主一样，都是出于同样的政治法则。

李隆基不仅善于判断形势，而且遇事机敏、果而能决，有着政治家与生俱来的决断力。当时大事将发，有人说应该先禀告李旦，李隆基说如果父王同意，那是拉他下水；如果不同意，计划必然失败。“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归于宗社，不成身死于忠孝”，这是青年的雄姿英发，是大丈夫的舍生取义，是英雄的正气凛然。千钧一发之际，李隆基果断提兵入宫，斩关而进，诛杀韦氏之党，捍卫道统之正。在成功清除叛党之后，李隆基再次把权力夺回到李氏子孙手中，他辅佐其父李旦当上皇帝，自己则成为众望所归的接班人。李隆基第一次尝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滋味。

但是随着共同敌人的落幕，曾经的盟友却反目成仇。“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大半附之。”她的权势已经威胁到李隆基的安全。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不变的亲情，只有不变的权力——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往往把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无情地挑开，这对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是智慧与良心的双重考验。李隆基也有过犹豫，“主上同气，唯有太平，言之恐伤主上之意”。他深知父皇与太平公主情意深重，但如果任由太平公主恃宠而骄，干预政事，那么大唐从武则天延续下来的女人干政就不会真正结束。于是，政治理性最终战胜儿女情长，李隆基的决断力在关键时刻再次爆发出来。他果断发动兵变，出人意表，先发制人，将太平公主的党羽先斩后奏，一举清除了太平公主的权力网络。李隆基英明果决，善谋能断，再次尝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滋味。

至此，李隆基彻底将唐朝政治领回正轨，结束了自武则天以来的朝纲紊乱，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然而，当这位年轻人意气风发地坐上皇帝宝座，他的誓言却将走向反面，拯社稷之危，复成社稷之祸，赴君父之急，卒乱君父之业。李隆基的人性嬗变展现为多元维度，但抓住其荦荦大端，则可以从节俭、勤政和纳谏这三个方面进行观察。

从厉行节俭到奢华无度

除天下之祸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李隆基凭借不世功业成为天下归心、四海属意的真龙天子，他在诛除暴逆中展现出来的因势而谋的判断力、当机立断的决断力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都是成大事、举大业必备的素质，也因此迎合了人们心中对明君的期待。正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李隆基拥有一个堪称完美的开始，却最终以山河破碎而告终。

李隆基的悲剧还不是“水满则溢”“日中则昃”的简单辩证法则，而是人性受到绝对权力腐蚀后的蜕变与堕落。就像硫酸能将世界上最坚硬的金属腐蚀，绝对权力也能让世间最自律的人在无形中发生改变。它把英明神武的李隆基变得昏聩无能，把克己复礼变成奢侈无度，把心怀天下变成纸醉金迷，把虚心纳谏变成刚愎自用。使用权力就像舔舐刀锋上的蜂蜜，在尝到甘甜之时就已经受到刀锋的伤害。李隆基沉溺于权力带来的甘甜，却对日复一日的伤害浑然不觉。

权力本无形，腐蚀更悄然。李隆基的人生轨迹却提供了清晰的样本，透过他的前后变化，可以把权力腐蚀人性的过程变得可视化，完整地展示权力改变人性的动态过程与作用机制。

先来看从厉行节俭到奢华无度的转变。一个农耕大国向来崇尚勤俭节约，正如《大学》所言，“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但凡贤明君主，无不躬行节俭，以俭治国。李隆基初登大宝，同样从节俭入手，一革奢靡风俗，大有与民更始的态势。他先是下诏“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宣令省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李隆基随后再次下诏，给文武百官的服饰做出了严格规定：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其他官员严禁服以锦绣，饰以珠玉。并且规定“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两道诏书，前后相望，禁令明确，措辞严厉，其以俭治国之志可知矣。

李隆基初有天下，尚能克己复礼、躬行节俭，制服欲望这头乱撞的“犀牛”。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隆基封禅泰山，沿途观察各地官员善恶得失。皇帝巡狩四方，地方官为了博其欢心，自然要“表现一番”。这时的李隆基还没有被欲望蒙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进贡越多的地方官，却得分越低；无所贡献的地方官，却得到赏识。李隆基对随行的群臣说：“怀州刺史王丘，饩牵之外，一无他献。魏州刺史崔沔，供张无锦绣，示我以俭。济州刺史斐耀卿，表数百言，莫非规谏。”“如三人者，不劳人以市恩，真良吏矣！”不劳民伤财以邀宠献媚，这正是李隆基越过欲望才看到的美德。那时的他还能以自律镇压住欲望的惊涛骇浪，抵挡住权力无孔不入的诱惑。

然而，“节俭悖论”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显现：厉行节俭的结果是财富积累，国库充盈，而这在客观上又会滋生奢侈之风，逐渐让人偏离节俭的轨道。在以俭治国的数年之后，财货山积，国库充盈，李隆基也面临着“节俭悖论”的考验。由于皇权不受监督意味着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于是李隆基强大的自律精神开始在欲望的进攻面前出现松动。一开始，宇文融推行改革，经营有方，财富倍增，因而得到李隆基的器重。李隆基提拔重用言利之官由此开始，这也是李隆基由俭入奢的一个心理转折点，“由是百官浸失其职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

之”。李隆基悄然逃离了自律的约束，开始顺从欲望的牵引，走向奢侈的极乐之地。

宇文融之后，杨慎矜、王鉷、韦坚、杨国忠等人都以聚敛无度、生财有道而得到李隆基重用。随着时间推移，李隆基已经完全忘记了厉行节俭的诏书、革除奢靡的誓言，在皇权至高无上而又予取予求的情势之下，也不可能总有人冒着杀头的危险来提醒皇帝。于是，李隆基只能生活在一个没有记忆的世界里，曾经许下的诺言、内心深处的自律，在权力任性面前都已是随风而去的过往云烟。“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这正是李隆基中晚期生活的真实写照。而王鉷等人也懂得迎合皇帝的欲望，王鉷看到皇帝使用国库的钱还是心存忌讳，于是“岁贡额外钱帛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并且告诉皇帝这都不是国家税收，无预经费，可以随意使用。结果，王鉷等人被愈加器重，朝廷的开支水涨船高。

到了晚年，李隆基的奢靡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不用看朝廷用度，仅从李隆基的赏赐就可见一斑。当时，李隆基宠爱杨贵妃，并把杨贵妃的三个姐姐分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由此爱屋及乌，三家如一，并承恩泽。于是，三家“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运逾千万”。这还不算什么，建成之后，“见它人有胜己者，辄毁而改为”。外戚尚且如此奢侈浪费，李隆基的生活有多么奢靡简直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

李隆基以厉行节俭开始，到最后却走向反面，沉溺于富贵温柔乡难以自拔。在不受监督的权力面前，没有人能够自己约束自己，也没有人能够以自律打败欲望。即便一时可以，长远来看仍然会被欲望俘虏。司马光评价说：“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其实，“易以溺人”的不是奢靡，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是被权力激发起来的欲望。

从勤政爱民到怠惰因循

《尚书》有言，“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赋予皇帝君临天下的大权不是为了满足一家一姓的私利，而是要用权力为天下百姓谋永福。正因此，皇帝既应该有承继道统、延续宗庙的使命感，也应该有勤政爱民、苍生为怀的责任感。李隆基即位初年，每以苍生为念，常因兴衰自警，朝乾夕惕，战战兢兢，可以说是爱百姓、明治道的楷模。

开元年间，宰相韩休为人峭直，不干荣利，甚允时望。李隆基或是宫中宴乐，或是后苑游猎，只要怠于政事、追求享乐，韩休就会立刻上表劝谏，从不顾及时间场合，常常让李隆基很难堪。时间一久，李隆基但凡小有过错就先自坐立不宁，偷偷问左右说：“韩休知否？”一言甫毕，韩休谏疏已至。李隆基有一次“临镜默然不乐”，左右都说：“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是啊，宰相废立，大臣进退，都是皇帝一句话的事儿，韩休既然让皇帝如坐针毡、动辄得咎，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刺儿头”留在宰相的位置上？

而李隆基的回答充分表明了他对国家治理的清醒认识，对百姓的深切关怀，并以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意识去承受人间苦难，而为天下百姓带来安宁与福音。他说：“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如果把皇帝的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放任自流的欲望，另一部分属于治国理政的理性，那么韩休的峭直伤害的是欲望的部分，而满足的则是理性的部分。他接着说：“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任用韩休，不是为了顺从自己的欲望，而是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于是，李隆基说出了一句足以彪炳千古的话——“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皇帝之瘦，是具体而鲜活的感受；天下之肥，是无形而抽象的效果。以皇帝之瘦成就天下之肥，需要皇帝克服一己私欲去追求万众喜

乐。李隆基用这简短有力的8个字道出了“权力”自身的千古奥秘：只有当拥有权力的人不那么舒服，权力的相对方才能免受权力的伤害；相反，如果拥有权力的人过于舒坦，那么权力也必然会被滥用。

这时的李隆基严于律己、舍身为国，只要是对国家有利，哪怕牺牲自己的安逸也在所不惜；只要是维护公道，哪怕是亲旧犯法也绝不纵容姑息。当时，有一名供奉左右的侏儒，李隆基把他当作肉做的茶几，谓之“肉几”，凭之以行，宠赐甚厚。这名侏儒恃宠而骄、目无法纪。有一次进宫迟到，李隆基问为什么，他说在路上遇到捕盗的官员，把人家撞得人仰马翻。按说，妨碍公务当以罪论处，但是对于这样的小事，只要皇帝略加包庇，就能蒙混过关。然而，李隆基不愿意以自己的私心破坏法律的公正，京兆尹一奏其状，李隆基即杖而杀之。失一己之“肉几”而示四海以公信。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洞悉权力奥秘、敢于与自己对抗的李隆基，却在长期执政后变得日益懈怠，失去了一开始的梦想与激情。他开始厌倦每天日理万机的生活，也忘记了曾经挂在心头的万家忧乐，宁愿逃到心理上的舒适区养尊处优。在执政后期，他对内侍高力士说出的一段话表明了他由勤转怠的心理变化。他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虽然是征求意见的语气，但是他在心里主意已定，那就是摆脱琐碎俗务的羁绊，进入“高居无为”的享乐世界。

接下来，李隆基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他不再直接面对文武大臣，也不再亲自处理军国机务，而是沉浸在声色自娱和修道登仙的梦幻之中。而朝纲为之紊乱，法度为之不存，人心为之丧失，竟直到安禄山举兵向阙，他才如梦方醒般看着这个早已恍若隔世的世界，暗自在心中流下悔恨的泪水。

李隆基宠爱杨玉环，本身就有违儒家的伦理秩序，因为杨玉环是他的众多儿媳妇之一。当然，爱情应该随心所欲，不应被世俗的礼教所羁绊，但是身为国君，这样“放肆”地追求爱情仍然有损国体。更何况，爱情与政治本应该泾渭分明，但是李隆基却任由爱情的火焰烧毁政治的框架。“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早已记录下李隆基对爱情的痴狂，而那些旁逸斜出的故事则更能证明李隆基晚年的荒淫无度。

有一次，杨氏姐妹夜游，与广宁公主[注]争西市门，杨氏的家奴挥鞭打到公主的衣裳，结果公主坠马、驸马被鞭。于是广宁公主“泣诉于上”，李隆基虽然杖杀了杨氏家奴，但是驸马却被免官，不听朝谒。这与“肉儿”之事形成鲜明对比，当李隆基守法之时，虽渺小如左右侍从，亦不姑息纵容；而当其徇私之际，虽恩义如亲生骨肉，也不依法论处。

李隆基已经尝到了随意使用权力的滋味，心灵的欲望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而理性思维则受到了长期的蒙蔽。“吾貌虽瘦，天下必肥”的理性认识，就像一把锐利的尖刀，何必再用这把“不合时宜”的尖刀来刺破此时的美好时光？李隆基已经在欲望的世界将自己放逐。

从虚心纳谏到刚愎自用

在中国历史上，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常被看作良政善治的开端，壅蔽言路、闭目塞听往往是政治衰败的前兆。但凡贤君明主，无不善于博采众长、择善而从。李隆基初登大宝就以闻过则喜的胸襟、察纳雅言的气度，展现出一代雄主的潜力，从而在大唐政治的断点上向未来延伸着一幅春和景明的美好图景。

在他放低姿态的时候，对姚崇、宋璟、张九龄等朝廷大臣无不言听计从，就连不知名的芝麻官、刀笔吏，但有片言之善、一语之美也无不为之敛容改谢、以正视听。有一次，李隆基派宦官到江南收集几种珍贵鸟类，想要放在皇家林苑以娱视听之乐。使者口衔天宪，自然威风凛凛，所到之处，烦扰地方，搜刮百姓。路过汴州的时候，当时的刺史倪若水上言："今农桑方急，而罗捕禽鸟以供园池之玩，远自江、岭，水陆传送，食为粱肉。道路观者，岂不以陛下为贱人而贵鸟乎？"一书既上，手敕随至，李隆基不仅"纵散其鸟"，而且重赏倪若水，"赐帛四十段"。进直言而改君过，说真话而受奖赏，这就足以打消士大夫心中因言获罪的疑虑，树立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导向。

还有一次，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而师子国有灵药妙医，都可以不远千里运至宫中。远方的东西总是带着未知的神秘感，李隆基同样抵挡不住内心的好奇，于是派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一起前往。按说"跟着领导做100件好事，不如跟着领导做一件坏事"，替皇帝办私事既可以满足皇帝的欲望，也可以借此拉近与皇帝的关系，但是杨范臣坚守原则，从容劝谏说："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示不复用。今所求者何以异于所焚者乎！"以昨日之我伐今日之我，杨范臣直指昨日是而今日非，言语不可谓不激烈，也瞬间粉碎了李隆基对珠翠奇宝和灵药妙医的好奇心，"上遽自引咎，慰谕而罢之"。

这些都是李隆基执政生涯中的小事，但正因为它们无伤大雅、无关大体，才更能说明李隆基包容不同意见的雅量以及律己以严已经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小事中见大情怀，细节中有大道理。李隆基不仅展现出闻过则喜的品质，而且也表现出过而能改的行动力。一代明君的形象正因此而愈益丰满。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隆基对不同意见越来越表现出反感。那些忤逆己意的逆耳之言，以前被他看成致君尧舜、功在社稷的真知灼见，现在却被看成不识时务、不合时宜的奇谈怪论，甚至认为是在

挑战皇帝的权威。而那些迎合上意的美语甘言，他曾经把它们当作逢迎拍马，对此不屑一顾，现在却越来越沉迷于它们所带来的快感。关于车驾巡幸的事情最能反映李隆基心理的这一变化。

唐朝中后期，关中常常出现粮荒，而洛阳由于毗邻江淮，成为财物汇聚之地、粮食转运之所，皇帝为了维持锦衣玉食的生活，常常在长安与洛阳之间来回奔波。乘舆一动，则皇亲国戚、满朝文武无不跟从，给地方造成了巨大的接待负担。尤其是皇帝如果率性而为、动不以时，社会成本就会更高。李隆基恰恰就是这样，厌倦了东都的繁花似锦就向往长安的厚重朴实，常常在农忙时节大兴车驾，纵意所如。在执政早期，宋璟等人极言劝谏，认为这是妨害农事，李隆基也会欣然接受。但是到了中后期，李隆基的心理悄然地发生变化，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张九龄、裴耀卿等人仍然以此为由阻止皇帝任意巡幸，李隆基这时已经不再是“上意深然之”，而是表现出“不悦”。就此，李林甫乘隙而入，说天子四海为家，在自己家里怎么能受制于人？如果说妨害农事，那就免掉沿途农民的赋税好了。一言之下，李隆基龙心大悦，然后心安理得地越出道德的边界。

同样的道理，在他广纳言路时，哪怕是小人物的声音也能得到足够的尊重；而在他刚愎自用时，无法容忍任何人发出任何不同意见，哪怕最亲密的人。高力士在李隆基位居藩王时就辅佐他，自始至终谨小慎微，因此深得帝心。即便是这样，当李隆基晚年说自己要高居燕适，把政事都委托给李林甫时，高力士只是小心翼翼地说：“威柄人君只可自为，不可假之于人。”这立刻引来了李隆基的冷眼以对，而结果是高力士从此不敢深言天下之事，李林甫肆行其恶再无人敢进直言矣。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执政晚期，安禄山蓄意谋反已是路人皆知，但是李隆基却用之不疑，甚至只要有人进谏说安禄山要造反，李隆基就把他绑起来不远万里交给安禄山处理。而戏剧性的一幕是：安

禄山已经举兵造反，军队正在南下的路上，还与李隆基绑去进谏的人擦肩而过，师心自用竟一至于此！

所谓“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以此比喻君主虚心纳谏，实际上是说木受绳也好，金就砺也罢，都需要一番对人性的砥砺与规范，都是一个不那么舒坦的过程。但这时的李隆基内心欲望已经如水就地，倾泻而下，他正享受这番淋漓畅快，如何能接受逆耳之言的侵扰?

绝对权力让人陷入精神封闭

自唐兴以来，镇守边疆的将领都遵循着“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的原则。不久任，是为了防止将帅与士兵融为一体、阴蓄异志；不遥领，是为了防止朝廷大臣身兼将相、权位过重；不兼统，是为了防止边将跨州连郡、尾大不掉。这三个原则都是为了避免地方武装威胁朝廷而进行的制度设计。但是到了李隆基晚年，他先后打破了这三项原则，尤其是让安禄山久任范阳节度使又兼领数道，“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

李隆基在年少时，曾两次果断用兵终结了朝廷的祸乱，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而在晚年时，却轻易就把掌兵之权交到了安禄山手中，最终导致大唐从太平盛世坠入战乱深渊。前后相较，对比何其强烈?

晚年的李隆基备尝人生的凄冷。他虽然从西蜀风光无限地返回长安，受到万人空巷的夹道欢迎，与睽违已久的京城百姓相对而泣。然而，时间已经改变了一切，天下不再是他的天下，长安不再是他的长安，皇宫不再是他的皇宫。

与其说他是大唐帝国的太上皇，不如说是偌大皇宫里的一位高贵的囚徒。他仅仅是在自己居住的宫殿接见了一位无足轻重的地方官，就被当权的宦官李辅国诬告为结交大臣、图谋不轨，结果只得离群索居，前往无人问津的冷宫，而跟随李隆基辗转一生的高力士也遭到了当权者的流放。李隆基不再被看成是英明神武的明君，而是导致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一个在现有秩序中无处安放的尴尬存在。

比李隆基的人生际遇更具悲剧色彩的则是那个千年之后还激发着无数浪漫想象的灿烂时代。大唐盛世在李隆基之后就彻底淹没在时间的河流之中。可以说，有唐一代，以李隆基为分界点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李隆基一手造成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就像两颗毒瘤一样永不餍足地腐蚀着唐朝政治，直到这个当时世界最强的帝国轰然倒塌。

李隆基曾经把这个王朝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却最终又把它丢进了更加痛苦的深渊。他的人生本不该这样结束，他一度展示出千古一帝的精神特质，却在时间的磨砺中逐渐失去光泽，逐渐堕入衰变的罗网。千载之下，李隆基的人生转折仍然值得深思：绝对权力，凭借怎样的作用机制来腐蚀人性?

按照通常的逻辑，盛世危机的原因在于李隆基未能抵挡住外在的诱惑，放松了内心的自律，从而越出了权力的边界。这样的解释似是而非，它隐含的前提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长期保持自律，那么就能从容地驾驭绝对权力。正是基于这一假设，中国古代数千年难以走出帝制，总是渴望着“五百年必有圣人出”，把国家命运和万家忧乐寄托在某一个明君的内心自律上，而拒绝做出约束权力的制度设计。

李隆基就曾寄托着这样的瞩望，但是他行至中流而彻底蜕变，把热情的希望变成冰凉的绝望。内心自律并不可靠，而且它容易蜕变的原因并不在于道德的堕落，而是因为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的“认知困境”。也就是说，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既是行为的实施者，又是结果

的评判者。当一个人兼具这样两种角色，那么就必然会陷入自我论证的循环之中，从而导致理性的丧失与精神的封闭。

每一代皇帝都曾接受最好的教育，从小在最杰出的大师的耳濡目染下，熟读四书五经，提高德行修养。可以说，没有哪个皇帝不想天下大治、青史留名，也没有哪个皇帝不懂得克制欲望、实行仁政。但根本问题就在于，皇帝一旦在绝对权力的催眠下陷入“认知困境”，就很难区分欲望与理性的边界，更无法辨别是非曲直、对错真假。最后，皇帝根本不需要真理的准绳，因为他会把自己等同于真理。到那时，就是皇帝的欲望开始为所欲为的时候了。

李隆基之所以会出现180度的转变，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为了分析皇帝的“认知困境”，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例子中窥其端倪。再以车驾巡幸的事情为例，李隆基就遭遇到这样的“认知困境”。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月，李隆基由于洛阳宫中出现灵异现象，想要立刻返回长安。宰相裴耀卿、张九龄都说：“今农收未毕，请俟仲冬。”两位宰相都从百姓利益出发，劝谏皇帝不要操之过急。但这时，同为宰相的李林甫潜知上指，对皇帝说了下面这段话：

> 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借使妨于农收，但应蠲所过租税而已。臣请宣示百司，即日西行。

结果可想而知，“上悦，从之”。李林甫迎合上意，但是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表面上没有丝毫纵容皇帝欲望、无视百姓利益的意思。他把长安、洛阳定义为皇帝的“东西宫耳”，巧妙地把国家的都城偷梁换柱为皇帝的私宅，皇帝在自己私宅当然可以为所欲为。就这样，李林甫为满足皇帝的欲望制造了充分正当的理由，而这恰恰就是李隆基所面对的“认知困境”：裴耀卿、张九龄心系百姓的劝谏，看上去义正辞严，李林甫迎合上意的谄媚，同样显得正气凛然。

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政治议题上，皇帝都会面对同样冠冕堂皇的劝谏，该何去何从、如何判断？李隆基选择了顺从自己的欲望，因为他就是自己行为的最终评判者，他可以随时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正义的，更何况李林甫还给出了充分正当的理由。就这样，李隆基做了错事也可以被说成是对的，顺从了欲望也可以被认定是正当的，直到最后他不断放大自己的欲望而浑然不觉，从厉行节俭、恪守法度堕落为荒淫无度、昏聩无能。

既是实施者，又是评判者，皇帝身兼两种角色而陷入了自我封闭。皇帝做事也好、思考也好，始终缺少一个独立于自身的客观参考，只能让自己的欲望不断膨胀，任由自己的偏见在正反馈的情况下不断放大。本来广开言路、虚心纳谏能够为皇帝提供一个客观参考，从而避免皇帝陷入自我论证的循环。但是皇帝一旦陷入精神封闭，就会把不同意见看作是对自己的挑战和不满，而把美语甘言视为支持自己的表现。在提拔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的事情上[注]，张九龄执意不从，认为牛仙客大字不识，而尚书之位多由德高望重之人担任，不是奖赏之官，不能滥施于人。面对骨鲠之臣的面折廷争，李隆基只是愤愤地反问道："事总由卿？"不久，张九龄就被罢免了宰相。

皇帝一旦进入精神的封闭，就会对任何不同的意见怀有敌意，同时皇帝也会感到前所未有的愉悦。他做出的决策、写下的文章、说出的话语会被无数人奉为金科玉律，而他自己也会把自己等同于真理。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认定这个人是敌对分子而予以打击。皇帝再也不必担心自己的言行不合准绳，因为他自己就是准绳；皇帝也不必担心自己纵欲过度，因为他的欲望就是正义。晚年的李隆基就这样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心理上的舒适区甘之如饴、难以自拔。

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性，根源就在于绝对权力让人兼具实施者与评判者两种角色，从而不可避免地让人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陷入自我论证的精神封闭中。这与自律无关，也与道德无关，因此不必企盼

道德高尚的圣人就能逃出罗网。正确的做法是摒弃根深蒂固的“圣人情结”，放弃期待真龙天子出现的思维定式，打破对绝对权力的崇拜，在权力约束上进行制度设计。

李隆基逃到西蜀之后，对历任宰相做出了真实的评价。在评价李林甫时说：“是子妒贤疾能，举无比者。”给事中裴士淹趁机进谏说：“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邪？”李隆基默然良久，为之语塞。

其实，李隆基不是不能罢黜李林甫，他只是难以走出自己的世界，他宁愿在精神的封闭里养尊处优。

而在李隆基陷入耳目闭塞的精神封闭过程中，李林甫可以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李林甫为相，不仅乐见皇帝放纵欲望，那样他自己能把持朝政、滥用权力，而且李林甫还善于通过控制皇帝获取信息的渠道来控制皇帝的思维。皇帝如何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知道什么。而李林甫则是前现代社会的信息高手，通过“信息不对称”的伎俩，一直控制着皇帝获取信息的渠道与内容。

---

1. 广宁公主，《旧唐书》记公主封号为广平，《新唐书》和《全唐文》则记为广宁。——编者注
2. 牛仙客的官职摘自《旧唐书》卷一〇六《李林甫传》。——编者注

第七章



李林甫：以“信息不对称”制造“愚君政策”

如果在中国历史上为“奸诈”找一个代名词，那么这个人非李林甫莫属。在尔虞我诈的权力场，没有人比李林甫更加长袖善舞、表里不一，也没有人比李林甫更懂得合纵连横、纵横捭阖。毫无疑问，他是权谋学的集大成者。

“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因为李林甫而家喻户晓。一个人的内心该有多么“强大”，才能身藏利剑而不露声色，甚至仍然对人美语甘言？一个人的人格该有多分裂，才能在内心计算着最为卑鄙无耻的阴谋，而在脸上永远带着一丝暖人的笑意？李林甫就能长时间地忍受着这种深度的人格分裂，他将奸诈与伪善结合起来，将刺骨的阴毒与柔和的外表熔为一炉，最后炼成了高深莫测的胸中沟壑，与之交往的人无不陷入前途未卜的恐惧之中。

这正是李林甫期待的效果，他知道猎人在俘获猎物之前必须抛出诱饵。在这里，伪装与表演正是他精心设计的诱饵，以迷惑那些心存善念的人们。当他开始接近一个人的时候，那正是他拿起屠刀的前奏；当他开始向一个人释放善意的时候，那正是他手起刀落的时刻。李林甫把“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权谋用到了极致，在他亮出獠牙之前，他一定会用善意融化别人所有的戒备。李林甫是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然而，说李林甫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小人，那是后人“事后诸葛”式的道德泄愤。如果放在当时的语境中，当其他人都对他感到手颤股栗时，皇帝却感到安全可靠；当其他人都认为他十恶不赦、死有余辜时，皇帝却对他宠眷优渥、特加倚重。唐玄宗李隆基就这样与满朝文武陷入信息不对称的困境之中，“天下皆知而当权者独不知”的悖论再次出现，李林甫在皇帝与大臣之间隔上一层“无知之幕”，并在中间上下其手、游刃有余，将皇帝与大臣都玩弄于股掌之间。

李林甫为相19年，而唐政衰矣。他为了独揽大权，将有才之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其他宰相要么听命于他，要么遭他陷害；他为了专宠固位，剥夺了汉人士大夫的军事指挥权，使得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异军突起，卒成乱唐之祸；他为了防止劣迹败露，封锁了皇帝获取信息的所有渠道。李林甫最后在荣华富贵中安然去世，在有生之年享尽尊荣。然而他的成功太过沉重，压垮了一个当时世界最强帝国的脊梁，他获得成功的代价，竟是促使一个鼎盛王朝从此走向衰败。

千载之下，道德层面的指摘已经毫无意义，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把李林甫当作权谋学与厚黑学的大师，在人前鄙视他的人格，在人后却学习他的手腕。李林甫内心的邪恶已经超越了一时一地的限制，直指权力与人性的内核：阴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李林甫究竟做了什么能让那么多英雄豪杰引颈受戮，让一代雄主唐玄宗如同傀儡一般？这其中的关键正是——信息。

可以说，信息是李林甫克敌制胜的武器，他设计的所有阴谋，都建立在某种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之上。直到现在的信息时代，人们才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而李林甫对此早有先见之明，并成为前信息时代当之无愧的信息高手。

依靠“宫廷情报”迅速崛起

李林甫不学无术，说话鄙陋不堪，一向受到士林鄙薄，但是他善伺人情，能迅速捕捉有效信息，尤其是善于抓取关系到朝廷政局走向的宫廷情报，因此总能占据先机、快人一步。从刀笔小吏一跃而至秉政当国的宰相，李林甫凭借的正是对信息的获取。

李林甫本为宗室之后，但是传到他这一代，政治资源已经在代际相传中挥霍殆尽，因此李林甫的起点没有任何优越性可言。当时，源乾曜为侍中，有人推荐李林甫为司门郎中，而源乾曜向来鄙薄李林甫，于是不屑一顾地说："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岂是郎官耶？"哥奴乃是李林甫的小名，源乾曜直呼小名，可见内心对李林甫多么轻视。

李林甫当然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灰心丧气，他仍然不断钻山打洞，后来终于得到宇文融引荐，当上了朝廷的御史中丞。这时，李林甫捕捉信息的能力初露峥嵘就为他赢得了巨大的晋升机会。李林甫善于结交宦官，并从宦官那里获得宫廷政治的最新动向。本来，士大夫阶层一向鄙视宦官，称之为"阉竖"而羞于与之同列，但是李林甫为了成功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更不会在意所谓的名节，他看重的是宦官掌握的宫廷情报。而长期的情报交易也终于让他从宦官那里得到一个重要线索：武惠妃当时宠冠后宫，她的两个儿子寿王和盛王也子承母贵，特见宠异，于是武惠妃与太子李瑛的矛盾日益升级。

宫廷斗争是朝廷的核心机密，决定着朝廷的权力分配与未来走向。李林甫第一时间得到情报之后就开始发挥优先获得信息的优势，先人一步参与到宫廷的博弈之中。他通过宦官向武惠妃纳款输诚，"愿护寿王为万岁计"，一句话戳中了武惠妃的痛点。孤儿寡母，位居偏裨，虽有皇帝宠爱，但是圣眷从来都是飘忽不定，而且与太子争宠，需要朝中大臣的支持，这时李林甫主动靠近自己，岂不是雪中送炭？于是，武惠妃对李林甫感恩戴德，开始暗中帮助李林甫。

当时，宰相裴光庭去世，皇帝请宰相萧嵩择相，萧嵩沉吟良久后推荐右丞韩休。诏书还未草就，宦官高力士就把消息泄露给武惠妃，而武惠妃又迅速透露给李林甫。李林甫再次获得了朝廷的最高机密，他懂得如何让情报为自己服务，于是在朝廷诏书赶到之前，就先把消息告诉了韩休。韩休自然会把李林甫当作给自己带来幸运的人，也会把李林甫的通风报信看作投靠自己的表现，一朝位居台辅便对李林甫充满了感激之情。后来，萧嵩与韩休二相不和，韩休想引李林甫为己助，于是向皇帝推荐李林甫"堪为宰相"，武惠妃又使劲吹枕边风，两厢合力，最终帮助李林甫戴上了宰相的桂冠。

从宦官那里套取宫廷斗争的最新动向，从武惠妃那里获得任命宰相的最高机密，李林甫对信息的渴望犹如虎狼之于羔羊、蚊蝇之于腐肉。同时，李林甫具有十分强大的政治敏锐性与政治判断力，能够从信息中读取政治密码，并为仕途晋升计算最优路径。当上宰相之后，李林甫更懂得如何运用信息优势，打败强劲的竞争对手。

当时，裴耀卿、张九龄都位居宰相，李林甫居于最后，当然对二人恨之入骨。裴耀卿、张九龄都是当世大儒，正道直行、深孚众望，于是常常对皇帝犯颜直谏。皇太子、鄂王、光王被人诬陷，唐玄宗想要废黜三位皇子，"张九龄切谏，帝不悦"。而在朝堂上一言不发的李林甫已经从皇帝的"不悦"中探知了皇帝的底牌，懂得如何迎合上意而打击对手。他故意私下对宦官说："天子家事，外人何与邪？"这番话自然会从宦官那里传到皇帝耳朵里，后来三位皇子果然被废。

李林甫谋定而后动，是为了获得皇帝内心偏好这个最重要的信息，一旦探知帝心，他立刻就知道如何苟合取容、斜肩谄媚。后来，皇帝想从东都洛阳返回西京长安，裴耀卿等人建言："农人场圃未毕，须冬可还。"这时，李林甫故意装跛，走在诸位宰相后面。他留下这个时间差，正是为了看看裴耀卿等人劝谏之后皇帝的反应。他一定看到了皇帝面色铁青，于是从容对皇帝说："二都本帝王东西宫，车驾往

幸，何所待时？假令妨农，独赦所过租赋可也。”皇帝听后，顿时眉开眼笑，即驾而西。

还有一次，皇帝想给朔方节度使牛仙客晋封，张九龄在见皇帝之前就与李林甫约定，这事儿不合规矩，应该“与公固争”，李林甫当面“然许”。但是见到皇帝之后，张九龄持中守正、疾言劝谏，李林甫不仅三缄其口、不发一言，而且把张九龄的话泄露给了牛仙客。牛仙客方得宠幸，翌日见到皇帝就流下了委屈的眼泪，更加激发了皇帝的愤怒。这时，李林甫又向外散布传言说：“但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这话可以说是对皇帝的愤怒火上浇油，皇帝卒用牛仙客，而且“善林甫不专也。由是益疏薄九龄，俄与耀卿俱罢政事”。

李林甫狡猾凶险而又灵活多变，他在不能占据信息先机的时候就懂得运用“后发优势”。凡是皇帝与宰相议事，或是不置可否，或是坐等观望，一旦察言观色摸准皇帝的底牌，就开始果断参与讨论，在慷慨陈词中附和上意，又在悄无声息间中伤政敌，达到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效果。

裴耀卿和张九龄卸任宰相之时，李林甫带着嘲讽的语气说：“尚左右丞相邪？”对他们“目恚而送乃止，公卿为战栗”。他的眼睛里射出一道阴冷的寒光，冻结了裴耀卿和张九龄渐行渐远的背影，也即将让朝野上下、宫廷内外感到冰寒刺骨。

封锁皇帝的“信息渠道”

两位宰相虽已远去，但新任宰相马上就会补缺，在彻底稳固权力之前，李林甫还将跨越一条荆棘密布的曲折之路。为了在残酷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李林甫开始实施他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在皇帝

与群臣之间打造一层“无知之幕”，使得皇帝与群臣陷入信息不对称的困境之中。

他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皇帝与群臣出现信息短缺，处于信息弱势，只有他掌握完整信息，居于信息强势。扭曲的信息分配格局一旦形成，信息弱势的一方隔着一层“无知之幕”，就只能对信息强势的一方言听计从，而居于信息强势的李林甫恰好可以上下其手、肆行奸恶，达到“祸福由其口”的效果。

李林甫首先要垄断的一条信息渠道是皇帝身边的“非正式”的信息渠道。这条信息渠道并不是朝廷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但是在人格化权威高于制度化权威的朝廷中，这条信息渠道的价值远远高于正式的制度安排。原因很简单，这条“非正式”信息渠道由皇帝的身边人组成，其成员可以是宦官、宫女、宠妃等。他们负责皇帝的日常起居，属于皇帝的私人领域。恰恰因为这一点，皇帝往往会在私下不经意间对他们透露真实想法，而这就是朝廷政治中最宝贵的情报。李林甫从起家开始就注重运用这条“非正式”的信息渠道，在当上宰相之后更会将其据为己有，并时刻警惕其他人染指。

当然，垄断这条“非正式”信息渠道就是要拉拢皇帝的身边人，李林甫于是开始大范围行贿。他只要对皇帝有所奏请，“必先饷遗左右”，目的就是“审伺微旨，以固恩信”。而他的行贿艺术也极其高超，“至饔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动静必具得之”，就是说，连给皇帝做饭的厨工、为皇帝使唤的奴婢都不遗漏。李林甫的贿赂艺术真如《六韬》所言，“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而其结果也必然是人乐为之用，天子动静、皇帝心思自然一清二楚。

在垄断皇帝身边的“非正式”信息渠道之后，李林甫接下来就要封锁朝廷正式的信息渠道，使得下情无以上达、上意无以下传，为皇帝与群臣的信息沟通打上一道“隔断”。李林甫首先要做的就是打击谏官、壅蔽言路，使真话无人敢说、正声无从而闻。当时有一个叫杜琎

的人上书言政事，立刻被贬斥为县令。李林甫并不是针对这一人一事，而是要杀鸡儆猴、树立导向，因此对其他谏官传话：“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暇，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后虽欲不鸣，得乎？”李林甫把谏官比作马驹，终日无声就能锦衣玉食，一旦发声只会祸害速至，行重罚于前，指明路于后，结果是“谏官皆持禄养资，无敢正言者”，而天子耳目为之蔽矣。

李林甫封锁信息渠道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大量提拔亲信、树立朋党、建立门户。“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真可谓附顺者拔擢、忤逆者诛戮，而那些受到李林甫私恩而加官晋爵的人断然不会暴露李林甫的奸恶，这本身就是对信息渠道的封锁。

从历史上著名的“野无遗贤”的典故，可以窥见李林甫操控信息的能力多么强大。当时，皇帝“诏天下士有一艺者得诣阙就选”，就是要绕过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而为天下人才直接打开上达天听的通道。李林甫敏锐地察觉到这对自己的威胁，因为一旦有人直接面对皇帝，就可能暴露自己的斑斑恶迹。于是，他再次祭出封锁信息的撒手锏，向皇帝建言说：“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乱圣听，请悉委尚书省长官试问。”李林甫建议皇帝不要亲自面对这些草茅之士，而是让尚书省长官代为咨问，这其实是要避免皇帝与士子的直接接触，而在其间横生中间环节。皇帝同意后，李林甫马上让他的同党上书说，考察之后，“而无一中程者”。李林甫也适时向皇帝发出祝贺：圣上知人善用，以至于“野无留才”。可怜的唐玄宗，竟被公开玩弄而依然心安理得。

垄断“非正式”的信息渠道，是为了探知皇帝的主观偏好与内心想法；封锁正式的信息渠道，则是为了过滤真话，只允许于己有利的话上达天听。在完成这两项任务之后，李林甫就在皇帝与群臣之间成功

打造出一层“无知之幕”。接下来，借助信息不对称的无穷力量，李林甫将开始“屡兴大狱”，逐一构陷大臣、打倒政敌。

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阴谋

对李林甫来说，他控制信息的所有目的都在于“固宠市权”，永远独享皇帝的宠爱与信任。也就是说，除了李林甫之外，没有人应该亲近皇帝；除了依附李林甫之外，没有其他获得位高权重的渠道。于是，李林甫要把皇帝紧紧禁锢在他的身边，拒绝任何人染指圣眷，那些有可能受到皇帝垂青的人，在自己还未察觉时就已经进入李林甫的攻击范围，而他利用的武器恰恰就是君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先看已经接近皇帝并与李林甫争权不下的人会有何下场。当时，李适之代替牛仙客成为宰相，一度与李林甫不相上下，李林甫当然对其恨之入骨，后来终于思得一计可以排挤这个忤逆己意的同侪。他从容地对李适之说：“华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国，顾上未之知。”李适之性情疏忽，不拘小节，竟信以为真，而且伺机向皇帝报告了这个可以充实国库的好消息。偶得飞来之财，皇帝自然喜形于色，就来问李林甫是否可行。李林甫这个始作俑者竟然说：“臣知之旧矣，顾华山陛下本命，王气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闻。”意思是说，李林甫早就知道华山生金，但华山是皇帝天命所系，出于体恤皇帝的考虑，所以一直不敢向皇帝报告。

这段话说得非常高明，既委婉表达了他对皇帝的爱护，为了保住“王气”，甘愿放弃富国强兵的金银财宝，同时也暗中让皇帝感到李适之只顾金钱，却毫不怜惜皇帝的天命。其实，所谓“华山生金”“陛下本命”都是杜撰出来的一派胡言，但是李适之受到“华山生金”的利诱，皇帝陷入“陛下本命”的自怜，丝毫未能察觉二人已经被一层“无知之幕”隔开，就像玩偶一样被李林甫任意操纵。李林甫一言之下，“帝以

林甫为爱己，而薄适之不亲”。由此，李适之惧不自安，“乃上宰政求散职”，自己主动放弃宰相之位，并认为这样的退步会换来安全，“欣然自以为免祸”。但李林甫怎可善罢甘休？后来由于受到另一件大案牵连，李适之被贬为宜春太守，最终“仰药自杀”。

再来看蜚声朝野并对李林甫构成潜在威胁的人又会遭到怎样的迫害。严挺之资质轩秀，名重当时，早年就受到一代名相姚崇、张九龄等人的器重。张九龄辅政时就有意推荐严挺之为宰相，于是让严挺之去拜访同为宰相的李林甫以寻求支持。但是严挺之自负清高，“陋其为人，凡三年”，非公事从不私谒李林甫。自此，严挺之就与李林甫产生了嫌隙，而严挺之也自然未能当上宰相。后来，唐玄宗突然想起严挺之，于是从容对李林甫说：“严挺之安在？此其材可用。”皇帝的用意非常明显，想要任用严挺之为宰相。

显然，严挺之一旦入相，与自己新仇旧怨就会瞬间爆发，李林甫断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李林甫再次拿起了信息不对称的武器，以几句口舌之快而杀敌于无形之中。他退朝后就找到严挺之的弟弟，一方面“谆谆款曲，且许美官”，另一方面则故意谈到严挺之，“天子视绛州厚，要当以事自解归，得见上，且大用”。这是要向严挺之传递错误的信息，意思是皇帝重视绛州，有意派严挺之去那里任职。其实，这不过是一面之词，谁都知道朝廷政治内重外轻，到地方任职等同于遭到贬斥。于是，在听到弟弟传回来的信息后，严挺之只好上表称疾，“愿就医京师”。皇帝看到后“恨咤久之”，没过多久严挺之也“郁郁成疾”。

皇帝以为严挺之不愿担任宰相，辜负圣眷，何为不怒？严挺之惧怕远出绛州，自求多福，何错之有？其实，皇帝与严挺之都没有错，因为皇帝不知道严挺之并未收到担任宰相的邀请，而严挺之更不知道皇帝许诺的是宰相而不是绛州刺史。于是皇帝与严挺之从未真正了解过对方的真实意图，也从未接收到真实的信息。他们的愤怒与郁闷，

是隔着“无知之幕”的主观虚构，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无谓的猜疑，而这都源自李林甫的玩弄与欺骗。

最后来看李林甫如何防备那些尚未知名，但有可能受到皇帝青睐的人。有一次，皇帝在勤政楼宴饮群臣，结束后，兵部侍郎卢绚策马扬鞭，绝尘而去，皇帝爱其风采，称美之。这些李林甫都看在眼里，他对哪怕有可能产生威胁的萌芽都保持高度警惕，于是立刻故技重演，用打倒严挺之的办法来毁灭卢绚的前程。李林甫第二天就对卢绚的儿子说：“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广，若惮行，且当请老。”依然是传递错误信息，李林甫故意恐吓卢绚说要将他发配到岭南，结果当然跟严挺之的下场如出一辙，卢绚赶紧上表请辞，皇帝一看主动辞职也就不好再加以重用，而卢绚大好的前景竟毁于一旦。但是卢绚哪里知道皇帝的真实想法？而皇帝又何尝知道卢绚上表背后的隐衷？在他们中间隔着李林甫这个过滤信息的人，于是他们也必然会因为虚假信息而产生错误判断。

就这样，无论是已经位居宰相的，还是可能跻身宰相之列的，无论是已经得到皇帝宠爱的，还是可能得到皇帝宠爱的，都被李林甫以信息不对称的武器打入另册。这正是他精心打造无知之幕、垄断信息渠道的意图所在，即把皇帝圈禁在他设计的牢笼里，皇帝除非通过他，否则不能接触其他人。李林甫因此彻底把皇帝变成他手中予取予求、随意摆弄的玩偶。

以信息封锁开展“愚君政策”

晚年的唐玄宗随心所欲，纵情声色，他认为他可以把大臣们的逆耳之言屏蔽在外，而自行躲在深宫里及时行乐。他自以为终于能够脱离俗务，获得渴望已久的自由，但实际上他正处于李林甫设计的牢笼之中。

在政治学中，“信息”的传播与控制被誉为是“政府的神经”，对于政治体系的运转至关重要。信息从外部环境输入政治体系，并通过一定的渠道自下而上地传播进入最高决策层，决策层最后对相关信息进行反馈。因此，信息的采集、控制、传播其中有一个环节出错，就会导致最高决策层接受的信息失真，从而导致决策失误。

皇帝居于政治体系的最顶端，接收信息的链条最多、周期最长，因此质量也最难保证、最易操纵。接受什么样的信息，就有什么样的判断。可以说，谁要是能控制皇帝获取信息的渠道，就能控制皇帝做出的决策，最后甚至控制皇帝的认知与思维。这是控制信息的最高境界，也正是李林甫梦寐以求的“雄心壮志”。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君临万民自有其“愚民政策”，但是皇帝统驭下的官僚，也发明出一套控制皇帝的“愚君政策”，而李林甫正是这些人的“杰出代表”。

李林甫当上宰相之时，唐玄宗已经进入晚年岁月，在位多载，倦于朝政，而且直接面对大臣时，总会有那些以致君尧舜为己任的人犯颜直谏，使其难徇私欲。因此，自从李林甫担任宰相，唐玄宗终于找到了一个无条件阿谀自己的人，于是政事一以委之，自己则深居燕适，恣行宴乐。李林甫“善养君欲”，不仅仅是出于迎合上意，也是为了让唐玄宗在纵情无度中心甘情愿地被屏蔽耳目，并最终享受被李林甫圈禁起来的那种舒适与快感。这样，李林甫就能为禁锢皇帝的牢笼加上一把心理依赖的锁。

于是，面对信息封锁的铜墙铁壁，唐玄宗对外界的了解就会仅仅停留于想象，而想象的图景还是李林甫刻意为他描绘的。太子妃的哥哥韦坚曾经辉煌一时，就是这样被李林甫陷害致死。当时，韦坚、杨慎矜、王鉷等人都以勾剥财物争行进奉而获得重用，而韦坚尤其具有把进贡财物制造成公共景观的想象力。他将两三百只船集中于长安城郊，令驾船人保持江南的原始风情，又令妇人合唱民间乐曲：“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

《得宝歌》。”“和者妇人一百人，皆鲜服靓妆，齐声接影，鼓笛胡部以应之。”一时间观者山积、人人骇视，皇帝自然龙颜大悦，即下诏褒奖。

韦坚方得宠于帝，也已进入李林甫的攻击范围。李林甫故技重演，表面上靠近韦坚、释放善意，实际上担心韦坚承恩日深，“乃与腹心构成其罪”。李林甫的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年中秋，韦坚与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夜游，被李林甫告发，他给皇帝的理由是“以坚戚里，不合与节将狎昵，是构谋规立太子”。意思是说，韦坚属于外戚，不应该与手握雄兵的节度使私下交往，这明显是要图谋不轨、拥立太子。处于信息牢笼中的唐玄宗，一下被这句话击中了恐惧心理，于是在未经审讯、不知真相的情况下，迅速下诏处置了韦坚与皇甫惟明。唐玄宗的认知与思维，已经被李林甫牢牢控制。

一个人越是处于无知的状态，就越是容易产生恐惧心理。因此，在受到信息封锁之后，唐玄宗只会变得越来越敏感。由于对外界缺乏了解，所以对于任何风吹草动也更容易产生负面猜想。而韩非子早就认识到信息通畅对皇帝的重要性，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壅于言者制于臣矣”。

于是，一方面，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真实的声音受到屏蔽，逆耳之言遭遇消声，皇帝接收到的总是歌功颂德的信息；另一方面，李林甫可以通过伪造信息把控皇帝的喜怒哀乐，从而彻底控制皇帝的所思所想。这真如韩非子的描述，“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削危，主上劳辱”。相与一口，正是皇帝信息壅蔽的体现。唐玄宗彻底陷入牢笼中而不自知，只是因为信息渠道已经封死，他无法认识真实世界，其实也不想认识真实世界。

信息不对称让朝廷丧失认知能力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这样评价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固其宠、成其奸、保其位、张其势，李林甫能够达到上述成功依靠的正是对信息的控制与垄断。

李林甫深知自己树敌众多，一旦失去皇帝的恩宠，结果只能是被仇家碎尸万段。因此，他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李林甫的儿子曾泣涕劝谏说：“大人居位久，枳棘满前，一旦祸至，欲比若人可得乎？”他听后黯然不乐，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势已然，可奈何？”

李林甫确实已经没有退路，他只有在不断斗争中获得安全感。为了防止遭人刺杀，他一改有唐一代宰相轻车简从的传统，开始前呼后拥、侍卫清道。他居住的地方重关复壁，一个晚上多次更换睡觉地点，虽是家人亦无从而知。他给其他人带来了万劫不复的灾难，也让他自己陷入暗黑无界的恐惧。权力的作用就像物理世界的“力”一样，存在作用力就一定存在反作用力。

李林甫从一开始进入权力核心就懂得运用“信息”为自己铺就进身之阶。实际上，注重结交宦官、宫女、嫔妃等皇帝的身边人并不是李林甫的原创，在此之前，就有很多人盯住了这条“非正式”信息渠道，并以此作为获得朝廷机密的终南捷径。在这方面，李林甫的老师应该是隋文帝杨坚。杨坚本为北周宣帝的岳父，按说皇帝死后，北周宗室尚有存者，担任临时摄政地位怎么也轮不到身为外戚的杨坚。然而，杨坚与北周宣帝的心腹刘昉、郑译等人私交甚笃，这些人不仅向杨坚及时输送情报，而且在北周宗室还未反应过来就迎接杨坚入朝执政，

独揽北周政治、军事大权，为后来的以隋篡周打下了基础。杨坚的成功显然为李林甫提供了学习的样本。

“非正式”的信息渠道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在古代政治中，人格化权威远远超越制度化权威之上。正因此，皇帝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根本难以泾渭分明。因此，除了公共生活之外，皇帝的私人生活以及身边人在朝廷政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当然，李林甫心里完全清楚，皇帝的身边人数量有限、目标明确，因此易于笼络，但是要封锁满朝文武组成的正式信息渠道，无异于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其难度可想而知。李林甫一方面打击异己，让说真话的人处于家破人亡的危险之中；另一方面取悦皇帝，让皇帝始终生活在自己的偏见之中，从而最终完成了这项繁难复杂的工程，成功在皇帝与官僚体系之间打上了一道信息的隔断。隔着这道隔断，在官僚看来，李林甫口衔天宪，代表天子；在皇帝看来，李林甫礼绝百僚，代表士林。于是，在他们都这样“相信”以后，李林甫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谎话连篇，将皇帝与官僚都遗弃在谎言编制的梦境里。

这正是李林甫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你永远无法判断他和蔼的外表之下正在酝酿怎样巧妙的机关，也无从知道从他的如簧之舌蹦出的话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因此，在真假难辨之际，在祸福未知之时，与他接触的人无不陷入不可名状的恐惧之中。狡猾奸诈如安禄山，在与李林甫接触时，即便是在隆冬也必然汗流浃背。李林甫为相，而安禄山不敢举兵造反。有人说，权力起源于信息的不对称，掌握权力的一方总是信息的优势方。在这方面，李林甫可以说做到了极致。他让自己占据信息高地，从而掌握了绝对的信息优势，“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同为宰相的陈希烈，面对台司机务“不敢参议，但唯诺而已”。

所谓“口蜜腹剑”正如李林甫，如果说他让其他人感到的是剑的锋利，那么让皇帝感到的就是蜜的香甜。当李林甫从内部掌握了皇帝的主观偏好，又从外部控制了信息的流通渠道，他就能通过精神的麻

醉，永远把皇帝囚禁在自己心理上的舒适区。皇帝心中的恣肆欲望，无不能通过李林甫找到正当性；皇帝脑海的主观判断，也都能通过李林甫找到“依据”。于是，皇帝感到世界是如此美好，没有任何违和感，没有任何龃龉感，他想到的一切都能被李林甫“证明”是正确的。

这正是封锁信息最为可怕的地方。一个人本来就是自己偏见的奴隶，如果他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都在印证他的主观偏好，他只会生活在一个主观臆断的世界里，从而失去对真实世界的感知与判断。晚年的唐玄宗就处于这样的境地之中，而一旦皇帝接受的信息被“控制”，他也就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其结果必然是朝廷作为一种制度体系本身将失去辨别真伪的能力。

李林甫掀起的那些冤假错案在后世才得以沉冤昭雪，而在当时，唐玄宗是多么笃定地相信“谋反”是真的，并且发自内心地感到如果自己不先下手为强，就会被“乱臣贼子”篡位。历史的真实往往在后人眼中黑白分明，但如果放在彼时彼地的情境之中，朝廷往往难以辨别真伪，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天下皆知而当权者独不知”的悖论。隋朝末年，天下群盗蜂起，乱兵甚至已经打到长安城，隋炀帝仍然在虞世基等人的蒙蔽下，认为四海升平、百姓安居。而在李林甫死后不久，安禄山意欲谋反已是天下尽人皆知的秘密，唯独唐玄宗相信安禄山仍然忠贞不贰。皇帝接受的信息被操控，其思维也必然被操控。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明君无不强调广开言路，容忍直言，为的就是增加信息渠道，避免信息被操控。然而，一旦自律不复存在，皇帝就极其容易被自己的偏见俘虏，对那些迎合己意的信息更加看重，从而滑入自我论证的心理舒适区。到那时，皇帝耳之所闻、目之所见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世界，而是出自权臣的精心安排。当扭曲的信息大行其道，朝廷也将失去辨别真伪的能力，而朝廷的政治衰变将是不可挽回的悲剧。

李林甫日夜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害怕在万马齐喑的沉寂之中，突然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划破天空，惊醒了被谎言催眠的皇帝。他有一次梦到一个“白晰多须”的人逼迫自己，醒来后立刻斥逐了与之形象类似的大臣。没想到，后来杨国忠得志，第一件事就是诬告李林甫谋反，而杨国忠同样类似于李林甫梦里的形象。

杨国忠并没有叫醒处于“沉睡”中的皇帝，而是从一种封锁换成另一种封锁，从一种麻醉换成另一种麻醉。皇帝依然被谎言包围，朝廷仍然缺少辨别真伪的能力。如日中天的大唐正等待着一次巨大的打击。

李林甫为相19年，已经对唐朝的政治运转形成了不可挽回的腐蚀，而在他之后，一直为帝国镇守东北边陲的将领安禄山起兵造反，他与李林甫一样善于通过控制信息来隐瞒自己的造反意图。但是安禄山的好运并不止于此，他的侥幸成功并不只是源于自己的努力，更大的原因在于杨国忠等朝廷的既得利益者扭曲了朝廷的决策，才给了这个少数民族将领以天赐良机。

第八章



安禄山：既得利益导致制度衰变

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安禄山是永远的罪人，汉语世界能够想到的邪恶词汇都应该与他有关。正是他，摧毁了所有关于大唐盛世的美好想象，就像一只丑陋的"虱子"牢牢地趴在历史的锦袍上，整体的美观因此毁于一旦。

于是为了保存大唐盛世的美感，人们只好努力把安禄山从记忆中铲除，或是视而不见，任其逃入"选择性忽视"的庇护之中，或是满腔愤怒把他打入邪恶的地狱，以此来衬托历史的美好。然而，忽视也好，愤恨也罢，都不可能用鄙夷的目光或不屑的口吻对那只"虱子"造成任何伤害。安禄山就在那里，他的邪恶与丑陋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不仅需要正视，而且应该值得人们反思。

唐玄宗李隆基曾对安禄山宠信无比、赏赐无度，杨贵妃还把他收养为假子，在宫中直接称呼为"禄儿"。而安禄山却包藏祸心，最后背信弃义，称兵向阙，导致唐玄宗仓皇西逃，在马嵬驿饥寒交迫、前途渺茫。唐玄宗身为天子策杖蹑履面对临时的兵变，最后不得已默认了将杨贵妃处死。唐玄宗固然有用人失察的问题，但是对安禄山也算是恩重如山。安禄山竟恩将仇报、卒乱天下，只要是戴天履地的生灵，没有人不会为安禄山的阴毒扼腕长叹、唏嘘不已，感到义愤填膺。

然而，情绪的浪潮终将褪去，应留下一片理性思考的空地。与其含着盈盈泪光极尽谴责之能事，不如带着理性之光去上下求索、追根溯源：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如何在官僚体系中伪装自己，并一步步登上权力的巅峰？谋反迹象早已路人皆知，为什么唐玄宗仍然执迷不悟？信息的传递为何再次陷入“天下皆知而当权者独不知”的困境？安禄山带来的这些问题比唐朝的衰落更值得关注。

安禄山起兵之后，唐朝就结束了自立国以来的上升态势，如同一个庞然大物滚落在陡峭的斜坡上向着最后的崩塌急速坠落。而在安禄山造反之前，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诈小人先后执政，这些人出于专宠固位的考虑已经让唐朝良好的制度运转出现衰变，而正是这种衰变为安禄山提供了崛起的机会。可以说，安禄山的崛起既是制度衰变的产物，又会反过来加速制度衰变。

正是李林甫出于专宠固位的考虑，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而打压汉族将领，开启了唐朝任用蕃将的先河，安禄山才可能获得制度化的上升渠道。同样，正是杨国忠等人为了一己私利牺牲了官军的战斗力，安禄山才可能获得造反的成功。而在一层压倒另一层的官僚体系中，下级为了取悦上级，会有意地选择上级喜欢的信息，从而导致信息层层过滤，直到信息传递到天子所处的权力顶端已经接近于完全扭曲。正是这种扭曲掩盖了安禄山的阴谋，也保护了安禄山的伪装。直到“渔阳鼙鼓动地来”，唐玄宗才如梦方醒般“惊破霓裳羽衣曲”。因此，安禄山制造的悲剧应该引起深刻的反思：一方面，官僚政治如果产生既得利益，就必然会以私利压倒公义，从而导致决策不是为了实现社会公益最大化，而是为了实现权贵的私利最大化；另一方面，朝廷的信息传递如果被官僚体系垄断，官僚政治如果垄断信息渠道，就容易导致信息传导的失真，从而让真相与事实远离当权者，结果是朝廷本身将丧失发现真相的能力。

唐玄宗直到仓皇西逃时才意识到，他一厢情愿地宠信安禄山，却是最后一个知道他要谋反的人，被亲信的人欺骗，又被所有人玩弄。

既得利益为蕃将打开晋升大门

安禄山恶名满天下，后世史学家自然要在他出生时就找到“原罪”。据说，安禄山的母亲是突厥的巫婆，生他的那天晚上，“赤光傍照，群兽四鸣，望气者见妖星芒炽落其穹庐”。地方官对此深感震惊，连夜派人来调查，“长幼并杀之”。而安禄山“怪兆奇异不可悉数”，他母亲也以为是神明显灵，于是将他取名为“轧荦山”，突厥语意为“斗战神”，可见寄望之重。

安禄山长大成人后，精通多种少数民族语言，于是就在幽州边境做各个民族互通有无的翻译，安禄山此时能想到的最好的未来也不过是家给人足、小富而安。然而，命运这张薄纸注定无法镇压住它下面的波涛汹涌。安禄山由于偷盗事发本应论死，却意外改变了他波澜不惊的人生轨迹。刀都架到脖子上来了，安禄山对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大声惊呼：大夫不是要消灭契丹吗？为什么还要杀壮士！一言之下，张守珪“奇其言貌”，不仅原宥其罪，而且许其军前效力。而安禄山果然不负所望，所战皆克，擒贼必倍，迅速升为张守珪的副手。

就这样，安禄山获得了能够与朝廷对话的平台，人生再次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本来由于华夷之防，唐朝从一开始就在军事领域设计出汉人主导的制度安排，“蛮夷将领”再有才华也不能升为元帅，独当一面，而必须被汉人元帅统领。“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也就是说，“蛮夷将领”无法获取镇守一方的军权，能够获得的最高军阶也只是汉将的偏裨。安禄山这时已经摸到了朝廷设置的“天花板”，人生似乎将止步于

此。然而，此时高层政治正在酝酿巨变，将会为安禄山打破那个妨碍他平步青云的“天花板”。

当时，李林甫作为宰相秉政当国已有十数载，虽然他屡兴大狱，一一铲除政敌，但仍然缺少权力的安全感。尤其是唐玄宗志在削平四夷，边将权力日益膨胀，甚至到了与宰相分庭抗礼的程度，而且边将当中，“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郭元振、张嘉贞、张说、萧嵩、李适之等人都是以边将身份直接跻身宰相之列，而李林甫刚刚与李适之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权力斗争。心有余悸的李林甫为了专宠固位、永葆权势，开始酝酿改变唐朝的军事体制，其中的核心就是以蕃代汉，明以胡人为将，实削汉人之权。

为此，李林甫专门为唐玄宗上了一道奏疏，力陈在军事领域以蕃代汉的好处。他在上表中说：陛下英明神武，之所以还未削平四夷，根本原因就是“文吏为将而怯懦不胜武也”。陛下欲灭四夷、威海内，就应该使用蕃将，因为蕃将“生时气雄，少养马上，长习陈敌”。李林甫非常懂得抓住皇帝的心理，李隆基“有吞四夷之志”，所以李林甫就顺着皇帝的宏图远志进行了一番为国为民的慷慨陈词。表面上看，李林甫是说蕃将比汉将勇猛，必能实现皇帝吞并四夷的梦想，实际上是为了暗中废黜汉族将领的军权，使得边将入相不再成为他的劲敌，从而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唐玄宗在万邦来朝的想象中被李林甫催眠，完全没有看穿实质就轻松同意了这个将会毁灭大唐江山的决定。

朝廷的大门徐徐打开，而安禄山个人也开始发力，他从最初与朝廷接触就懂得通过控制信息的传播渠道来为自己赢得更多关注。御史中丞张利贞作为河北采访使来到平卢，安禄山极尽谄媚，重金贿赂，“多出金谐结左右为私恩”。张利贞入朝之后，“盛称禄山之美”，朝廷接收到虚假的信息，也凭此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竟立刻提拔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由副职而位居正职，由偏裨而独任方面，安禄山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飞跃。

权贵因私废公，洞开方便之门；官僚受贿谎报，扭曲信息之实。故事开头包含的这两个因素将会贯穿故事的始终，也会助推安禄山走上人生的巅峰。

以“野蛮人”淳朴憨厚的表象迷惑皇帝

当然，在此之前，安禄山需要一个获得皇帝宠信的资格。善伺人情、苟合取容是安禄山与生俱来的优势，但是最为打动唐玄宗并在人心浮动时仍然能抓住帝心的，恰恰是他身为“蛮夷”所处的地位，让唐玄宗充分感受到作为“文明人”的优越感，并沉溺其中难以自拔。

安禄山经常展现出一个未经开化的野蛮人所具有的淳朴、憨厚、简单，并以此作为伪装，赤裸裸地向皇帝邀宠献媚。安禄山在一份上表中曾诉说自己的忠诚，没有士大夫的华丽辞藻与磅礴气势，翻译成白话文简直就是一篇小学生作文，大意是：去年院子里面有虫子吃禾苗，臣焚香祷告，要是臣事主不忠，就让虫子吃臣的心；要是臣事主竭诚，那就让虫子去死吧，后来果然有神鸟来叼虫。通过这种充满儿戏色彩的故事来向皇帝表明自己的忠心耿耿。这在久经圣贤熏陶的汉人士大夫看来，安禄山邀宠献媚的方式过于直白、近乎呆板，但安禄山实际上是把皇帝想象中的“野蛮人”应该具有的淳朴发挥到了极致，并让皇帝感觉到安禄山这个人尚未开化、心思简单，不像受过文明熏陶的汉人士大夫已学会了伪装和说谎。

还有一次，安禄山上表跟皇帝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到先朝的名将徐世勣、李靖来求食，于是他就在自己的驻地为这两位开国名将立庙供奉，没想到庙宇方立即有灵芝生于庭院，这真是天降祥瑞，于是发誓要踏平契丹，因为“人神协从，灵芝瑞应”。他还在一次宫廷宴饮上直言不讳地说：“臣蕃戎贱臣，受主宠荣过甚，臣无异材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这番话如果出自汉人之口，唐玄宗或许还会引起

戒备心理，认为这是讨好自己的美语甘言，但是李隆基这时把安禄山当作秉性淳朴的“野蛮人”，因此对安禄山的这番表忠心的话深信不疑，而且不由得生出了怜悯之心。史书上对皇帝的心理描写用的是这样4个字：私甚怜之。

正所谓“夷狄进而为华夏，华夏退而为夷狄”，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里，中国自视为中央大国，“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汉人因此拥有天生的文明优越感，而夷狄则被视为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不懂得君臣父子的伦理大道，也不懂得委婉曲折的权变谋略。安禄山自然属于野蛮民族中的“野蛮人”，但是他抓住了唐玄宗的这一心理，灵活运用道家“知其雄，守其雌”的权术，把“野蛮人”的淳朴、愚昧、憨厚表演得淋漓尽致。一方面让皇帝产生了“文明人”对“野蛮人”特有的同情，另一方面则以其憨厚淳朴进入了皇帝的心理安全区。狡猾如汉人文儒，皇帝当然会有所保留；唯有淳朴到呆板、憨厚到痴呆，皇帝才会彻底放下猜疑。

为了维护淳朴的形象，安禄山可谓煞费苦心，甚至到了装傻充愣的地步。他本来身宽体胖、大腹便便，一度达到330斤之重，腹垂过膝，“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就是在移动如此不便的情况下，只要是在皇帝面前，安禄山还能以如此体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有一次唐玄宗跟他开玩笑，你这肚子里面装了什么这么大?安禄山回答说：“唯赤心耳！”这是一肚子的赤胆忠心啊！皇帝听后自然龙心大悦。而后，皇帝命安禄山拜见太子，他竟然站着不动，只是充满疑惑地说：“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唐玄宗解释说：“是储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安禄山才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这次装傻更让皇帝觉得安禄山心思简单，也由此更加深了对他的信任，“玄宗尤嘉其纯诚”。

当时，杨贵妃宠冠后宫，安禄山又用这份“淳朴”攻占了皇帝枕头边的政治阵地。他请求皇帝允许自己作为贵妃的养儿，李隆基欣然同意。而后，安禄山但凡入朝觐见必然先妃后帝，李隆基感到很奇怪，安禄山的解释再次以淳朴打动帝心，“蕃人先母后父”，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杨贵妃在一次过生日时，用绣绷子绑住安禄山，欢呼动地。唐玄宗派人询问，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曰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这也勾起了唐玄宗的童心，于是欣然前往，极乐而罢。从此宫中都称呼安禄山为“禄儿”，不禁出入、来去自由。“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安禄山与杨贵妃甚至传出通奸的绯闻，而唐玄宗亦不之疑也，可见安禄山的淳朴已经让他放下了所有的戒备。

300多斤重的中老年男人竟被称为“禄儿”，至今想来都令人感到肉麻，而这也恰恰反映出唐玄宗、杨贵妃该是把安禄山看得多么淳朴简单。然而，安禄山并不是他们想象中未经开化、不知狡猾为何物的“野蛮人”，也不是没见过世面所以还保留着原始淳朴的乡野村夫。皇帝看到的一切都来自安禄山处心积虑的表演。

通过信息控制麻痹皇帝

当然，安禄山不仅懂得如何把自己假扮成皇帝想象中的淳朴憨厚形象，更懂得如何用虚假信息来蒙蔽皇帝，让皇帝目之所见、耳之所闻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信息”，彻底把皇帝隔绝在真相之外。

前文提到，“信息”的传播与控制被誉为“政府的神经”。在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中，由于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下级在传递信息过程中会有意选择那些迎合上级偏好的信息，最常出现的情况就是“报喜不报忧”，结果导致信息在向上传递过程中层层过滤、级级失真。特别是在君臣之间，如果处于权力顶端的皇帝已经有明确的“主

观偏好”，下级更不敢提供与之相悖的信息，即便这个信息是真实的。在下文中将会看到，这一点如何导致唐玄宗直到最后仍然执迷不悟。

当然，历代统治者自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凡是一代明君，无不主张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唐太宗就曾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无非就是希望获取更多信息渠道，以便相互印证，避免单个信息源导致信息失真。其实，唐朝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官僚体系的信息渠道之外，还直接从朝廷派出采访使、观察使等官员，绕开叠床架屋的官僚体系，直接向皇帝汇报信息。因此，从使者那儿得到的信息，可信度比经过官僚体系过滤的信息要更高，而皇帝也往往对这条信息通道更为倚重。

但是这样做也会面临另一个问题：如果派下去的京官一旦被收买，信息失真岂不是后果更严重？安禄山就是利用这一点，在传言四起的关键时刻打消了唐玄宗的疑虑。当时，宰相杨国忠极言安禄山将反，并且谋划任命安禄山为宰相，以此为名征召入朝、罢其兵权。诏书未下，唐玄宗仍然犹豫再三，最终决定还是先派使者前往观察，然后再做决断。于是，“使中官辅璆琳赐大柑，因察非常”，名为颁发赏赐，实为刺探隐情。安禄山也知道使者到来的真实意图，“厚赂之”，结果使者刚一回朝，就对皇帝盛言边境无恙。虚假的信息在关键时刻蒙蔽了唐玄宗的心智。

如果说这只是技术层面的应对，那么安禄山更加洞悉促使信息失真的真谛：由于下级视上级偏好而有选择性地提供信息，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上级的主观偏好。对安禄山而言，最重要的是抓住皇帝的主观偏好。皇帝只要形成主观偏好，下级就会用信息去证明，不是事实也能编造出事实，没有根据也能制造出根据。比如说，唐玄宗满心期盼削平四夷，安禄山就“懂事地”让皇帝心想事成。他经常献馘阙下，捷报频传，哄得龙颜大悦。实际上，那并不是战争所得，而是他利用熟人关系，对契丹酋长大摆鸿门宴，“大置酒，毒

焉，既酣，悉斩其首，先后杀数千人”，然后用向朝廷谎报战绩。所谓“边朔底宁”，纯系子虚乌有，却因为迎合上意，竟让皇帝笃信不移。

在安禄山举兵谋反的前夜，唐玄宗实在抵挡不住漫天飞舞的传言，于是设计了一个测试：追召安禄山入朝，立即回京则是忠心耿耿，若便迁延则是心怀二志。然而，洞悉人性的安禄山揣得其谋，驰马入谒，毫不犹豫，结果“帝意遂安”，更加坚定了皇帝的主观偏好和先入之见。而面对朝中大臣甚至太子的进谏，唐玄宗无论如何都闭目塞耳、置若罔闻。

于是，大唐风平浪静的繁华表面之下，正酝酿着即将带来毁灭之灾的惊天巨变。安禄山最后一次离京心怀恐惧、战战兢兢，由于担心朝廷收回成命，一日疾行三百里，不顾一切地奔回范阳老巢。这时，安禄山的反状等于是大白天下、路人皆知。如果此时下旨召回，特一狱卒之擒耳，就能避免“安史之乱”的悲剧。但是作为大唐的最高掌权者，唐玄宗不仅毫不知情，还戏剧性地“助纣为虐”，“人告言者，帝必缚与之”，凡是来告安禄山谋反的人，都把人绑起来交给安禄山。皇帝之蒙蔽，竟一至于此！

结果，道路以目，无敢言者，直言不闻，真话匿迹，只有皇帝喜欢的信息才能登于朝堂，而皇帝也因此更加强化了主观判断与先入之见。于是，唐玄宗就在一厢情愿的想象中麻痹自己，直到他记忆中那个淳朴憨厚的“野蛮人”举起屠刀。

既得利益导致朝廷坐失良机

公元755年，安禄山果然起兵造反，以“奉密诏讨杨国忠”的名义，腾榜郡县，兵凡15万，号20万，以日行60里的速度鼓噪而下。安禄山

虽然兵雄天下，但是唐朝国强民富、根基深厚，起兵造反可以说是以卵击石。王夫之就明确地指出，唐玄宗失德而未失道，还未到改朝换代的时候，“安禄山不足以亡唐”。

在安禄山起兵前后，朝廷至少有两次机会能够以最小成本、最短时间将其扑灭，从而将危害降到最小。然而，在长枪短戟的刀锋之上却闪现着既得利益的魅影，哪怕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当朝权贵为了维护一己私利，不惜牺牲朝廷的整体命运，异化了朝廷的正确决策，让朝廷坐失了镇压叛乱的最佳时机，间接助长了安禄山的反叛气焰。

第一次机会是在安禄山欲起兵而未起兵的关键时刻。当时，安禄山上表请求以32名蕃将替代汉将，宰相杨国忠与韦见素认为这是将谋反公开化了，于是一起去劝谏唐玄宗。韦见素与杨国忠约定好，如果他劝谏不成功，杨国忠要继续努力。结果，韦见素见到皇帝后，呜咽流涕，仗义执言，但是皇帝仍然不为所动，而皇帝宠信的杨国忠，这时竟然“都无一言，俯偻而退”，最终不了了之。

当此之时，杨国忠可以说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但是为什么一言不发、保持缄默？道理很简单，安禄山起兵，不符合朝廷的公益，但是符合杨国忠的私利。杨国忠与安禄山，一个居朝为相、身当国柄，一个处外为将、手提雄兵，向来身为对手、视若仇寇。杨国忠从一开始就一直认为安禄山将会造反，是不折不扣的“倒安派”，这就让二者一直处于相互猜忌的状态。在杨国忠看来，自己一直说安禄山谋反，但如果他还没谋反就收拾他，那不是说明自己的判断不正确吗？于是，杨国忠的如意算盘是逼安禄山造反，那样不仅可以在皇帝面前“以明己之先见耳”，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借朝廷之手铲除劲敌。于是，在可以消祸于未萌的时候，杨国忠为了维护一己之私竟然放弃了天赐良机。

后来，安禄山造反的消息传到朝廷，举国震恐，大臣以下，相顾失色，唯独杨国忠认为终于验证了自己的先见之明，“扬扬有得色”，

笑着说："陛下发兵讨之，仗大义诛暴逆，可不血刃而定矣。"国命悬于一线而权贵犹自窃喜，私利害于公益竟至于此乎？

第二次机会是在全国已经对安禄山形成合围、胜利朝夕可望的时候。当时，哥舒翰率领10万大军镇守潼关，截断了安禄山西取长安的进攻路线；李光弼、郭子仪从河北率军南下，阻挡了安禄山退回范阳的撤退路线。官军四集对安禄山形成瓮中捉鳖的合围之势，安禄山起兵未几就陷入了"进无所攻，退失巢穴"的进退失据的困境。

潼关不开，老巢难回，这时的安禄山充满了追悔莫及的失望情绪，他把谋士召来大骂一通："我起，而曹谓万全。今四方兵日盛，自关以西，不跬步进，尔谋何在，尚见我为？"起兵之时，你们说策之万全，现在官兵日盛，寸步难进，你们还有何脸面见我？安禄山在万念俱灰之际或许还曾想过自己沦为阶下囚的惨状。然而，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当朝权贵再次为了维护私利，让安禄山绝地逢生了。

当时，哥舒翰镇守潼关，有人劝谏说安禄山起兵造反，以"清君侧"为名，当时汉景帝诛晁错而平七国之乱，将军何不师法古人，派兵诛杀杨国忠而靖难呢？哥舒翰同意这一方案，却在未发之时被人泄露给了杨国忠。杨国忠为了明哲保身，在后方开始组建一支新的军队，而哥舒翰认为这是对付自己，上表请将这支军队隶属潼关前线。于是，安禄山还未消灭，统治集团内部的将相矛盾再次公开化。失去军队的杨国忠这时正酝酿着如何挫败哥舒翰。

本来，消灭安禄山的最优策略是哥舒翰坚壁清野，以逸待劳，阻之于前，而李光弼、郭子仪挥兵南下，锐意进取，逞之于后，两军合围，形成夹击之势。但是杨国忠这时宁愿哥舒翰失败，也不愿安禄山就戮，宁愿自己宠禄皆保，也不愿朝廷渡过难关。于是，杨国忠给唐玄宗上表，谗言哥舒翰"逗遛不进"，唐玄宗竟被迷惑，不识大局，而连发诏书迫使哥舒翰出兵。哥舒翰无奈之下，"恸哭出关"，放弃万全

之策而就莫测之险，结果兵败被擒，潼关失守。形势一时间急转直下，唐玄宗在慌不择路的绝望中仓皇西逃，大唐陷入亡国的危险。

可以说，安禄山起兵成功并不是他自己用兵如神，而恰恰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为权贵阶层为维护私利而扭曲了朝廷的正确决策。没有杨国忠对既得利益的誓死保卫，就不会有安禄山困兽犹斗的意外突围。

既得利益与信息扭曲共同导致制度衰变

安禄山起兵之初，天下就流传这样一首童谣："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毡上一贯钱。"燕，是安禄山起兵后的国号；天上女，是安禄山的姓氏"安"字；毡上一贯钱，以钱的数量预言安禄山称帝只得一千日。人心浮动的乱世，童谣与谶纬再次扮演了未来的先知，对安禄山而言却是一言成谶。

安禄山与杨国忠的下场都当得起一个"惨"字。安禄山在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夜晚，那个他自诩为装满忠心的大肚子，被贴身侍卫一刀砍穿，须臾肠溃而死。幕后的指使竟然是他的亲生儿子。杨国忠自以为战胜了所有当朝的政敌，还能胁迫天子共同前往剑南老巢，正是国家不幸自家幸的幸福时光，却在一个名叫马嵬驿的荒山野岭被义愤填膺的起义士兵乱刀砍死，并抛尸荒野。或许，这样的下场也难解天下士子的千古遗恨。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满腔愤恨只能徒增感伤，只有理性的反思，才能采撷教训的真谛。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天下皆知而当权者独不知"的信息困境几乎普遍存在，这是一个王朝走向衰亡的标志。"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

夷之祸；梁武帝偏信硃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这是魏徵对唐太宗说的一段话，来说明如果只有单一信息源，必然导致君主被欺骗，以证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通过《贞观政要》的记录，这8个字也成为历代统治者引以为戒的金科玉律。

唐玄宗在仓皇西顾的途中，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盖为此也。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平。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这位乡野村夫以极其朴素的语言表达着极为深刻的道理，以前皇帝虚心纳谏，不同的声音竞相涌现，信息来源多样，“天下赖以安平”；而后皇帝日益闭目塞听，信息来源单一，“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

增加信息渠道固然能够增强信息的对比，避免单一信息源陷入自证清白的境地，但这只是技术性的调整，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安禄山深谙此道，他深知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信息渠道的多少，而在于居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皇帝的主观偏好。或者换句话说，在事实还未澄清之前，皇帝内心期盼什么？愿意相信什么？又主观偏向什么？一旦抓住皇帝先入为主的偏好，就能够“选择性”地提供信息，甚至制造假象，而皇帝看到能够印证自己价值偏好的“证据”，也必然会“选择性”地相信。至于那些与自己期盼相左的信息则会被视为异端邪说，从而遭到权力的剿灭，结果皇帝的主观偏好陷入了自我论证的循环之中，从而缺少发现真相的能力，这才是“天下皆知而当权者独不知”的根本原因。

而聪明的官僚，往往是事先就揣摩到皇帝的心思，然后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搜集信息，最后皇帝竟“意外地”发现事实证明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但其实，那只不过是被制造出来的“证据”。于是，绝对权力看上去能宰割一切，实际上会陷入自我论证的盲目中，最终会让朝廷丧失发现真相的能力。在这方面，李林甫更是炉火纯青，安禄山与之相比真是萤火虫与日月争辉。

唐玄宗的悲剧在于，他的主观偏好总是被安禄山悄然探知，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唐玄宗总认为上报来的信息在佐证他的判断，其实那是手段更高的欺骗。

导致安禄山崛起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官僚政治产生出既得利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提出著名的“诺斯悖论”，意思是说：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既得利益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显然，前者是既得的私利，而后者则是国家整体的公益，这两个目标处于无法调和的冲突之中，如果前者压过后者，则是国家衰退的开始。

可以说，“诺斯悖论”为解释杨国忠的行为提供了完美的理论框架。杨国忠身为宰相，秉政当国，一方面要维护宰相的权势，这是私利；另一方面要调和阴阳、治理庶政，这是公益。对杨国忠而言，这二者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如果换作房玄龄、杜如晦、张九龄等士大夫楷模来做唐玄宗的宰相，这些人或许会出于高尚的道德追求而在安禄山祸起萧墙时以身许国、废私立公。然而，当道德约束不复存在，出于私利的选择就会是杨国忠的做法：宁可牺牲公益，也要成全私利；宁可牺牲朝廷，也要保全自己。呜呼，将人性之悲耶？将制度之哀耶？

杨国忠寄生于朝廷，但从不对朝廷产生任何责任。他从朝廷中获得所有人生的成功，却对朝廷并无丝毫的感恩。翻开中国古代历史，

杨国忠并不是独有的孤独存在，可以说，历朝历代的最后灭亡都是由于这样一群“寄生虫”肆无忌惮地腐蚀与消耗。明朝末年，天下群盗蜂起、烽火遍地，而福王朱常洵仍然富可敌国，“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致使官军将士抱怨“福王府里金钱百万，却让我们饿着肚皮去送死”；清朝将亡，革命军已经席卷大半个中国，那些锦衣玉食的王公贵族只是口头上支持朝廷镇压革命，却不愿为朝廷拿出自己家产的一分一毫。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既得利益通过寻租活动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从而增加既得利益自己的收入”。也就是说，既得利益一旦形成，就只会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就会不断地损公肥私。杨国忠则是既得利益的极端表现，他明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却仍然不惜牺牲朝廷以谋取私利。

在奄奄一息的最后时刻，安禄山集聚浑身力量惊呼：“是家贼！”这三个字，是他对造反之人的谴责，但何尝不是在以最后的声嘶力竭，为自己的人生盖棺论定？安禄山确实是家贼，这正如欧阳修在《新唐书》中的评价：“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贼杀其父，事之好还，天道固然。”安禄山能够以臣反君，他儿子为什么不能以子弑父呢？践踏伦理道德的结果，是自己承受道德崩塌的代价。报应不爽，诚不我欺。

安禄山起兵造反，不仅破坏了天下承平日久的和平秩序，而且践踏了君君臣臣的儒家伦理。而在关键时刻，多少志士仁人乘势而起，以匡扶天下为己任，有破坏者，就有卫道士。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人在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与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展开了浴血奋战。然而，当这三位将领忠诚于朝廷之时，他们得到的并不是对忠诚的回报，而是来自皇帝及权臣的猜忌，对此，他们三个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

第九章



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不能预设个人对朝廷的无限责任

沧海横流的历史转折，风雨晦暝的时代危机，最能慰藉那颗撞击在英雄人物胸膛里的强大心脏，满足他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雄心壮志。然而，英雄人物在扮演历史"扳道工"的角色之时，也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疾驰而过的历史列车。他们改变了历史的运行轨迹，历史也塑造了他们的人生命运。

大唐盛世，横亘百年，曾让一个民族的文明成为世界历史的普遍想象，却因"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内部反叛而骤然失色。当此之时，安禄山挥兵南下、攻城略地，唐玄宗放弃长安而仓皇西顾，天下分崩，四海离析，风雨飘摇，危在旦夕。这样的关口往往是"需要伟人而且能够产生伟人"的时刻，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人趁势崛起，从"无名山丘"隆起为"时代高峰"，从镇守边疆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将天下安危运之于掌。

郭子仪宽厚为怀，信义著于天下，曾经单枪匹马，降服了回纥数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演绎了"仁者无敌"的千古传奇；李光弼善于用兵，天下服其威名，能够以少胜多，困守太原时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敌军；仆固怀恩骁勇善战，浑身充满少数民族的野性与血性，跨马临阵无不身先士卒、以一当百。他们三人各以所长、尽显其美，把时代的困顿当作人生的舞台，在绝望的铁幕上凿出希望的光亮。

然而，“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当宏大叙事的剧目落下帷幕，他们三人在享受荣誉的同时，也遭到了当权者的猜忌与怀疑。就在这时，他们三人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也走出了迥异的人生轨迹。郭子仪选择了和光同尘、韬光养晦，从而获得了宠禄及身、富贵常保的完满结局；李光弼选择了迁延不进、等待观望，最后在愤懑和羞愧中积劳成疾、惨然离世；仆固怀恩选择了举兵造反、讨回公道，不惜引狼入室为自己正名，结果在背主叛国的骂声中暴毙军中。他们三人曾同仇敌忾、扭转乾坤，却在个体命运上迥然不同。

千载之下，郭子仪的选择最为人称道，因为他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保住了荣华富贵。他被视为道家权谋学的绝佳代言人，他的隐忍与退让被奉为最为经典的官场哲学。然而，郭子仪的世俗成功并不能证明李光弼与仆固怀恩的失败，而且也无法阻挡后人这样连连发问：为什么个人需要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在国难当头之际需要慷慨赴难、以身殉国，而在削平群雄之后又要忍受猜忌、陷害？在抽象的家国面前，个人为什么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获得的权利？又是什么把那些为国为家屡建功勋的人逼到了只有隐忍退让才能自我保存的逼仄境地？

这不是一个为人处世的权谋问题，而是一个怎样处理集体与个人关系的根本问题。李光弼与仆固怀恩的结局不仅是他们自身的悲剧，也是朝廷的悲剧，问题不在于他们如何选择，而是朝廷为什么要给予他们这样进退失据的无奈选择。他们三个人的命运走向反映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当个人对皇帝的忠诚、对朝廷的付出无法换来与之相称的回报，个人该如何重新定义与朝廷的关系才能做到上不愧天、下不愧己？

其实，一旦置于这样的选择困境，不仅个人难以找到合适的答案，朝廷的道德感召力也将随之降低。那么，为什么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之中？

命运草蛇灰线的伏笔

命运就像是一位构思精巧的作家，在很早的时候就为人物的结局埋下了草蛇灰线的伏笔。郭子仪、李光弼与仆固怀恩的最终结局，在他们意气风发建功立业之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三人之中，郭子仪是心思缜密的政治家，李光弼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仆固怀恩则是勇冠三军的战士。郭子仪排兵布阵不及李光弼，但是他更懂政治，既能以宽厚仁慈笼络人心，又能以谦抑隐忍深得帝心。与之相比，李光弼则像是一个更加技术化、专业化的军事将领，他不懂政治，也不善于窥伺人心，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行军打仗的技术化事务之中。而仆固怀恩既无政治眼光，也无军事才能，他所凭依的只是遒劲有力的肌肉、视死如归的胆魄以及时而勇猛、时而鲁莽的性格。在平定叛乱的时候，他们三人的不同特长正好形成相互配合、互补短长的优势，但是在天下底定之后，却又决定了他们不同的人生结局。

在血雨腥风的战争中，郭子仪展现出来的不是集体使用暴力的力量，而是个人的人格魅力，是道德与正义的感召力量。仆固怀恩造反之后，引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大军南下，京师震动。郭子仪临危受难向皇帝直言“怀恩无能为也”，因为“怀恩本臣偏将，其下皆臣之部曲，臣恩信尝及之，今臣为大将，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为也”。他相信自己曾经恩泽三军，现在必然还能令这些将士感念旧德。果然，郭子仪坚壁清野，仆固怀恩不战而退。

这还只是有关郭子仪传奇一生的序曲，接下来，郭子仪单枪匹马，降服了回纥数万大军，这才是军事史上的千古佳话。后来，吐蕃、回纥、党项等少数民族再次南侵，泾阳作为京师的屏障已经被数万回纥骑兵重重包围，局势紧急，京师告急。郭子仪这时镇守泾阳却只有一万多名士兵。在绝无成功可能的时候，道德感召力又创造了奇

迹。郭子仪往来指挥引发了回纥的好奇，他们询问“此谁也”，这边答曰“郭令公”。回纥说：“令公诚存，安得而见之？”郭子仪这时决定只身前往，但是诸将担心万一回纥使诈，郭子仪则必死无疑，都说“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请无往”。郭子仪斩钉截铁地说：“虏有数十倍之众，今力固不敌，且至诚感神，况虏辈乎！”诸将仍然不放心，请求选铁骑500卫从，郭子仪心知一旦有铁骑在侧则是示回纥以不信，“适足以为害也”，于是策马挥鞭，一个人面对一支锋刃相向、旌旗蔽野的军队。这种信大义于天下的胸怀、不计个人生死的气度，化解了回纥的猜忌与仇恨。那些血脉贲张的少数民族士兵一瞬间就被大仁大义所感动，舍兵下马齐拜曰：“果吾父也。”

他敢于正视死亡的威胁，敢于直面庞大的军队，因为他清楚身后有道德与正义的支撑，这让他拥有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获得了“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美誉。他以行动证明：道德与正义，是比暴力更加强大的力量。而这一点，也将在命运转折之际给予他足够的荫庇。

与郭子仪不同，李光弼更像是一个军事领域的技术官僚，如果说郭子仪带着一股脉脉温情的魅力，那么李光弼则透露着军事将领特有的冷酷与严肃。李光弼初露峥嵘就表现出这种堪为将军的果敢。安史之乱后，朝廷派李光弼镇守太原，并命一个叫崔众的人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李光弼。在交接仪式上，崔众戏谑无礼，又不立即整肃军队，李光弼二话不说将其拿下，这时适逢朝廷使者到来，正要宣布提拔崔众为御史中丞的诏书。李光弼说：“众有罪，系之矣！”中使于是以敕示之，意思是不要公开让朝廷难堪，也是给李光弼一个台阶下。没想到李光弼心意已决，“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朝廷就是拜崔众为相，李光弼也是非斩不可。这话说得有军人的阳刚之气，有一股凛然不可犯的气概。于是，崔众被斩首了。

就是凭借这种气概，李光弼麾下的将士令行禁止、纪律严明，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力和战斗力。李光弼既善于攻城野战，也长于守城御敌，尤其是后者更能彰显李光弼以少胜多、用兵如神的军事才华。退守河阳就是最具李光弼风格的守城战役。当时，敌军将城池围得水泄不通，李光弼登城望曰：“彼虽众，乱而嚣，不足惧也。当为公等日午而破之。”这是在以胜利的预期增强将士的信心，然后，他就开始以军人的气概重整队伍。“向来战，何处最坚而难犯？”或曰：“西北角。”遽命郝玉曰：“尔往击之。”又问：“何处最坚？”曰：“东南隅。”即命论惟贞以所部往击之。军令如山，言出令行，毫无拖泥带水，具有不容置疑的决断力。最后，在先锋冲击之后，李光弼率领三军望旗俱进，“声动天地，一鼓而贼大溃，斩万余级”。

李光弼每逢临战，“常纳短刀于靴中，有决死之志”，既为“光弼位为三公，不可死于贼手”的尊严，也为了激发“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的斗志。李光弼是一个天生的军事将领，在绝望时给将士希望，在懦弱时给将士勇气，在困顿时给将士温暖。然而，当军事将领进入政治领域，却并不像在战场上那么挥洒自如，命运的考验终将降临。

三人之中，仆固怀恩的表现，最具有戏剧化的视觉效果，因为他的人生缺少抽象的运筹帷幄，更多的是赤裸裸的搏击、血淋淋的厮杀。他先是跟随郭子仪鏖战西北，“凡经五月，常为先锋，坚敌大阵，必经其战，勇冠三军”；后又追随李光弼坚守河阳，“破周出，擒徐璜玉、安太清，拔怀州，皆摧锋陷敌，功冠诸将”。仆固怀恩并不是军事战略的制订者，而是一个坚定有力的执行者，“勇冠三军”“摧锋陷敌”等描述可以还原一个在战场上横刀立马、孔武有力的将军形象。

正因为此，仆固怀恩也更容易将战场上的思维方式带入现实生活中。有时候，勇猛与鲁莽只有一线之隔，直爽与犯上也往往难以区分。可以说，仆固怀恩是战场上勇猛，生活中鲁莽；战场上直爽，生

活中犯上。他的儿子仆固玚兵败降敌，后来又自拔而归。按说虎毒不食子，仆固怀恩却不问是非曲直，“叱而斩之”。他本人又刚决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虽主将必诟怒之”，完全不把主将放在眼里。以战场的行事风格对待云谲波诡的政治，仆固怀恩的性格特点为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三位勋臣宿将在平定叛乱过程中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性格特点，而在军事战争结束之后，他们都将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在那里，命运已经举着法槌等候良久。

郭子仪以隐忍求得自保

三人当中，最早受到当权者猜忌的当属功盖天下的郭子仪。鱼朝恩和程元振两位宦官，先后在唐肃宗、唐代宗两朝受到重用，二人为了固宠专权，尤其嫉妒郭子仪的功勋，担心郭子仪的权势威胁到自己。于是，二人既在君侧，无不乘隙曲进谗言、谮毁百端。外有敌军操戈，内有奸臣陷害，郭子仪的处境可以说是险象环生，稍有不慎就可能身首异处。

越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越能突显郭子仪对道家哲学的精通，将守弱为强、以退为进的辩证法用到了极致，煌煌二十四史，似无人出其右者。首先，郭子仪能容、能忍、能屈，能够受尽委屈、吃尽苦头，以此紧紧抓住皇帝的信任。鱼朝恩当权之时，往往是在战事紧急时突然解除郭子仪的兵权，然后又在朝廷陷入绝境后不得已让他官复原职，去收拾烂摊子。这样的不公，常人难以接受，但是郭子仪却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郭子仪毫无迁延、从不观望，奉诏之日即是动身之时，用这种方式向皇帝表明自己毫无贰心，因此鱼朝恩等人所进的拥兵自重等谗言始终不能动摇皇帝的信任。

后来，唐代宗即位，程元振成为新的宠臣，更是“忌嫉宿将，以子仪功高难制，巧行离间”，请求皇帝解除郭子仪的兵权。郭子仪有存亡继绝的功勋，却无端被朝廷解除兵权，这样的委屈，常人都难以忍受，郭子仪却默然接受，不仅上表谢恩，而且更为精明的是，他把前朝皇帝唐肃宗所赐前后诏敕一并奉上，“昧死上进，庶烦听览”。这一举动充满了政治智慧，因为兵荒马乱之际，郭子仪手握雄兵，如果前朝皇帝留有密诏，郭子仪足以借此行废立之事，威胁当朝皇帝的地位。而奉上先帝诏敕，信息完全公开透明，就能彻底打消当朝皇帝的忧虑。果然，唐代宗亲自写下诏书回应道：“朕不德不明，俾大臣忧疑，朕之过也。朕甚自愧，公勿以为虑。”郭子仪的自我剖白引来了皇帝的自愧自省。

其次，郭子仪深谙“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知道君子应该“居善地，心善渊”，就像无往而不胜的水一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在受到程元振的猜忌之后，他上书给皇帝，毫无怨言，也表达了自己急流勇退的志趣：“器忌满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贤路？”

再次，皇帝每有封赏，郭子仪的第一反应必然是上表请辞。他在第一次打败反叛的仆固怀恩后，被朝廷封为太尉，他立刻上表坚辞，说：“太尉职雄任重，窃忧非据，辄敢上闻。”郭子仪表明自己的志向是“追踪范蠡，继迹留侯”，像范蠡和张良那样功成名遂而后身退。郭子仪在第二次打败反叛的仆固怀恩后，被朝廷任命为尚书令，他也立即上表恳辞，说自己“内参朝政，外总兵权”，实在是“猥蒙驱策”“德薄位尊，难逃天子之责；负乘致冠，复速神明之诛”，所以恳请皇帝收回成命。他在息兵止戈的晚年也时时向皇帝吐露衷肠，表达自己愿意解甲归田的愿望，说自己“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齿发已衰，愿避贤路，止足不诫，神明所鉴”。郭子仪给皇帝的上书，态度诚恳，语气谦抑，毫无自居功臣的傲慢，也没有自矜自伐的傲气，对于一个立下不世功勋的人而言，这需要多么宽广的胸怀才能做到！而正是因为他的

谦抑退让、不贪恋权位、不痴迷功名，才避免了皇帝把他当作潜在的叛变者，从而保全了自己。

最后，郭子仪即便是对待仇人也拥有天无不覆、地无不载的包容，能够以德报怨、以直报曲，用道德去化解猜忌，用信任去消除嫌隙。鱼朝恩、程元振等人无时无刻不想将郭子仪除之而后快，但是郭子仪从来没有任何反噬之心。不用说他坐拥天下兵马，又年高德尊、天下闻名，只需以"清君侧"为名，振臂一呼，就可以迅速除掉两位宦官。即便是单独觐见皇帝，他也不曾有半句谗言、一次谮毁。郭子仪不仅没有这样做，还主动放低身段去弥合与鱼朝恩等人的关系。

有一次，郭子仪打败吐蕃，胜利归来，但就在这时，他父亲的坟墓被盗。天下人皆知鱼朝恩向来妒忌郭子仪，于是都猜疑是鱼朝恩暗中派人所为。在讲究慎终追远的儒家伦理秩序中，祖坟被挖可以说是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郭子仪已经忍受了那么多委屈，这次还能忍气吞声吗？而如果郭子仪与鱼朝恩闹翻脸，本来就风雨飘摇的朝廷必将分崩离析，因此，天下人都在关注郭子仪的一举一动。没想到，郭子仪见到皇帝后，竟然泣不成声地说："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他把自己祖坟被盗说成是自己常年带兵打仗的报应，是因天谴，殆非人事，一口气吞下了鱼朝恩制造的奇耻大辱，并以自己的退步解除了与鱼朝恩之间的风波，"朝廷乃安"。

这就是郭子仪，以大屈辱赢得帝心，以大退步保全自己，以大宽容收获人心，做人与修身都达到了极致。《道德经》里面对权力辩证法的描述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胸怀；"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智慧;"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的谦逊;"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的眼光，这些都体现在了郭子仪的为人处世中。结果，郭子仪也

赢得了至高评价——“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

中国几千年政治史中，能担得起这三句评价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李光弼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

在当时，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论军事贡献，李光弼犹在郭子仪之上，所谓“战功推为中兴第一”。因此，李光弼自然也遭到鱼朝恩、程元振等人的猜忌，尤其是在鱼朝恩指挥失当，导致朝廷兵败洛阳之后，鱼朝恩等人更加深对李光弼的妒忌与仇恨。

当时，史思明再陷河洛，兵锋甚盛，李光弼退守河阳，好不容易才解除了河阳之围，正是休养生息、缓图进取的时机，朝廷的观军容使鱼朝恩却屡次上言“官军可进、贼军可灭”。于是，朝廷下旨命令李光弼速收东都。李光弼身为一线指挥非常清楚贸然进取的后果，屡次上言，“贼锋尚锐，请候时而动，不可轻进”。这时，仆固怀恩作为副将也妒忌李光弼的功勋，巴不得李光弼失败一次，于是暗中依附鱼朝恩言贼可灭，鼓吹速战。最终，朝廷命中使督战，李光弼身不由己，只好硬生生把军队搬到北邙山下。“贼悉精锐来战”，李光弼屡战屡胜的军旅生涯中也终于记下失败的一笔。

按说，兵败洛阳的结局证明了李光弼的先见之明，也说明罪魁祸首就是鱼朝恩。如果鱼朝恩心胸宽广，就应该向李光弼谢罪，但是鱼朝恩偏偏心胸褊狭、妒火中烧，不是把这件事看成是自己的过失，而是当作李光弼对自己的一次羞辱，“朝恩羞其策缪，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这与历史上袁绍杀田丰的事件如出一辙，袁绍进军官渡之前，田丰就极力劝谏不要冒进，袁绍不为所动，后来果然大败而归。田丰即在狱中说，袁绍心胸狭窄，打了胜仗，一高兴或许能赦

免自己。万一败绩，心中猜忌发作，自己必死无疑。后来田丰果然被袁绍赐死。鱼朝恩也像袁绍一样外宽内忌，为了文过饰非不惜迁怒于人，通过惩罚别人来掩盖自己的过失，因此对李光弼的妒忌又多了几分。

于是，鱼朝恩、程元振先后用事，对李光弼“日谋有以中伤者”，这已经引起了李光弼的警觉与恐惧。而当时的平乱名将来瑱入朝之后，不仅未能得到奖赏，反而被鱼朝恩等人陷害致死，这更加重了李光弼的恐惧。李广粥纵横沙场，有着“策敌制胜不世出”的来去自如，但是在无形的政治战场，他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何去何从的问题像一座坟墓一样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后来，吐蕃突然入侵，乘舆播越，唐代宗下诏勤王。李光弼手提雄兵，心系皇室，换作以前，他必然不计生死、舍身赴难，但这时李光弼却面临着人生最为沉重的选择。进，有馋毁之祸；退，受背主之名。天地悠悠，山高水长，李光弼感到四海之大，却无处安放他的一颗拳拳之心。他曾无数次战胜了战场上有形的敌人，却无法在无形的政治斗争中辨明方向。于是，他选择了不进不退、不偏不倚，既不进军勤王，也不起兵清君侧，而是做一个踏踏实实的中立派。

朝廷方倚之为援，恐成嫌隙，亦惧其反，于是主动伸出了和解的橄榄枝，不仅数次下诏存问其母，而且派遣中使到军中宣慰李光弼，并最终做出了试验性的决定：征李光弼为东都留守，察其去就。朝廷虽然释放善意，但是李光弼害怕的是程元振等人在暗处射出的冷箭，他对自己周旋于复杂人事的能力不够自信，也无法像郭子仪那样，用以退为进的方式向皇帝吐露衷肠、获得信任，正所谓“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于是，一位曾经“攘袂徇国，天下风靡”的名将决定就这样黯然离开历史的舞台，逃到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寻求自我保护。李光弼再次回绝了朝廷的邀请，“光弼以久须诏书不至，归徐州收租赋为解”，随便找了个理由，让自己保持与朝廷若即若离、亦合亦分的关系。

晚年的李光弼由于不听诏命，曾经的麾下名将亦不受约束，各谋出路，让曾经风光无限的李光弼感到了人生的寂寥。他一生效力朝廷，风餐露宿，溅血沾衣，与郭子仪同享中兴之臣的尊荣，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由于忧谗畏讥、无以自明，而失去了忠君爱国的名声。李光弼的确没有郭子仪那么长袖善舞、通晓人事，但这是个人的天性使然，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一定要给予李光弼一个进退两难的选择？

仆固怀恩以反叛讨回公道

为国立功却遭到权臣猜忌，面对这样的委屈，如果说郭子仪选择的是“退”，李光弼选择的是“躲”，那么按照仆固怀恩的刚烈性格，他肯定会选择“进”。八面玲珑、和光同尘，他不如郭子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不如李光弼；唯有鲁莽冒进、暴躁刚烈，则远胜于“李郭”二人。

仆固怀恩不懂政治，也不关心政治，他在受到猜忌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按照战场上嗜血杀敌的方式进行反击。他信奉的是强者胜出的逻辑，不屑于迂回曲折，向来是直来直去，因此也完全不关心政治运转的内在机理，受到委屈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直接把朝廷砸碎，而不是采取讨价还价的方式。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后期，郭子仪受到猜忌而解除兵柄，李光弼出于自保而拥兵观望，朝廷所倚靠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仆固怀恩的坚守。为了争取回纥等少数民族的支持，朝廷主动与之和亲，将公主下嫁于可汗，而可汗又为其少子求婚，皇帝再也舍不得将亲生骨肉送往大漠绝域，于是将仆固怀恩的女儿嫁了过去。皇帝只是为了搪塞回纥贪得无厌的要求，却没有想到可汗死后，少子继位，仆固怀恩阴差阳错地成了回纥可汗的岳父。既为朝廷重臣，又是藩属国外戚，这一交叉角色成就了仆固怀恩的人生辉煌，也为日后的猜忌埋下了种子。

接下的剧情可谓顺理成章，朝廷与回纥既已结盟，仆固怀恩与两边又有深厚渊源，于公于私、于国于家，他都是蕃汉连兵最理想的统帅。于是，仆固怀恩“领河东、朔方节度行营及镇西、回纥兵马赴陕州，并令诸道节度一时齐进”，他率领回纥精兵、天下劲卒鼓荡而下，如秋风扫落叶般荡平史思明的残余势力，结束了长达7年之久的安史之乱。郭子仪与李光弼为平定叛乱殚精竭虑，但是他们呕心沥血的成果，最后被仆固怀恩轻松摘走了。无论如何，仆固怀恩给出了最致命的一击，为唐朝光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这时的仆固怀恩，或许正春风得意地策马奔腾，将江山胜景尽收眼底，憧憬着凯旋还朝的盛大场景，天子亲临，百官俯首，万民夹道，礼乐齐鸣，等待着他这位扭转乾坤的救世主的回归。然而，命运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而时常会在一个人最得意的时刻出现莫名其妙的转折。等待仆固怀恩的不是胜利的酬劳，而是猜忌的惩罚。

仆固怀恩还军太原，想象中的礼遇不仅没有实现，反而遭到了镇守将军辛云京的拒绝。辛云京的理由恰恰来自仆固怀恩的双重身份，认为回纥可汗是仆固怀恩的女婿，“疑其召戎，闭关不报”。仆固怀恩无奈，只好上表讼冤。恰恰在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刻，朝廷派来的宦官彻底把水搅浑了。宦官骆奉先抵达太原，辛云京即奏言仆固怀恩与回纥可汗之间订有密约，逆状已露，“乃与奉先厚结欢”。而后，骆奉先又到仆固怀恩驻扎的地方，仆固怀恩与其母亲都拼命想在朝廷使者面前表达忠诚，但最终不欢而散。

骆奉先一回朝，即奏其反状。仆固怀恩无以自明，又自以为功不可没，难以忍受辛云京、骆奉先等人的诬陷。他既缺少郭子仪的八面玲珑，也缺少李光弼的老成持重，于是直接上表请求皇帝诛杀辛云京与骆奉先两人。

辛云京颇有战功，骆奉先侍奉在侧，皇帝不可能因仆固怀恩的一面之词就诛戮了事。仆固怀恩上表请求皇帝诛杀二人，结果是没有为

双方留下商谈的余地，也没有给折中方案创造空间，双方只有陷入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之中。仆固怀恩以勇士的刚烈来处理政治矛盾，恰恰忘记了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政治虽然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但它不是快意恩仇的战场，政治讲究的是妥协与对话。

皇帝最后提出了折中方案，“手诏和解之”，并且为了化解仆固怀恩的怒气晋升了他两个儿子的官位。然而，仆固怀恩不仅未能领会皇帝的深意，反而以更加刚烈的方式给皇帝施压，他向皇帝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上书，言语之中充满了对皇帝的指责，导致仆固怀恩与朝廷的决裂。

仆固怀恩说自己“兄弟死于阵敌，子侄没于军前，九族之亲，十不存一，纵有在者，疮痍遍身”，一门之中，女嫁西域，男死沙场，可谓劳苦功高，但他这样直白的表达，与郭子仪的推功纳过相比，显然更多了一份自矜自伐的傲气；他说皇帝如此处置自己，“何异伍子胥存吴，卒浮尸于江上，大夫种霸越，终赐剑于稽山”。当时皇帝还没有做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事情，这样说显然是公开猜忌皇帝，与李光弼的隐而不发相比，显然更多了一份彰君之恶的进攻性。仆固怀恩他最后更是直接指责皇帝，“陛下不思外御，而乃内忌忠良，何以混一车书，而使梯航纳赆？天下至大，岂可暂轻”，训斥皇帝任用奸臣、残害忠良，傲慢无理的语气隐含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懑。

那时朝廷权轻，方镇权重，仆固怀恩言辞悖慢，皇帝犹推心待之，欲其悔过，而且皇帝再次伸出了橄榄枝，“恐其不信，诏召黄门侍郎裴遵庆使汾州喻旨，且察其去就”。裴遵庆即日启程，仆固怀恩一见其面，即“抱其足号泣而诉”，裴遵庆“讽令”仆固怀恩入朝，而仆固怀恩也当面允诺。然而，仆固怀恩的上书已经封闭了妥协大门，正如仆固怀恩的副将范志诚所言：“公以谗言交构，有功高不赏之惧，嫌隙已成，奈何入不测之朝？公不见来瑱、李光弼之事乎！功成而不见容，二臣以走诛。”现在嫌隙已成，入朝之后祸福难测，更何况来瑱、李光

弼早是前车之鉴，仆固怀恩这时又怎可能入朝？没过多久，仆固怀恩便举兵反唐。

就这样，仆固怀恩刚刚为唐朝平定安史之乱，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功臣的尊荣就要加入叛乱的行列之中。杀贼成贼，平乱成乱，仆固怀恩戏剧性的角色转变固然是他自己的性格特点使然，但又何尝不是朝廷的悲剧？

权利义务不对等的忠诚不可持久

从同样的起点出发，为了同样的目的，最终却到达了完全不同的终点。郭子仪在荣华富贵、万人敬仰中颐养天年，李光弼在人生寂寥、孤独愤懑中黯然离开，仆固怀恩则举兵造反，用后半生来彻底否定自己的前半生。命运的分岔点滥觞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当对朝廷的忠诚不能换来相应的回报，一个人该如何对待这份“忠诚”？

而当个人必须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朝廷的道德感召力也将随之降低。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功臣先后遭到谗毁，而像来瑱这样的平乱名将遭到诛杀，结果是“天下方镇皆解体”。唐代宗即位不到两年，吐蕃人就毫无征兆地直接打到长安城郊，皇帝仓皇出逃，下诏勤王，得到的回应只是“诸道卒无至者”。如果忠诚不能换来相应的待遇，那么忠诚也必然会被稀释。正如欧阳修在《新唐书·李光弼传》后面发出的感慨：“功臣去就，可不慎邪？”

郭子仪对权力本质的洞察可谓千古独步、举世无双，真正达到了“上善若水”的至高境界，他以有容乃大的胸襟融化那些常人难以接受的谗言与委屈，以“水之就下”的谦逊来取得皇帝的信任、化解奸臣的猜忌，又以变幻多姿的灵活来适应瞬息万变的政治格局。郭子仪可以拍着胸脯说，他坚守住了始终如一的忠诚，无论是面临暴风骤雨，

还是遭遇暗枪冷箭。郭子仪可以把自己安放在儒家道德秩序的神龛之上，以供后人顶礼膜拜——敬仰他的道德修养，学习他的为人处世，向往他的传奇人生。

然而，郭子仪的天赋与秉性是他特有的优势，并不能荫庇每一个面临同样问题的人，李光弼与仆固怀恩没有他的天赋，所以不能像他那样拥有善始善终的人生。“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变成另一个郭子仪。因此，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解决方案就不是要求个人在付出全部的忠诚之后，还要学会郭子仪的隐忍，而是要防止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陷入尴尬境地，避免一个忠君爱国的人面临“忠君与叛君”的两难选择。

郭子仪、李光弼与仆固怀恩陷入困境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对皇帝的忠诚、对朝廷的付出始终是一种单向的给予，朝廷仅仅要求他们应该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而没有为忠诚的回报确定相应的义务。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也就是说，当臣子付出忠诚，应该换来君主的礼遇，这为君臣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确立了对等的关系。但是在现实的政治运转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臣子付出忠诚属于理所应当，但是皇帝对忠诚的回应，却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于是，君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处于一种不对称的状态。

鱼朝恩、程元振等人确实可恶，但他们只是皇帝的影子，他们的谗言能够发挥作用，恰恰是因为他们说出了皇帝内心的担忧。郭子仪、李光弼与仆固怀恩在战场上出九死、得一生，在血沃残阳、马革裹尸之后，还要面对皇帝的不安与朝廷的猜忌。仆固怀恩以其直爽的性格，说出了三个人面临此情此景的真实心声：这样的皇帝，不值得付出忠诚；这样的朝廷，不值得献上热爱。

在儒家设计的政治秩序中，君臣犹如父子，臣之忠亦犹子之孝，是不言自明的义务。如果臣不尽忠、子不尽孝，都不需要国家机器的惩罚，社会舆论压力就足以让一个人身败名裂。但是在这套制度设计

里面，始终没有对君主履行的义务做出规定，如果君不爱臣、父不爱子，君主不能对臣子的忠诚给予回报，那又该如何是好?

这正是郭子仪、李光弼与仆固怀恩面临的尴尬。郭子仪选择了默认君主的特权，承认君主可以享有权利但无须承担义务，把忠诚的无限责任坚持到底；李光弼则隐约感到一种潜在的不公平，表达出无声的抗议；相比于郭子仪的隐忍退让与李光弼的忍气吞声，仆固怀恩则在君主不能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以叛君的手段迫使皇帝认账。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无数英雄豪杰选择的出路。当忠诚得不到回报，他们往往会以“清君侧”的名义称兵向阙，为自己讨回公道，他们不能让自己背上弑主的骂名，于是以诛杀奸臣的名义来迂回曲折地迫使皇帝在享受臣子的忠诚时承担相应的义务。

三人之中，仆固怀恩的行为最不能见容于儒家的评价体系，但是他以自己的努力使权利与义务能够对等起来，他以行动表明当个人的忠诚不能得到皇帝或朝廷的回应时，当权利与义务关系不对称时，个人可以选择捍卫自己的权利。事实上，当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不对称时，任何关系都难以持久，君臣父子亦如是。从吐蕃入侵而无人勤王就可以看出，当付出忠诚得到的不是礼遇而是猜忌，谁还会再付出忠诚？最可怕的结果或许是再无人为皇室尽忠，“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也就是说，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价值，在个人付出义务的同时，也要充分尊重他应有的权利。只有权利义务对等的忠诚才可能持久，才可能避免郭子仪、李光弼与仆固怀恩等人曾经面临的无奈或尴尬。

郭子仪的晚年可谓穷富极贵，一栋家宅就占了一条街的1/4，房屋与街巷相通，相出入者不知其居，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李光弼晚年滞留军中，与老母亲竟成永诀，临死时悲叹“既为不

孝子，夫复何言”！而仆固怀恩则在讨回公道的过程中，暴疾身亡。三人同经辉煌，却各有归宿，无论如何，在他们之后，再没有人像他们那样热爱大唐了。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三人都是优秀的战略执行者，他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凭借的是清晰的战略蓝图。而那个在幕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家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被主流史学家轻视的“布衣宰相”李泌。李泌从道士下山到匡扶国难，书写下辅翼三代帝王的传奇，而他自己总是在成功时飘然远走，留给这个世俗的世界一个潇洒自如的背影。

第十章



李泌：被儒家掩盖的天才“布衣宰相”

历史中最吸引人的不是众人皆知的桥段，而是那些被时间的灰尘所掩盖的故事和人物。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条昼夜不息的河流，那么溅起的浪花只有转瞬即逝的美丽，河流深处的暗流才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这是历史的复杂之处，也是历史的精彩所在。

有唐一代，豪杰辈出，精英人物灿若星河，唐太宗时期的房玄龄、杜如晦和唐玄宗时期的姚崇、宋璟都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名臣良相。但如果只有这些正面的形象，唐朝的历史就过于单调乏味了。幸好，在这些近乎“脸谱化”的儒家形象之外，唐朝还有一个叫李泌的“布衣宰相”。李泌，出山为相，入山修道，进则天下，退则山林，来也潇潇，去也飘飘，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当人们从时间的尘埃中发现了他的存在，历史才豁然开朗般呈现出一幅从庙堂之高延伸到江湖之远的画卷，表现出引人入胜的立体感与层次感。

自安史之乱以来，李泌是贯穿于肃宗、代宗、德宗三朝的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唐肃宗从长安逃到灵武，刚刚继承皇位就把他儿时的好友李泌招到身边，而李泌不居官职、不着官服，竟以山人的身份辅佐皇帝。唐肃宗与他入则同榻、出则同辇，留下了“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的佳话。他为唐肃宗谋划的战略蓝图，堪比诸葛亮的《隆中

对》，唐肃宗却因为急于求成而未能采用，结果为唐朝中晚期的长期祸患埋下了种子。

唐肃宗克复，遍赏功臣，唯独李泌坚持退隐，自有一种功成名就而身退的飘逸与洒脱。唐代宗继位，复招李泌入朝，但为朝中大臣所忌，李泌再次归隐田园。直到唐德宗一朝，李泌在旋起旋落之后，正式被任命为朝廷宰相，从一介布衣道士一跃而当国柄、执国政，展示出杰出的政治才能。他北和回纥、南连云南、西结大食，在地缘政治上对吐蕃形成包围，从而为国力衰退的唐朝赢得了回旋空间；他揖睦皇室、和谐君臣、澄清吏治、改革税赋、疏通漕运，上至天子家事，下及匹夫忧乐，无不治理得井井有条，为政治混乱的唐朝带来了中兴气象。

然而，李泌的魅力不是在于独步天下的文治武功，而是他取得这些文治武功的方式，他是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以好谈神仙的飘然之姿取得世俗成功。李泌胸中满是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却以修道炼丹为人生归宿，他既想在世俗的世界建成人间天堂，又对道家的超然境界心向往之。于是，他的身上融合着儒家的务实与道家的超脱、入世的雄心与出世的洒脱，在群星闪耀的历史星空兀自璀璨。李泌在历史上已经成为谜一般的存在，通体散发着神秘的光彩，关于他的传说已经演绎成怪诞的神话，在稗官野史的记录中代代相传。

与野史的热闹相比，李泌在官方的历史叙事中却是名声寥寥，他为一个衰落的王朝创造出企稳回升的可能，却只得到轻描淡写的评价："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而在后世的官方历史中，他对"神仙诡诞"的追求一向受到儒家史官的鄙薄，退隐修道被当作装神弄鬼，而在历史上留下的功勋，也因此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为什么一向以"史官精神"为其灵魂的历史叙事，这时会有意忽视李泌的存在?

李泌的寂寥将揭示出，历史真实并不等同于事实真实，所有的历史真实都建立在某种思想体系的基础上，都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儒家的思想体系，断然无法接纳李泌对神仙诡诞的追慕。

少年英才峥嵘早露

李泌在儿时就表现出卓尔不群的才华。年未弱冠，名即大震，那时就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并召之入宫，由此奠定了他与唐朝三代皇帝的渊源。从儿时铸就的起点出发，将延伸出李泌辅翼三代皇帝的传奇佳话。

唐玄宗召童子李泌入宫之时正在与当朝宰相燕国公张说对弈，就请张说来考考这位声名远播的少年奇才，看看他是否名副其实。张说以文学著称于世，出的题目也相当见水平，他请李泌以“方圆动静”作赋，并先为李泌做了一个示范，“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方圆动静”，两两对称，既需要准确解释每个字的含义，又需要展现出方与圆、动与静内在的辩证关系，在阐释义理的基础上，还要求做到语言工整、文辞优美，而这些都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对一个孩子而言，其难度可想而知。张说以棋盘与棋子作为比喻，正好应和了与皇帝对弈的情景，加上深厚的学养支撑，可以说是取象棋局之内、喻意棋局之外，已经是极其高明，这显然给李泌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李泌毫不迟疑，立即答道，“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一言之下，张说立即祝贺皇帝得到“奇童”，而唐玄宗也喜形于色，连连夸赞“是子精神，要大于身”。李泌的回答无论是义理之深、境界之高，还是用字之准、文辞之美，都远出于张说之上。李泌没有以目之所及的具体事物作为依托，而是直接以儒家思想中的“行义”和“用智”作为比喻，既破方圆之意，

兼解儒家之思；而后面的“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则在一动一静之间描摹出动静相宜、进退得当的人生境界。“骋材”是要发挥才能、实现抱负，是为“动”，但是“得意”之后却不能志得意满、骄傲自负，而应该追求无为境界，是为“静”。

一个孩童能有这样深刻的思想、豁达的境界，并能以如此优美的文辞表达胸中所思，此非天才而何？这段传奇佳话也被写进了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正所谓，“泌七岁，能赋棋。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而少年李泌说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恰如自己传奇一生的一个隐喻，他将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几进几退，骋材以辅佐皇帝，得意而退居山林，动静相宜，刚柔相济，终能在险象环生的政治斗争中全身而退。

少年李泌也引起了一代名相张九龄的青睐，“张九龄尤所奖爱，常引至卧内”。那时，张九龄又与大臣严挺之、萧诚私交甚笃。严挺之向以秉性刚直而闻名于世，非常讨厌萧诚的谄媚，于是劝张九龄与萧诚绝交，张九龄却说严挺之锋芒毕露，但是萧诚却“软美可喜”，于是一时兴起，命左右召萧诚前来晤面。没想到，这时李泌恰好倾听在侧，帅尔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软美者乎？”意思是您凭借正道直行而当上宰相，怎么反而喜欢“软美”的人呢？张九龄根本就没想到这位小朋友竟然能开口劝谏，以凛然正气规训当朝宰相，由此感到了一种超越年龄的灵犀相通，不仅“改容谢之”，并且称呼李泌为“小友”，足见心中赞赏怜爱之意。这段佳话表明当时李泌已然壮志在胸，无论他日后怎样追求神仙不死之术，致君于尧舜的世俗梦想已经铭刻在一个少年的心中。

及至年长，入世的志向与出世的旨趣，这两个看似紧张对立的人生走向在李泌身上却能完美地结合。“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

扁舟泛五湖。”李泌写下的这首诗将胸中块垒一吐而出，人生要么“绝粒升天衢”，达到遗世独立、羽化登仙的飘然境界，要么“鸣珂游帝都”，实现运筹帷幄、辅翼帝王的不朽功业。要么在彼岸登极乐之境，要么在此世创盖世之业，人间唯一值得留恋的就是伟大的梦想、彻底的成功。如果没有这些宏大使命，只剩下庸碌无为、饱食终日，那就会索然无味，“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而在宏大使命完成之后，也不必眷恋滚滚红尘，重要的是享受过程，而不在于收割结果，理想的境界是“业就扁舟泛五湖”。进与退、入与出就这样统一于李泌的精神世界，而他将要在三代皇帝的时间跨度里展现这种动静相宜的人生境界。

天宝年间，李泌常游于嵩山、华山、终南山之间，“慕神仙不死术”，后来出山，诣阙献《复明堂九鼎议》，而早已年迈的唐玄宗仍然记得那个天资聪慧的少年，让他在翰林供职，同时供奉东宫。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后来成为唐肃宗的太子李亨与李泌结下了超越君臣的亲密关系，从而开启了李泌与三代君王的旷世奇缘。

凌云纵横的战略想象力

“渔阳鼙鼓动地来”，从大唐疆域东北方向发起的“安史之乱”打破了波澜不惊的政治格局，李泌与太子李亨结下的深情厚谊将在战乱中经受考验，也将在唐朝光复中大放异彩。从这时起，李泌展示出纵横捭阖的战略构想能力。

唐玄宗在潼关失守之后仓皇西逃、一意幸蜀，太子李亨这时与其父分道扬镳，逃到了位居西北的军事重镇灵武，并开始了重整山河、再图兴复的事业。李亨刚刚即位为唐肃宗，就派人秘密到南岳衡山寻找李泌，而李泌也一直心怀“先生不出，如天下苍生何”的使命感，注

定不会在天下大乱之时袖手旁观，于是不待唐肃宗召唤，即自觉奔赴灵武。君臣之间，其相得如此，而默契亦如此。

当此之时，安禄山以范阳为根据地，挥兵西进，已经连克洛阳、长安两京，沿途郡县皆望风而降，兵锋甚盛，势焰更炽。但与此同时，天下勤王之师四下大集，纷纷以尽力于王室、铲平叛乱为己任。郭子仪出兵朔方，李光弼坚守太原，从西北方向对安禄山形成包围之势。从大形势判断，朝廷与安禄山各有优劣，安禄山占据两京，导致唐朝宗庙隳灭、社稷毁弃，这对于意气风发的唐肃宗来说是不可忍受的政治耻辱，也恰恰给安禄山带来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但是从军事形势来看，安禄山悬军深入，从范阳到长安，战线拉得太长，天下勤王之师逐渐对其形成合围之势，朝廷可以说占据了军事上和道义上的优势。这正是李泌风尘仆仆赶到灵武时面对的天下大势，也是他为唐肃宗规划战略构想的初始条件。

接下来，李泌为唐肃宗提出了堪比《隆中对》的战略蓝图，展示出奇崛的想象力、隐忍的政治艺术与高超的战略构想能力：

> 不出二年，无寇矣，陛下无欲速。夫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今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使子仪毋取华，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抚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

李泌为唐肃宗谋划的平反方略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打持久战，不能急于求成，“陛下无欲速”，目的是为了荡平安禄山、史思明的范

阳老巢，从根本上消灭贼寇的有生力量。而基本策略就是先取范阳，再定长安，对长安保持攻而不取的态势，故意保持范阳与长安的畅通，攻而不取，使其“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弊”，然后再发动战略进攻，范阳既定，则长安、洛阳自可不战而得。

李泌的战略构想最具想象力也是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对长安这个帝国的政治象征采用攻而不取的策略，以一座城池为诱饵困守贼寇。这一点既是安禄山始料未及的，也正是唐肃宗难以做到的。在安禄山看来，长安是唐朝的政治象征，唐肃宗怎么可能舍眼前之长安而就千里之范阳？而唐肃宗一旦集中力量攻占长安，那么千里之外的范阳老巢就能得以保全，安禄山就总能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但如果朝廷按照李泌设想不急于攻占长安，那么安禄山的如意算盘就会落空，但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隐忍的政治艺术，毕竟光复京师，始终是皇帝最为迫切的愿望，尤其是对刚刚即位的唐肃宗而言，更需要通过光复京师来确立自己的威信。

于是，等到兵马大集，皇帝果然“欲速得长安”，并对李泌说：“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而李泌也准确预言到了急于求成的危险后果，“必得两京，则贼再强，我再困”。皇帝不听，并以巨大的伤亡代价迅速光复了长安，但是皇帝还没有坐下来品尝胜利的滋味，坐守范阳的史思明就再度起兵造反，再陷河朔，复乱中原，而正是平定史思明的过程奠定了中晚唐的藩镇割据制度，引发了无休无止的兵连祸结。史思明再次凭借范阳老巢而发动叛乱，正是应验了李泌“贼再强，我再困”的预言。如果唐肃宗能够采纳李泌的构想，不急取长安，先覆敌巢穴，又怎么会留下长远的祸患？

三国时期的曹操说过一句非常具有哲理的话，“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纵览天下之事，往往是“慕虚名”就会“处实祸”，唐肃宗急于求取光复两京的虚名，而留下了贼寇卷土重来的祸患。这其实揭示出谋事

创业中常常遇到的两难选择——虚名与实利、局部与整体、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情绪与总体要求，这些都往往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状态。而好的战略家就需要做到让虚名服从于实利，让个人情绪服从于总体要求，这就需要摒弃虚荣、懂得隐忍。就此而言，李泌确实堪称优秀的战略家，他不贪图虚名，不迷恋小利，不囿于一时一地，始终以大局为重，并从长远利益出发制订整体的战略框架，并让短期利益、私人恩怨、个人情绪服从于长远利益。

在唐德宗时期，李泌终于获得了宰相地位，而此时唐朝国力中落，藩镇割据于内，吐蕃侵扰于外，屡致乘舆播迁、天子鼠窜。为了应对吐蕃的威胁，李泌从地缘政治格局出发，为唐朝规划出合纵连横、孤立吐蕃的外交战略——“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在李泌的构想里，结交回纥“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同盟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而“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是大食、天竺与唐朝结盟的基础。在李泌看来，这些国家既有与唐朝合作的需求，也有达成合作的条件：云南最弱，屡受吐蕃奴役，早就想找一棵大树乘凉，唐朝伸出橄榄枝，他们必将求之不得，而大食、天竺都与吐蕃为敌，这三者都是潜在的盟友。唯有回纥最难拉拢，而偏偏唐德宗又与回纥存在私人恩怨，李泌的战略构想再次面临被唐德宗个人情绪瓦解的危险。

而这一次，李泌不再像初次辅佐唐肃宗那样放任自流，他对皇帝强硬施压：“臣备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许臣言！”李泌已经是独任朝政的宰相，代天理物，以天下为己任，断不能因为皇帝的私人恩怨而让国家坐失合纵连横的机会。最终，他以回纥“称臣，为陛下子”的许诺化解了皇帝的积怨，而为唐朝赢得了地缘政治的战略主动。

对外方略既定，李泌开始考虑朝廷的内部安全。藩镇割据已经延续数代之久，朝廷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不是重新集权化，而是如何维持起码的生存。当时，关中屡遭战乱，加上比岁饥馑，朝廷的用度主要依靠江淮漕运。李泌深知，若漕运保持通畅，则朝廷尚可维持，漕运一旦被断，朝廷就会在饥饿中自我解体。而江淮漕运，自淮入汴，以甬桥为咽喉。甬桥地属徐州，毗邻淄青，李泌担心，淄青节度使“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致”！于是，他的另一个大手笔是以内部的战略调整保证延绵千里的漕运始终舳舻相接。李泌将甬桥附近的濠州、泗州隶属徐州，又将庐州、寿春划归淮南，对不听朝廷号令的淄青节度使形成包围态势，则彼即有异图，亦将投鼠忌器，达到“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的目的。

虽然唐肃宗放弃了李泌平叛安史之乱的战略构想，留下了横亘中晚唐的藩镇祸乱，但是在唐德宗时期，李泌又以外交战略为唐朝赢得外部空间，以内部规划为朝廷赢得生存基础，为后期唐宪宗时期的短暂中兴奠定了基础。李泌向人们展示出一个好的战略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他应该始终着眼大势，关注最为重大的议题而不拘泥于细枝末节。除此之外，李泌还知道应谨防一时得失、个人情感等因素异化战略的执行。

进则天下退则山林

李泌虽然以神仙不死术为毕生追求，但是他的处世之道又堪称儒家“内圣外王”的典范。他不仅善于谋国，而且工于谋身，既能以宏大的战略构想谋划国家命运，又能以进退得当的处世艺术明哲保身，进则安天下，退则安此身。

李泌从一开始就知道奔赴灵武如同飞蛾扑火一般，是把自己送往权力斗争的旋涡。他十分清楚施展报国之志的前提是自己能够从残酷

的政治斗争中生存下来，而他作为一介布衣，刚刚才道士下山，就立刻成为唐肃宗形影不离的身边人，也必然会引来其他掌权人物的猜忌。这其中就包括权倾朝野的宦官李辅国和唐肃宗的患难妻子张良娣。唐肃宗与李泌出则联辔，寝则对榻，“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这样的亲密无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但对李泌而言却意味着不可预知的险象环生。

李辅国一路追随唐肃宗到灵武，又最先劝肃宗即位以系人心，可以说是唐肃宗登上皇帝宝座的佐命元勋，因此受到重用，成为肃宗一朝的新贵。而张良娣也是在唐肃宗患难期间不离不弃、给以慰藉，到灵武驻扎后又亲自为战士缝衣，由是受宠，肃宗登基后遂立为皇后，“亲宠无比”。李辅国看到张良娣有宠，自然倾心结交，于是，灵武朝廷肇建，两位新贵就结为攻守同盟，“与李辅国相助，多以私谒桡权”。对来路不正而又忽得宠信的李泌，他们自然会视为潜在竞争者，因此充满猜忌与敌意。

而李泌对此洞若观火，早有防备，他从一开始就以守弱、退避、让步求得自保，避免触及李辅国、张良娣等朝廷权贵的既得利益。唐肃宗对李泌特加宠信，视之为委以心膂的心腹、言听计从的智囊，“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并要正式任命李泌为右相。这时，李泌进退得当的处世之道就开始显现出来，他深知，一朝身居将相，更会引起李辅国、张良娣等人的嫉妒，不如以退为进、守弱为强。于是，李泌坚决请皇帝收回成命，“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说是贵于宰相，实际上是要继续以宾友或幕僚的非正式身份辅佐皇帝。这是要让李辅国、张良娣等人看到，李泌对朝廷名位没有觊觎之心，他们大可对李泌放心。

然而，李泌懂得退让，他的盟友却未必能像他这样韬光养晦。李泌与皇帝亲密无间，与皇帝的两个儿子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也情好日笃。尤其是建宁王李倓，“英毅有才略”，既能看清大势、认识大

局，在皇室西逃时率先建议唐肃宗北趋灵武，与谋兴复，又心系社稷、英明神武，“每接战，常身先，血股袂，不告也”。李倓的优点是锐意进取，而缺点则是太过进取、太过直爽，与李泌的隐忍退让截然相反。面对李辅国、张良娣等人的威胁，李泌选择退避三舍、不与争锋，而李倓却正面迎敌、主动出击，这决定两个人迥然不同的人生命运。

只要对立存在，嫌隙总会在不经意间产生。李泌、李倓与李辅国、张良娣之间因为一个赏赐之物而结下了深仇大恨。太上皇李隆基从远在千里的西蜀，派人给张良娣送来七宝鞍作为赏赐。李泌对皇帝说：“今四海分崩，当以俭约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请撤其珠玉付库吏，以俟有战功者赏之。”朝廷草创，四海兵兴，正是艰难之际，确实不该遽尔奢靡，而应该把七宝鞍输入国库，奖励三军。李泌这番出于公心的劝谏，立刻打动帝心，“遽命撤之”。李泌本已触及张良娣的利益，引起她的不快，而李倓的劝谏则是点燃了她的怒火。李倓突然“泣于廊下，声闻于上”，唐肃宗在震惊之下召而问之，李倓说：“臣比忧祸乱未已，今陛下从谏如流，不日当见陛下迎上皇还长安，是以喜极而悲耳。”李倓放声大哭是将一件小事放大为尽人皆知的公共事件，而又说“今陛下从谏如流”，潜台词是把张良娣置于祸国殃民的位置。对于李泌的柔和劝谏，张良娣如果从朝廷整体利益出发或许还能包容，而李倓的耿直和刚烈，则彻底刺痛了她，“良娣由是恶李泌及倓”。

嫌隙已成，仇恨已生，李泌还是隐忍退让，而李倓已经跃跃欲试。当时，“张良娣与李辅国相表里，皆恶泌”，李倓于是对李泌说，为了报答先生恩德，“请为先生除害”。李泌立刻劝阻说：“此非人子所言，愿王姑置之，勿以为先。”但是李倓不听劝告，竟主动向李辅国、张良娣发起进攻，“数于上前诋讦二人罪恶”，而这两个人则更加懂得诬陷的技巧，他们对皇帝说：“倓恨不得为元帅，谋害广平王。”此时，广平王已经立为太子，诬陷李倓谋害太子，就是诬陷他谋反叛国，唐肃宗在愤怒之下，竟赐李倓死罪。一个英明神武的皇子，一个

扶危济困的功臣就这样断送了美好韶华。如果李倓懂得迂回曲折、以退为进的道理，又怎么会遭此荼毒？果然是“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

李泌最终以隐忍退让幸免于难，建宁王李倓为他而死，但在灵武时期，李泌竟不为李倓说半句公道话，这同样是出于隐忍的考虑，李泌心知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会等到合适的时机为李倓沉冤昭雪。李倓既已冤死，太子李俶也感到日益逼近的威胁，心不自安，决定先发制人，“谋去辅国及良娣”。李泌马上劝谏说：“不可，王不见建宁之祸乎？”李泌告诉李俶，自己在平定京师之后，就会重返山林，“庶免于患”。而李俶担心李泌一旦离去，自己就会更加危险。李泌传授给李俶的处世之道还是以退让求安全，他对李俶说：“王但尽人子之孝，良娣妇人，王委曲顺之，亦何能为！”其要义就在于不要正面冲突，而要委曲顺之。李俶后来果然渡尽劫波、履险为宜，最终当上了皇帝。

李泌也履行自己的诺言，在长安光复之后，他就立刻向唐肃宗提出了辞呈。而唐肃宗自然执意挽留，李泌于是向肃宗表明了他不能留下的5个理由——“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所谓“五不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自己功盖天下而又来路不正，必然会遭到朝中大臣嫉妒，因此进不如退、留不如去、在不如不在。唐肃宗不得已，乃听归衡山，还为隐居的李泌“给三品料”。

李泌就这样潇然隐退，留给人们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他不远千里奔赴行在，又呕心沥血竭忠尽智辅佐皇帝，在攘平叛乱时还要时刻提防明枪暗箭。即便付出了这样的艰辛努力，在获得成功的那一天，李泌也没有因为成功来之不易而产生半点留恋。功成名遂身退，说起来容易，但是要克服心中的贪念，又谈何容易？李泌就能做到来去自如、进退由心，成功之日即是隐退之时。

接下来，李泌的人生就在朝廷与江湖之间来回摇摆，而他也当进则进、宜退则退，就像江上的漂木一样与水沉浮、与时消息。李俶即位为唐代宗之后，立即将李泌从衡山召到朝廷，“自给、舍以上及方镇除拜、军国大事，皆与之议”，还要拜李泌为相，李泌再次恳辞。而李俶坚决要求李泌“食酒肉，有室家，受禄位，为俗人”，李泌泣诉，李俶却说：“卿在九重之中，欲何之？”又不是僻居衡山，何必这么多讲究？而李泌也顺从了皇帝的意志，这再次表明李泌参道的至高境界，所谓“上善若水”，就要像水那样无可无不可，岂能为清规戒律所限？

而李泌的进退得当与潇洒处世，也恰恰来自这种“无可无不可”的自如境界。唐代宗李豫[注]器重李泌引起了当朝宰相元载的嫉妒，于是，李泌再次隐退，被皇帝寄养在江西。后来元载倒台，时隔8年，李泌再次被唐代宗召入宫中，却又遭到新任宰相常衮的嫉妒，被贬为澧州刺史。直到唐德宗即位，李泌才回到朝廷，并由于辅佐三代的威望终于坐稳了宰相的位置。

这样屡进屡退、几去几留，李泌从无怨言，人生来去自由，此心平静如水。进生祸端，何如退求万全？退保此身，何必进受侮辱？由此而言，进即是退，退即是进，不合时机的进，恰恰是退入万丈深渊；而恰到好处的退，则正如一日千里。这其中的辩证法成就了李泌的政治成功，也造就了李泌的潇洒境界。

来去自由源于对人性的深刻把握

其实，李泌能够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并能纵意人生、潇洒自如，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他理解人的本性，洞悉恐惧、愤怒、猜疑等人性弱点，知道人惧怕什么、欲求什么、渴望什么，因此才能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走出飘逸洒脱的人生轨迹。

比如说，李泌非常懂得向皇帝劝谏的时机。建宁王李倓因为他而被冤枉致死，李泌非常清楚，当时李辅国与张良娣互为表里，一手遮天，最重要的是皇帝听信谗言，余怒未解，而愤怒向来都是理性的敌人，对一个愤怒的人直言其过失，只会添柴加薪，让皇帝增加对建宁王的厌恶。所以，李泌绝不会在这时据理力争，而会等到恰当的时机，也就是在功成身退的离别时刻。

李泌判断，唐肃宗这时成功克复长安，实现了重整山河、再造乾坤的伟业，也向全天下证明了他这位新皇帝的功德，精神的愉悦必然达到顶峰，而心情越好，胸怀就越宽广，就越是能听进不同意见，重提建宁王的冤情就可能被皇帝相信。而这时李泌又即将远行，唐肃宗突然失去左膀右臂，空自感慨："朕与先生累年同忧患，今方相同娱乐，奈何遽欲去乎！"唐肃宗满腹离愁别绪，对即将远行的李泌也自然会因为忧愁而生出一份宽容。李泌选择这个时候向皇帝诉说建宁王的冤情，可以说是抓住了皇帝心理宽容的最佳时间。

于是李泌从容对皇帝说，如果建宁王确实有篡夺之心，那么广平王最应该对他心生怨念，但是广平王一直私下为其由冤，"辄流涕呜咽"。一番言语之下，唐肃宗顿时醒悟，从谗言的蒙蔽中苏醒过来，泣下沾襟，说道："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闻之。"至此，圣心回转，李泌也终于能告慰建宁王的在天之灵，而且李泌还不忘在此基础上为太子李俶的平安留下更多圣眷。他知道这时皇帝暗自悔恨，也正是进一步劝谏的绝佳时机，于是李泌对皇帝说，以前武则天育有4子，为了临朝称制而杀死了长子李弘，又立次子李贤，而李贤内不自在，作《黄台瓜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这是在用本朝往事劝谏皇帝，不可再杀子嗣，否则就会瓜毁蔓存。李泌实际上是在为广平王李俶说话，"是时广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潜构流言，故泌言及之"，而皇帝也顿时醒悟，"卿录是辞，朕当书绅"。试想，李泌如果在灵武时就抗言直谏，不仅难以为建宁王沉冤昭雪，反而有可能落得与李倓同样

的下场，更可能置李俶于不测之险。李泌的隐忍不是退缩，而是在蓄积力量，等待恰当的时机。

由于对人性弱点和权力规律的深刻洞察，李泌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充当宫廷关系的调和者，在皇帝父子之间、君臣之间减少猜忌、培养信任。唐肃宗克复长安之后，立刻派使者迎接远在西蜀的父亲回朝，而其旨意是“表请上皇东归，朕当还东宫复修人子之职”，李泌听说之后，立刻说“上皇不来矣”。唐肃宗惊问其故，李泌说，现在应该另写贺表，“言自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及今成功，圣上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之意，则可矣”。果不其然，使者从成都回来，说太上皇接到第一个贺表，忽忽不乐，说：“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而接到第二个贺表“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日”。唐肃宗的第一个贺表为什么让太上皇忧惧，而第二个贺表却让同一个人大喜？李泌为什么对太上皇的情绪把握得如此精准？

答案就在李泌对人性的洞察。第一个贺表的意思是，唐肃宗一俟其父还京就要以皇位相让，把生杀予夺的大权让渡出去，而自己重新回到东宫当闲散的太子；第二个贺表的意思是，唐肃宗自叙灵武劝进、平定长安等功勋，实际上是在向曾经的掌权者宣示自己的合法性，然后请太上皇回来，自己仍然大权在握，太上皇只是闲散养老而已。两个贺表的本质区别就是唐肃宗是否交出皇位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唐肃宗在平定两京的过程中，已经组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执政集团，即便自己同意交出大权，这些追随他功定华夷的朝廷新贵，怎么会对以太上皇为代表的先朝老人俯首帖耳？李隆基自己也清楚，他事实上已经失去了权力，也不可能再夺回，因此接到第一个贺表时不知所为，直到确信皇帝只是请自己回去养老才能安心地回到京师。而这一切心理变化都在李泌的掌控之中。

在唐德宗时期，李泌备位宰相，也是协调皇帝与功臣之间私人关系的关键。当时，唐德宗由于“泾原兵变”而出幸奉天，朝廷大臣朱泚

复乱京师，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奉命勤王，但是在打到咸阳时观望不进，甚至与朱泚暗通款曲、联合叛变。这时，另一位著名将军李晟趁势而起，打败了李怀光，赶走了朱泚，迎接唐德宗凯旋京师。李晟取得了让唐朝起死回生的功绩，功劳不输于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然而，功高震主者不赏，立大功、成大业的功臣宿将与皇帝的关系向来最难处理，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相互猜忌。李晟已经感受到冥冥中的危险，他仅仅因为家里庭院种了茂密竹林，就被人诬告说暗藏兵器、意欲谋反，即便只是假话，但是皇帝出于权力安全的考虑，怎么会置之不理?

李泌看到，唐朝在战乱中走到今天已经是千疮百孔，而君臣和谐正是这个衰落的王朝起死回生的关键。因此，李泌刚刚当上宰相就趁李晟、马燧等功臣觐见时向皇帝说:"愿陛下勿害功臣。"他接着向皇帝列举猜忌功臣的后果，李怀光就是因为受到猜忌才会离心离德，"陛下以李怀光为太尉而怀光愈惧，遂至于叛"，这是皇帝亲自经历的切肤之痛，李泌以前车之鉴说眼前之事，自然增加了说服力，最后的结论是，"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一番劝谏，情理并茂，唐德宗一时感动，而两位功臣也泣下沾襟。李泌志在调和君臣，既然在君臣面前把话说开了，也自然能减少无谓的猜忌，同时，他也会留心堵住任何可能会引发君臣猜忌的漏洞，以此维护着唐朝仅存的活力与生命。

李泌洞悉人性、修道于心。与人相处从不争强好胜，与皇帝对话，从来不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居高临下地批评皇帝，而总是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并且注意照顾对方的情绪和感受，总能在不知不觉间将对方带到心理舒适区，并成功地说服对方。唐德宗与李泌有一段对话，从皇帝的角度全面地展示出李泌深得帝心的智慧:

> 朕言当，卿有喜色；不当，常有忧色。虽时有逆耳之言，如曏来纣及丧邦之类。朕细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则理安，如彼则

危乱，言虽深切而气色和顺，无杨炎之陵傲。朕问难往复，卿辞理不屈，又无好胜之志，直使朕中怀已尽屈服而不能不从，此朕新以私喜于得卿也。

李泌劝谏皇帝，“言虽深切而气色和顺”，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谦和与从容，越是犀利的话语，越要平和地表达，这是“道法自然”的哲理：在一个人自然表达这样的谦和与从容时，从一开始就能消除对方的反感。与此同时，如果皇帝“问难往复”，李泌又能尽心为其解疑释惑，其中的关键是“又无好胜之志”，这又抓住了皇帝的心理要害。皇帝与宰相议事是为了群策群力，而宰相不能因此就得意扬扬，并把与皇帝的讨论看作是辩论，不为求真而一味求胜，皇帝以君主之尊怎么会长期忍受这样的居高临下？而李泌恰恰就能做到讲道理是讲道理，讨论是讨论，这并不是要证明自己比皇帝还高明，也不是要表明自己胜过皇帝，而是为了把事情说清楚。道家的自然平和使他少了一份求胜的虚荣，而多了一份长者的慈祥，这才让唐德宗感慨，“直使朕中怀已尽屈服而不能不从”。

李泌总是能在恰当的时机说恰当的话，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他不与人争胜，却总是能在不知不觉间赢得胜利，正所谓“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历史真实是思想建构的产物

《孙子兵法》有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也就是说，胜利的最高境界是自己不损失一兵一卒，而让敌人自我溃败。李泌的处世之道看似绵软无力，实际上是“无为而无不为”，使对手在得意之际陷入自我瓦解的困局。

唐德宗正式任命李泌为宰相时，考虑到李泌在政坛几起几落，担心李泌一朝大权在握，就会公器私用、公报私仇，于是对李泌说："朕今用卿，欲与卿有约，卿慎勿报仇，有恩者朕当为卿报之。"而李泌的回答则耐人寻味，"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李辅国、元载皆害臣者，今自毙矣"。寥寥数字，道尽了暗流汹涌的斗争，也蕴藏着安身立命的智慧。

李辅国、张良娣在灵武时互为表里，在克复京城后，又开始相互争宠，于是联盟瓦解、反目成仇。张良娣后来被李辅国率禁军杀死，而李辅国在唐代宗即位之后也由于过度膨胀而树敌颇多，在家中被刺客谋杀。元载在赶走李泌之后，更加肆无忌惮、藐视朝纲，公然卖官鬻爵、沆瀣一气，最后被皇帝罢免。面对他们的积极进攻，李泌总是选择隐忍退让，避免正面交锋，这就像太极拳一样，通过柔软的方式将刚强的进攻力量化解于无形。与其说这是退让，不如说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是以退步的方式发出的心理攻势，让对方陷入骄傲自满的眩晕之中，而后在骄傲的顶点陷入自我毁灭。就像一杯浑浊的水，只要静下来等一等，水就能自然将杂质沉淀，何必急躁地摇来晃去？这真如老子的诘问：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李泌重新定义了力量的内涵：有时候，沉静是比进攻更强大的力量。

这正是李泌对道家哲学的理解，这种沉静、平和、追求自然的境界，在李泌进入政坛时就演变成隐忍退让的处世之道，在李泌退居山林时就转化为与时消息的潇洒自如。就像他年轻时写的那首诗那样，"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李泌的人生在朝廷与江湖两个维度之间展开，进则天下，退则山林，而在天衢与帝都之间，一以贯之的则是"道法自然"的不变信仰。

李泌的传奇一生迎合了后世对"布衣宰相"的浪漫猜想，后人在他的故事中又加入道教光怪陆离的想象，使得李泌充满了神秘甚至是魔幻的色彩。《邺侯家传》《邺侯外传》中记载的故事把宫廷政治与道

教文化杂糅起来，更显得神秘莫测。唐肃宗问李泌何时能廓清宇内，李泌回答说：“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而且，据说李泌“辟谷身轻，能行屏风上，每导引，骨节珊然有声”。这些离奇而近乎荒诞的演绎在把李泌抬上神坛的同时，也成功地让李泌在正统的史官那里受到冷遇。于是，李泌的生前身后竟形成了巨大的矛盾与反差，他曾经辅佐三代帝王，奋力阻止大唐的急速坠落，但是在史书中，他又是如此的寂寞孤独。

《旧唐书》对他的记载只有寥寥数段，而且明确写下李泌由于好谈神仙诡道，“故为代所轻，虽诡道求容，不为时君所重”。直到欧阳修等人重新修订唐史时才对李泌的故事有了更为详尽的记载，而且给予了他更高的评价：“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但是史官是如此惜墨，即便是承认李泌的不世功勋，也不忘加一个“近”字，以此暗含对他好谈神仙诡道的轻视。《资治通鉴》记载更多李泌立德立言立功的故事和细节，但是在故事的结尾，还不忘打上这样的封条，“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

然而，就像当代国学家南怀瑾所言：“个性思想爱好仙佛，只是个人的好恶倾向，与经世学术，又有何妨？善用谋略拨乱反正、安邦定国，谋略有什么不好？”潜心修道，好谈神仙这只是生活领域的爱好，为什么非要以此对个人的功德形成偏见和歧视？这正是因为李泌的私人爱好侵犯到儒家思想体系的根本，而受到儒家正统史学的排斥。孔子不是说“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吗？不是还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吗？而李泌所追求的神仙诡道恰恰就是六合之外的怪力乱神，又岂能见容于蘸满儒家思想的史官之笔？

李泌，这个被正统儒家历史叙事遮蔽的天才宰相，揭示出所谓历史真实其实都需要经历某种思想体系的过滤与筛选。书写历史的人会根据他个人的价值观对历史进行剪裁，如果历史中的真实故事不符合

这套价值观，就有可能对事实进行取舍。黑格尔说，一切东西都取决于作者的信念、理念和原则，“当历史学家们试图描述已经逝去的时代精神时，他展示出来的却通常是他自己的精神”。结果，书写者按照自己的想象为后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于是，“历史真实”并不等同于“事实真实”，“历史真实”是价值观建构的产物，是将“事实真实”进行价值加工之后放入历史的殿堂之中，而彼时彼地原封不动的人与事已随时间流逝而飘散如烟。

李泌就在“历史真实”与“事实真实”的夹缝中成为饱受争议的人物，赞赏他的人意欲把他捧上神坛，“勋参郭令才原大，迹似留侯术更淳”，堪比郭子仪、张良的贡献；贬损他的人则断言历史上关于李泌的传奇故事大多数是捏造出来的，李泌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物，历史上的功勋与他好谈神仙诡道一样荒诞不经。褒贬不一而又决然对立使李泌的真实形象难以还原。然而，与其说争论的是事实本身，还不如说是不同的价值观在李泌身上的折射。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识事实的方式和视角。

然而，无论如何，李泌辅佐三代帝王，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都是著在典籍有迹可考的记载。这些并不会因为他个人爱好而一文不值，也不是儒家史官一句“为世所轻”就能抵消。历史越受到意识形态的筛选与过滤，就越需要后人能够摒弃有色眼镜，穿越“历史真实”去尽量触摸“事实真实”。

唐德宗看到山河破碎曾空自感慨“此盖天命”，而李泌却说：“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在他看来，皇帝和宰相当一国之重，不应该被命运玩弄，而应该创造命运。这与道家的“无为”相反，而与儒家“知天命而用之”的进取精神类似。说到底，李泌不像儒家史官所记载的那样，他或许是儒道完美结合的典范。

李泌思必周详、虑则长远，他生前并没有急于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朝廷虽然平定安史之乱，但是那些在战争中崛起的将领，开始占地为王、自成体系，消灭一个安禄山却成就了无数个安禄山。藩镇割据造成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而李泌采取与藩镇和平共处的姑息政策并着手恢复唐朝初年的府兵制，以从根本上增强朝廷的军事实力。这样的休养生息增强国力，等到唐宪宗继承皇位，朝廷将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削藩，以裴度为代表的士大夫将履行修齐治平的责任。只是当所有的努力都已付出，人们才恍然大悟：藩镇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养寇自重”的逻辑。

---

1. 唐代宗李豫，即广平王李俶，后来改名为李豫。——编者注

第十一章



裴度：
“养寇自重”导致削藩失败

中后期的唐朝像是一个罹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与藩镇的拉锯式斗争中延续着微弱的生命之光。盛世繁华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回忆，而生存下来却像是不期然而然的侥幸。这个虚弱的“巨人”已经耗尽了所有的体力在幽暗的时空走廊里踽踽独行、步履蹒跚。

裴度作为一代名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崛起的，他因为力主削藩而被唐宪宗提拔为宰相，又以他的刚烈、坚忍与韬略维护着朝廷摇摇欲坠的威信。裴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理想类型”，上马打仗、下马治国，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即便付出一腔热血得到的只是猜忌与排挤，也时刻准备着为朝廷抛头颅、洒热血。然而，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却难以熄灭藩镇的嚣张气焰。

裴度的追求与中晚唐历代皇帝的梦想异曲同工，他们继承的是支离破碎的山河、七零八落的国家机器，他们的使命是把这些碎片再次拼接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使天子号令达于四方，让国家权力直接落实到每一寸国土，而不是在大一统的名义之下，还存在着自成体系的独立王国。

唐德宗和唐宪宗都曾掀起大规模的削藩运动，试图改变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实现权归天子、政出朝廷。他们进行全国动员，整合全

国资源，竭中华之物力，平不臣之藩镇，却总是在胜券在握的期待中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最后以戏剧性的失败而告终。唐德宗在削藩最为热火朝天的时候，遭遇祸起萧墙、变生肘腋，横生枝节的泾原兵变，吞噬了他最后一丝的削藩激情；唐宪宗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各个击破，一度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直到最后功败垂成，河朔藩镇得而复失、归而复叛。

他们注定无法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梦想，只是用一生的努力铸就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疑问：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打败一个藩镇？各路诸侯为什么不能战胜一个诸侯？一个代表天下百姓、掌握全国资源的合法政府，为什么不能打败一个跨州连郡、固守一隅的地方武装？

晚年的裴度就像一个救火队长一样，在“按下葫芦起了瓢”的藩镇叛乱中疲于奔命。与郭子仪一样，裴度也以一己之力维系着一个王朝的存在，取得了“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的成绩。但他仅仅只是一张薄纸，根本无法镇压惊涛骇浪，维持现状既已不易，更遑论削平群雄、再现皇室雄风。裴度曾让最为骄横的藩镇胆战心惊，但是他无法改变时代的潮流。裴度直到生命结束之时，仍然不能理解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轻易战胜一个藩镇？

平定淮西叛乱是裴度的成名之战，最后也以朝廷的胜利而画上句号。但是举全国之力，用时4年之久，才在裴度亲临指挥后出现转机，这样的胜利实在来之不易。这场战役几乎包含了朝廷削藩的所有因素，通过分析这场经典的削藩战役，可以看到“养寇自重”如何导致朝廷的削藩失败。

朝廷与藩镇的力量对比

设置淮西节度使本是为了防止安禄山南下，但是杀一安禄山而适成一安禄山，乱贼虽灭，藩镇坐大，尝到权力滋味的淮西节度使逐渐不听朝廷号令。吴元济接任淮西节度使时，更是飞扬跋扈、傲慢无礼。唐宪宗意气风发，以削平四海为志，而淮西又襟江带湖，是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唐宪宗首当其冲拿淮西祭旗，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当时，宰相李吉甫撰写《元和国计簿》，记录下当时的“中央—地方”的力量对比：

> 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馀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

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首先，朝廷依然是最为强大的政治力量，藩镇所辖州县总数虽然超过朝廷，但是平均每个藩镇下辖不足两个州，从实力上来说，对中央权威只能消极抵抗，还不能积极进攻，而朝廷对每一个藩镇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其次，朝廷的财政收入急剧萎缩，而军事支出水涨船高，朝廷的震慑力不再是天威难犯，而面临着江河日下的困境；最后，藩镇之多，地势之杂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朝廷哪怕只是各个击破，也会引起其他藩镇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担忧，从而引发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危机。这张清晰的政治地图作为初始约束条件决定了朝廷削藩的策略选择：只能一次对付一个或两个藩镇，然后再逐一击破。而作为博弈的另一方，藩镇之间也会采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一致行动，避免被朝廷各个击破。

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敢于向朝廷叫板，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束身就擒。他把当地军民锻造成小而精、少而强的共同体，就像一颗无孔不入的子弹，虽然小，但足以穿透大而无当、平均受力的钢板。吴元济首先对内实行“法西斯式”的极权统治，把权力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通过极权隔绝了百姓之间的互相交往，把百姓变成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子化个体，从而确保民间力量无法组织起来与之对抗。

对内实行极权统治，对外实行信息封锁，吴元济的伯父吴少诚在篡夺节度使位置之后，就伪造朝廷的文书向将士传递虚假的朝廷密旨，“收蔡州日，乞一将士妻女以为婢妾”。朝廷一旦攻破淮西就会把各位将士的妻女掳去做奴婢，这自然能激怒众人，断绝将士对朝廷的归化之心。而吴氏叔侄也终于达到他们的目的，成功把朝廷说成是三军将士的假想敌，是以“蔡人有老死不闻天子恩宥者，故坚为贼用”。正所谓“哀兵必胜”，用愤怒武装起来的军队，自然具有难以想象的战斗力。

朝廷与淮西的对决也引起邻近诸侯的警觉，与淮西接壤的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害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于是在朝廷用兵以来，就在外围百般阻挠、暗中较劲。

虽然朝廷占据军力、物力、财力的优势，淮西军队的内聚力却更强，并且淮西的周边藩镇也从外围参与到战争中。至此，一场朝廷致力削藩而藩镇合纵连横的大戏，终于拉开了帷幕。

政治刺杀将裴度送上宰相宝座

元和九年，也就是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他的儿子吴元济秘不发丧，意欲不待朝命、父死子继。淮西内部更新换代之

际，人心浮动、群情汹汹，正是朝廷用兵的绝佳时机。朝廷听从了大臣张弘靖的建议，“先遣使吊赠，待其有不顺之迹，然后加兵”，这就能为朝廷赢得道义上的主动。吴元济不仅不迎敕使，反而发兵四出，屠掠邻境，又清除异己，杀死了所有支持入朝的幕僚。至此，矛盾已经公开爆发，朝廷也可谓仁至义尽。于是唐宪宗下诏，“以大臣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招讨吴元济”，迅速对淮西形成合围之势。

大军压境，旌旗蔽野，“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然而，吴元济还未心惊，王承宗和李师道就已胆寒。他们担心朝廷一旦收拾完淮西，腾出手来，枪口一转，自己就是下一个被蚕食的对象。于是，在淮西兵凶战危时，外围的政治博弈也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王承宗与李师道先是通过正规渠道表达诉求，“数上表请赦元济”。皇帝既然兴师动众，岂能因区区上书而回心转意？受挫之后，王承宗与李师道就开始耍阴谋诡计，以非正规方式进行博弈，表面上顺从朝廷，背地里却破坏阻挠。当时朝廷征发诸道兵马并没有涵盖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却罕见地主动请缨，派大将率2 000人奔赴寿春，声言助力官军，实则暗中援助吴元济。

这些小打小闹只能形成局部破坏，并不能改变朝廷的削藩大局。既不敢公开与朝廷兵戎相见，又不愿意实质上裹挟到淮西的战事中，有什么轻松便捷的手段可以达到让朝廷罢兵的目的呢？王承宗与李师道不谋而合地想到一个最为直接的方式——政治暗杀。李师道的谋士非常直白地说：“天子所以锐意诛蔡者，元衡赞之也，请密往刺之。元衡死，则他相不敢主其谋，争劝天子罢兵矣。”也就是说，皇帝现在执意削藩，是因为宰相武元衡的力挺，于是最为便捷的方式就是，暗杀主战的宰相武元衡，用死亡的威胁让朝廷大臣不敢再言战事。

接下来，淮西鏖战正酣，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大唐帝国的心脏地带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暗杀事件。那一天，东方初晓，天色未

明，宰相武元衡起早入朝，没想到刚刚从府邸出来，就遭到刺客暗杀，“贼执元衡马行十馀步而杀之，取其颅骨而去”。当时，裴度虽然尚未跻身宰辅，但由于强烈主张武力削藩，是个不折不扣、坚定不移的“鹰派”，因此也遭到暗杀。但裴度比武元衡多了一份幸运，仅仅因为他的帽子更厚，贼伤其首而得不死。完成刺杀任务之后，这些刺客竟给朝廷的官兵留下警告，“毋急捕我，我先杀汝”。刺客的猖狂，藩镇的嚣张，及他们对朝纲的蔑视竟到了这种程度。

事件甫一传开，就立刻引发舆论震荡，“朝士未晓不敢出门”，皇帝更是怒不可遏。在帝国的心脏，天子的脚下，如果连代天理物、总揆百司的宰相都不能保证人身安全，那么朝廷还能保护谁？而武元衡和裴度的政治态度再明显不过，都极力主张武力削藩，因此暗杀二人的意图也昭然若揭：支持武力削藩，虽位居宰相，亦必遭到阴诛显戮。王承宗与李师道正是想借此震慑文武百官，让言兵者噤声，让主和者胜出，从而改变主战派与主和派在朝廷议程设置中的力量对比。

这对于皇帝和裴度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皇帝心知兵兴不解，藩镇自然会奋力反抗，暗杀只是一种方式，以后还会遭到更多反抗。如果因为藩镇的威胁就遽然罢兵，那就是向藩镇示弱，变相地让藩镇阴谋得逞，让它们更加肆无忌惮，朝廷的权威将进一步瓦解。而裴度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惊魂瞬间，身心遭到沉重打击。他似乎只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与主张，与世沉浮、随波逐流才能避免人身危险，但那样就是置朝廷命运于不顾，视天下苍生为无物。皇帝与裴度何去何从，这考验着他们的胆魄与见识，也关系到朝廷的命运和走向。

就在人心浮动的时刻，政治刺杀带来的恐惧开始攻占很多人的心理。他们建议罢免裴度以安抚藩镇，也有人发出了悲情的警告：“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者，此朝廷之辱也！”共识撕裂，信心不再，就在此时此刻，皇帝和裴度展现出了政治家应有的胆魄、勇气与担当。唐宪宗斩钉截铁地说：“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

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而裴度在卧养许久之后，“慨然以天下而己任”，向皇帝直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籓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淮西之战不仅事关淮西一地，而且是天下藩镇的风向标，胜则藩镇瓦解，败则朝廷失威。

裴度的这段话既透露出他不计生死、以身报国的勇气，也对天下政治形势进行了深刻分析，这就像裴度性格的两个维度——胆魄与谋略兼具，坚忍与智慧并在。王承宗与李师道做梦都没有想到，恐惧并没有粉碎朝廷的削藩决心，而是让这种决心更加坚定。这也揭示出潜藏于人性中的奥秘：恐惧让弱者更加懦弱，却让强者更加坚强；基于恐惧的威胁，可以弯曲弱者的膝盖，却能激发强者的勇气。

没多久，朝廷就迅速查出元恶真凶，王承宗和李师道与朝廷早已貌合神离，所以公开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朝廷讨伐淮西却经年无功，唐宪宗又发动对王承宗的战争，朝廷左右开弓、腹背受敌，若再迁延，势难持久。而在淮西战场，看上去占有绝对优势的朝廷，为什么会遭遇接连失败?

官军统帅危国邀功、养寇自重

朝堂的政治斗争暗流涌动，而淮西战场的战事更是剧情诡异。战争开始不久，裴度就以朝廷使者的身份奔赴淮西、宣谕诸军。回京后，皇帝问诸将之才，裴度说：“臣观李光颜见义能勇，终有所成。”李光颜确实心系朝廷、志存高远，但是像他那样甘愿为朝廷出力死战的将军实在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然而李光颜一个人的战绩并不能掩盖整体战局的惨淡。

“自征兵讨贼，凡十余镇之师，环于申、蔡，未立战功。”各路大军对淮西形成合围之势，自是经年而未得尺寸之地、未立微末之功。按照力量的对比、人数的悬殊、财力的差距，朝廷应该长驱直入、所向披靡，即便互有胜负，也不至于狼狈如此。那么，在反常的表象背后究竟潜藏着怎样的吊诡逻辑?

其实，对于官军来说，打败淮西地方武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亦不愿也。说得再直白一点儿，这些奉命戡乱的官军将领没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地打仗，他们不再是只懂得机械地执行皇帝诏令的战争机器，不再把效力皇室作为自己的信仰，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具有自主利益诉求的独立主体，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朝廷利在速战速决，而他们的利益则在拖延战时，这样既能获得朝廷重视，也能坐享朝廷军饷。

朝廷最早派去节制诸军的元帅严绶，到军之日，不以军旅野战为务，而是致力于市恩保位。对上，“厚赂宦官以结声援”；对下，“倾府库，赉士卒，累年之积，一朝而尽”。主帅无心求战，将领自然怠于战事，于是，“拥八州之众万馀人屯境上，闭壁经年，无尺寸功”。而诸将更是挖空心思，通过谎报战绩来骗取国家的赏赐，“时诸将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败则匿之”，报喜不报忧，报喜更翻倍，用以取悦朝廷。自主帅到士兵都是把战争作为谋利的工具，而不是把胜利当作目标。与其说是为朝廷平乱，不如说是为自己牟利；与其说是为国靖难，不如说是发国难财。以此临敌，非败而何?

但是，“威名折于外，财用穷于内”，皇帝对淮西战事的忍耐力一再受到挑战。直到唐、随、邓节度使高霞寓大败，仅以身免，淮西战事的真实面目终于难以隐瞒，大白天下，引发朝廷骇愕。唐宪宗愤怒于军久无功，决定更换主帅，即日命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

朝廷本来想通过更换主帅来振奋士气，但是韩弘比严绶更甚。严绶仅是消极怠工，韩弘则直接以主帅的身份积极阻挠战事，比严绶的危害更大。“弘乐于自擅，欲倚贼以自重，不愿淮西速平”，韩弘对自己的利益诉求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要做的不是速平淮西，而是“倚贼自重”。换句话说，他表面上替朝廷勘定叛乱，实际上与叛乱的藩镇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利益同盟。道理很简单，贼在一日，则战缓一日，韩弘就能多享受一天朝廷的军饷，掏空国库、殷实自家；相反，贼灭宠衰，寇尽兵收，贼寇荡平则无复朝廷馈饷矣。于是，“弘虽居统帅，常不欲诸军立功，阴为逗挠之计。每闻献捷，辄数日不怡，其危国邀功如是”。哪里有统帅听说打了胜仗反而会不高兴的呢?

韩弘知道李光颜在诸将中最不惜力，为了不让李光颜这么拼命杀敌，他还专门从汴州城找到一位倾国倾城的绝世美女，“教之歌舞丝竹，饰以珠玉金翠”，然后派人献给李光颜，意欲以美色来分散李光颜的精力。其危国邀功竟至于此！韩弘设下的美人计也确实给李光颜带来了一个两难选择：受之，则是贪恋美色，给将士树立负面导向；不受，又是辜负上级美意。李光颜骁勇善战、勇冠三军，但并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鲁莽大汉，他心思缜密、智虑周详，完全清楚韩弘送出糖衣炮弹的真实意图，于是精心设计了一个拒绝美姬但又不得罪韩弘的做法。

使者到来当天，李光颜“大飨将士”，美姬容色绝世，一座尽惊。李光颜先对使者说：“相公愍光颜羁旅，赐以美妓，荷德诚深。”欲抑而先扬，欲拒而先谢，以对韩弘的感谢来化解韩弘的猜忌，然后李光颜对众人慷慨陈词：“然战士数万，皆弃家远来，冒犯白刃，光颜何忍独以声色自娱悦乎！”言出涕流，将士感怀，座者皆泣。在这样的氛围下，美姬又如何能留下来?于是李光颜顺势以厚礼赠送使者，并正气凛然地说道：“为光颜多谢相公，光颜以身许国，誓不与逆贼同戴日月，死无贰矣！”

李光颜以与将士同甘共苦的大义，不仅有理有节地拒绝了韩弘的糖衣炮弹，而且成功地借此感动将士、振奋士气，把一个棘手的两难选择处理得滴水不漏，可谓有胆有识、智勇双全。尽管如此，淮西战场只有一个李光颜，却有无数人在韩弘身后亦步亦趋。当军队的统帅绞尽脑汁地破坏其战斗力，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打胜仗？当战争的指挥者千方百计地阻挠战争胜利，这样的战争又怎能不输得血本无归？这又是多么吊诡的悖论：军队的统帅反而破坏军队，战争的指挥者反而拒绝胜利。

韩弘统领军队的结果可想而知，王师败绩、无尺寸功。而在朝廷讨伐王承宗的战场，各路军队相互顾望，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六镇讨王承宗者兵十馀万，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运，期约难一，由是历二年无功”，凄凉的战况与淮西的战况惊人地相似。而幽州节度使刘总，“引兵出境才五里，留屯不进，月给度支钱十五万缗”，尚未出兵，先享馈饷，可以说是以平乱的名义大发国家的战争财，这又与韩弘等人的心思不谋而合。

朝廷占尽天时地利，却未得人和，大多数受命戡乱的军事将领都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不会为天下公利而舍身赴难，只会为个人私利而绞尽脑汁，并不断通过公利套取私利。那么，煌煌中华，素称“郁郁乎文、泱泱者大”，真的只能坐视地方诸侯飞扬跋扈、践踏朝纲而无计可施？

裴度慷慨悲歌舍身赴难

当此之时，“诸军讨淮西，四年不克，馈运疲弊，民至有以驴耕者”，不仅国库为之虚耗、民生为之凋敝，朝廷也陷入空前的信任危机。如果兵连四载而淮西不克，那么朝廷就会失去对藩镇的震慑力，

还有谁会听从朝廷号令？在这样的艰难时刻，要么任其沉沦，要么有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而裴度，就是那个临危受命的“巨人”。

每当战争陷入低潮，主和派的声音就会占据主流。这时，连李逢吉都竞相上言，“师老财竭，意欲罢兵”，而裴度独无言。皇帝询问时，他才把决意远征的想法和盘托出，“臣请自往督战”。皇帝犹不信之，又试探性地问：“卿真能为朕行乎？”裴度斩钉截铁地回答：“臣誓不与此贼俱生！”

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最能检验一个人的信念与意志，而行进在绝望的低谷，也最能激发一个人的斗志与力量。裴度决意出发，在凛冽的寒冬励志要为宗庙社稷走出一个希望的春天。他既有胆魄也有见识，既然决意前往，也自然有对形势的敏锐洞察。他向皇帝分析说：“臣比观吴元济表，势实窘蹙，但诸将心不壹，不并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矣。”在他看来，失败并不是因为敌人多么强大，而是官军互不统属、用力不专，而他正是那个可以统一思想、凝聚军心的人物。

裴度出征之时，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他对皇帝许下了“主忧臣辱，义在必死”的誓言，此行有死而已、无复他虑。而后，裴度说出了一句千年之后同样能给人力量与感动的话，“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这里面有士大夫坚守价值的气节，有烈士慷慨赴难的豪迈，有勇士视死如归的气魄，与文字本身的对称性结合起来，自有一股不可侵犯、难夺其志的凛然之气。裴度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像鲁迅先生所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裴度赴镇，气象为之一新，士气为之一振，战局为之一变。这并不仅仅因为他的人格魅力，更是因为他以宰相之尊莅临行营，自然拥

有凌驾于各路诸侯之上的权威性，从而能够将松散的军队更好地凝聚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避免互不统属、相互顾望。更重要的是，裴度的到来彻底改变戡乱军队的利益指向。他不像严绶、韩弘等人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养寇自重、危国邀功，裴度不远千里而来，就是为了胜利。于是三军上下，危国邀功的思想受到打压，奋力杀敌的劲头占据主流，像李光颜这样的将领再也不用担心流血流汗之后还要流下委屈的泪水。

统帅是一支军队的灵魂，韩弘等人足以毁灭一支军队，而裴度则能成就一支军队。仿佛就在一瞬间，一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的军队变得训练有素、英勇无畏，仅仅因为同样的肉身被赋予了不同的灵魂。军队之前被当作发国难财的工具，现在则被赋予保卫朝廷的光荣使命。

于是，4年的迁延不战在这一刻变成斩关夺隘的胜利进军。名将之后李愬带领军队雪夜奇袭蔡州，直捣黄龙，军队连夜驻扎到吴元济的家门口，有人报告吴元济说："官军至矣！"吴元济还在睡觉，笑着说："俘囚为盗耳！"后来李愬军号响起，吴元济才如梦方醒。雪夜奇袭蔡州充满了奇崛的想象力与冒险精神，是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而在战场的另一边，李光颜如入无人之境，降服了一万多名淮西将士。至此，一境皆平，敌军俱降。经过4年多的鏖战，耗费无数人力物力，终于迎来早该收入囊中的胜利。

淮西既平，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谓一子落而全盘活。王承宗、李师道相继割地纳款、归附朝廷。后来朝廷轻松收缴李师道，王承宗"奉法逾谨"，而曾为官军统帅的韩弘，也不敢存有贰心，亲自入朝觐见，向皇帝起身拜舞、山呼万岁。

胜利的滋味是如此甘甜，但是它的酿造过程却如此艰难曲折。一个藩镇都需要耗费如此多的国力和时间，天下反叛藩镇还有那么多，

朝廷又如何一一诛之？然而，一城一地的胜利只是一种回光返照，却难以改变唐朝衰落的趋势。

养寇自重的深层逻辑

平定淮西是一个短暂辉煌的起点，唐宪宗以这次的胜利为跳板，通过恩威并施，让自安史之乱以来就不听朝命的河朔藩镇倾心归附，天下再次呈现出表面上的四海一统。然而，胜利的根基并不牢固，唐宪宗驾崩未久，河朔藩镇就得而复失、治而复乱。朝廷只好再度征讨，却又陷入淮西战役的困境，“虽李光颜、乌重胤等称为名将，以十数万兵击贼，无尺寸之功”。

而那个曾经充当救世主的裴度，在平定淮西之后就因为执性不回、极言劝谏而失去宠信，终于被罢黜宰相、解除兵权。他空怀一颗报国之心，却只能眼看河朔复乱而扼腕长叹，直到朝廷无力讨贼才再度请他出山。但一人之力难以对抗一种趋势，正所谓“势既横流，无能复振”。朝廷对藩镇已失去战略上的进攻优势，只能勉强维持与藩镇和平共处的局面。

接下来的时光，天下稍有太平，裴度即因“素称坚正，事上不回”而被奸邪所排斥；藩镇兵戈一起，裴度即“受册司徒”而复典军权。内为群小所排，外有藩镇之逼，裴度一生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但是他也只是无边黑暗中的一团火光，不能照亮这个朝廷，反而衬托出时代的暗淡。

最后直到撒手人寰，裴度也没有改变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心系天下的情怀，临终上表，“言不及家事”。但他还是带着问题含恨而终，他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朝廷削藩会遭遇屡屡失败的困境。

按照裴度给唐宪宗的分析，官军失利的原因是“诸将不一”。也就是说，官军并不是一个有机整体，而是由各个藩镇组成的松散联合，既然互不统属，也就难以协调合作，战斗力自然会大打折扣；而且各路诸侯无不心怀鬼胎，都希望别人上阵杀敌而自己保存实力，遗人以累卵之危，而自己坐享泰山之安。因为存在这种想法，跨马临阵自然会相互顾望，谁都不愿意身先士卒。

中晚唐时期实行的监军制度，更加剧了军队的离心力。“时诸道兵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主将，战胜则先使献捷，偶衄则凌挫百端。”裴度确实慧眼如炬，看到了这一弊端，并以宰相之尊把各路诸侯的松散联盟凝聚为一个有机整体，“军法严肃，号令画一，以是出战皆捷”。然而，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裴度愿意整合这支军队，而像严绶、韩弘等统帅会坐视不管，甚至会主动破坏军队的战斗力与凝聚力。

因此，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整合军队这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利益问题。裴度是当朝宰相，自然以朝廷的整体利益为旨归，但是严绶、韩弘等人都是封疆大吏，尤其是韩弘，自己本身就是称霸一方的节度使，他们不会把朝廷的整体利益当作自己的追求，而具有独立自主的利益诉求。朝廷的整体利益是要尽快平定叛乱，而他们的利益诉求则是养寇自重、危国邀功，通过战争不断套现国家的财政支出，从而达到发战争财的目的。

也就是说，当朝廷失去自己的军队，只能通过藩镇来镇压藩镇时，在朝廷、平乱藩镇与叛乱藩镇三者之间就会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平乱藩镇表面上归附朝廷，但是真正到了兵戎相见的时刻，行为方式往往会在私利的牵引下出现变异。平乱藩镇一旦知道可以通过养寇自重来套取国家财政，就极有可能与叛乱藩镇暗通款曲，形成共生共荣的利益同盟，把战争当作双簧游戏，结果战事一再拖延，国库逐渐耗尽，而藩镇日益坐大，弊病日益加深。

“养寇自重”的逻辑就像癌细胞一样，朝廷每一次削藩都会进一步引起癌细胞的扩散。在唐宪宗之前，唐德宗也曾掀起大规模的削藩运动，朱滔作为当时削藩主将已经接近攻克河北藩镇，却在最后的时刻临阵倒戈，与河北藩镇同流合污。在朝廷、平乱藩镇与叛乱藩镇三者之间，平乱藩镇是一个连接敌对双方的关键角色，它既会以平乱的名义向朝廷索需无度，也会在需求得不到满足时转变为叛乱藩镇。削藩失败，不是因为朝廷力量不足，而是因为“养寇自重”的逻辑掏空了朝廷的力量。而揆诸根源，朝廷成功平定安史之乱之所以会产生藩镇的残留，也正是因为当时平定叛乱的仆固怀恩担心“贼平宠衰”，而故意让史思明的降将继续掌握兵权，以便“自为党援”。从这里，才能理解王夫之的感慨多么沉重——“安禄山不足以亡唐，亡安禄山者亡唐也”！

“养寇自重”拖垮的不仅是唐朝，甚至在每个朝代的解体过程中，都隐约闪现着它的魅影。直到近代，国民党虽然名义上完成国家的统一，但是内部仍然军阀林立、派系众多。在国民党动用地方军阀来剿灭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时，完整地再现晚唐削藩的局面。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剿灭红军，实现地方武装与红军两败俱伤的结果，但是地方武装就像晚唐时期的平乱藩镇一样，它不会为国民党的整体利益而伤及自身实力，反而会通过与红军的周旋来套取国民党的钱财支持。毛泽东正是从历史中看到了现实的根由，于是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敏锐地指出：“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这就为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客观依据。”这里面，“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中的“分裂”，实际上指的就是地方武装与国民党的整体利益不一致，地方武装不会为了国民党的整体利益真正与红军开战，而只会以战争为借口，一直坐享财政支持。

裴度当然不会知道，困扰他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历朝历代的英雄豪杰。晚年的裴度常常诗书遣怀，向往手抚素琴、目送归鸿的境界。他在东都洛阳的豪宅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引甘水贯其中，釃引脉分，映带左右”。而闲暇时，裴度常“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既然不能消灭外部的寇仇，那就不如去除内在的喧嚣，回归内心的安宁，裴度一生操劳，到晚年终得内心的大自在。

裴度一生辗转、戎马倥偬，是各路诸侯闻之丧胆的存在。但是他的努力还只是针对朝廷外部的敌人，而在此时，朝廷内部的祸患如毒瘤一般迅猛扩散，这就是伴随唐朝直到寿终正寝的宦官专权。宦官，将开始向这个造成他们身心残缺的社会发起复仇。

第十二章



宦官群体：权力向皇帝的身边人集中

宦官群体的存在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阴暗角落，是一个不堪回首而又无法回避的悲惨故事，是在历史的锦袍掩盖下的一块暗疮。他们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存在，而是具有不可弥补的生理缺陷。宦官——他们的共同名字，就像一种不断重现的羞辱，横亘在历史不断变更的剧目之间。

从人本价值出发，宦官的存在值得同情，但这样一群存在生理缺陷的人们，居然能在崇尚斯文的政治体系中占据高位，“伤贤害能，召乱致祸，卖官鬻狱，沮败王师，蠹害烝民”，甚至将皇帝的废立大权掌握在手，将一个王朝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千百年来，论及宦官专权，不知多少仁人志士扼腕叹息、义愤填膺。

宦官群体总是在王朝兴盛时销声匿迹，在衰落时悄然崛起，在王朝灭亡后被赶尽杀绝，他们的命运就像是一个朝代运势的反面标志，他们何时站到台前，王朝的命运就从那时开始衰落。尤为可叹者，大唐，一个曾把豪迈与大气写进历史记忆的王朝，一个给后人留下无尽想象空间的帝国，却没有逃过宦官群体的糟蹋与折磨。

唐朝之前，宦官干政的惨痛教训就已充斥典籍，赵高、阎乐擅权，秦朝二世而亡；张让、段珪干政，“遂倾刘祚”。在立国之初，唐

太宗李世民鉴于前世之弊，从制度设计上抑制宦官，规定宦官品级不能超过四品。但是，在一个皇帝可以凌驾于制度之上的环境中，制度向来都缺少连续性与一贯性。唐玄宗李隆基“始隳旧章”，一改前规，对宦官言听计从、“是崇是长”。杨思勖典兵在外，高力士侍奉在侧，尤其是高力士，居然可以代替皇帝“省决章奏，乃至进退将相”，权力拟于人君、地位堪比宰相。宦官之势，从那时起便一发不可收拾。

于是，两条清晰的脉络开始贯穿唐朝历史，宦官不断崛起，而国运日益衰微。唐肃宗、唐代宗平定安史之乱，宦官李辅国居中用事，鱼朝恩、程元振先后擅权，可以说唐朝中期，是宦官崛起并稳固地位的时期。唐德宗志平藩镇，却在失败之后心灰意冷，索性把掌控禁军的大权交给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人。从此，“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宦官也最终拥有了可以挟制人君、宰执天下的权力。在唐朝后期，宦官已经是决定朝廷命运的最重要的变量，以至于唐宪宗稍逆其意，竟遭毒杀，而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六帝，皆为宦官所立。至此，一个曾经的盛世王朝已经完全落入宦官的掌握之中。

“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唐文宗的感慨表达了一国之君受到宦官挟制的凄凉与无奈。事实上，宦官夺取权力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皇帝也并非心甘情愿地将权力拱手相让。唐德宗一开始整肃纲纪，“稍抑宦官”，后来却变本加厉地倚重他们；唐文宗与宰相密谋诛杀宦官，却酿成了血溅宫禁的“甘露之变”，使得宦官权力不削反增、地位不降反升。宦官专权的毒瘤似乎只有与奄奄一息的唐朝同归于尽，才能迎来最后的覆灭。而对于唐朝来说，解脱之日即是灭亡之时。

既有前朝的惨痛教训，也有此时的切肤之痛，唐朝中后期的皇帝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地重用宦官？为什么宦官崛起总是伴随着制度衰变，而制度衰变又会进一步导致宦官得势？唐朝宦官群体的命运轨迹

将揭示出：宦官的生理缺陷以及作为人的不完整性，恰恰是他们获得皇帝信任的最重要的保证，也是他们在皇权政治中参与博弈的最大筹码。

宦官是皇帝的影子与延伸

丑陋的结局往往源于美好的开始，或许因为开始太过美好，人们陶醉其中、沉溺其中，一厢情愿地被心理预期催眠，从而容易忽视它可能隐藏的恶果。宦官擅权亦复如是，它能够从唐朝政治发展中横空出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之中的佼佼者编织的美好开始，而杰出代表就是名重一时的高力士。

高力士自幼入宫，少读诗书，却具有常人难以匹敌的政治判断力，在云谲波诡的斗争中总能正确地选边站队、择主而事。在李隆基还是藩王时，高力士就"倾心奉之，接以恩顾"。后来，李隆基率军入宫、平定内乱，成为深孚众望的储君，而高力士也得以"日侍左右，擢授朝散大夫、内给事"。紧接着，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矛盾暴露，高力士又参与了打击太平公主的谋划，"超拜银青光禄大夫"。与皇帝"相逢于微时"的交情，助皇帝夺取天下的功劳，决定了高力士在玄宗一朝的崇隆地位。

高力士非常清楚，有唐一代，宦官并无掌权的先例，而他自己正是开疆拓土的开垦者，因此也非常懂得与时沉浮、应时而动。他有士大夫致君尧舜、公忠体国的追求，但更懂得如何自我保护与专宠固位。唐玄宗晚年时想把朝政全部交给李林甫，而高力士直言劝谏说："自古威权之柄，不可假之于人。"这样的犯颜直谏显示出高力士竭忠事上的勇气与担当，但李隆基一表现出不悦，高力士便不再坚持原则，而且以后"不敢深言天下之事"。如此灵活应变还体现他善于在

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合纵连横，利见则与交，利尽则与绝，“虽至亲爱，临覆败皆不之救”，于是保持了在政坛的不倒翁地位。

权力的光环容易让人忘记高力士的宦官身份，而八面玲珑的策略，让他能够广结善缘、少树敌人。除此之外，高力士身为宦官的独特优势，是他与皇帝从青少年以来就朝夕相处所达成的熟悉与默契。他对皇帝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与内心想法能够准确掌握，常常让皇帝感到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默契，拥有惺惺相惜、灵犀相通的快感。而在“朕即国家”的制度设计中，衡量一个人权力大小不仅要看他的官方地位，更要看他与皇帝私人关系的远近。在这方面，作为与皇帝形影不离的宦官，高力士拥有无人能比的优势。

且不论皇帝对军国机务的看法，单论皇帝内心深处最为微妙的情感变化，高力士也能了如指掌，这是两个人无话不谈、年深日久才能达到的亲密境界。李隆基深爱杨贵妃，两情相悦正笃时，不免出现耍脾气、闹别扭的事儿，一个在皇宫临风洒泪，另一个在府邸对月长叹。每当此时，皇帝就会闷闷不乐，作为一国之君既不能主动向一位女子低头，也不可能将这些儿女情长和盘托出。这时，高力士就能心领神会地探知圣意，悄无声息地把杨贵妃从府邸接回宫中，皇帝自然见之大喜，在与爱人和好如初的同时，对于体察圣意的高力士更多了一份信任与倚重。

很快，皇帝对高力士在私生活上的倚重转变为在公共事务上的重用。“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可以说，高力士已经被皇帝当作自己的影子，在倦怠时，把高力士当作自己的替身去处理公务。李隆基甚至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当时，高力士富贵震天下、权倾朝野，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因之而取将相高位，其他攀龙附凤者不可胜计。唐肃宗位居东宫时，呼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之为“阿翁”，驸马辈呼之为“爷”。在朝廷正式的典章制度中，高力士只是一名负责皇帝生活起居的宦

官，但是在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转中，高力士的权势甚至远超当朝宰相，这仅仅因为他与皇帝关系亲密。

高力士只是皇帝的影子与镜像，人们并不是畏惧于他，而是畏惧他背后的皇帝。而无论他在人前多么风光，在与皇帝不对等的亲密关系中，他始终是卑贱的一方，永远无法像宰相或名士那样获得皇帝的敬重。李隆基曾因为废立太子的事情闷闷不乐，高力士趁机问其故，李隆基张口就说："汝，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在皇帝心中，高力士始终只是一个"家奴"，而"家奴"一词也是中晚唐的历代皇帝对宦官使用最多的称呼。皇帝蔑视宦官，因为他们不是完整的人，因此是至卑至贱的"家奴"；而恰恰因为他们是"家奴"，皇帝习惯毫无防备地与他们亲昵，从而把私人亲密转化为政治信任。面对皇帝则至卑至贱，置身朝廷则极富极贵，这正是宦官地位的二律背反，而这背后的根源，就是皇帝与宦官的私人关系向政治生活的延伸与渗透。

高力士与唐朝后期的宦官截然不同，不像他们那样飞扬跋扈、心狠手辣，他作为皇帝"最亲近"的人，虽然权势熏天、炙手可热，但仍然能保持谦虚谨慎、如履薄冰的态度与行事风格，甚至在他获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权势时，他也没有恣意妄为、紊乱朝纲，而是带着修齐治平的梦想，保持着攘袂为国的风范。高力士树立的正面形象，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中晚唐历代皇帝对宦官的正面想象。

从高力士开始，宦官相继受到重用，"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果园池沼，中官参半于其间矣"。所谓中官，即是宦官，从京城房产资源的占有情况就可看出，玄宗一朝，宦官逐渐得势。随后，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人先后崛起，终于掀开高力士编织的美好面纱，开始露出狰狞的面孔与锋利的獠牙，也将揭示出皇帝信任宦官更为本质的原因。

宦官是皇帝心理阴暗面的投影

有了高力士在前面披荆斩棘、铺路架桥，宦官的权力之路不再充满艰辛曲折。在高力士之前，任用宦官是违反祖训的行为；在高力士之后，任用宦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是唐玄宗李隆基开创的新祖训，而继任皇帝也乐于效仿，因为与宦官是如此亲密，使唤起来可谓得心应手、如臂使指。

于是，李辅国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与高力士比肩的成就。安禄山称兵向阙，唐玄宗仓皇西逃，李辅国在那时还默默无闻，只是一个养在东宫的太监而已。时代风云变幻之际，也是小人物脱胎换骨之时。在紧要关头走对一步，就足以荫庇剩余的人生道路，而李辅国恰恰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首先劝谏太子李亨，不要跟随玄宗入蜀，而是“北趋朔方，以图兴复”。在追随李亨到达灵武之后，李辅国又力劝李亨即位，“以系人心”。可想而知，李亨即位为唐肃宗之后自然会对李辅国委以心腹。

就这样，李辅国一跃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在灵武时，“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乃还京师，专掌禁军，常居内宅，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宰相百司非时奏事，皆因辅国关白、承旨”。李辅国既是皇帝颁发诏令的关键环节，也是群臣上书奏事的必经通道，可以说李辅国卡住了朝廷政治运转的咽喉。而他不茹荤血，在处理公务的间歇常常模仿僧人，手持念珠、口诵佛经。一开始，“人皆信以为善”，而不知祸之将至。

在蹑居高位之后，李辅国产生“高处不胜寒”的危机感，他深知自己既不能像士大夫那样兴化致理，也不能像武将那样战场杀敌，自己能够位极人臣仅仅是因为皇帝的宠信。论功劳不足以服众，论德行不足以配位，这种发自内心的自卑感与危机感开始驱使李辅国滥用权力、紊乱朝纲。他既然没有功劳、缺少德行，于是开始逐一打击那些

屡建奇功、德高望重的勋臣宿将。“置察事数十人，潜令于人间听察细事，即行推按”，所谓“察事”，就是间谍或特务，也就是运用特务统治来打击异己、巩固权位。

李辅国屡屡“欲立奇功以固其宠”，而他终于找到一个与皇帝心意相通的契合点。当时太上皇李隆基从西蜀回京，虽然与皇帝父子情深，但是太上皇代表的昔日权贵，与皇帝代表的今日新贵处于一种微妙的对立关系。太上皇李隆基仅仅在住处接待几名朝廷命官，李辅国即趁机诬陷“南内有异谋”，并向皇帝进言说：“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唐肃宗自然不能公开猜忌其父，哭着说：“圣皇慈仁，岂容有此！”然而，李辅国计谋已定，竟矫诏将李隆基迁居大内，“陈玄礼、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能留左右”，名为迁居，实为软禁，将太上皇与其旧臣拆分开来。

问题是，唐肃宗并未同意，李辅国为什么敢于公开“违背”圣旨？其实，李辅国之所以如此“胆大包天”，是因为他也做了一件皇帝想做但不便言明的事。唐肃宗真的不担心李隆基“与外人交通”吗？真的不担心太上皇拿走自己头顶上的皇冠吗？李辅国派六军将士“号哭叩头”，请将李隆基迁居大内时，唐肃宗的反应只是“上泣不应”，并没有断然否决。从权力斗争而言，唐肃宗确实心存担忧，但是从骨肉亲情来说，他又于心不忍，于是才会表现出摇摆不定的不置可否。在李隆基移居大内之后，唐肃宗有一次抱着幼女接见大臣，说：“朕念之，卿勿怪也。”谁知大臣因之进言说：“太上皇思见陛下，计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一言之下，唐肃宗自然泫然泣下，但即便如此，也未亲自拜见被软禁的父亲。这就足以说明，唐肃宗至少默认李辅国对父皇李隆基的软禁，而李辅国恰恰“懂事地”完成了皇帝难以启齿的事情。

李辅国妒忌勋臣宿将，而皇帝也是一样。正所谓，“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皇帝既需要勋臣宿将为之效劳，但又把他们视为皇权的潜在挑战者，于是皇帝对待勋臣宿将往往充满矛盾，心存

猜忌却又不能言明，公开褒奖却又暗中牵制。这时，无功无德而躡居高位的宦官也对屡建奇功的勋臣宿将恨之入骨，于是通过他们自然能将皇帝的猜忌表现出来。宦官就像皇帝心理阴暗面的投影，皇帝为了保持光明正大的形象，自然不能公开表达内心的邪恶，于是把内心见不得阳光的因素，诸如猜忌、狡诈、阴谋等，通过宦官显性地表现出来。皇帝需要这样一面镜子，而宦官也乐于借此获得权势。

可以说，皇帝与大臣之间的猜忌越深，皇帝对宦官就越信任、越倚重。李辅国之后的程元振与鱼朝恩，更是以伤贤害能为己任。

在唐肃宗薨逝之后，李辅国通过一场宫廷政变将唐代宗李豫送上皇位，自己步入如日中天的境地，同时也是跌入谷底的时刻。李辅国对唐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这样公开架空皇帝，自然会引起皇帝的不悦。而李辅国曾经的伙伴程元振趁机向皇帝输诚纳款，在与唐代宗合力打倒李辅国之后，程元振也取代了李辅国曾经的崇隆地位。

李辅国起码还在肃宗中兴的过程中立下定策之功，与之相比，程元振是彻彻底底依靠宫廷政变起家，于是变本加厉地妒忌功臣。程元振妒忌郭子仪"功高任重"，于是"数谮之于上"，在战乱正炽时强夺郭子仪的指挥权；平乱名将、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入朝，程元振"谮瑱言涉不顺"，致使功臣"赐死于路"；曾经的宰相裴冕稍有异议，即遭贬斥。其结果，"来瑱名将，裴冕元勋，二人既被诬陷，天下方镇皆解体"。等到吐蕃突然入侵，兵锋已至长安近郊，一直被程元振蒙蔽的皇帝如梦方醒，而下诏征兵竟无一卒赴阙。

最后，程元振成为众矢之的，皇帝只好将其罢黜。然而，程元振既倒，鱼朝恩复起，依然是宦官用事、妒忌功臣、伤贤害能。早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郭子仪、李光弼等9位节度使合军野战，皇帝就"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是各路军马又需要居中协调的人，皇帝就任命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名义

上节度诸军。皇帝明知道乌合之众必败无疑，但是为什么不设置诸军统帅一职？显然是担心无论谁成为诸军统帅，都会对皇权构成巨大威胁，这比安禄山、史思明的威胁更大。于是，鱼朝恩从一开始便受到重用，以宦官之卑而凌驾于诸将之上，这就是皇帝猜忌功臣的产物。

于是，鱼朝恩“专典禁军，宠任无比，上常与议军国事，势倾朝野”，越是身居高位，就越是因为无功无德而心虚，就越是妒忌贤能、凌侮宰相。鱼朝恩“恶郭子仪，因其败，短之于上”，不仅诬陷郭子仪，还派人挖了郭子仪的祖坟，时刻设置陷阱刺杀郭子仪。鱼朝恩还喜欢表现出士大夫的文化气质，“乃学讲经为文，仅能执笔辨章句，遽自谓才兼文武，人莫敢与之抗”。妒忌功臣也好，附庸风雅也好，都是心虚的表现，是小人得志的结果。

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人相继崛起，他们对功臣的妒忌，其实反映着皇帝对功臣的猜忌，因为皇帝始终把这些人当作潜在的竞争者。问题是，皇帝担心功臣尾大不掉，为什么就不担心宦官掌握大权也会“功高震主”呢？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宦官由于生理缺陷，哪怕拥有再大权力，也不具备通过子嗣将权力传承下去的可能，因此只能依附于皇帝而存在。换句话说，宦官不可能取帝位而自为，因此皇帝才能放心地把大权交给他们。不可逆转的生理缺陷给他们的身体带来伤害，却为他们赢得巨大的政治资本。

于是，皇帝越猜忌功臣，宦官的地位就越高；宦官地位越高，就越变本加厉地陷害功臣，导致皇帝与功臣之间的嫌隙更深。于是，皇帝与大臣的关系陷入不断破裂的恶性循环，制度因之衰败、礼仪因之瓦解、朝纲因之紊乱，而只有宦官是君臣关系破裂的最大受益者。可以说，君臣越是疏远，宦官就越是得势；正式制度越是衰败，非正式制度就越是猖獗。

宦官只能依附于皇帝而存在

由于宦官的不完整性，皇帝才敢于付出自己的信任；反过来看，也正是因为宦官的不完整性，他们无法成为特立独行的主体，而只有依附于皇帝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价值。他们是盘绕在皇帝这棵大树上的藤蔓，是生长在皇帝这面巨石上的苔藓，无论皇帝是大权在握还是徒有其名，无论是所向披靡还是四面楚歌，他们只有义无反顾地追随皇帝。对他们而言，失去皇帝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本，而得到皇帝的宠信则意味着得到一切。

他们对皇帝的这种依附性，在和平时期只是被当作“家奴”的本分，但是在战乱频频的非常时期，尤其在皇帝困顿之时，容易让皇帝产生一种“绝对忠诚”的错觉，一种无论富贵还是贫贱、顺境还是逆境，都生死相依的安全感。中晚唐时期，唐德宗李适是第一个对宦官擅权保持警醒的皇帝，他一度贬抑宦官，最终却在这种错觉的麻醉下变本加厉地倚重宦官。

李辅国离间皇帝父子，程元振、鱼朝恩猜忌勋臣宿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目共睹，朝士捶胸，藩镇切齿，上下交怨，愤于宦官。然而，按照中国古代政治的逻辑，当朝君主一般很难自我纠错，而位居东宫的太子则对问题心如明镜，成为改革的潜在力量，但是只有等到皇位更替之日，才是改革推进之时。唐德宗李适身为储君时，就对宦官擅权的危害有着切肤之痛，于是继承大统后，就开始推动抑制宦官权力的改革。唐德宗首先革除宦官的兵权，把保卫皇宫的禁军交给朝廷大臣掌控，然后在用人上表现出亲文人、远宦官的导向。

唐德宗李适外攘诸侯、内抑宦官，大有与民更始、再图复兴的态势。然而，藩镇羽翼已丰，难以根除，唐德宗削藩太急，反而引起藩镇玉石俱焚、鱼死网破的反扑。终于在公元783年，被朝廷派往剿灭藩镇的将领朱滔竟然与藩镇头目暗中勾结，突然枪口反转对付朝廷，而

朱滔的哥哥朱泚借势发动泾原兵变。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唐德宗李适从皇宫仓皇出逃，开始一段屈辱的流亡。

在皇帝落难之时，掌握禁军大权的白志贞却不知所踪。更令皇帝感到心寒的是，由于禁军招募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大量军籍被赐予长安城中的富家子弟，导致禁军徒有名册，竟无其实。结果在皇帝用兵之际，“上召禁军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难道以圣人为师、行仁义之道的士大夫掌握禁军，只能使皇帝狼狈不堪地逃跑?

恰恰在这时，一直受到打压的宦官则表现出不计前嫌、慷慨赴难的“气节”。窦文场与霍仙鸣两位曾经在东宫服侍李适的宦官率领100名宦官与敌军短兵相接。正所谓“患难见真情”，在自己孤立无援时能够舍身赴难，皇帝如何不为宦官的“绝对忠诚”所感动？与士大夫的首鼠两端、颟顸无能相比，更是凸显出宦官的朴实与可靠。于是，在流亡的过程中，“左右禁旅，悉委文场主之”。等到拨乱反正时，皇帝更是对宦官委以重任，“禁旅文场、仙鸣分统焉”，实际上是把禁军权力还给宦官。

二次回归，是人心的回归。唐德宗再次倚重宦官，则意味着打消了一切可能的疑虑，给予毫无保留的信任。在经历生死惊魂之后，唐德宗“颇忌宿将，凡握兵多者，悉罢之”，而把所有的权力都安心地交给宦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宦官掌握兵权的局面自此稳固下来，他们也终于获得了可以挟制人君的权力。

然而，唐德宗至死也不会明白宦官之所以赴汤蹈火并不是因为忠诚，而是因为他们对皇帝难以割断的依附性。离开了皇帝他们不但无事可做，甚至会遭到发动政变的军阀的屠杀。因此，皇帝总认为宦官是绝对忠诚的，其实忠诚不过是他们的无奈选择；而相比皇帝的倚重，宦官更是无法离开皇帝。皇帝信任宦官，宦官依附皇帝，一个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一个拥有不可挽回的缺陷，他们就这样在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中结成坚如磐石的攻守同盟。

宦官对皇帝的依附性在他们占据绝对优势之后表现得更加彻底。唐德宗之后，宦官权势不断巩固，藩镇将领、台省大臣出其门者不计其数，而手握禁军又让他们拥有了废立君主的权力。即便如此，宦官也无法离开皇帝而独立存在，他们可以架空皇帝，但不能取代皇帝；宦官可以拥有实权，但必须借助皇帝的名义。接下来发生的“甘露之变”，以宦官大获全胜而画上句号，但他们仍然需要依附皇帝。

等到皇位传到唐文宗时，唐朝已经是徒有其名的空架子，唐文宗李昂[注]常常闷闷不乐、黯然神伤，“受制于家奴”的窘境让他感到耻辱。于是继唐德宗之后，唐文宗开始第二波贬抑宦官的运动。而不同的是，此时宦官势倾朝野，尾大不掉，皇帝难以通过一道诏书就使之束手就擒。于是，唐文宗选择密谋屠杀的暴力方式，试图以宦官的血流成河换取他作为一国之君应有的尊严。

为此，唐文宗将曾经的流放官员李训、江湖郎中郑注提拔为心腹大臣，共同谋划诛戮宦官。他们深文周纳、计划缜密，从“甘露”这个美好的词汇开始实施残忍的计谋。按照计划，先使人奏称“左金吾听事后石榴夜有甘露，臣递门奏讫”，然后皇帝在“惊喜”之余，假装派宰相及大臣前往查验，而李训也将说出准备好的台词，“臣与众人验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称贺”。于是，皇帝自然会处于将信将疑的状态，这时再派私人关系亲密的宦官前往就显得理所当然，也不会引起宦官的猜疑。而等待宦官的将是准备好的屠刀和利箭，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切都按照计划顺利进行，禁军统领仇士良果然率领宦官欣然前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只待猎物入彀，便要万箭齐发！就在最关键的时刻，执行任务的人突然“变色流汗”，引起仇士良的警觉。而恰在这时，突然风吹幕起，藏在幕后的兵甲一览无余，而兵仗声更是铿锵在耳。仇士良久典禁军、常在帝侧，不知经历过多少政治风波，看到这些“异常”的细节，怎能不立刻揣知背后的阴谋？于是，“士良等惊骇

走出”，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不是宦官遭到屠杀，而是掌握禁军的宦官肆意屠杀朝廷大臣，李训等人无一幸免。

那些参与密谋的大臣只在瞬间的生死永诀中接受了成王败寇的事实，但是唐文宗却要接受无言的审判与精神的凌迟。仇士良等人心知这是皇帝的阴谋，但是他们不能报复皇帝，反而要把皇帝拉到他们这边，因为皇帝如果不再是皇帝，宦官也将失去存在的理由。于是，仇士良只有压制心中的怒火，把皇帝保护起来，把整个事件说成是大臣密谋造反，而皇帝对此竟全然不知。由此可以想象唐文宗内心的痛苦，仇士良等人把宰相的“手书”呈上，逼迫皇帝承认宰相造反，而唐文宗“悲愤不自胜”，也只好宣布：“诚如此，罪不容诛！”

一场旨在诛杀宦官的行动就这样以屈辱的方式完成了剧情逆转。晚年的唐文宗就是宦官手中的傀儡，他无力反抗命运的安排，也不能主动退出表演。从唐德宗到唐文宗连续两场镇压宦官的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宦官之势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从前，宦官是皇帝的影子，现在，皇帝成了宦官的面具。

宦官向制造他们的社会发起复仇

在唐朝晚期，皇帝只是坐在龙椅上的权力象征，而难以登堂入室的宦官才是手握生杀大权的背后人物。晚唐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宦官擅权干政、祸乱天下的故事连环画，而其荒唐程度也超乎想象。

唐僖宗一朝，宦官田令孜居中用事，导致京师两次战乱、皇帝两次出逃。唐昭宗即位，宦官杨复恭与有功焉，竟把皇帝视为自己的“门生”，后来皇帝黜退杨复恭，他竟然在私人信件中抱怨说：“吾于荆榛中援立寿王，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废定策国老。”视

天子为门生，自诩为“定策国老”，而且大有责骂皇帝忘恩负义的意思，其妄自尊大、野心膨胀竟至于此！

然而，宦官再飞扬跋扈也无法像勋臣宿将那样在位极人臣之后可以黄袍加身、废君自立。皇帝宠任宦官也正是因为看准宦官不能自立门户，现在皇帝终于品尝到自己酿下的苦酒，宦官确实因为生理缺陷不能篡位，但是他们为稳固权位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迫害功臣、伤害贤良、破坏制度，让皇帝饱尝屈辱，让朝纲紊乱。更何况，宦官向来是社会的边缘人，士林阶层更视之为身体残缺的“怪物”。他们既受到身体摧残，又饱受心理折磨，自然会对整个社会心存仇恨，一旦窃居高位、出人头地，就会以泄愤式的报复表达心中郁积的仇恨。社会法则导致了他们的不完整，权力法则又促成了他们的得势，最后，这些宦官会以复仇的方式向制造他们的社会发起进攻。

晚期的唐朝已经完全失去自我修复的能力，宦官对皇帝的废立简直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唐昭宗后期，宰相崔胤排摈宦官，而禁军中尉刘季述竟“矫诏以皇太子监国，遂废昭宗”。在缺少合法程序的情况下，宦官居然将一国之君擅自圈禁起来，并历数皇帝的过失，如“某时某事，你不从我言，其罪一也”，这样轻率的理由，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唐朝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到了不改朝换代就无以革除宦官的膏肓之地。刘季述擅自废立皇帝，激怒了朝中大臣和在外藩将，在诸侯混战中迅速崛起的朱温趁机劫掠皇帝。崔胤同样意识到诛戮宦官正当其时，上书极言其罪，“大则倾覆朝政，小则构扇籓方。车驾频致播迁，朝廷渐加微弱，原其祸作，始自中人”。崔胤还建议朝廷“内诸司使务宦官主者，望一切罢之，诸道监军使，并追赴阙廷”。

于是，“诸司宦官百余人，及随驾凤翔群小又二百余人，一时斩首于内侍省，血流涂地”，大规模的屠杀和满地的鲜血，标志着宦官专权

的彻底结束，自此京城再无宦官，只不过“崔胤虽复仇快志，国祚旋亦覆亡”。

宦官们一死，人心大快，朝野相庆，但是皇帝也失去了最后的存在基础。宦官无论怎样紊乱朝政也不可能做到“彼可取而代之”，他们还需要借助皇帝的名义，维护皇帝的存在。但是朱温起兵草莽、志存轩辕，不像宦官空有篡位实权，却无篡位野心，所以朱温做到了宦官不能做到的事——终结大唐，僭位称帝。

宦官专权源于皇权不安

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说过这样一段话：“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哲学中的辩证法同样道出了权力的本质特性。雄与雌孰强孰弱？自然是雄强而雌弱，但只要懂得“守其雌”就能实现“守弱曰强”的逆转。换成现代语言来说，所谓优势劣势、强者弱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恒久状态，很多时候，劣势会变成优势，弱者会变成强者，恰恰是宦官的缺陷成就了他们的权力。

唐朝宦官群体的相继崛起，毫无疑问是权力辩证法的生动注脚。正是生理缺陷为他们的权力之路开辟了康庄大道，阉割只是毁灭了他们的男性身体，却完整地重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

高力士、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霍仙鸣、王守澄、仇士良、刘季述……宦官群体就像是如影随形的幽灵一样紧紧地攫住了中晚唐的政治咽喉，遍布于唐朝每一个苟延残喘的时间单元，直到耗尽了这个伟大王朝的最后一丝气血，败坏了这个王朝的最后一点儿道德感召力。皇帝宠信宦官就像吸食鸦片一般，明知道会上瘾却仍然沉溺其中，这是因为宦官的生理缺陷赢得了皇帝的信任。

对强者保持警惕，对弱者疏于提防，这是人之常情。皇帝会把朝中大臣看作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是对于宦官，皇帝向来视如草芥、呼为家奴，内心对他们充满了不屑与鄙夷，因此对他们能够放松警惕、敞开心扉、吐露衷肠。高力士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处理唐玄宗李隆基的私人事务，他能在皇帝与情人打情骂俏时探知皇帝的微妙心情，也能在皇帝不知立谁为太子时揣知皇帝的内心偏好。对帝王而言，国事即家事，私务亦公务，唐玄宗也会把私人的亲密关系扩展到政治领域，从而成就了高力士的辉煌。

然而，私交甚笃只能为皇帝与宦官提供短暂的亲密期，他们对朝廷功臣的共同猜忌才是维持二者之间长期信任的根本因素。皇帝猜忌功臣是因为皇帝把功臣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害怕功臣一旦坐大就能取帝位而自为，而宦官猜忌功臣，则是出于专宠固位的考虑。宦官在一个讲究伦理道德的政治体系中蹑居高位，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上的耻辱，而身处舆论旋涡中心的宦官，更能感觉到高处不胜寒的压力。他们的权利来路不正，自然会对通过合法程序，凭借立功立德而身居高位的大臣心生厌恶。千百年来，士林与宦官向来彼此鄙夷、势同水火。没有什么比共同的敌人更能激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面对功臣——这个共同的敌人，皇帝与宦官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同盟。

在郭子仪、李光弼等人围攻安禄山的残余势力之时，皇帝明知军队没有统帅就没有战斗力，却仍然不置统帅，竟让大字不识的宦官鱼朝恩作为“观军容使”凌驾于各位屡建奇功的将军之上。诏令一出，即已表明皇帝对将领的不信任，而对宦官的倚重则无所保留。朝廷将领既然受到朝廷的怀疑，本就说明朝廷正式的制度运转已经失效，而皇帝派出宦官则是使用个人化的因素来进行弥补。这是中国历史上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皇帝由于担心大权旁落，从而对正式的制度运转缺少信任，转而以更为个人化的因素取代正式制度。

于是，中国古代的制度变迁虽然复杂，但是有一个脉络分外清晰，就是权力越来越集中到与帝王私人关系更亲密的人手中。毋庸赘言，在中晚唐的剧情中，这个角色由宦官承担。秦朝时设置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行政、军事和监察权力；汉朝时，皇帝担心太阿倒持，于是把信任缩小到朝夕共处的内臣；东汉光武帝时，将宰相崇以虚名、实夺其权，而把宰相权力分配给皇宫内府的台省，所谓“事归台阁，三公论道而已”。对此，著名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论：

> 其后同属台阁，尚书又不若中书亲近；到了唐代，索性以中书、门下及尚书三者为相职。这就是说，国家行政大权，愈来愈集中到帝王更亲近的人手中了。

按照这一逻辑，三公不如台阁亲近，尚书不如中书亲近，中书又不如宦官亲近，于是，只要皇帝对其他人掌握权力存有猜忌，就只能把信任范围日益缩小，直至缩小到自己的私人圈子，如果还不能放心，就只好把信任锁定在宦官身上。在皇帝对他人掌权缺少基本信任的极端情况下，皇帝的信任范围将只剩下宦官这个朝夕相处的影子，这还是因为宦官的生理缺陷使皇帝不用担心他们能够取代自己、自立门户。

可以说，皇帝对宦官的信任源于对大臣的猜忌，对正式制度的不信任，而宦官本身就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他们是一种病态的信任关系。这是在正式制度无法运转、真正的信任付之阙如的情况下，以宦官的生理缺陷来缓解皇帝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填补信任的空白。然而，病态的关系只能导致信任更加稀缺、猜忌更加严重，直到宦官挥霍掉皇室最后一丝威信。朝廷造成宦官群体不完整的身体、畸形的存在、扭曲的心态，朝廷也只能自食其果。

在《资治通鉴》里，司马光忠于记叙，评论不多，感慨更少，而在宦官一节，司马光写了长达1 500多字的议论，可见对此厌恶之深、警惕之严。然而，司马光思考的深度仅仅止于“顾人主不当与之谋议政事”的技术层面。人主对大臣心存猜忌，不与宦官谋议政事而与谁谋之？司马光不会明白，宦官专权源于皇权的猜忌与不安，只要皇帝还心存猜忌，权力就会向皇帝的身边人集中，正式制度就会衰败，私人关系就会胜出，而宦官专权只是其极端表现形式。明代的宦官专权更甚于中晚唐，就是明证。

宦官人数之众，其间岂无贤者？高力士竭忠事上，杨复光大义讨贼，都有令人为之动容的精彩瞬间。高力士晚年遭到流放，离开朝夕相处的唐玄宗，后来在赦免归来的途中听说唐玄宗驾崩，“北望号恸，呕血而卒”，其心真切，其情可哀。然而，个人的品行不能改变群体的特性与权力的法则。是皇权对其他男性的排斥导致了宦官的身体残缺；是皇权的深层不安造就了宦官的畸形崛起，而宦官也只有拿起屠刀向着造就他们的这个制度进行快意复仇。

宦官与士大夫似乎总是水火不容，士大夫对宦官嗤之以鼻，而宦官对士大夫也充满仇恨。在中晚唐的政治形态中，士大夫的表现实在无法引起宦官发自内心的敬仰，士大夫本应有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品格与操守，但在中晚唐时期他们却纷纷把“朋党”作为最高归宿。于是，以李德裕与牛僧孺为代表的两派将拉开长达40多年的朋党斗争。

---

1. 唐文宗李昂本命为李涵。——编者注

第十三章



李德裕、牛僧孺：朋党车轮碾碎制度的正常运转

“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唐文宗李昂在绝望的峡谷发出无奈的哀叹，撼动着唐朝行将就木的根基，也穿越了时间的隧道，震撼着后世那些志在天下的帝王将相。晚唐时期的政治形态，为困扰中国古代政治的朋党难题留下了最为沉重的注脚。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朋党之争不像战场上两军对垒，面对有形的敌人，进行一场畅快淋漓的厮杀就能分出胜负。朋党则是无处不在的幽灵，是难觅踪影的所在，是镶嵌在政治体系中看不见的暗影，根本无法通过简单的正面冲突使其销声匿迹。唐文宗李昂比谁都清楚，朝廷政治已经按照朋党的方式运行，无论任命谁为宰相，都会暗中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皇帝悲哀地发现，他要么选择朋党竞逐，要么选择让朝廷瘫痪。

而在这场长达40多年的朋党政治中，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正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他们是各自派别中实至名归的精神领袖，把大好河山当作政治博弈的舞台，乐此不疲地相互倾轧，使得朝廷政治让位于门户之争，社会公利让位于党派私利。天下士子，只知有门户，而不知有朝廷；只知有私利，而不知有公利。朝廷已经淡化为若有若无的背景，各个派别才是巍然屹立的政治实体。

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都是时代的精英人物，代表当时的智力高峰，他们本应该戮力同心，一起治愈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伤害。然而，只是因为一些个人恩怨，这些读圣贤之书、行仁义之道的士大夫们就陷入了势如水火的内部分裂。牛僧孺、李宗闵当权于前，凡是李德裕的奏章一概否决，凡是李德裕的朋友相继黜退；李德裕秉政于后，也开始了他的隐忍已久的复仇计划。凡是一个党派赞成的，必然遭到另一个党派的否定，朝廷已经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也难以选贤任能，更不能求同存异、凝聚共识，朝廷在党派冲突中接近于“否决型政体”的边缘。

其实，如果形成正向的权力竞争规则，朋党则有利于多元利益的表达、社会共识的凝聚。朋党之间的批评，属于建设性的“忠诚反对”，也就是说，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国家公益而批评，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好而批评。这种“忠诚反对”是党派之间的良性博弈，也是党派之间的相互补台。问题就在于，晚唐时期的朝廷党争为什么没有进入这种良性博弈的境界，而是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恩怨纠葛当中？究竟是什么让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之间如此仇视彼此？

按照后来史学家的分析，李德裕出身名门，代表所谓的“贵族”；牛僧孺出身乡野，代表所谓的“寒门”，“牛李党争”实际上就是士大夫阶层中“贵族”与“寒门”的斗争。身份的差别确实存在，但这样解释却夸大了身份的差别，李宗闵的父亲是前朝耄宿，为什么没有与李德裕站在一起？可以说，身份差别与阶层属性只是揭露部分事实，中国古代的朋党政治有着更为深层的奥秘。

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长达40年的拉锯战将表明，政治路线的分歧埋下了斗争的种子，而斗争的第一要义就是分清敌我，这本身就会滋生朋党。是斗争产生了朋党，是朋党加剧了斗争，朋党政治一旦产生，就会陷入自我繁衍的境地。

路线之争演变成个人恩怨

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在政治体系中，矛盾和责任都是沿着权力金字塔向上传导，那些表现在各个具体领域的问题会以高度抽象的形式呈现在最高决策层面前。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就曾经处于这样的旋涡之中，他曾经作为唐宪宗时期的宰相，为唐宪宗谋划武力削藩，而最初的路线之争就这样在两代人的延续中埋下了种子。

李吉甫力主武力削藩，但是同为宰相的韦贯之、李逢吉却坚持以和为主，宰相之间出现或战或和的分歧，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不同的政策主张能够为皇帝展示军国机务的不同侧面，也有利于皇帝做出全面的、准确的判断。然而，路线之争最怕的就是伴随着人事变动，那样就会把公务争论演变成个人恩怨。“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事情的发展果然按照“墨菲定律”向前推进。不久，韦贯之、李逢吉就被罢相，路线之争终于演变为私人纠葛，韦贯之、李逢吉自此对李吉甫恨得咬牙切齿。这份仇恨随着李吉甫与世长辞也自然转移到他的儿子李德裕身上。

而牛僧孺与李宗闵的第一次亮相就带着尖利的刺刀，直接向秉政当国的李吉甫刺去。当时，牛僧孺、李宗闵“应制举直言极谏科”，进士及第，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得意时刻，二人对诏也自然带着“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之情，深诋时政之失、直言朝政之非。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李吉甫备位宰相，身当国柄，这都是对李吉甫的公开批评，是在皇帝面前向李吉甫的进攻。结果，虽然李吉甫“泣诉于上前”，但是皇帝的怒气没有减少半分，“考策官皆贬”。由此，牛僧孺、李宗闵与李吉甫结了仇，在李吉甫撒手人寰之后，他的儿子将要背负父辈的恩怨。

就这样，在李德裕还未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他就已经背上了父亲在政治旋涡中积累的是非恩怨。李德裕的政治生涯注定会在这样的“路

径依赖”中历经崎岖坎坷的痛苦挣扎。而他自己又自恃出身名门，兼之“幼有壮志，苦心力学”，更增加他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自恃才华，心高气傲，“耻与诸生同乡赋，不喜科试”。而牛僧孺、李宗闵等人恰恰是通过科举考试实现命运逆转，李德裕既然鄙视科举，就注定与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层的进士存在天然的心理鸿沟。

于是，路线之争的恩怨纠葛并未因为当事人的逝去而自然消除，反而通过各自的谱系传承到下一代人身上。李德裕继承其父李吉甫的门户，而牛僧孺、李宗闵从进士及第攻击李吉甫之后，就自然会到李吉甫的对手那里寻求庇护，也将继承李逢吉的衣钵。而身份的差别、阶层的属性横亘其中，更加剧了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的对立。

故事的开头早已注定，而跌宕起伏的剧情直到李德裕与牛僧孺双双出现后才变得充满戏剧性。李德裕与牛僧孺可谓棋逢对手、各有千秋，这才让他们之间的斗争持续40年而胜负未分，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你方唱罢我登场，却又无法将对手完全打倒，只能等着下一次的主客颠倒、攻守异势。李德裕善于治国，梁启超称其为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牛僧孺善于做官，他在官场八面玲珑的艺术垂范后世。李德裕锐意进取，处江湖之远犹念庙堂之高；牛僧孺知止知退，居宰相之位常思颠覆之祸。李德裕哪怕处于人生的低谷，也能政绩斐然、闻名于世；牛僧孺即便身陷政敌窥伺的境界，也能动静相宜、明哲保身。命运安排他们出现在同一个时代，为他们埋下仇恨的种子，也让这两位巨人永远地对峙下去。

就这样，李吉甫与李逢吉在多少年前擦出的火花在他们的后人身上燃起熊熊烈火，这团朋党之争的烈火，以双方的仇恨与怒气作为燃料，肆意燃烧长达40多年之久，直到炽烈的火舌将盛世大唐的最后一丝繁华化为灰烬。

李德裕在贬谪中写下治国之道

李德裕与牛僧孺迥然不同的禀赋，在初入政坛时就已经显现出来。李德裕出身名门，“年才及冠，志业大成”，年纪轻轻就在父亲李吉甫身边耳濡目染，更有致君尧舜、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在唐穆宗还是东宫太子时，就久闻李德裕大名，当上皇帝后更是对他委以重任，“禁中书诏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李德裕也希望能够一展抱负，他看到外戚与权臣往来，于是不顾个人安危，无视朝中权贵，大胆向皇帝进言，说驸马私下接触宰相，“唯是泄漏禁密”“交通中外，群情所知，以为甚弊”。一纸上书既批评了皇帝的女婿，又指责了当朝的宰相，李德裕倾力皇室、一心奉公的忠诚与胆魄可见一斑。

与李德裕不同，牛僧孺从一开始就展示出清廉的品质。唐宪宗时，宣武军节度使韩弘入朝，韩弘长期担任封疆大吏，富可敌国，为了保证在朝廷的政治安全，自然会花钱买平安，“以家财厚赂权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遗”。不久，韩弘父子相继辞世，继任皇帝唐穆宗“命中使至其家，阅其宅簿”。出人意料的是，韩弘竟然将他行贿的名单一一记录下来，而在他试图收买的朝廷大臣中，唯有牛僧孺予以拒绝，书簿上记载为“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讫”。由此可以想象，皇帝在看到这本书簿时，会对牛僧孺形成怎样深刻的印象。果不其然，“穆宗按簿甚悦。居无何，议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牛僧孺自然不会想到韩弘会把行贿的事记录下来，更不会想到这本书簿会落入皇帝手中，这份偶然的幸运背后，可见牛僧孺的洁身自好、守身如玉。

由此，李德裕居能吏之名，牛僧孺获清廉之望，二人皆有担任宰相的能力和德行。但这时，李逢吉把持朝政，“既得权位，锐意报怨”，为了引牛僧孺助己，不惜把李德裕贬为浙西观察使，而将牛僧孺升为宰相，一贬一升，一压一抬。正所谓“对待朋友要像春天般温暖，

对待敌人要像冬天般冷酷无情”，敌我界限清晰，而双方“由是交怨愈深”。

而李德裕也终于离开京城，开始艰难曲折的地方执政经历。他还不知道，这一走就要在云蒸霞蔚的江湖飘荡大半辈子，虽然中间短暂回京任职，但都因朋党排挤而郁郁不得志。而出镇方面，离京意味着两种命运同时降临在李德裕身上：一方面，远离庭阙就远离了帝国最核心的政治，而李逢吉、牛僧孺等人占据相位，可以居高临下，对李德裕伺机中伤；另一方面，执掌一方为李德裕施展才华提供了舞台，这位满腹经纶的政治家将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治理成绩证明他的价值。

李德裕刚到浙西就一扫官场失意的阴霾，“锐于布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岭之间的百姓惑于鬼怪，父母兄弟如果得了疾病，竟不治疗，“举室弃之而去”。李德裕“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他上除淫祠、下清寇盗，除旧布新、兴利除弊，获得了“人乐其政，优诏嘉之”的政绩。

虽然流落在江湖之远，李德裕仍然心系朝廷。唐穆宗驾崩之后，唐敬宗少年继位，颇事奢靡，而且“荒僻日甚，游幸无恒；疏远贤能，昵比群小”，以至于一个月坐朝听政不超过三次，那些身在朝廷的大臣却缄默不言，“海内忧危，虑移宗社”。李德裕这时体现出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他“久留江介，心恋阙廷，遣使献《丹扆箴》六首”，说自己“尝学旧史，颇知箴讽，虽在疏远，犹思献替”，以讽皇帝“视朝稀晚、侮弃谠言、信任群小”等弊病。这些逆耳之言虽然不能改变皇帝，却也得到皇帝的公开嘉奖，皇帝手诏答曰：“置之座隅，用比韦弘之益；铭诸心腑，何啻药石之功？”

然而，尽管李德裕希望借此能够再得圣眷、重返京师，皇帝也确实下诏褒奖，但仍然难以跨越朋党的鸿沟，“而逢吉当轴，枳棘其涂，

竟不得内徙”。浙西与京城之间的有形距离易于跨越，朋党内耗的无形阻隔却难以弥合。

这只是牛僧孺一党的消极拒绝，他们时刻抓住机会主动进攻。唐敬宗少年早亡，继位的唐文宗对李德裕一向倾慕，“采朝论征之”，但这时李宗闵由于宦官的帮助而捷足先登，早李德裕一步入朝为相，而且短时间内就“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同居相位，共同把持朝政，开始对李德裕展开新一轮的排挤与迫害。不久，刚回帝京的李德裕就出镇剑南西川，朋党斗争到这里还未结束，“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李德裕的朋友也受到牵连。由此，牛僧孺与李宗闵“权赫于天下”。

李德裕开始了再次的“政治流亡”，也再次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如果说主政浙西彰显的是治理内政的技艺，那么出镇西川则体现出他保境安民的才能。有唐一代，西川一向为军事重镇，西与吐蕃接壤，南与南诏毗邻，是保卫帝国安全的西南屏障。而前任节度使“抚理无术，人不聊生”。李德裕到镇之日，“复葺关防，缮完兵守”，“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痏之民，粗以完复”，获得“西拒吐蕃，南平蛮蜒”的政绩。

“德裕所历征镇，以政绩闻。”在晚唐日益凋敝的政治生态中，李德裕出类拔萃的政绩犹如无边黑夜中一颗璀璨的夜明珠，以其熠熠光辉赢得了皇帝的回心转意。就在一瞬间，胜败看似就要逆转，李德裕入朝为相，而牛僧孺、李宗闵被相继罢黜。然而，短暂的胜利似乎只是为更加险恶的失败埋下伏笔。

唐文宗为了诛戮宦官，开始亲近曾经遭到流放的官员李训和江湖郎中郑注，而李德裕秉持着攘袂为国的胸襟与气度向皇帝上书，“李训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于是遭到群小诋毁，被贬为兴元节度使。而李宗闵再居宰相之职，他再次得势对李德裕更是心有余悸，于是主动进攻，策划阴谋陷害李德裕。

李德裕到镇之后，按照皇帝的诏书供养一位叫作杜仲阳的流放罪犯。这位杜仲阳大有来头，曾经是漳王的养母，因漳王获罪而受到牵连、遭到流放。李宗闵一党正是抓住这次机会，开始深文周纳、潜心密谋，为李德裕编织谋反的罪名。于是，李宗闵暗中命左丞王璠、户部侍郎李汉进状，“论德裕在镇，厚赂仲阳，结托漳王，图为不轨”，诬告李德裕通过杜仲阳结托漳王、蓄意谋反。在所有的罪名当中，皇帝唯独对谋反保持高度警惕，而李德裕出镇地方、手握兵权，如果与皇室亲王勾结、图谋废立，那就不能不引起皇帝的恐慌——即便这可能只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谎言。于是，“帝于蓬莱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随、王璠、李汉、郑注等，面证其事”，王璠、李汉自然“加诬构结，语甚切至”。在一个缺少理性司法审判的制度体系中，皇帝与大臣在密室中的窃窃私语就足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荣辱，而证据则仅仅凭借几个人的口头担保。这时，如果没有人站出来为李德裕说话，他就会被认定为企图造反、大逆不道，被政敌钉在欺君叛国的耻辱柱上。在命悬一线的时刻，李德裕或许还在驻地优哉游哉、诗书遣怀，而千里之外的朝廷，已掀起轩然大波。

在关键时刻，路随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德裕实不至此”，并且愿意为此赌上自己的穷通荣辱，“诚如璠、汉之言，微臣亦合得罪”。有人以死为李德裕作担保，也就打破了李宗闵等人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阴谋，而皇帝也不再相信李德裕会起兵造反。但即便如此，李德裕被贬为袁州长史，而路随也“坐证德裕，罢相，出镇浙西”。路随仗义执言，在李宗闵等人看来就是党附李德裕，同样遭到打击。朋党之泾渭分明，竟一至于此！

没过多久，李德裕重返浙西，而后出镇淮南，在辽阔的大地展露他经世济国的才华。然而，李德裕心不在江湖、志不在外邦，他须臾不忘的是帝王所居的阙庭，他毕生的志向是主宰这个国家的命运，他愤懑于心的欲望是对牛僧孺、李宗闵等人进行复仇。正所谓，“福兮祸

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李德裕在历经“颠沛流离”之后，终于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望之际，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

唐文宗驾崩之后，唐武宗继位，而唐武宗在位居藩王时就对李德裕的政治才华心向往之，于是刚刚继位就将李德裕提拔为宰相，军国机务一以委之。如同在土地里压抑了一个冬季的种子，终于在某一个春和景明的日子破土而出，李德裕就像这样尽情吐出压抑在胸中的郁闷之气，开始热情拥抱倾泻而下的阳光雨露，也开始他蓄谋已久的复仇行动。

牛僧孺进退以道展现为官艺术

牛僧孺擅长为官，不需要李德裕在晚年得志之后举起屠刀，他就已经常常“革自己的命”。在身居高位之时，牛僧孺不像李宗闵那样贪恋权位，也不像李德裕那样锐意进取，而是当行则行、宜止则止，朝廷政治形势一旦不妙就立刻上表请辞、自求贬抑，绝不恋战、绝无停留。

正所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很多时候，一个人能走多远，并不取决于他能前进多少，而取决于在恰当的时机能后退多少。牛僧孺知止知退的特点恰恰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保全了自己，而把握“退”的节奏与时机是比一味进取更难的事情。

牛僧孺第一次当宰相是在唐穆宗一朝，那时牛僧孺由于不收受韩弘贿赂，偶然间被皇帝得知，于是大见信用，一朝提拔为宰相之尊。骤然间穷富极贵，任何人当此境地都会沉浸在成功的迷醉之中，然而牛僧孺却没有被虚荣心攫住。当时“朝廷政事出于邪幸，大臣朋比”，朝廷最为核心的政治形势日益恶化，宦官擅权干政，朝廷大臣又朋党比周、党同伐异。身处这样复杂敏感的环境中，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

罪祸，无论自己有多么小心翼翼，也总会在不经意间贻人口实。最佳的策略是选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这也是当止当退的节点。但是，当要离开政治舞台的核心时，又有多少人能克服心中的虚荣?

牛僧孺就能做到这一点，他屡次上表请求解除宰相之位，“拜章求罢者数四”，皇帝实在感到难以挽留，于是在鄂州置武昌军，以牛僧孺为武昌军节度。居内则危，处外则安，牛僧孺的选择让自己远离了是非之地，而尽享万全之安。

牛僧孺凡镇江夏5年，朝中皇帝更换两代，穆宗、敬宗相继驾崩。直到文宗即位，李宗闵位居台辅，欲引牛僧孺为内援，“屡荐僧孺有才，不宜居外”。不久，牛僧孺再度入朝为相，而这次的进取恰恰是牛僧孺再次大撤退的序曲。当时，宦官手握宫廷禁军，以王守澄、仇士良为代表的宦官更是权倾朝野，“多纳纤人，窃议时政，禁中事密，莫知其说”，可以说宦官专权已经到内挟人君、外预朝政的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文宗有一次与宰相一起议论朝政，突然问宰相：“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于此乎？”

皇帝突然发问，究竟有何深意？如果撇开王守澄威逼天子这样的背景，这样发问或许只是向大臣咨询治理天下的艺术。但显然，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这一发问预示着朝廷将有一场腥风血雨的斗争，而牛僧孺对此早有洞察。他对皇帝说：“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讟；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也就是说，现在虽然不是太平盛世，但也可以说是臻于小康，那么皇帝所谓“太平”，并不是针对天下而言，而是另有所指。牛僧孺当然心知肚明，于是接着说：“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而公议结束，牛僧孺立即对同僚说：“吾辈为宰相，天子责成如是，安可久处兹地邪？”于是，10天之内三次上表请辞，再次以退为进、以退求安。

那么，牛僧孺说皇帝“别求太平”，这个“太平”究竟指什么？而牛僧孺又体会到了什么？显然，天下治理臻于小康，皇帝所谓“太平”不是对外而言，而是暗示皇宫内部并不太平，需要清理。牛僧孺准确把握到皇帝这是在暗示宰相帮助自己革除宦官专权，实现乾纲独断，这正是皇帝明知故问的“太平”之义。而宦官这时手握兵权，皇帝向宦官宣战，必然意味着一场血流成河的宫廷斗争。意识到这一点，聪明如牛僧孺，岂有不退的道理？

而事件的进展正好印证了牛僧孺的选择。唐文宗为了诛除宦官，终于引发震惊一时的“甘露之变”，导致宦官对朝廷大臣的肆意屠杀，数名宰相都身罹祸患、惨遭屠戮，而这时远在淮南当节度使的牛僧孺，再次因为自己的退步而幸免于难。当牛僧孺看到顶替他的人血流成河，究竟是为政治的残忍感到后怕，还是为自己明哲保身感到庆幸？无论他怎样看待自己，他的为官之道已经获得当世称誉——“而僧孺进退以道，议者称之”。

当此之时，“搢绅道丧，阍寺弄权”，牛僧孺认识到离开朝廷还不足以确保安全，自己还应该做进一步的退让。淮南属于朝廷重镇，多少朝中权贵盯着这个肥差，牛僧孺自然懂得“非善不居”的道理，自己怎么能眷恋这个是非之地？于是，“僧孺嫌处重籓，求归散地”，虽然“累拜章不允”，牛僧孺不得已必须长期镇守淮南，但是他马上就使出“大隐隐于朝”的绝招。皇帝不是不允许他离开淮南吗？那好，他就寄情山水、雅好清谈，常常与诗人白居易一起吟咏诗句，这是在向朝中的权贵表明，自己虽然身当重籓，但是无复进取之怀，大家都可以放心了。

接下来，牛僧孺最不愿意看见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唐武宗克承大统，李德裕在承受长期的打压之后实现命运逆转，也开始了对牛僧孺等人的政治倾轧。李宗闵被一贬再贬，而且曾经的旧事也扒出来被李德裕大做文章。李宗闵后来死在贬谪的途中。与之相比，一向以退为

进、明哲保身的牛僧孺，却在鹰睃虎视的险恶环境中再次实现了自我保全。

李德裕刚刚取得国柄就解除了牛僧孺节度方镇的兵权，征召入朝，并且伺机中伤，但是牛僧孺贞方有素、识量弘远，而且“人望式瞻”、深孚众望，李德裕竟然“无以伺其隙”。牛僧孺自进入政坛以来，洁身自好，以退为进，没有与剪不断、理还乱的宫廷政治沾上不清不楚的关系。他在所有宫廷斗争发生之前，就早已一骑绝尘地离开京师，用空间距离与那些错综复杂的恩怨纠葛划清了界限。因此，直到晚年，“僧孺数为德裕掎摭，欲加之罪”，但李德裕始终难以找到合适的借口。

李德裕积蓄了一辈子的怒气，正准备向敌人挥出重重的一拳，却被牛僧孺的忍辱负重和以退为进化解于无形。李德裕自然会有拳打棉花的憾恨，但牛僧孺却在宠禄及身中安然辞世，在朋党斗争中得其善终，也创造了千古佳话。

朋党斗争使朝廷丧失决策能力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政治斗争充满云谲波诡的不确定性和生死一线的残酷性，但唯其凶险，也能给参与其中的人带来心理上的刺激。李德裕从江湖之远到一朝问鼎庙堂之高，牛僧孺屡次躲过政治风波的惊涛骇浪，这样骤起骤落的人生轨迹，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大喜大悲。而在朋党斗争中，比当事人的穷通荣辱、喜怒哀乐更值得倾听的，是一个王朝暗自凋零的沉重叹息。

此时，朝廷已经难以做到选贤任能，因为人才的提拔任用不再取决于能力、才华以及政绩，而要看所在的阵营、所属的门户、所站的

队列。如果与李德裕亲善，而这时又恰好是牛僧孺、李宗闵把持朝政，那么再有才华也只能置之散地，既无以施展才华，也不能报效朝廷。唐文宗时，牛僧孺等人执政，“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唐武宗时，李德裕夺回国柄，同样按照朋党界限排除异己，一位名叫苏涤的官员被一贬再贬，“前自给事中为德裕所斥，累年郡守”，而原因仅仅是“涤李宗闵党”。

于是，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被无形地架空，实际的法则变成“惟党是从”。比用人的门户之见更可怕的，是朝廷的大政方针和重大决策被严重扭曲。宰相议事不再以朝廷的整体利益为旨归，而是以党派和门户的利益为根据，凡是李德裕赞成的，牛僧孺就不问是非曲直地极力反对。结果，朝廷决策陷入朋党斗争的泥潭，日益接近于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否决型政体”。

李德裕在出镇西川时，曾有机会取得对吐蕃的战略优势，最后却因为牛僧孺的党派偏见而中途搁浅。当时，“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举城降”，这对饱受吐蕃侵略之苦的朝廷来说，正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事喜事。维州“南界江阳，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在井底”，并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地位，“一面孤峰，三面临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这个得天独厚、易守难攻的城池，觊觎内地、威胁中原的桥头堡，吐蕃人称之为“无忧城”，而前代节度使“韦皋镇蜀，经略西山八国，万计取之不获”。这时，悉怛谋遣人送款，对吐蕃可以说是巨大损失，而对朝廷岂不是从天而降的好事?

李德裕毕竟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不敢相信竟有这样的好事送上门来，于是“遣人送锦袍金带与之”，以此察看吐蕃是否有诈，而“悉怛谋乃尽率郡人归成都”，以铁的证据证明投降属实。李德裕自然上书朝廷，请求朝廷允许受降、占据维州，“因陈出攻之利害”。按道理，这是一件能够改变帝国地缘政治格局的大好事，朝廷应该欣然接受。

但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牛僧孺与李德裕的门户之见，这件事竟以悲剧而收场。

牛僧孺发挥他善于打太极的优势，即便拒绝一个明智的决定，他也能做到理直气壮、滴水不漏。他对皇帝说，朝廷与吐蕃“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也就是在此之前就签订了和平协议，“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今一朝失信，戎丑得以为词”。因此，朝廷不应该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应该顾全大局、信守前约。这一番言辞迎合了皇帝的道德优越感，用一番道德说教迷惑了皇帝对具体事务的判断，成功把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贴上了背信弃义的标签。不能不说，牛僧孺以门户之见异化朝廷决策，既显毒辣，又无胸怀，但是仅看他成功阻挠一个正确的决策，便可看出他是多么擅长“说服的艺术”，既把实际好处掩盖于无形，又让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

结果，“乃诏德裕却送悉怛谋一部之人还维州”，而吐蕃一旦得到这些“叛徒”，就将他们处以极刑。这样残酷的下场也斩断其他人的归化之心，吐蕃再无将领投降朝廷，而只会血战到底！反过来看整件事情，天下岂有将敌人的降将又拱手还给敌人的咄咄怪事？造成这样荒天下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的丑闻不是因为朝廷缺少判断的智慧，而是失去了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这就是朋党斗争极化的结果。

凡是你赞成的我就反对，哪怕利国利民、有益社稷、泽被后世，我也要极力阻挠。朋党斗争极端化之后，朝廷就这样被利益集团绑架，一切以党派界限为判断标准，而朝廷整体利益就这样被散落在地，接着被朋党的车轮碾成粉末。于是，朋党愈演愈烈，而朝廷政治生态日渐恶化。

利益集团污染朝廷政治生态

唐武宗继位未久就将李德裕提拔为宰相，军国机务、大政方针，一以委之。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相继谢世，李德裕得以总国柄、专朝政，而朝廷政治也终于短暂地摆脱了朋党倾轧之苦。唐武宗与李德裕君明臣贤、相得甚欢，在晚唐苟延残喘期间，竟创造出外服四夷、内平藩镇的骄人政绩。就像日薄西山、夕阳西下之时，犹有万道金光射向人间，殷红晚霞铺满天际，唐朝在寿终正寝的前夜也以这种方式向曾经的辉煌表达敬意。

然而，回光返照无论多么强烈，也只是转瞬即逝的片刻之美。朋党斗争的幽灵在短暂离开之后，也时刻准备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唐武宗由于倾心道术、服用仙丹，在人生最有活力的韶华时光暴毙身亡，继位的唐宣宗对屡立奇功的李德裕心存芥蒂，刚刚登基就把李德裕贬到地方。而白敏中、令狐绹等人在李德裕当国时还引为同列，这时却“抵掌戟手，同谋斥逐”，替九泉之下的牛僧孺和李宗闵进行报复，朋党斗争的幽灵再次降临在朝廷的政治版图上。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有半年程”，李德裕在南下的途中充满苦闷，他还是那样，无论身在何处，一样心系朝廷、心恋阙廷。即便这时牛僧孺早已入土为安，李德裕还是把自己的不幸归之于他。李德裕在郁郁不得志时写下著作无数，所著《穷愁志》引用“犊子之谶”以斥牛僧孺，又在其他篇目中视之为“太牢公”。他们之间的相互憎恨，穷极一生竟没有半点消弭。

究竟是什么在他们之间埋下了不可弥合的仇恨？又是什么导致了朋党斗争的产生、兴起与极化？

其实，纵览古今中外，很少有政治体系能够避免朋党的产生。美国第4任总统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把利益集团叫作派别，“派别就是为某种共同的感情或利益所驱使而联合起来的一定数量的公民，不论他们占全部公民的多数或少数，而他们的利益是同其他公民的权利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相左的”。在晚唐的历史中，联合

起来的不是公民，而是朝廷官员。他们最先由于共同的政治主张而联合起来，对内合纵连横、结党营私，对外则步调一致、党同伐异，最后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朋党或利益集团。

其实，有朋党并不可怕，产生朋党也并不意味着政治的恶化。朋党之间的斗争，如果表现为建设性的“忠诚反对”，那么朋党斗争反而有利于凝聚共识。但是在朋党斗争极端化的情况下，反对并不是出于维护公益的目的，仅仅是因为门户不同、派别各异，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批评而批评，那么朋党以派别的利益异化朝廷的整体利益，以派别利益绑架朝廷的决策，最终让朝廷决策服务于派别利益，从而导致政治生态日益恶化。

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曾写下《国家的兴衰》一书，研究“利益集团”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书中的这段精彩论述，简直与晚唐时期的朋党斗争高度一致：

> 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的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

牛僧孺站在道德制高点正气凛然地否决了李德裕的奏章，这正是对“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的生动诠释。朝廷用人受到派别支配，朝廷决策受到朋党异化，这同样演绎着这样的逻辑——“最终慢

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写下传世名篇《朋党论》，提醒君主警惕朋党斗争，但是欧阳修的论述还只停留在君子小人的框架之内，认为“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欧阳修并不知道，无论是小人“见利而争先，利尽而交疏”的“伪朋”，还是君子“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的“真朋”，只要朋党开始产生，就会产生维护派别利益的自觉性，就会以派别利益异化整体利益。这与君子或小人没有关系，而是门户之见、利益使然。

中国古代的朋党政治之所以未能产生现代政治中多党轮替的良性竞争，而是堕入利益集团恶性竞争的泥潭之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路线之争演变为私人恩怨，而私人恩怨又在零和博弈的思维下不断极化。斗争的首要任务就是分清敌我，而正是敌人的存在，让集团内部的自我认同更加强烈。从李吉甫与李逢吉的斗争到李德裕与牛僧孺的对立，正是因为敌人的存在才让自己的朋党变得如此亲密。而双方无论哪一派得势，总是想置对方于死地，正是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让双方都处于备战状态。结果，朋党极端化将利益集团的所有弊病展现得淋漓尽致，直到耗尽晚唐的最后一丝气息。

李德裕在卑湿多雨的南方仍然余恨未消，但是他也从变化无常的命运中体会到某种更为本质的东西。这个东西在古希腊的悲剧中被称为不可抗拒的“命运”，在李德裕看来则是无法改变的“冥数”。“周、孔与天地合德，与神明合契，将来之数，无所遁情”，周、孔都不能改变命中注定的“冥数”，自己又怎么能抗拒命运的安排？李德裕以此排解胸中苦闷，只是，朋党斗争带来的伤疤还在心头，也还在朝廷沉重的躯体上。

经过李德裕和牛僧孺长达40多年的朋党斗争，本应担负扭转乾坤的士大夫，却把过多的经历耗费在朋党斗争中，朝廷内部的宦官专

权，外部的藩镇割据，只能放任自流、愈演愈烈。唐朝就像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等待着死神的光临。而起于草莽的小人物黄巢和朱温，将一起完成终结唐朝这一任务。

第十四章



黄巢、朱温：流寇的失败与“身在朝廷反朝廷”的成功

进入生命晚期的唐朝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巨人，它的沉重呼吸在天地之间震颤，呼唤着死神姗姗到来的脚步。而黄巢与朱温这两个出生在乡野草泽的无名小辈，在和平年间或许只是泯然众人的“一介草民”，但在这个非常时期，是他们举起命运的利剑将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王朝一剑封喉。

皇权衰微，诸侯并起，天子号令不达于四方，旧的秩序逐渐崩塌，而新的秩序正在重建。就是这一毁一建之间，逐鹿中原之际，也为底层草根实现命运逆袭提供了绝佳机会。黄巢与朱温正是抓住了这样的机会，把朝廷的崩塌当作崛起的契机，把曾经的王侯将相、典章制度“打倒在地”，在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舞台上享受权力的盛宴。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是黄巢把“造反美学”发挥到了极致，他的激情书写为中国历史注入一种激动人心的刚健之美。而激情与斗志总是能打败时间，拥有不随时间流逝而干枯的生命力，激励着后世那些胸怀壮志的英雄豪杰。毫无疑问，黄巢是一个更加浪漫的存在，在历史上也享有更高的知名度，但现实从来不会迎合人的审美，魅力四射的黄巢以失败而告终，而更加隐忍、稳重、老谋深算的朱温，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终结了唐朝的统治，建立起改天换地的伟业。

在黄巢登高一呼、万众响应时，朱温还在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后来才加入黄巢的农民起义大军，并凭借不断累积的战功获得黄巢的赏识，短时间内就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正是在这时，黄巢与朱温开始踏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是从一个战壕的战友裂变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审时度势之后，朱温决定归顺朝廷，从起义军摇身一变而成为剿匪官军。然而，表面上的归附只不过是朱温实现更大政治抱负的幌子。

朱温与黄巢的梦想不谋而合，都是要取天下而自为，只不过手段不同、路径各异。在朱温看来，黄巢走的是一条没有根基的“流寇路线”，而他则要踏上自己精心设计的“身在朝廷反朝廷”的“坐寇路线”。两个人从这里分道扬镳。结果，黄巢依旧到处流窜，最终在官军的围追堵截中日暮途穷，惨死于泰山的狼虎谷；而朱温则在剿灭黄巢的过程中屡立奇功，受到朝廷嘉奖，由此奠定了在朝廷上的政治地位，为开展“身在朝廷反朝廷”的战略构想打下了基础。朱温不再像黄巢那样四处流窜，而是有一个朝廷敕封的合法根据地，也不再像黄巢那样背负着“造反”的骂名，而是打着朝廷的旗号东征西讨，借朝廷之名，行征伐之实，兼弱攻昧、开疆拓土。结果，朱温以朝廷的名义扫平群雄，然后再取朝廷而代之，“名正言顺”地接受唐朝皇帝的禅让。

黄巢曾经是朱温的引路人，有着朱温无可企及的优势，但最终只是扮演了历史的报幕人。当黄巢将唐朝冲击得七零八落时，他并不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成就朱温的辉煌。黄巢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在扼腕叹息中不断追问，“流寇路线”为什么注定失败？而“身在朝廷反朝廷”的“坐寇路线”为什么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黄巢与朱温迥然不同的人生轨迹说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正义的力量永远强于非正义的力量，建制内的力量永远强于建制外的随意组合，而有组织的精锐之师必将战胜无组织的乌合之众。流寇产生的是强盗，而稳定下来才能产生军队。

饥饿驱使下的浪迹天涯

中国古代群雄争霸，各种权谋花样迭出，但是最基本的原则可以概括为这样8个字——“深根固本，以图天下”。所谓深根固本，就是首先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有了自己的根据地，经营得好可以出兵争霸，万一兵败又可以闭关自守、再图进取，这样就可以处于可进可退的有利地位。诚如所言，“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相反，群雄争霸最忌讳的就是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因为缺少一块可进可退的根据地，就只有漫无目的地到处流窜，就像随风飘荡的飘蓬一般，没有根基，缺少保障，也丢掉了最基本的安全缓冲。这样的“流寇路线”，最大的弱点就是缺少韧劲儿，无法经受挫折，由于没有一个可供东山再起的后方，一次沉重的打击就足以带来彻底的毁灭。而黄巢从举兵开始，就已经违背了“深根固本，以图天下”的基本原则，也就注定了黄巢大军不会得到胜利的眷顾。

黄巢本以贩盐为业，波澜不惊的人生本该继续平静如水，但命运的安排却偏偏要掀起巨浪。唐僖宗年间，“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没有生计来源的平民百姓开始聚众为盗，而黄巢也终于从中看到了人生的转机，他决定从庸碌无为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带领那些饥肠辘辘的难民踏上造反的道路。于是，黄巢与昆仲8人一道揭竿而起，“月余，众至数万”，他也顺理成章成为起义军的领袖。

然而，起义军虽然“推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仍署官属”，但仍然是一群缺少组织架构的乌合之众。黄巢现在是数万人的统帅，但他对这支起义军的未来既缺少一个系统的长远规划，也没有一个细致的近期计划，更没有一个加强组织建设的制度设计。于是，这支由于饥饿而聚集起来的人群，只会在饥饿的驱使下把烧杀抢掠作为第一目标，除了填饱肚子之外，这支起义军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革命蓝

图。这就决定了黄巢的起义不过是一场集体的觅食行动，是一群饥肠辘辘的难民走遍天下寻找食物的旅程。

于是，黄巢把整个中国的大好山河当作觅食场所，开始一场纵横南北、驰骋东西的流窜行动。他先是带领众人南渡淮河，“寻南陷湖、湘，遂据交、广”，为了占据岭南永为巢穴，主动向朝廷上表请求归附，没想到朝廷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而岭南气候湿热，北方人甫至此地，即遍染病疫，“死者十三四”，上绝朝廷之命，下有群情之逼，黄巢不得已挥军北上，开始了新一轮的流窜。他本来可以把岭南当作起义的大后方来经营，即便离开，也可以编户齐民、建章立制、派驻守将，万一北伐失败还可以重返岭南、以图复兴。然而，黄巢离开岭南就意味着永远地离开了用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城池，将它轻易地还给了对手，而自己同样失去了一个经营根据地的机会。

从南海北逾五岭、进犯湖湘，黄巢和他的乌合之众将对饥饿的恐惧和对果腹的渴望转化为势不可当的愤怒与战斗力。兵锋所到之处，藩镇望风披靡，黄巢一路高歌猛进，攻洛阳、破潼关、定长安，一气呵成地从南蛮之地杀到天子脚下，流窜的胜利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然而，占领京师之后呢？黄巢向来对起义军的未来缺少战略规划，占据京师之后，自然也没有自己的施政纲领，既没有一套意识形态说明自己的正当性，也缺少一个成建制的官僚体系来处理政务、安抚百姓，更没有一个系统的外交战略用来与诸侯合纵连横。于是，由于缺少正当性来源，上至官僚、下及平民，无不视之为贼寇；由于缺少与诸侯周旋的外交策略，天下各路藩镇，也绝少与之暗通款曲，纷纷起兵勤王，都视黄巢为共同敌人。

黄巢的军队没有稳固的组织架构，非常适合于四处流窜，而一旦在一个地方稳定下来就立刻暴露出无组织、无纪律的弊端。军队由于“累年为盗”，士兵在经年累月的烧杀抢掠后变得非常富有，进入长安城之后，看到路上的穷人就“争行施遗”。不能不说，这些起义士兵

还保留了曾经的饥饿记忆，对路边的穷人保有怜悯之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行伍不胜其富”本身就说明黄巢对军队财富缺少系统管理和集中使用，这才会纵容士兵各怀所私、各得其财。在路上随机向穷人散财，那只是个人的小恩小惠，若把这些钱财集中起来，以新建朝廷的名义赈济贫弱，则是来自公家的仁政惠政，更能为黄巢赢得百姓支持，这样做岂不是比士兵私下散财更好？这个细节足以说明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始终缺少组织架构，缺少宏图远志和整体谋划。

“冲天香阵透长安”的夙愿终于达成，黄巢一扫当年名落孙山留下的心理创伤，在京城长安僭位称帝，国号大齐，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品尝喜悦，就发现自己深陷全国兵马的合围之中。朝廷所属的藩镇，从来都是相互猜忌、彼此攻伐，这时却不约而同地捐弃前嫌，枪口一致对外，就连屡次违反圣命的沙陀部落也得到朝廷赦免，在李克用的带领下渡河南下，与藩镇合力围剿黄巢。

接下来，“诸侯勤王之师，四面俱会”，在反复争夺中，黄巢最终退出长安，开始又一轮的流窜。而这一次，幸运女神不再眷顾于他，朝廷各路诸侯同仇敌忾形成剿匪合力，朝廷与黄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也正是在这时，善于审时度势的朱温认识到黄巢的“流寇路线”终将失败，于是决定归顺朝廷，成为朝廷剿匪联军中的得力干将。而黄巢从潼关以东又迈出流浪的脚步，他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可以回去，稍遇挫折就会引发巨大的心理恐慌，加上又缺少钢铁般的组织纪律来约束部属，丧失信心的队伍也在迅速地土崩瓦解。公元884年，退到关东的黄巢再次遭遇官军合围，在这次重大的失败后，黄巢的大部分将军归顺了各路藩镇，留下来的将士“自相猜间，相杀于营中，所残者千人”。而黄巢退到泰山狼虎谷之后也被卖主求荣的部将杀害，一场历时9年、横跨大半个中国的流窜行动终于画上句号。

黄巢把天下当作流浪的场所，但是到头来却发现，天下之大，却容不下他的雄心壮志。他所走的“流寇路线”始终无法形成合法的力

量，也不具备坚固的组织结构，更缺少让自己摆脱盗贼身份的意识形态资源。而这一切，“身在朝廷反朝廷”的朱温，都将轻易取得。黄巢的使命只是通过到处流窜，而破坏唐朝的国家机器，剩下的任务就要交给朱温来完成了。

从造反盗贼变为剿匪的中流砥柱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句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名言，它以简单直接而又极其深刻的方式揭示出名义上的正当性对于干事创业的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名义”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虚幻之物，而是做成事、做大事的前提条件。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兵以义动则兴，师出无名易败。而名义上的正当性，正是朱温“身在朝廷反朝廷”获得的第一个红利。

黄巢起兵草莽，最终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自己的“盗贼”身份，既没有来自现任皇帝的合法性授权，也没有创造一套起兵造反的正当性理由。就连朱温的谋士劝谏朱温归顺朝廷时，也曾直截了当地说：“黄家起于草莽，幸唐衰乱，直投其隙而取之尔，非有功德兴王之业也，此岂足与共成事哉！”连自己人都认为黄巢“起于草莽”，并没有什么“功德兴王之业”，这样的草寇怎么能共谋大事呢？接下来，这位谋士继续说：“今天子在蜀，诸镇之兵日集，以谋兴复，是唐德未厌于人也。”唐室虽然衰微，但是唐朝皇帝还是天下拥戴的真命天子，还是代表着最高的正义与道德。这一番说辞之后，朱温对自己何去何从也就豁然开朗了。

中国古代流行战争檄文，最著名的莫过于唐朝初期骆宾王写下的《讨武曌檄》，檄文的本质就是自己的正当性宣示，一方面指明朝廷失德、政治腐败，另一方面说明自己替天行道、师出有名，这其实是

要通过舆论造势为自己正名，并以此争取人心。然而，黄巢始终未能获得“正名”的机会，他总是被视为捣乱的“盗贼”，以至于那些平时相互攻伐的藩镇都把他视为共同敌人而合力围剿。而黄巢一死，那些曾经携手并肩的藩镇陷入了更为惨烈的混战之中。正是因为缺少一个朝廷承认的名分，本该成为诸侯争霸一员的黄巢却偏偏沦落为“天下共击之”的众矢之的。

而黄巢缺少的东西朱温轻易就拿到手了。朱温的做法非常简单，那就是表面上归顺朝廷，而他也看准了他与朝廷具有政治交易的基础。皇帝既然还是各路诸侯共同承认的真命天子，就能给朱温需要的道德名分，这是朱温需要皇帝的地方；而皇帝亟须能为皇室效力的军队，这是皇帝需要朱温的地方。于是，他临阵倒戈，归顺朝廷，拿到“身在朝廷反朝廷”的第一个红利，那就是获得来自朝廷的合法性授权，让自己从造反叛贼转变为朝廷剿匪的中流砥柱。

从此以后，朱温不再像黄巢那样背负造反的骂名，也不会像黄巢那样被定为叛贼而成为众矢之的。虽然朱温本人比黄巢毒辣百倍，进行了比黄巢起义更加残忍的战争，但他总是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打着朝廷的旗号讨伐其他藩镇，表面上看是替天子讨伐不臣之人，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但其实都是为自己开疆拓土、扩充地盘，是以“为朝廷”的名义进行“反朝廷”的事业。

朱温归顺朝廷之后就成为剿灭黄巢的急先锋，在黄巢覆灭之后，朝廷任命他为宣武节度使，与洛阳毗邻的汴州成为朱温的根据地，也正是他的皇图霸业的起点。从此以后，朱温开始打着朝廷的旗号东征西讨。公元887年，朱温讨伐控制兖州、郓州的朱瑄、朱瑾，初战告捷，而唐僖宗不仅赐予朱温铁券，而且命令朝廷翰林撰写德政碑以歌功颂德；公元888年，朱温讨伐占据徐州的时溥之前，唐昭宗还给朱温“增食邑三千户”，把朱温的故乡改名为“沛王里”；公元901年，唐昭宗受到宦官挟制，还密诏朱温进京勤王，并封朱温为护国军节度

使……朱温每一次消灭异己、削平诸侯，都能得到来自朝廷的授权。虽然每一次征战都打着正义的旗号，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血腥的战争与残忍的屠杀，与黄巢又有什么分别？以正义的名义发动战争，这是高超的政治伎俩，又是丑恶的生存法则。

唐朝的末代皇帝们如此倚重朱温，以至于他们天真地相信朱温的东征西讨是为了重振皇室的权威，他们根本不知道，朱温只是表面上忠于皇室，朝廷也不过是他挂在嘴边的道德符号，一旦发展到无人能与之抗衡的地步，朱温就是要撕破朝廷这个“道德面具”的时候。正所谓“图穷匕首见”，朱温的做法正是“身在朝廷反朝廷”的经典套路。

公元901年，朝中宦官挟制皇帝，而朱温又从大梁称兵向阙，宦官在手足无措中决定将皇帝送到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那里。朱温仍然披着进京勤王的道德外衣，实际上是与李茂贞争夺对皇帝的控制权，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朱温一路向西，引兵速进，迅速以绝对的兵力优势将凤翔围得水泄不通。在经过一年多鏖战之后，李茂贞势屈力穷，最终同意将皇帝交给朱温。既然出兵的名义是匡扶皇室，朱温这时也需要假戏真做。于是，见到皇帝之后，朱温亲自为皇帝执辔牵马，“且泣且行，行十余里”，此情此景，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咸以为忠”。皇帝自然大为感动，不仅给朱温赐名为“朱全忠”，还赞美朱温，“宗庙社稷是卿再造，朕与戚属是卿再生”。然而，皇帝并不知道，那都是朱温“身在朝廷反朝廷”的一贯伎俩，“全忠”的赐名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皇帝已经大祸临头而不自知。

接下来，朱温提议将京师从长安东迁到洛阳，而洛阳毗邻大梁，正是在朱温的控制范围之内。等到唐昭宗在洛阳安顿下来也就完全落入朱温的掌控之中，而在唐昭宗暴毙之后，继位的唐哀帝再三恳请朱温接受禅让，而朱温也只好在三请三让后半推半就地即位称帝，“身在朝廷”终于成功地实现了“反朝廷”。

朱温不再需要皇帝的合法性授权，也不再需要在东征西讨时打着朝廷的旗号，因为他自己已经成为皇帝，他自己就等同于朝廷。

以团结合击强者、以果断蚕食弱者

朱温以朝廷的名义为发动战争制造出正当性理由，把自己扩大地盘的预谋掩盖在匡扶皇室的名义之下，最终达到“反朝廷”

的目的。除了正当性之外，“身在朝廷反朝廷”的路线，还为朱温赢得了一块可进可退的根据地。由于朱温已经被纳入朝廷的制度体系之中，他将对自己的队伍进行一次制度化的重建，用刚性的组织纪律来驾驭乌合之众的激情，锻造一支在诸侯中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威武之师。

黄巢由于缺少一块长期经营的根据地，只能漫无目的地到处游荡，因此根本无法制订攻城略地的系统规划；但是朱温占据大梁，有了一块可以虎踞龙盘的根据地，并依据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制订出一套远交近攻、合纵连横的战略规划，将邻近诸侯各个击破、逐一吞并。更为重要的是，朱温在汴州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官系统和组织体系，他不会像黄巢那样难以经受失败，更不会像黄巢那样一战成擒，朱温即便遭到失败的打击，也能存活下来并东山再起。

在黄巢覆灭之后，朝廷剿匪的各路诸侯也就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而这些在战争中崛起的新旧军事力量，也开始陷入无休无止的内战之中。公元885年，唐僖宗结束了在成都的流浪，回到了刚刚光复的京城，而皇帝位置还没坐稳就发现诸侯混战的战火燃遍神州大地：

> 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

许、蔡，时溥据徐、泗，朱瑄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

这些手握朝廷节钺的封疆大吏只是从道义上尊奉朝廷为正朔，实际上割据一方自成体系，大者跨州连郡，小者亦能占山为王。而朱温占据的汴州和滑州正是中原地区的核心地带，处于鹰瞵虎视的四战之地，西有秦宗权，东有朱瑄、时溥，北有李克用，南有高骈。从历史上诸侯混战的经验来看，越是处于边疆地区，战略地位就越是有利。原因很简单，地处边疆避免腹背受敌的窘境，可以在一个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春秋战国时期，如秦如楚，都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主，无不是地处边缘地带；如韩如魏，都是最早遭到蚕食的国家，也都处于诸侯环绕的四战之地。朱温的处境与韩魏如出一辙，他肯定能感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敌意，他是所有人的敌人，是所有诸侯扩张地盘第一个要跨越的障碍。

基于这样险恶的处境，朱温也制订了自己的扩张战略。第一个原则：当敌人强大时，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第二个原则：当敌人弱小时，就要毫不迟疑地将其吞并；第三个原则：主动发起进攻，绝不婴城自守，必须先发制人。正是凭借这三点，才使身处四战之地的朱温并未遭到吞并，而是不断吞噬其他诸侯，逐渐发展成为势力最大的藩镇。

诸侯混战之初，朱温就遇到秦宗权这个强大对手，处于战略上的守势。当时，黄巢刚刚覆灭，秦宗权就擅自称帝，“连陷汝、洛、怀、孟、唐、邓、许、郑等州，圜幅数千里，殆绝人烟”。秦宗权既然称帝，当然是志在夺取天下，而与之接壤的朱温则可谓首当其冲。于是，三路大军压境而来，大将秦贤、卢瑭、张晊率军合围汴州，“环汴为三十六栅”，可以说是重重围困。朱温猝遇大敌，顿感势单力薄，“顾兵少，不敢出”。这时，朱温就开始动用合纵连横的外交策

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起对付强敌。兖州的朱瑾、郓州的朱瑄、徐州的时溥都地处汴州以东，地势上可以说是唇齿相依、犬牙交错，朱温正是看到这一点，于是派出使者向朱瑾、朱瑄借兵。理由很简单，汴州如果覆灭必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接下来就轮到兖州、郓州。

朱瑾、朱瑄果然被朱温说服，不仅给予朱温3万援兵、数百马匹，而且亲自率军前来御敌。就这样，三方合力，消灭了秦宗权的主力军队，使他再无力量发动战略进攻。西边的威胁刚刚消除，朱温就间不容发地开始部署向东进攻，而其兵锋所指正是帮助他一起打败秦宗权的朱瑾、朱瑄。即便这样恩将仇报，朱温也能为自己找到“合适”的借口，他诬蔑朱瑾、朱瑄在离开汴州时试图以金帛引诱汴卒东归，并以此移檄兖州、郓州，为自己制造攻伐的理由。朱瑾、朱瑄自然会为朱温的背信弃义怒不可遏，而这正是朱温求之不得的事情，他以秋风扫落叶的攻势迅速发动对“二朱”的进攻。这正是朱温性格中毒辣的一面，也是他在诸侯环伺下的生存策略——主动发起进攻、必须先发制人，绝不因为朱瑾、朱瑄有恩于己而心软，曾经的恩人即是此刻的猎物，而朱温毫不心软地举起屠刀。

既除西边之患，又兼东邻之地，朱温从诸侯的包围中突然崛起为赫赫大藩，他遭遇强敌就合纵连横，占据优势就果断进攻，而在他具有压倒性优势之后，就开始像滚雪球一样兼并弱小藩镇，下手果断，绝不心慈手软。公元891年正月，朱温降服中唐时期最为桀骜不驯的藩镇——魏博；同年四月，朱温的部将“枭时溥首以献”，遂平徐州；公元900年，朱温引兵西进，镇州节度使王熔“纳质请盟”；公元901年，朱温称兵向阙，在行军途中顺便降服了华州节度使韩建……朱温对土地的贪婪可谓细大不捐，从不因对手弱小而心慈手软，从未因犹豫不决而给对手留下回旋余地，这成就了朱温的迅速崛起，也终于让他具有了取唐而代之的实力。

朱温以合纵连横来对付强者，以果断吞并来蚕食弱者，以主动进攻来打击对手。第一个原则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分清敌我，团结可以团结的朋友对付共同的敌人；第二个原则和第三个原则需要果断决策、雷厉风行，把进攻当作最好的防守，绝不因为道德或情感而迟疑。朱温兼具狡猾、果断、毒辣与决绝，并利用朝廷赐予的根据地获得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

深度人格分裂与生性残忍

“身在朝廷反朝廷”的路线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体现，表面上“为朝廷”，实际上“反朝廷”，这是一个人外表与内心的相互否定，是外在言行与真实意图的彼此龃龉，需要一个人长期的伪装与表演。而朱温从走上这条路线开始就意味着他有深度的人格分裂，人格与心理都极其扭曲。

朱温的毒辣可以说是泯灭了基本的人性，他只要认定自己的目标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能够踩穿任何道德底线、践踏所有人间法则。朱瑾、朱瑄在他受到秦宗权围攻的危急时刻慷慨赴难，不仅毫无保留地给人给物，还冒着生命危险与他并肩作战、共御外敌。但是刚刚打退秦宗权的进攻，朱温还没有对朱瑾、朱瑄表示丝毫感谢，就已经开始酝酿攻打他们，于是才会有污蔑“二朱”利诱汴卒东归的阴谋。

朱温心里清楚，西边的秦宗权一旦势屈力穷，他就要移檄东征，与朱瑾、朱瑄早晚会兵戎相见。而此时此刻，朱瑾、朱瑄刚刚帮朱温与秦宗权展开恶斗，正是兵困马乏之际，也正是发动进攻的最佳时机。从政治的角度看，此时不取，更待何时？但是从道义的角度讲，恩将仇报，何其太急？朱温的选择已经说明一切，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会顾及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在他的世界观里，政治与道德截然不同，政治就是物竞天择的生存斗争，让政治为道德所牵绊，那是

政治不成熟的感情用事。朱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会发现，当政治失去道德，生命也就失去庇护，他自己也不会拥有基本的安全。

朱温从归顺朝廷之后就表现出表里不一的特点，他能背叛黄巢，也能背叛朝廷，而他从投降之日起，就已经怀揣着“反朝廷”的密谋，把共同剿匪的其他藩镇看作日后的敌人。公元884年，黄巢败退长安，朱温归顺朝廷，旋即与朝廷的各路军队联合剿匪，这中间包括李克用率领的沙陀部落。沙陀部落来自漠北，骁勇善战、无坚不摧，被诸侯誉为“黑鸦军”。但是在朱温看来，剿匪时固然是强大的队友，一旦黄巢覆灭，沙坨部落岂不是强劲的敌人？于是，朱温还在剿匪时就开始策划谋杀李克用。这年五月，李克用急追黄巢，路经汴州，节度使朱温自然要款待一番，而鸿门宴也就此摆开。

朱温发现李克用兵力寡弱，而大军还在前方，于是想趁此机会除掉李克用这个潜在对手。“是夜，置酒邮舍，克用既醉，全忠以兵围驿，纵火烧之。”李克用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加上大军包围、大火蔓延，看似就要命丧于此。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中自有天注定，在李克用命悬一线的时刻，突然间“雷雨骤作，平地水深尺余”，而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李克用也趁机“逾垣仅免”，但他的部下三百余人及监军使史敬思、书记任珪都被朱温杀害。按说，黄巢此时还未覆灭，各路联军应该一致对外，但是朱温在投降时就把问鼎中原当作目标，把今天并肩作战的队友看作明日逐鹿中原的对手，于是在李克用还未起疑心时，朱温就早已动了杀机。而这件事情之后，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的对立贯穿晚唐始终，晋梁对峙也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主要脉络。

朱温生性之残忍、内心之毒辣，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罕见，最鲜明的体现就是他对人的生命缺少最起码的怜悯和敬畏。公元895年，朱温在与朱瑄的鏖战过程中，俘虏了3 000士卒，当时狂风暴起，沙尘沸涌，本来是天气异常，朱温却说：“此乃杀人未足耳。”于是下令“尽杀所获囚俘”，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风沙中陨灭，这一血流成河

的场面也足以说明朱温的残忍。而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矣”，朱温也会反过来受到残忍的伤害。

最能突显朱温扭曲人格的莫过于他在晚年的乱伦行为。本来，朱温的原配张皇后“严整多智”，而朱温常常“敬惮之”。张皇后去世后，本来就荒淫无度的朱温更加纵意声色，而乱伦的事情就在此时公开发生。朱温的儿子们多数带兵在外，即便如此，朱温“常征其妇入侍”，“往往乱之”。义子朱友文的妻子王氏美艳不可方物，朱温“尤宠之”，而且还要将太子之位传给朱友文，这引起了朱温的亲生儿子朱友珪的嫉妒，而骨肉至亲的相互屠杀就是在这里被埋下种子的。

朱温残忍一生，没想到在晚年时节，与安禄山、史思明等人一样，命丧亲生儿子之手。然而，没有这样的毒辣与残忍，朱温怎么能在诸侯混战中脱颖而出？没有这样的人格分裂与扭曲心理，朱温怎么能走出“身在朝廷反朝廷”的路线？但世事无常，报应不爽，曾经成就朱温的这些因素最终造成了他的灾难。

流寇失败与坐寇成功揭示权力的起源

晚年的朱温在乱伦的关系中纸醉金迷，意志衰退，精神萎靡，他因为迷恋义子朱友文妻子的美色而想传位于朱友文。他的亲生儿子朱友珪这时又被贬为莱州刺史，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惧之中。朱友珪决定像他的父亲那样用弑君篡位来为自己的人生进行最后一搏。

朱友珪联合禁军首领韩勍，“以兵五百人伏于禁中”，到夜深人静时斩关而入，直至朱温的寝殿之外。听到兵器铿锵作响，朱温从睡梦中惊醒并慌张地问：“反者为谁？”而朱友珪的回答则耐人寻味，他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只是意味深长地告诉朱温，“非他人也”。朱友

珪的意思很明显，造反的不是别人，正是你的儿子，这不是告诉朱温只能落下这个以子弑父的下场吗？接下来，朱友珪大呼“老贼万段”，而利剑已从朱温后背穿出。

这一幕儿子杀父亲的情景是如此残忍，与朱温一生又是如此契合。朱温在临死前对儿子说：“汝悖逆如此，天地岂容汝乎！”他在指责儿子犯上作乱时，有没有反思过自己的人生，他走出的一条“身在朝廷反朝廷”的路线，与他儿子的弑父行为相比在道德上又能崇高多少呢？

在中国古代奇书《推背图》里面，黄巢和朱温据说都是著在典册的人物。黄巢的判词是“万人头上起英雄，血染河川日色红。一树李花都惨淡，可怜巢覆亦成空”。“李花惨淡”自然隐喻唐朝国运衰落，但是“巢覆成空”也正预示黄巢身死族灭的下场。而朱温的判词则是“一后二主尽升遐，四海茫茫总一家。不但我生还杀我，回头还有李儿花”，第三句“不但我生还杀我”暗含着朱温被亲生儿子杀死的结局，但是他毕竟完成“四海茫茫总一家”的伟业。黄巢和朱温的结局都可谓凄凉，朱温唯一比黄巢欣慰的是他完成了黄巢未竟的事业。为什么“流寇路线”中途夭折，而“身在朝廷反朝廷”的“坐寇路线”却能笑到最后？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周期性的朝代更迭中，真正凭借农民起义而获得成功的例子可谓凤毛麟角，真正驰骋天下、逐鹿中原的多数都是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贵族，是这些占据朝廷政治优势的贵族最后取代了朝廷。秦末汉初的刘邦、项羽，共同立楚怀王为主，并以“楚”的名义招降纳叛，获得正当性；东汉末年的三国鼎立，曹操的家族是汉朝贵族，孙坚则是朝廷在东南的地方官，而刘备则打着皇叔的旗号到处收买人心；隋末唐初的群雄逐鹿中原，白手起家的李密败给了在朝廷中身居高位的贵族李渊……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史上，除了朱元璋是真正白手起家之外，似乎没有一个新王朝的建立不是与旧王

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凭借着旧王朝赋予的优势，最后获得取代旧王朝的实力。这里面究竟潜藏着什么样的奥秘?

首先，是因为身在朝廷的人能够为自己制造正当性与合法性。儒家讲究君臣父子，长幼有别、尊卑有序，最反感的就是犯上作乱，而起义造反本质上就是无君无父的表现。因此，黄巢的行为才会在国家的精英阶层中激起众怒，那些平时对朝廷骄横无礼的藩镇，这时也心向朝廷。所以，即便是造反，也应该打着朝廷的旗号，以表面上维护秩序的方式去破坏秩序，这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奥妙所在，也恰恰被朱温用在自己的实践中。

而在治乱交替的朝代更迭中，“道统”沿着一个朝代向下一个朝代传递，旧王朝虽然行将就木，但它也是“道统”传递过程中的一环，新王朝的合法性需要它的授权。韩愈在千古名篇《原道》中写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道统”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在中国的王朝更替中自有其连续的谱系，新王朝虽然在武力上打败了旧王朝，但是仍然需要继承旧王朝传递下来的“道统”。否则，像黄巢那样虽然自立为王，却仍然被人认为“起于草莽”，没有任何权威性与公信力可言。旧王朝虽然实力衰微，但它仍然在名义上是合法性的来源。朱温对此了然于心，他需要旧王朝赐予名号，然后为自己所有“反朝廷”的活动戴上正义的面具。

“身在朝廷”还有另一个“白手起家”无法与之相争的优势，就是直接继承朝廷原有制度化的组织体系。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定义，制度化就是组织或程序获得稳定性的过程。黄巢的军队虽然有组织架构，但士兵从流民起步，把朝廷的制度当作参照，照猫画虎、邯郸学步，到头来还是依靠起义首领之间的个人关系，缺少制度化的组织体系来统合军队。这样的乌合之众或许会有短暂的巨大破坏力，但是绝对谈不上真正的战斗力。黄巢从岭南直捣京师，是因为沿途藩镇闭门不出，

而京师守将也是望风而降。如果各个藩镇的正规军队集结起来，黄巢就只有一路溃败，直到身死族灭。成建制的精锐之师必然会战胜乌合之众，有组织的军队也必然会打败随意组合的流民，而黄巢的命运就像是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一样，虽然人数众多，但缺少组织，于是只能在官军围剿中四处溃散。

而朱温早就看明白这一点，于是他果断地倒向朝廷，从朝廷那里得到合法性授权、封地和一整套组织体系。他的军队不再是一盘散沙，也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产生心理防线的崩塌，只要组织体系还健全，就总是有足够的韧劲儿东山再起。秦宗权三路大军合围汴州，而朱温没有像黄巢那样陷入众叛亲离的地步，正是因为他的地盘还在、组织还在，所以才能度过黎明前最黑暗的短暂绝望。

黄巢的“流寇路线”走到最后既失去了为民起义的正义性，也没有一个稳固的地盘和组织可以蓄积力量，走向最后的灭亡可以说是得其所哉。而朱温走出的“身在朝廷反朝廷”的“坐寇路线”则从朝廷那里获得了合法性授权、一个稳固的地盘和一个健全的组织体系，这些都让朱温最终具备取代朝廷的实力。对朝廷而言，最可怕的敌人不在外面，而就在它的内部。从更深层次来看，“流寇”与“坐寇”或许为权力起源提供了一个解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名著《权力与繁荣》中说到，流寇由于其流动性，会采取杀鸡取卵的方式，而坐寇由于其长期性，会采取养鸡取卵的方式，结果，流寇只能是盗贼，而坐寇则会带来秩序。或许，黄巢的失败与朱温的成功在权力起源的本体层面就已注定。

朱温灭唐的过程充满了血腥与屠杀，他把唐朝皇帝从长安迁到洛阳，跟随皇帝的左右侍从总共不到200人，而朱温心里仍然充满猜忌，于是派人诬陷皇帝的侍从谋反，而将这些侍从全部杀死，将皇帝身边都换上汴州的士兵。《旧唐书》的作者愤怒地写道：“全忠所行，止于

残忍。”同时，作者又痛苦地追问：“人道浸薄，阴骘难征，然以此受终，如何延永！”

《道德经》有言，“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这句话竟一语成谶，朱温果然二世而亡，无论他的结局如何悲惨都无法改写“身在朝廷反朝廷”路线的成功，这是悲剧所在，也是反思所系。

结语



一个认识中国传统政治的视角

对于所有历史悠久的民族而言，如何认识历史都是一个不可回避而又激动人心的命题。“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按照时间单向流逝的想象，未来只是历史的延伸，是时间的流经之地。历史的保险箱里面锁着未来的剧本，或者说，历史的故事即是未来的种子。

然而，想要打开历史的保险箱又是何其艰难。那些会哭会笑的鲜活人物已经定格为典籍上的篇章文字，又铺满历史的灰尘。隔着漫长的时间回望，有时会让人感到一种因久远而产生的温情，有时又会让人感到不可捉摸的神秘。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它最复杂的时候，也正是它最为丰富而又最具魅力的时候，这让所有重读历史的人都充满疑惑。

中国历史曾经以汉唐盛世创造出当时世界的文明巅峰，但是仍然无法避免治乱交替的历史周期律，无法走出自我毁灭、自我重建的循环。曾经以百家争鸣点燃人类文明觉醒的星火，却在漫长的时间进程里以“慎终追远”为目标，在朝代更替的沉闷重复中失去多种可能性。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有时让人不知所措，热爱它的秦砖汉瓦、唐诗宋词，迷恋它的激情澎湃、婉约清新，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发出沉重的叩问：伟大而美好的文明，为何难以走出治乱兴替的自我循环？

正如孔尚任在《桃花扇》序言中的感慨：“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政治秩

序从建立到崩塌究竟潜藏着怎样的政治密码？唐朝，一座耸起的文明高峰，它的崛起是如此迅速，而它的崩塌又是如此痛苦，它从文明巅峰坠入毁灭深渊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也为解开中国古代政治密码提供了一个样本。

本书中选取的这些政治面孔构成了一个前后呼应的连续体，他们的故事共同构成了有唐一代的慷慨悲歌：李密、李世民、长孙无忌、徐世勣、武则天代表了唐朝从建立到兴起的上升阶段；李隆基、李林甫、安禄山则活跃在唐朝达到巅峰而由盛转衰的转型时期；李泌、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裴度则代表唐朝衰落后的挣扎时期；而李德裕、牛僧孺、宦官群体、黄巢、朱温则共同见证了唐朝的覆灭时期。每个人的人生际遇都与唐朝的命运起伏息息相关，而他们的命运构成的轨迹就像唐朝吐纳呼吸的躯体一样，反映着这个王朝内在的政治机理。

这些在时代洪流中引领着历史潮流的风云人物，他们努力着，拼搏着，挣扎着，有人备尝成功之后的孤独，有人努力过后感慨人生的无力。无论如何，当一切都已落幕，他们留给后世的不是世俗功业，而是个人努力挣脱命运安排时所带来的普遍思考。人生总要谢幕，但唯有思想不朽。

儒家思想体系

在所有的人物中，李世民、徐世勣、武则天的故事分别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儒家思想体系的特征。李世民将唐朝推向鼎盛，却在晚年陷入长期的困惑：为什么权力继承与血肉亲情不能两全其美？为什么“成王败寇”的逻辑总是催生出无休无止的宫廷斗争？李世民思考的结果是斩断“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的道路，从而避免权力斗争的发生。然

而，技术性调整并没有改变“成王败寇”的逻辑，在李世民去世之后，武则天就再次通过权力斗争而取得皇位。

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李世民认识世界的方式被儒家思想体系定义，自然难以跳出儒家思想看到问题所在。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家思想没有为皇权提供超越世俗道德基石。“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皇天”只会支持那些有德的君主，君主失德就可取而代之。这是把君主的合法性建立在执政绩效的基础上，自然能倒逼君主勤政爱民、实施仁政，但也预设了君主能够被替代的可能性，而那些怀有政治野心的人便会以君主失德为借口，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为自己的权力野心制造正当性理由。最后，有德与无德的逻辑变成获取胜利就顺天应人，夺权失败就大逆不道。一切以胜败为依据，而道德只是胜利者的外衣，权力斗争自然难以止息。

如果说李世民的困惑揭示出儒家思想体系的世俗取向，那么武则天的失败则反映出儒家思想体系的超稳定性。武则天在有生之年战胜了所有对手，但在登上权力巅峰时，却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只是儒家秩序中的一个弃儿，是自己的毕生奋斗成功放逐了自己。武则天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时间竟然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而她又如何在时间的流逝中保证权力的延续?

武则天痛苦地发现，在儒家思想定义的时间里，兄终弟及也好，父死子继也罢，都是以男人为延续的载体。她突然感到自己被时间抛弃，从而在这个不可一世的女皇帝心中引起巨大恐慌，狄仁杰一句“三思立，庙不祔姑”就足以攻破她所有的心理防线。最后，武则天以还政于唐的方式宣布了自己的妥协，也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为儒家思想体系的超稳定性写下注脚。

而徐世勣的成功伪装说明，当儒家思想渗透到具体的治国实践时，道德纯洁性的要求可能会带来普遍的虚伪和伪装。徐世勣一生战功卓著，为唐朝的建立和稳固立下汗马功劳，但是真正让他能够在政

坛屹立不倒的则是他的道德伪装骗取了皇帝的信任。终于，在是否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他没有像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那样坚守原则，更没有像他标榜的忠诚那样捍卫皇室，而是撕破了道德面具，将武则天送上皇后位置，给唐朝皇室险些带来了灭顶之灾。徐世勣的实际行动是对他道德伪装的巨大讽刺，而他能长期伪装，直到临终才露出马脚，这恰恰说明将道德原则普遍化、纯洁化的努力反而会走向它的反面，使得伪君子大行其道。

总结起来，儒家思想并没有为政治秩序提供超越世俗的道德基石，它自身的逻辑预设了成王败寇、改朝换代的可能性，但是它的伦理构建是如此精密，使得它能够在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中保持自身的稳定性。而将儒家思想当作治国准绳，可能会导致普遍的道德虚伪。

皇权的绝对性与完整性

皇权的绝对性、完整性，以及皇帝为保证皇权所做出的努力，是决定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也是塑造君臣关系及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宋太祖赵匡胤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实际上道出了历朝皇帝的共同心理，要么全部得到，要么彻底失去。皇帝虽然享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却一直缺少最起码的安全感，他需要像猎人一样，对所有的潜在竞争对手保持高度警惕。

长孙无忌显然对皇帝的内心不安洞若观火，因此他也能利用皇帝的这种脆弱心理为自己服务，并在此基础上找出打倒政敌的便捷途径，那就是“诬告谋反”。无论是否属实，只要告发谋反，就足以引起皇帝的猜疑。如果对方碰巧还颇具实力，则在客观上具备了谋反的能力，那么无论他是否谋反，皇帝这时都会视其为潜在的挑战者。长孙无忌正是利用皇帝的这一心理，连续诬告江夏王李道宗和吴王李恪谋反，从而对二人不审而判、不教而诛。

然而，当长孙无忌如日中天之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了与皇帝分庭抗礼的权势，而这恰恰构成了皇帝猜忌的理由。于是，许敬宗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给长孙无忌来了个请君入瓮。许敬宗只需要告发谋反，并告诉皇帝长孙无忌的实力已经威胁到皇帝，就立刻为长孙无忌带来灭顶之灾。同样的法则，长孙无忌因之而兴，因之而败，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除了长孙无忌之外，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人同样能够感受到皇帝的不安。他们三人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在他们不断为朝廷冲锋陷阵、挥洒热血之际，他们的军队规模在不断扩大，实力也在不断增强。因此，当郭子仪、李光弼和仆固怀恩从战场胜利归来，等待他们的不仅有朝廷的赏赐，还有皇帝的猜忌。这时，三位功臣的人生走向开始出现分野，郭子仪以道家哲学明哲保身，李光弼选择了不偏不倚的中立，而仆固怀恩则用反叛来惩罚皇帝的猜忌。三个人的选择无须做严苛的道德指摘，而是共同揭示出：当皇帝为保皇权而猜忌功臣，就难以做到真正尊重人的价值，激发人尽其才的活力。

唯有宦官，是皇帝猜忌心理的受益者。宦官由于生理缺陷，不仅不具有独立的人格，更难以在儒家秩序中自立门户。因此，皇帝才能放心地把权力交给宦官，并安心地把宦官当作自己的某种心理延伸。而宦官掌握权力，本身就是朝廷政治的一个异端，因此，“来路不正”的宦官对朝廷大臣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排斥。可以说，皇帝开始任用宦官就意味着对大臣和正式制度的不信任，这促使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窦文场、王守澄、仇士良等宦官相继崛起，他们更懂得迎合皇帝猜忌大臣的心理，从而不断稳固了宦官的地位，最终发展到挟制人君、不可收拾的地步。皇帝把宦官当作自己的影子，以为具有生理缺陷的宦官不会威胁到皇权，但是最终却受到自己影子的挟制，岂不是绝妙的悖论?

于是，皇帝不断通过制度设计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完整性与安全性，这是中国古代制度变迁的一条清晰脉络。无论是宋代地方官职的冗员现象，还是元代的行省划分，抑或是明代废黜宰相制度，都是出于维护皇权绝对性的需要，都是通过牺牲活力的代价换取中央集权的效果。

然而，当皇帝能够坐享绝对权力时，真的就能实现内圣外王吗？唐玄宗的前后变化恰恰说明绝对权力能让一个人的精神陷入封闭。唐玄宗前半生英明神武、励精图治，到晚年却逐渐走向反面，从厉行节俭到奢华无度，从勤政爱民到懒惰因循，从虚心纳谏到刚愎自用，唐玄宗就这样用自己的后半生否定了前半生。然而，更可怕的是唐玄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转变，他手握绝对权力而丧失了基本的认知能力。这是因为，当唐玄宗能够不受制约地判断一切、决定一切时，下面的官僚集团就会通过信息输入证明他的正确性。久而久之，唐玄宗本人既是结论又是证据，还是论证过程，他永远是正确的，因此也失去了基本的认知能力，直到安禄山造反他才如梦初醒。

用这么大的代价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与稳定性，但如果使用它的人不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时刻保持警惕，如何能防止不被它腐蚀或囚禁？那些因为猜忌而被伤害的人，包括李隆基作为皇帝本人的遭遇，无不说明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官僚政治

争论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百代皆行秦政制”，实际上说的是历朝历代是继承和延续秦朝建立的官僚政治，而官僚政治更加准确地揭示出中国古代政治的本质。

毋庸赘言，在其他国家还处于封建时期时，古代中国就建立起一套严密的官僚制度，这代表了古代中国的先进性与创造性。“封建制”与“郡县制”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众多争议，“封建制”即封土地、建诸侯，实际上带有贵族色彩，而“郡县制”本质上就是官僚科层体系，能够打破出身对一个人的决定作用，从而为社会各个阶层打开相对平等的上升渠道，也能为治理国家提供一套理性的制度体系。然而，在这些优势背后，官僚制也有它难以克服的缺陷。

李密曲折命运，从一个侧面说明官僚制具有“不负责任”的倾向。“封建制”与“郡县制”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诸侯对所辖的土地具有人格化的所有权，他自然会负起主人翁的责任。但是官僚只是上级的代理，他的利益诉求是获得官职晋升，至于王朝的整体利益则是屈居于官职晋升的利益之下，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为了官职晋升而牺牲整体利益。换句话说，上级就像是委托方，而官僚如同代理方，委托方与代理方的利益并不一致，所以有时候代理方会通过损害委托方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李密遭遇失败恰恰就是遇到了这一困境。

李密只是经历了一次惨败，完全有资本东山再起，却在部属的“绑架”中走上了投降的不归路。道理非常简单，投降之后，李密作为旧主公，虽然会遭到新主公的猜忌，但是部属还可以为新主公所用，俸禄不减、官位不降，只是换了一个老板打工而已。也就是说，官僚制的有效运转，需要官僚变得工具化，但是过度工具化则会使得官僚丧失基本的主体性和责任心。

而李林甫、安禄山等人的政治伎俩则反映出官僚制还具有让信息失真的倾向。信息是政治的神经，是维持政治体系运转的血液。在等级森严的科层体系中，下级为博取上级欢心，自然会对信息进行有意识地过滤选择，从而导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产生扭曲。尤其是在当时，由于缺少新闻舆论，皇帝获取信息的渠道为官僚体系所垄断，信息失真难以得到矫正，从而容易导致皇帝被虚假信息所包围。

安禄山通过贿赂朝廷的使者，使信息从源头上就已失真，从而长期掩盖了自己图谋造反的事实，用虚假的信息蒙蔽了皇帝的判断。直到造反前夜，皇帝还在严惩直言安禄山造反的人，造成“天下皆知而皇帝独不知”的信息不对称。而李林甫更是玩弄信息的高手，他通过垄断皇帝获取信息的渠道，能够随意控制皇帝获取的信息，从而通过定义信息输入而牢牢控制住皇帝的思想认识。最后，李林甫为相19年，而唐政衰矣！

李密的困境，李林甫、安禄山的手腕，还只是官僚制在正常运转情况下的弊端，然而官僚制产生蜕变，滋生出既得利益和利益集团两颗毒瘤，这才是真正具有毁灭性的破坏力量。

既得利益与利益集团

既得利益是既定政治秩序的受益者。在历朝历代的政治秩序中，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得意者亦有失意者，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既得利益者。出现既得利益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为了维护现有的利益阻碍改革、破坏创新，甚至不惜牺牲王朝的整体利益。对此，安禄山与裴度都有发言权。

安禄山是既得利益的受益者，裴度则是受害者。安禄山起兵造反之后，虽然一路攻城略地、高歌猛进，但是天下勤王之师四合，已经对他形成了包围态势。哥舒翰奉命镇守潼关，可以阻止进攻；郭子仪、李光弼从西北出兵，正好截断退路，总体而言可以让安禄山进无所攻、退无所守，朝廷完全有机会把安禄山的叛乱消灭在初始阶段。但是在朝廷占据天时地利之时，却由于既得利益作祟而失去了最重要的“人和”。

当时的朝廷宰相杨国忠，为了专宠固位、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开始在长安城训练一支新的军队，这被镇守潼关的哥舒翰认为是针对自己，从而使将相矛盾陷入难以调和的境地。而杨国忠为了保全自己、打倒对手，明知道镇守潼关是万全之策，而弃关进攻只会自找死路，仍然劝谏唐玄宗命令哥舒翰弃关进攻，结果哥舒翰战败成擒。杨国忠为既得利益成功打败了对手，却让唐朝丢潼关、失长安，陷入长期的内乱。既得利益扭曲了朝廷决策，安禄山成为最大的赢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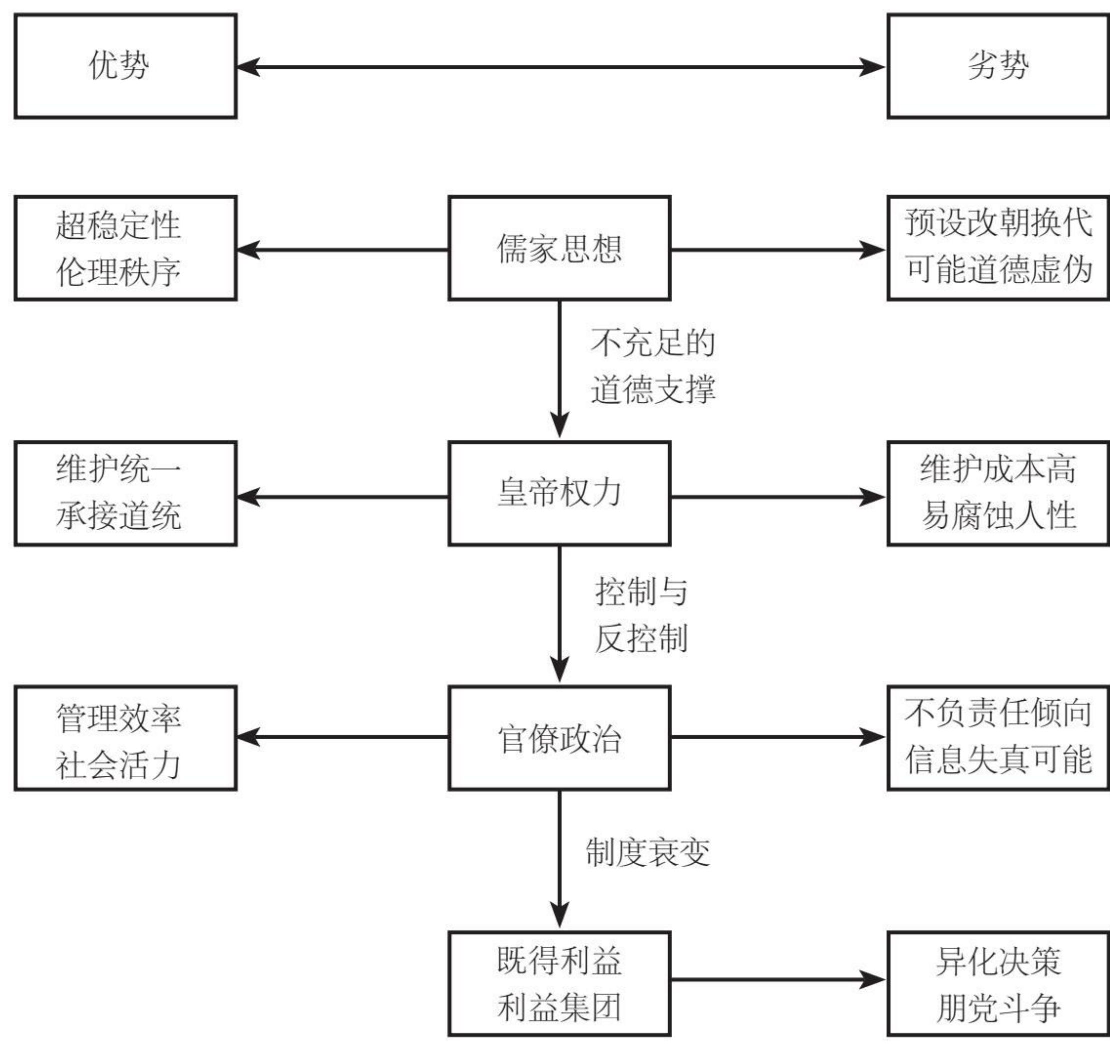
而以削平藩镇、倾力皇室为毕生追求的裴度，则更加深刻体会到既得利益的危害。唐宪宗举全国之力围剿淮西，却4年不克，真的是因为官军缺少战斗力吗？皇帝派去剿匪的第一任统帅严绶，致力于施恩保位，不以攻城野战为务；继任者韩弘，为自己的利益更不惜养寇自重，将具有杀敌积极性的将领李光颜晾在一旁，而自己则以平乱的名义坐享国家源源不断的军饷。主帅都是养寇自重、发国难财的思路，藩镇怎么可能得到平定？裴度的个人魅力不能改变既得利益者的行为逻辑，而一旦既得利益难以触动，藩镇之乱只能伴随唐朝始终。

既得利益者是捍卫既定的利益，而利益集团则是维护朋党的利益，二者都是以部分利益将朝廷的整体利益异化扭曲。中晚唐的朋党之争从李吉甫与李逢吉的路线之争开始，到李德裕与牛僧孺对立时已达到白炽化的状态。李德裕善于治国，牛僧孺善于当官，两位各有千秋的政治精英偏要终生对立，以门户之见左右对局势的判断，也使朝廷的决策不再以公共利益为旨归，而是以维护自身利益集团的利益为指向，导致朝廷既无法抓住正确的机会，也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牛李”朋党之争将利益集团的危害性发挥到极致。

既得利益与利益集团都具有自我生成的特点，一旦形成既得利益或利益集团，都会自觉维护自身私利，谋求更大利益，而这也正是官僚制开始衰变的开始。如果皇帝不懂得整顿吏治，听任既得利益或利

益集团不断恶性生长，那么最后皇帝也将被官僚绑架，导致朝廷为既得利益或利益集团埋单。

14个唐代人物（人物群体）揭示的中国古代政治传统，可以用下图表示：



王道解体：权力的负边际效应

内有宦官专权、朋党斗争，外有藩镇割据、蛮夷侵扰，中晚期的唐朝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只是等待最后的致命一击。黄巢和朱温因此趁势崛起冲击着唐朝本就涣散不堪的制度架构。

黄巢走出一条“流寇路线”，他就像遽然而至的洪水，没有目的地冲击着一切，最终也漫无目的地走向了终点；随之而起的朱温，则走出了一条“身在朝廷反朝廷”的“坐寇路线”，把朝廷当作背靠的大树，最终获得了拔掉这棵大树的实力。朱温从朝廷那里获得了道统的继承权、成建制的组织系统、有组织的军事力量，这些最终让他获得了取代朝廷的合法性资源和实力基础。表面上看，唐朝的瓦解似乎在重演历朝历代的故事：朝廷外部的农民起义军与朝廷内部的叛乱官军共同作用，最终实现改朝换代。

事实上，在黄巢与朱温奋起之前，唐朝就已经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与其说是黄巢和朱温毁灭了唐朝，不如说是唐朝自己毁灭了自己。在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中央—地方”关系已经完全改变，从内重外轻的格局变为外重内轻的格局，而朝廷内部的权力配置也日益分散，皇帝不再乾纲独断，宦官、朋党等日益成为坚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于是，安史之乱以后的每一位唐朝皇帝，他们的毕生梦想就是重新实现诸侯平、四海一的局面，再次回到君临天下、政归朝廷的格局。于是，中晚唐的皇帝为了重振皇权而不断努力。

然而，正是集权化的努力让唐朝一次次远离重振皇权的目标。中晚唐的皇帝们在几番挣扎之后才突然发现，他们正面临着两难困境：如果朝廷对骄横的藩镇听之任之，只会导致朝廷权力的进一步丧失，结果会形成负面的示范效应，会有更多的藩镇蔑视朝廷，并进一步坐大。与此同时，如果朝廷试图收回藩镇的自主权力、实现重新集权，那么朝廷与藩镇之间会爆发战争，而宦官、朋党等既得利益集团更会从中攫取私利，结果是集权成本上升，进一步弱化朝廷的权威。于是，分权会导致地方诸侯坐大，集权又会增加朝廷负担，唐朝陷入了

某种“权力的负边际效应”，在当前的权力配置前提下，无论是继续分权还是再次集权都会给朝廷带来巨大损失。

就像尼采曾经做过的比喻，如同一个人在两个悬崖之间的钢丝上行走，原地踏步也好，奋勇向前也好，畏惧退后也好，都面临着坠入悬崖的风险。唐朝走到生命的后期，正处于这样的窘境之中，“权力的负边际效应”如同魔咒一样缠绕左右，无论朝哪个方向发展都面临着一样的毁灭风险。在唐德宗到唐武宗时期，唐朝还有余力进行削藩，但是集权化的努力未告成功、反耗国力，从唐僖宗直至末代皇帝，唐朝已经无力节度藩镇，而分权的结果则是藩镇日益嚣张，最后终结了唐朝300年的国祚。

一个创造出无比灿烂文明的王朝就这样在内外交困中寿终正寝。它曾经努力想要重回昨日旧梦，但是“权力的负边际效应”就如同命运的法官落下的法锤，无论它往哪个方向努力，都是向灭亡更靠近一步。

历史的启示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一句非常悲观的话：“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这位著名历史学家以沉重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历史哲学的沉重问题：人类真的不能走出历史的周期性循环，避免错误再犯、悲剧重演？

汤因比或许会把中国的古代历史当作他的论据，治乱兴替的周期重演，恰好印证了“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的判断。黑格尔曾经也说，古代中国是一个“空间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时间的”国家，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况；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法发生任何

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不断重演的改朝换代似乎已经将时间冻结，而只是让不同的演员在不同的场景下演绎同一个剧本。

历史学家或哲学家的话语也许太过犀利，但确实揭示出中国古代历史的某些本质特征：为什么历朝历代都没有走出自我毁灭与自我重建的循环？从唐朝的衰落可以看出，没有哪个皇帝不想传之万世，没有哪个王朝不想赓续千年，在走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上，历代精英阶层无不深感无力：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他们无法改变儒家思想体系在文明开始之前的最初设定。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君主并没有万世一系所需要的超越世俗的道德基础，君主存在的前提是执政绩效，也就是所谓的“有德”。反过来看，当君主“失德”或者仅仅是被认为“失德”，他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资格，被统治的人就可以揭竿而起“诛一夫纣矣”。可以说，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王朝更替的可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治乱兴替已经成为人们牢固的心理预期。

他们同样无法改变皇权的绝对性与完整性。集体宰相制度营造的民主氛围，文人清流构成的朝野舆论，儒家思想体系的软性约束……这些都是对皇权的重要制约力量，但制约是在皇权产生之后的产物，它并不能否定皇权的绝对性与完整性。且不说皇帝为了维护皇权的安全要付出巨大的制度成本，单看皇帝受到皇权的腐蚀，只要年深日久，人性总是难抵诱惑。居于政治体系顶端的皇帝一旦蜕变，这套体系自然难以持续有效运转。

他们也未能发明更多配套制度来遏制官僚政治的弊端。官僚制是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发明，尤其是与选拔人才的科举制相结合，见证着中国古人在制度创新上的智慧。然而，官僚制有着比贵族制、封建制更多的优越性，但也有它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比如说不负责任的倾向、信息失真的可能，尤其是既得利益或利益集团会引发制度衰

变。治理国家过度依赖于官僚政治这一种制度模式，在发挥优势的同时也自然会把弊端发挥到极致。

按照上面这三条分析，要想走出历史周期律，或许也需要从这三个方面反向着力，从思想层面来说，应该改变儒家思想体系对执政绩效的依赖。执政绩效、民本主义确实能够提供合法性支持，但问题就在于，当执政绩效一时不佳，也就难以赢得百姓支持。换句话说，当人们的支持不仅仅出于利益，还出于超越利益的道德因素时，人们才能对统治者给予一以贯之的支持，正因此，唯有充足的道德合法性，才能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都能赢得百姓心悦诚服地支持。从权力层面来说，应该改变权力不受约束的情况，这就需要通过法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制度层面来说，应该创造更多配套制度来抵消官僚制的缺点而发挥其优势，这就需要建设民主和问责制度，用百姓的监督对抗官僚集团的弊病。

政治的视角只是看待古代中国的一种方式，黑格尔说古代中国没有时间，如果从治乱交替的角度还有几分道理，如果从更为丰富的文明层面，则可以说毫无道理。中国古人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自然科学上的进步，丝绸、茶叶、瓷器等方面的成就都可以说是独领风骚，曾在人类的文明星空中熠熠发光。而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经历了文明的沉沦又再次复兴的国家，这其中有着这个古老民族延续几千年的生生不息的力量，这是一种比政治本身更为强大而持久的力量，也是这个民族屹立世界的自信所在、底气所在。

正如有的学者把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称作历久弥新的“中国文明基体论”，中国能够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成为唯一一个未曾断代的文明体，并在千年文明的古树上发出现代新芽，自然有它深层的道理。古代中国保留了当今世界最为丰富的文献材料，为后人思考人类社会的深层问题提供了难得的素材，这不仅是中国的财富，更是全人类的财富。

本书正是对中国历史中一个片段进行凝视与回眸，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剖析唐朝政治的得失。或许观点、论证与分析都存在不足，但是它在片刻凝视中也足以带领读者遨游历史的星空，获得一种亦真亦幻的温情。这本书无非是一种历史的邀请，而当人们哪怕只是对历史做片刻凝视，也足以获得处世的智慧、创新的激情与前行的动力。于斯足矣，夫复何求?